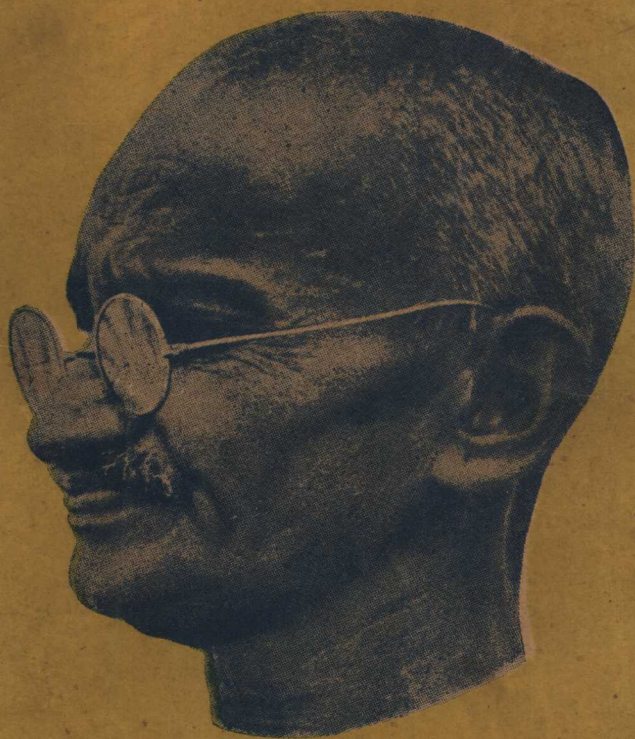


甘地自傳

吳耀宗 譯



青年協會書局發行

種一第書叢年青

傳自地甘

Mahatma Gandhi:

His Own Story.

有所權版

民國廿四年六月再版

原著者

M. K. Gandhi

編輯者

C. F. Andrews

翻譯者

吳耀宗

出版者

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博物院路一百卅一號

印刷者

華豐印刷所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每冊定價壹元郵費伍分掛號另加八分

原 序

這一本自傳——麻哈瑪甘地稱之爲『我對真理的試驗的故事』(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所採用的材料最先是由他用本國的語言，在一九二二至二四年長期監禁時期中，向他的一個同在獄中的政治犯口授的。後來它是在他的古查拉提文報名奈發着溫的分期登出，並由他的至友馬哈達夫狄西和比雅利樂尼亞譯成英文，並經他自詳加修正。史拉德女士也幫忙把英文加以潤飾。原稿由亞米特巴的奈發着溫書局印成兩厚冊出版，八開紙共一千二百頁，也在美國荷慕時博士的報名統一(Unity)的分期登載過。

還有一本重要的書被採用過，那就是甘地自己敘述他在南非洲的經驗，名叫南非洲的靈力運動的那本書。這書是由高溫治狄西譯成英文，它沒有在美國出版，只在印度印行。我在採用這些文件和節錄它們的時候，我願誠懇地感謝譯者之能忠於著者的精神。

我們若在這三本書裏面探求，要得到甘地對於人類行爲的估價的線索，我們便知道這估價是

集中於三種主要的德性的，那就是真誠，仁愛，清潔 (Truth, Loving-kindness, and Inner Purity 在梵語爲 Satya, Ahimsa, Brahmacharya) 第一第二兩種合起來就是人的靈魂亘古的追求的對象；它要在兢兢業業，出汗泥而不染的生活中，最後達到脫離塵世的目的。生命中節奏完全的音樂需要真與愛的融和。但這音樂是這樣的難於精通，而又需要那樣完全的解脫，所以只有一個在肉體上和精神上都能摒除情慾的人，才能得到成功。因此，在甘地的著述中，他有時候注重愛，有時候注重真，但清潔這個意義却是一貫的。他深切地相信，只有清心的人能見上帝，而他又爲清潔這一句話定一個很具體而清楚的界說。在他自己，清潔是包含着放棄結婚的生活和一切性關係的完全禁絕。至於他希望其他尋求上帝的人實行至何程度，他自己是要加以說明的。

在他的自傳的一部分，甘地會說，他爲他所寫的會不斷地尋求「神靈」的引導。他確實地感覺，他告訴我們，這一種引導，他在相當的限度內已經得到。因爲他是這樣誠懇地設法把他的內生活所蘊藏着的秘密，呈露於上帝之前，並把任何惡的和善的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公之於大衆，所以我覺得這些記述自有它的一種真純的活力。

在沒有開始閱讀這節本的自傳以前，有兩點應當向讀者先弄清楚。

(一) 他的最長期而又最繁瑣的非武力鬥爭，就是在杜蘭斯哇舉行的，並沒有在這本書裏敘述

到。這是不得已的，因為這整段的記載不容易刪削，所以我經過不少的躊躇，便把它割愛，希望以後還可以刊佈。這自傳的連續性却並不因此而受到什麼嚴重的影響，因為我把奈托爾的靈力運動敘述頗為詳細，而這實在是他在南非洲所成就的道德事業的冠冕。

(二)飲食的節制與禁食聯在一起，這是甘地在人事中尋求實在的一種方法。關於這一點，他自己所寫的已經不少，但因為這是很佔篇幅的，所以我也不能把它採用。但這一個遺漏還是使我慊然於懷，因為有人以他的生活態度為非科學的，而他的試驗正可以把這種觀念改正。它們證明了他是怎樣一個有膽量的探險者，他的心又是怎樣有着自成一家的科學的意識，這便是從假設到事實的嚴密檢查，以達於真理的發見。

這自傳的現在版本，在歐洲和美洲久已感覺需要。最先，荷慕時博士想完成這一件愛的工作。他對於甘地的品格的灼見使他為這工作可以勝任愉快，但他在一個緊急的時候，從美國被邀到伯力斯坦去，而碰巧那時我自己的職務又要我到西方去。因此，這責任便被放到我的身上，而荷慕時博士便擔任為這書作導言。他是使甘地的名字在美國為人所認識，所愛敬的第一個人，凡是知道這件事的，對於他所寫的欣賞之詞，在讀的時候，必能感到深切的興趣。羅曼羅蘭在歐洲所做的，他是在新大陸成全了。

在編輯這本書的時候，我所感覺的最大的困難就是材料太多而篇幅太少。有許多次，已被選用的東西不得不棄置，另外把必不能遺漏的材料放進去。有時似乎是到了最後一次的選擇，但仍不得不重行修正。我這樣做下去的時候，得到一種經驗，至終我覺得我有理由可以希望這些敘述可以引讀者入勝。我的目的方面是叫西方的讀者能夠很容易的了解這本書，另一方面是不要失掉它的特殊的東方的風味。我希望讀者把這書拿來和以前出版的那本甘地的主張同讀。

這本書編輯成功以後，印度的情形已到最嚴重的時候。甘地已再度入獄，但大家都承認，他的勢力仍然是印度事件中最主要的因素。因此，根據着可靠的文件去研究他的品格是必須的，如果我們不願意叫英印兩國最有思想的人士愈發背道而馳。在以前的那本書裏，我是要介紹甘地的思想和主張，在這一本書，我的目的是要用簡略暢曉的敘述，把它的生平介紹於西方的讀者。

用同樣的方法，也是抱着同樣的目的，我已把太戈爾的給一位朋友的信出版了。如果我的健康許可的話，我仍然要寫一本介紹太戈爾的書，如同我寫這本甘地自傳一樣，因為我深信從這兩個人的眼中，西方對於東本方終可以得到了解和欣賞。

安德烈 (C. F. Andrews)

甘地自傳目錄

原 序	一
導 言	一
第 一 章	家世	一七
第 二 章	學生時代	二九
第 三 章	幼年時代	四三
第 四 章	在倫敦的生活	五五
第 五 章	痘國	七一
第 六 章	到奈托爾	八五
第 七 章	在普力托勒	九七
第 八 章	杜爾本的暴動	一一七

第九章	波爾戰爭	一三一
第十章	治疫工作	一三九
第十一章	「到這最後的一個」	一四九
第十二章	蘇魯人的叛變	一五九
第十三章	精神訓練	一七一
第十四章	奈托爾的靈力運動	一八一
第十五章	消極抵抗者	一九一
第十六章	監禁與勝利	二〇五
第十七章	返國	二二一
第十八章	杉伯蘭	二四一
第十九章	開拉	二五七
第二十章	戰務會議	二六九
第二十一章	羅拉案	二八五
第二十二章	安烈沙議會	三〇一

第二十三章 嘉迪運動.....三〇九

第二十四章 編後.....三二一

譯 後.....三三一

導 言

甘地這本自傳，是一部極關重要的文獻，因為它裏面所記載的是一個現代——也是一切時代——的一個極偉大的人物的思想與生活。這位領袖，在他本國的民衆中，具有精神上至高的地位；他把印度的命運握在自己的手中，與統治他們的帝國抗衡，以求民族的解放。在印度歷史這個嚴重時期中，這本自傳，更覺得有深刻的意義。甘地內心的自覺，和印度當前的局勢交互影響的結果，便是這書中所敘述的好像戲劇一般的故事。甘地也就因為這段故事，在全人類生死關頭的時期當中，在劇台的中心出現。

我們想到印度現在的情勢和甘地在其中的地位，便覺得讀這本自傳時，有一種類似驚奇的感覺。這本書的樸素、率直、真純，處處都引起我們無限的敬仰。關於這本書的成功，我們不能不感謝編輯者安得烈先生刻苦細心的工作。他是一位英國人，在印度居住二十六年。除了印度本國的人以外，他是甘地最信任、最敬愛的一位朋友。他與甘地有了長期的密切的個人關係，因此他不但深知甘地的

性格，而且與他的理想極表同情。

我最近在世紀雜誌寫了一篇文說：我們西方的人，如果要了解甘地，就應當曉得他是一個繼承托爾斯泰和其他相類的聖者與先知的人。這些聖者與先知好像是人類那件花紋繚亂的衣裳中一道光輝照目的金線。我們相信人——如同上帝一樣——是一個靈，所以必須用靈的力量去達到他的目的，完成他的生命。換句話說：甘地，同托爾斯泰，霍士（Fox），聖芳濟（St. Francis），耶穌，以賽亞（Isaiah）一樣，是一個『不抵抗者』。

『不抵抗者』這個名詞是拙笨而不正確的，因為牠只表明不以惡對惡，不以暴力對暴力，受害而不事報復的那些消極方面，平常人不容易與墮力和畏怯分別清楚的那些意義。牠完全把那積極的進取的意義，即甘地所稱爲「靈力」（Soul Force）者忽略了。耶穌不朽的名言：『愛你的仇敵；咒詛你的要祝福他，恨惡你的要善待他。』正是不抵抗的真義。不抵抗者是要將人從原始靠賴暴力的野蠻生活提拔到理性與靈的崇高境界。他要使人從現在起，就能用知識，善意，創造的愛，和犧牲的服役——那些將人和獸分別出來的特質——去生活着。惟有這樣的生活才能夠使上帝的國降臨在地上，代替了那些依賴刀劍槍炮，世世代代咒詛人類，使其萬劫不復的許多王國。『不抵抗』這個名詞，並沒有把這些積極方面的意義表示出來，但因為牠已經成爲一個通用的名詞，所以我們也只好沿用這個

名詞去稱呼甘地。

但是甘地不只是不抵抗者的一個。他有特出的天才，在應用不抵抗的方法的時候，其範圍的廣闊，勢力的雄厚，直是前無古人。這種不抵抗的方法，在個人方面會有過純潔俠烈的榜樣。都可播（Dis-khobors）人就是這樣的分作小組，離開周圍的社會，去追求他們理想的生活。摩理斐人（Moravians）及貴格主義者（Quakers）等宗教團體也曾舉起不抵抗的旗幟，宣傳救世的福音；但是等到甘地來了，才算有人在政治方面應用不抵抗主義，以全民族的力量，去求社會和國家的解放。

甘地的南非洲之役（一八九四—一九一四）不但是有組織的羣衆運用不抵抗的方法的第一遭，而且是這種運動的典型。這是有史以來數見不鮮的一個現象：一個被輕視的人數較少的民族，受了一個驕傲的，殘忍的，強有力的人數較多的民族的壓迫。甘地有幾千的同胞被帶到南非洲去作田間粗賤的工作；他們受着不平等的待遇，被一個所謂優等的民族所藐視，所唾棄。他們就是這樣含辛茹苦，日與死亡爲鄰。如果在別的時代，遇見同樣的事件，這些被壓迫的民衆，或則甘心忍受，馴至於死，或則以熱烈的情緒，起而反抗。在鬥爭與殺戮的當中，僥倖的則死裏逃生，不幸的則同歸於盡。甘地一方面決定不使他的同胞在壓迫的威力下馴良地生活着，同時他也不肯使他們自己和壓迫他們的人瀝血伏屍於殘暴的戰鬥裏。他從精誠卓絕，久經煅煉的精神中發見了一個更好的方法。他用超

人的技能和忍耐，使數千沒有知識，沒有受過訓練的訂有僱約的工人，只憑着個人以身作則的力量，使他們團結起來，發動了一個「不抵抗的反抗」數年鬥爭之後，竟能得到他們所希冀的自由。甘地的第一步，是使他的從者不參加那剝削他們基本人權的社會的生活——這就是不合作。(Non-co-operation) 他的第二步是訓練他們，使他們不以暴力加諸壓迫他們的人——這就是非武力。(Non-violence) 他最後的一步是領導他們去做那為壓迫者服役的義舉：凡是對方需要幫助的時候，他們都去救助——這就是靈力。(Soul Force) 當蘇魯人叛變的時候，甘地與其從者停止了他們對抗的運動，去援助、慰勞他們的仇敵。當約漢斯堡鬧瘟疫的時候，對方的病人和死者，他們都去看護和埋葬。當戰事發生的時候，他們到英人的戰場上去救護傷兵。一個求自由的鬥爭，應用「不要以惡勝惡，要以善勝惡」的原則，這是有史以來所僅見的。那在宇宙和人的心中運行的道德律究竟為牠自己作了辯護，因為甘地和他的從者得了最後的勝利。從今以後，凡有對於不抵抗主義發生懷疑的，非洲的例子便是他們的答覆。

甘地在南非洲所成就的，比較以前同樣的運動雖然是偉大，但與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他在印度抗英的運動比較，便覺得南非之役是渺乎其小的。在這次運動，甘地變成了一個擁有三萬萬人口的偉大民族的領袖。在這一個時期中，他與勃魯士、華盛頓、加里波的，孫中山先後媲美，為擁護

人類自由的健者。但他究竟是超出這些人之上，因為他不肯以爭自由的原故而動刀兵。他在這些愛國者的當中是特立獨行的一位。他所用的是精神的武器。在他的追求中，他成功了一種和平革命的方法，使世界政治的運用開了一個新紀元。在他的不合作的程序中，他顯然是人中的大勇與上智。他能以紀律訓練偌大的羣衆，使其就範，又可以說是世界罕有的幹才。在一年的當中，他證明了用非武力方法去爭自由，雖在萬難之中，仍有牠莫之能禦的勢力。雖然正在嚴重的時候，他沒有達到最後的目的，這是因為鬥爭的熱烈和問題的重大，使他忘記了，或是忽略了，他自己在南非洲所諄諄告誡別人的，即不抵抗的方法需要時間去達到牠的目的的那種意義。用刀兵的時候，一剎那間可以造成全勝或全敗的局面，但是運用精神的方法，則非數年乃至數十年不能使理想實現。甘地在南非洲二十年堅毅的奮鬥，可以證明不抵抗的方法惟有經長期的試驗，才能得最後的勝利。但是這個原則甘地自己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竟違反了。甘地當時使民衆希冀急速的成效，以致偉大的運動竟從內部崩壞。但是我們並不因甘地這次的失敗而否認這個原則，因為以後的運動，如果根據這個原則去進行，勝利仍然是屬他的。

甘地既發見了自己的錯誤，馬上就設法將錯誤改正。這一件事最足表現甘地的偉大。他是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十日被捕的。他在衣拉華達獄中和被釋後養病時期中的長期靜默，使他得到了覺悟。

他在印度的民衆中，行了一件奇事：他做了一件沒有人做過，也是別人以爲必不能做的事——就是聯合全國人民爲整個的持久的民衆運動，以與壓迫他們的帝國主義相抗。這個幾乎成功了了的運動，使大英帝國從根本動搖。英國的孟買總督喬治魯意這樣的說：『甘地的試驗，是世界有史以來最宏偉的試驗，而牠的成功，只差了毫釐。』但是這個運動實在使民衆過於緊張，因而終於崩潰。他在南非洲的運動，只是小規模的，如今他在印度所領導的，却是大規模的運動。於是甘地不得不重新訓練民衆，使他們能擔當爲自由奮鬥的重任。他必須使他們有內心的修養，在精神上有勝利和堅持的把握；他必須使印度人民革除一切社會的惡習；永遠終止使民族分裂萎弱的政治，種族與宗教的紛爭；使民衆在外部的政治與經濟生活，內部的理智與精神生活，都能日趨於自立。換句話說：他必須以愛的公例教訓他們，使他們遵守着這個公例，做他們自己命運的主人。

當甘地在長時間的養病時期中，擔當了這件事爲全民族求精神復興的鉅大工作，他便到了他一生最偉大的時期。他暫時放棄了政治方面的工作，留給能力較小的人去做。他現在的任務不再是組織政黨，當政治會議的主席，主持愛國的政治運動那一類的事。這些工作固然仍在進行，也是必須進行。但是還有那更深的更高的改造民族精神的工作，——這便是他以後的任務。他馬上規定了幾種取得印度自治所必須具備的精神紀律的試驗。回教人與印度人必須消除了他們向來的交惡，要爲那

民族復興的共同事業，相處如弟兄。所謂「賤民」(Untouchables)者，必須從黑暗中救贖出來，待之以愛與同情，使與其他民衆一律。婦女的地位，必須提高，使其在政治、經濟、社會的地位與男子平等。酒的買賣必須禁止。愛國者所穿的家庭所紡織的布，必須推行於全國，使之成爲內心清潔與表現自由的特徵。而其最要的，是每一個人必須摒棄暴力，消除心中的恨惡與懼怕，以點鐵成金的愛，使民族的敵人大英帝國，能夠由敵人變成朋友，而達到民族的解放。甘地在個人的生活中，早已實行這些主張。他在阿米特巴有一個宗教學院(Ashram)而兼爲實行友愛生活的一個地方，曾經按照這些主張，有過小規模的組織。現在他把這些主張公佈於全國，努力使牠實現。

在這一個時期中，甘地變成了一個宗教領袖。他本來早就是一個宗教領袖，不過沒有現在這樣的顯明。在南非洲的時候，他是一個幹練的組織者。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的時候，他是一個爲民族爭自由的愛國領袖。在這兩個運動裏，甘地都能超過他當時所接受的任務，而爲一個更偉大的人物。他的不抵抗的程序可以說是一種在內裏運行着的偉大力量的有形表示。從最初起，在他的實際改革計畫中，甘地所注意的不止是政治和社會的目標，而且是道德和精神的理想。他當時也許連自己也不大理會，但他實在是受了自己性情的驅使，向着宗教的道路上走。現在呢，在一剎那之間，他的目標忽然從本能直覺式的運用，變成純意志的表現；換句話說，他變成一個精神界的先知。他不只是政

沿革新者和民族領袖的一個；從今以後，他是歷史上改變了世界途程，永垂不朽的十幾個卓絕的宗教天才的一個。

我們從現在的時勢，要回顧到英國在甘地當時這一段生活中所做的事。兩個大民族的復和與新關係的建設，是何等的機會！甘地在以前從未顯過這樣的力量。在這個政治領袖的時期當中，他是無與倫比的一個最有潛力的人物。我們翻遍世界的歷史，並沒有找到第二個在一時間能夠左右數萬萬人民的領袖。無論他是宗教家、軍事家，或是政治家，在全印度中甘地的地位是莫與之京。所謂大人物的，不得不尊敬他的聖潔；所謂飽學之士，不得不佩服他的智慧；至於盈千累萬的羣衆，則因他的愛與犧牲而歡欣鼓舞。在一個語言不同，風俗不同，信仰不同，而又有大多數不識字的人民中，甘地的名字是家喻戶曉的，他的主張是處處聽從的。以一個人的力量而能號召三萬萬的民衆，這是人類中唯一無二的一件事。在這個時期中，這個力量忽然深刻化了：牠沒有以前那樣急迫的要求，動人的表示，和切實的步驟，但是牠的範圍，和深入人心的功能，却是與以前沒有分別。牠並不像汎濫的洪水，有沛然莫之能禦之勢，牠只像地底下的泉流，滋潤着土壤，使含生之物都受其賜。現在的甘地不但是印度人民的政治領袖，他簡直握着靈界的權威，使人們五體投地地崇敬。他已不復縈懷於舉國莫衷一是的政治問題；他忽然變成一個靈界的領袖，注重人民靈的生活，使他們能獻身為仁愛與和

平而奮鬥。這些事實，在當時的英國，有沒有聰明的政治家看到？當時的大英帝國豈不能利用這個時機，與甘地携手，使印度，使大英帝國，使全世界都能因這崇高的試驗，得到拯救？

我們這種希望所以沒有變成事實，就是因為英國保守黨的愚拙。他們以為甘地自動的退出政治舞台，是因為他已失却民衆的信仰，不能再作羣衆運動的領袖。在印度英政府捕拿和監禁他的時候，他們以為從此可以打倒他的勢力，使他的從者分散。他被釋放并恢復健康的時候，沒有答應再作民衆的政治領袖，他們又以為是他承認了他自己的錯誤和失敗，以為在已往幾個月中帝國所認為最大的威脅，如今已烟消雲散，只剩下一個赤着身體，身材弱小的人，和圍繞着他的幾個瘋狂的自命為政治改革家的從者，過着沒有人理會的生活。如果甘地就此下台，印度的危險便已過去，他們便可以為所欲為，以支配印度的一切。大英帝國便是這樣愚拙地盲目地，自私地重演大戰以後曾經引起嚴重局面的那一幕誇大和壓迫的悲劇。英政府這種謬誤的政策，在當時便造成了四種事實，使印度人民的憤恨和失望，更甚於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間甘地實行不合作運動的時候。

第一，據當時一位英國自由黨裏面的人這樣的說：印度的事件，從英國方面來看，始終就是所託非人。在印度方面是甘地這樣的人，而他的對手却是那位巴根海；兩相對照，使人不勝感慨。英國在亞洲的勢力的命運就是這樣懸在他們兩個人的手裏。

第二，因為印度憲法將要修改，所以當時有西門委員會的任命；但是委員裏面竟沒有印度的代表。這就是說，在印度三萬萬人口中，沒有一個人——連甘地在內——配與英國人共同決定印度的事件。這件事激動了印度全國人民的公憤。各黨派，各宗教的人都放棄他們向來的爭執，聯合起來去抵制西門委員會。凡是西門勳爵和他的隨員所到的地方，人民都拿着侮辱的標語，示威反抗，以致委員會的工作，完全不能進行。

第三，最使人難堪的，就是西門委員會不但受保守黨和自由黨的擁護，就是工黨也是與他們一致的。麥唐納不但在衆議院投贊成的票，他並且讓工黨的代表充委員會的委員。他爲什麼愚拙到這個地步，實在是莫明其妙。自從工黨採取這樣態度以後，印度人民對於英國所遺留的一點信仰，也就隨之而消滅。自甘地以下，大家都覺得他們再不能相信任何一個英國人，無論他是在教會的或在政界的，無論他是私人或是公僕。工黨本來是他們最後的希望，但如今工黨也投降到敵人那裏去。從今以後，他們與英國的關係，便要永遠斷絕。

最後——彷彿造化弄人似的——米岳女士印度祖國那本書出版了。這本奇怪而侮謾的書在當時那重大事件正在演變的時候似乎不很值得注意，但若將牠與那時的背景連貫起來，便覺得這本書的出版是第一等的錯誤。爲應付當時嚴重的局面，本來已經需要極度的善意和穩健的態度，但是忽

然發現了這本書，牠公然地將印度譏笑和藐視，連甘地和泰戈爾都受牠的毀謗。在這個時候，要印度人相信這本書不是英國在背後搗鬼的產品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無論如何，印度祖國這一本書是當時使印度人不能與英人合作的一個最大原因。

印度從幻夢覺醒以後，英印的關係便完全斷絕。正如一九一九年一樣，英國重複錯過了牠的機會，驅印度人到不得不反抗的路。這時甘地正在退隱着，教導民衆從事內心的革新，以期實現民族的企望。他留心着事態的進展，知道局勢是向着災禍的路走。一壁是英國——固執的，刁頑的，愚昧的，堅決地始終信任武力的英國——和擁護帝國的人們；一壁是印度，被憤怒的火燄焚燒着，而且更甚的，因為大家失却忍耐和自制，已經起首懷疑着甘地所竭力主張的不抵抗的理想。那些血氣的青年所希望的，不是非武力的不合作，乃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辦法，運用武力，解除他們的羈絆。甘地在這個人心鼎沸的時候，是否仍能繼續他那改革社會與內心修養的根本工作？假如他自命清高，不去參加當時的羣衆運動，他是否能保持他原有的勢力，將來仍能有所作為？他不是一個印度人麼？在這個時候，正如在一九一一年，他豈不覺得他應當與一切的印度人取一致的行動，以維護他們的名譽與權利？還有最重要的：他豈不應當，正如在一九一九年一樣，挽回將要來到的暴力的劫運，而導之於平坦的抗爭的途途？他已經老而且弱，但是他的力量却沒有衰減。他豈不能作最後的努力，以超絕凡響的不抵

抗的愛，打破目前的僵局，一面得到印度的解放，同時却不致失去英國的同情？

大概就是這樣的思想在甘地的心中迴旋着，終於使他放棄他的退隱生活，回復他的領袖地位，與英國的皇室抗衡。在一九二八年的全印度會議裏，這位偉大的聖者第三次——也許是末次——負起爲印度奮鬥的全責。在那個時候，人民仍然尊崇他爲印度的拯救者；他使用着這樣的權威，向英帝國提出哀的美敦書，限她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以前批准印度的自治。同時甘地鄭重地向民衆宣言，如果到時沒有達到目的，他便要再度領導着全國，組織一個不抵抗的自由運動。

在此文屬稿時，甘地正在履行着他的誓約。在他這樣重入政治舞台的時候，有人說他違反了他自己的主張——即印度人民必須先有所準備，必須自己先有自主的能力，然後可以爲國家的自治奮鬥的主張。但是從一月以後所發生的事實豈不證明他們已經有了準備麼？甘地在精神方面的工作，豈不是已經收了效果麼？若不然，則數百兆的平民所表現的紀律、忍耐、度量、勇敢，和不抵抗的犧牲——這些事實實在寫成人類歷史中得未曾有的一頁——又將作何解釋？更有進者，這位印度的領袖似乎忽然得到一個精神界真理的啓示。他現在曉得奮鬥的本身就是成就，——在爲自由而奮鬥的過程中所受的痛苦就是爭得自由以後的最好的準備。甘地在他所主編的最近出版的少年印度上說：這一次運動的目的，不是自由的實現，乃是要人民得到爭自由的能力。他說：我們要自動的求創傷，甚至求

死亡，希望從犧牲的紀律中我們可以戰勝我們的仇敵，同時使我們可以準備着脫離他們的羈絆。這是一個新的甘地，更深沉，更充實，更可怕的甘地。像耶穌一樣，他變成一個「可怕的溫柔者」——「承受地土」的溫柔者。

這也許是甘地一生最後的日子，然而他已把這些殘餘的光陰完全貢獻給印度，爲她恢復昔日的光榮與權力，使世界最偉大最可敬的文明古國更能向前邁進；這樣重大的責任，真是尋常人所不易擔負的。在這個鬥爭中，甘地要使英國和印度避免暴力，流血，與毀滅的慘劇，所以他會宣言他的奮鬥不只是爲印度，也是顧念到英國，並且我們可以說是爲着全世界的福利，因爲現在甘地的勢力已從印度東漸，更從東方傳播到在困苦中掙扎的歐美。這位聖者在今日已經成爲一個世界的人物。誠然在品格方面，他仍然純粹是東方的人；他有許多的意思，必定永遠不爲那些背景不同的人們所了解；但是他的精神，如同明星一樣，照射到黑暗裏面去。凡是在艱苦中奮鬥的人都歡迎他所給的光明。他的名字已經成爲一個使人崇敬的象徵；他的生活便是一個拯救民衆的計劃。我們現在似乎約略地認識，這位聖者甘地實在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精神界的天才的一位，與老子，孔子，釋迦，蘇魯雅斯帖，以賽亞，和耶穌先後媲美。我們特別的不能不拿他和耶穌比較，不只因爲他們兩個人同是主張不抵抗的。遠在大戰以前，便有人發見甘地內生活的美麗與聖潔是同耶穌一樣的。我們只要看甘地爲印

度，爲世界所抱的願望，便覺得這種比較完全不是牽強的。如果我們要知道耶穌的聖潔在什麼地方，要知道他所以被稱爲救世主有什麼根據，我們只要看看甘地便可以曉得。

我們若要了解甘地生活的秘密，就必須觀其爲人。在人類的領袖中我們沒有看見過像他那樣能使精神的能力表現在一件完全集中了的事業上的人。除了這一點以外，我們再不能找到可以解釋他得到那驚人的力量的原因。他的舉止沒有什麼動人的地方，正如他那幾乎赤着的身體一樣。他的身材和相貌，更是平庸無奇。至於他的智力，若同托爾斯泰比較，簡直是瞠乎其後。他沒有耶穌那樣的口才；他沒有穆罕默德那樣熱烈的情感和堅強的意志。在許多宗教領袖之中，他最與聖芳濟相近，但是他卻沒有這位亞西西人在他的小小的花朵上所描寫的那可愛的審美的感覺，和愛好詩歌的天性。甘地便是這樣一個羸弱的，清癯的，完全不能使人重視的人。但是在這個微渺的軀殼內有一點光明，世人所沒有見過的光明。他的深沉銳利的目光，他的可愛的笑容，他的非常清澈的思想，他的溫柔，和藹，和渺無涯際的同情心，——這些品質一齊把他內在的榮光向外表現。他的外表的平庸正足以反映他的內心的卓越。別的人也許有一些關於閱閱，教育，人品，智力，詞令的特殊稟賦，但甘地却是一無所有。他好像一個純粹的精髓，僅僅披着一層稀薄得可憐的血肉，在人世間行走着。

這些觀察，使甘地的重到政治舞台成爲一件可驚的事實。他那蘊蓄着的靈力和左右民衆的力

量，使他成爲印度以至全世界的一個異常重要的人物。如果英國的統治者是聰明的，他們一定歡迎甘地作印度的領袖，和他合作，以建設的精神，促進永久的和平。但即使在現在，英國仍然可以這樣做。所謂『亡羊補牢，猶未爲晚。』因爲甘地，只有甘地，——『現在是這樣，將來還是這樣』——安得烈（C. F. Andrews）這樣的說，『是印度政治生活的中心動力』，只有他可以挽救現在嚴重的局面。如果甘地不能在這個時候出來主持一切，印度必定不肯馴善地屈服，恐怕要引起一個激烈的反抗，使全世界都被牽入旋渦。爲印度，爲英帝國，爲全人類，甘地都是『生命的道路。』這條路從前曾有人給指引過，但是人們不肯往那裏走；難道他們現在還是那樣倔強不成？

約翰·海衣士·荷慕時（John Hayes Holmes）一九三〇六月十五，於紐約。

甘 地 自 傳

第一章 家世

甘地這一族是屬於巴尼亞階級（註一）的，起先似乎是零售的商人。他們續連三代會做過加地亞華諸邦的首相。我的祖父奧特甘地想必是一個有主義的人。他因為某種政治紛擾被逼離開了波斑打；他是那個地方的首相。他到朱拿加去躲避，遇見當地的長官，他用左手向他行禮。有人問他為什麼這樣不恭，他回答說：『我的右手已經矢忠於波斑打了。』

奧特甘地因喪妻而續絃。前妻生子四人，後妻二人。我在幼年的時候，並不曉得奧特甘地的兒子們不都是同母生的。這六個弟兄中的第五個名叫加巴甘地，第六個是徒爾雪達甘地。這兩位弟兄會相繼做過波斑打的首相。加巴甘地就是我的父親。他曾做過那扎科和萬嘉納的首相。他去世的時候領到那扎科的卹金。

加巴甘地連續結婚四次，每次續絃都是因為前妻死亡。他在第一第二兩次結婚得了兩個女兒。他最後的妻子蒲麗比生了一女三子，我便是諸子中最幼的。

我的父親是愛護家族的；他是一個忠勇俠義，守正不阿的人，只是性情急躁一點。有時他似乎有點放縱情慾，因為他第四次結婚的時候，已經年過四十了。他對於本邦的忠心是人所共知的。有一次，一個政府派來的幫辦，語侵本邦的君主，加巴甘地便憤然詰責他；幫辦因此動了怒，要加巴甘地向他道歉。加巴甘地自然不肯，所以被扣留了幾點鐘，但因為他終不肯表示屈服，所以那位幫辦也就把他放了。

我的父親並沒有致富的雄心，所以沒有給我們留下多少產業。他沒有學過歷史與地理，但是他豐富的實際經驗使他能解決最繁難的問題，並且能管理數百的人。他沒有受過多少宗教的訓練，但因為他常到廟裏聽人講解印度教，所以得到一些宗教的薰陶。到了他的晚年，因為我家一位有學問的婆羅門朋友的請求，他便開始讀紀達經，平常在每日禮拜的時候，朗誦數段。

我的母親所給我的特殊印象就是她的聖潔。她是一個虔奉宗教的人；如果當日沒有禱告，就不肯進食。她每日必定到廟宇去參拜。就我記憶所及，她對於禁食，從沒有漏過一次。她有時許下最不易奉行的願，但她總是始終遵守着的。甚至有病的時候，她也是這樣。記得有一次當她履行一個特別的

(註一) 巴尼亞 (Mudh Bania) 階級是維殊亞 (Vaishya) 階級的一個支派。他原來的職業是農或商。

禁食的願的時候，她患了病，但她却不許疾病間斷了她的禁食的紀律。甚至連續禁食兩三次，在她也不算什麼。在禁食的期中，每天只喫一次，是習以為常的。她還以此為未足：有一次每隔一日竟完全斷食。又有一次，她許下一個願，不見太陽不進食。兒女們知道了，便向天空望着，等候太陽出現，預備向母親報告。在最壞的雨天，有時太陽竟日不出來。也有時太陽出來了，我們趕着去告訴她，但等到她出來了，太陽又復隱沒；她便說：『不要緊，上帝不叫我今天進食。』於是她又重理她的家務。

我的母親有很豐富的常識。國家的大事，她都很熟悉，甚至朝廷的命婦也賞識她的見地。我在幼年的時候常伴着她到外邊去與人談話討論。

這便是生我的父母。我是一八六九年十月二日在波班打出世的。在那裏我度過我的幼年，並初次到學校裏去。我經過一些困難，才學會了乘數表。我想我的智力和記憶力都是極平常的，因為關於當時的生活，除了同着別的學生向先生開頑笑外，我並沒有憶及其他的事。

我約在七歲的時候，父親離開波班打到那扎科去做朝廷裏的官。我就在那裏進了初級學校。當時的情景至今還十分清楚，連教員的姓名也還記得。我在那裏仍是一個平庸的學生，無足紀述；從此一直升到中學，那時已經到了十二歲。在這個時期中，就我記憶所及，無論對師長或同學，我從沒有撒過謊。我是很怕羞的，常常躲開別人；書本和功課是我唯一的伴侶。我每日都是準時到校，散了學，便趕

快跑回家去。我的確是跑的，因為我害怕與人談話，更怕有人向我取笑。

我在中學第一年考試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可紀的事。有一位教育視察員名齋爾斯的，到我們學校來視察。他要我們寫五個字出來作拼字的試驗。其中一個是「燭」字，我把這個字拼錯了。先生把足尖踢着我示意，但我却不知道他的意之所在；我沒有曉得他是要我從鄰生那裏抄襲，因為我想教員的義務是防止抄襲的。結果除我一個以外，別的學生都拼對了。後來先生當面指責我的愚拙，但這是有用處的，因為我是始終不以抄襲為然的。這件事並沒有影響我對於先生的尊敬。後來我知道他還有許多別的短處，但我對他是始終如一的，因為我對於別人的過錯總是忽視；這是我的天性。

在同一個時期內還有兩件事是我所不會忘記的。我平常是不喜歡看課外的書的。每天的功課我自然要做，因為我不願意受先生的詰問，更不願意欺騙他。但有一次我看見我父親所購的一本書，這是述說一件關於沙那華納以孝事親的故事的。我讀了之後，極感興趣。同時我們家裏來了幾個遊行演畫的人；他們所演的當中有一幅是畫着沙那華納背着失了明的父母去參神的样子。這段故事給我一個很深的印象；尤其是關於沙那華納死的時候，他的父母悲痛哀哭的情景。我會用我父親所給我的手琴演奏這一段哀歌，並且對自己說：這是我應當效法的榜樣。

還有一齣戲叫做哈里斯特拿，也使我受了很大的感動。我得到父親的許可去看這一齣戲；我

被這一齣戲迷住了。我看了又看，時常獨自演習戲中的故事。我自己日夜的想：『做人不應當像哈里斯參特拿那樣誠實麼？』我要像他那樣服從真理，爲真理的原故備受萬苦。這便是這齣戲所給我的唯一的感想。我當時完全相信這段故事是真的，所以每逢想起來，總是流淚。從我現在的常識看起來，哈里斯參特拿不會是一個歷史上的人物，但無論如何，我以為他與沙那華納都是代表一種人生的實在，即使我現在再談起這兩部劇本，我還是一樣要受感動的。

在敘述我的生平的時候，我要說到許多痛苦的經驗。如果我自命爲真理的崇拜者，我決不能將這些事實隱瞞。第一件事是我在十三歲的時候的結婚。我看見周圍與我年歲相同的孩子沒有遭到我的厄運，我便爲我自己傷悲，爲他們慶幸。我這樣額外的早婚，是完全沒有道理的。請讀者不要誤會，我是結婚而不是訂婚。在加地亞華這是兩種不同的儀禮。訂婚的約是可以解除的；男的死了，女的也不必守寡。訂婚是父母主持的，有時連本人也不知道。我自己似乎是訂過三次婚；頭兩次女的都死了。第三次彷彿是在七歲的時候。這一切我都很模糊，但是結婚的經過，現在却還十分清楚。

我的三位弟兄的第一個是早已結婚的。我們的家長決定把我第二個哥哥，一位表親，和我自己三個人的婚事，同時了結。這自然只是爲他們的方便和經濟起見，並不是爲我們的幸福設想，也沒有徵求我們的意見。印度的婚禮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男女兩方所耗費的經濟和時間，實在不少，有時竟

因此而毀家。衣飾喜筵之類，老早就計劃着，彼此還要爭華鬥艷。婦女們無論是否長於此道，總要引吭高歌，甚至因此得病。鄰人們自然是甘心忍受這些喧鬧和婚筵所遺下的污穢，因為他們曉得他們將來也是要這樣辦喜事的。我們的家長知道這些事體的麻煩，所以想一次都把牠弄完。這樣子辦，不但費用可省，而且因為只辦一次，可以比較鋪張一點。我的父親和叔父年紀都已老了，我們又是最小的一輩，所以他們希望在未死以前，能夠得到這最後一次喜事的快樂。

我們看見婚事的準備，才知道我們是要結婚的。我當時以為結婚無非是穿好的衣服，吃，喝，熱鬧，得到一個陌生的女子同玩的那一回事。性慾是後來才有的。

我的哥哥和我從那扎科被送回波班打去。我的父親因為公務很忙，而且很得本邦君主的信任，所以在婚期快到的時候，才能回家。父親所乘的長途馬車，因為趕程的原故，不幸在中途顛覆，使他受了重傷。但婚期是不能更改的，所以父親和我們的興趣雖然減少，婚禮仍是照常舉行。當時因為好玩的稗氣使我專注意到婚事上，竟忘記慰問父親意外的遭遇。

我對於雙親都是孝敬的，但同時我也受肉慾的支配。我還沒有曉得孝敬父母應當犧牲個人的快樂。倪斯古蘭南的歌會有這一句：「絕慾而不清心，必難持久。」我每逢唱到這一首詩，或聽見別人唱時，總覺得慚愧無地。

我的父親雖然受了傷，仍然鼓着勇氣，始終參加婚禮。我還記得當時婚禮中許多的細節，覺得那一天我父親所做的一切，都很滿意，却沒有想到我以後要批評他使我在幼年結婚。自然我自己當時是樂意結婚的，因此我對於這些事的記憶是特別的清楚。我記得我是怎樣坐在新郎的座上；怎樣與新娘同行『七步』的禮，以示百年偕老之意；新夫婦怎樣送糖果到彼此的口裏；和我們以後怎樣起首同居。兩個無知的孩子，便是這樣的奔向人生的大海裏去。我的嫂嫂曾經充分地將初夜應有的知識傳授給我。我不知道我的妻是誰給她指示的。我從來沒有問過她，現在更不願意問。我們當時彼此都覺得侷促不安，不敢對面相看。我因為畏羞，不知道應當怎樣與她攀談，要說些什麼話。嫂嫂所教給我的，似乎不能使我應付當時的困難。在我看來，這些事是不必有人指點的。我們前生所遺下的印象，可以使我們不學而知。我們漸漸彼此認識，自由談話。我們的年齡是相等的，但我不久便行使丈夫的威權。

我曾經說過，我在結婚的時候只是一個中學的學生。我們弟兄三人都同在一個學校讀書。我的大哥班次最高，與我同時結婚的那位哥哥只比我高一班。我們兩人因為結婚的原故，都損失了一年的光陰，我的二哥並且因此就棄學。像他那樣失學的青年不知有多少。恐怕因結婚而妨礙學業的那種現象，是我們印度社會的一個特色。

我自己是仍然繼續着求學的。學校裏的人並沒有把我當傻子看待，並且我很得師長們的鍾愛。學校每年寄給我的父母的關於我的學業和品格的進步之報告都是好的。據我記憶所及，我對於我自己的智力並不怎樣重視，但我却兢兢業業地保守着我的人格。只要一點小小的過犯，便會使我流淚。師長的責備是使我最難堪的。有一次我竟受了刑罰。當時我很悲楚地哭泣。我不是因為刑罰難過，我的難過乃是因為別人以我為罪有應得的。這是我在第一或第二班的時候。還有在第七班的時候所發生的同樣的事件。那時的校長是多拿治依都治基美。學生們都喜歡他，因為他嚴於紀律，而且教授有方。他把體操和棒球都列入男生高級班次的必修科目裏面。我是不喜歡學校裏的遊戲的；以前並沒有參加過棒球和足球那樣的運動。我的畏羞是其中的一個原因。現在我知道這是不應當的。當時我有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為學校裏的運動和遊戲與教育沒有關係。現在我才知道身的訓練與心的訓練在課程內應當有同樣的地位。但是我雖然在學校裏沒有參加運動，我的身體卻沒有因而孱弱，因為我從書本裏面知道步行的益處，所以我便養成一個步行的習慣。直到現在，這個習慣依然在；并因步行的原故，使我的體格保持相當的健康。

我不喜歡運動的主要原因，是我要為父親作看護。每天散學以後，我便趕快回家服侍他。因為我從這種服役可以直接得到運動，所以我便請校長免了我的體操功課，使我能自由地為父親服役。但

是校長却不肯答應。碰巧有一天禮拜六，功課在上午完畢，但是下午四點鐘却要回到學校體操。我沒有時計，而那天陰沉的天氣又把我的觀察弄錯了。我到了學校，學生們全都走了。第二天，基美先生查看點名冊，曉得我沒有到，便來問我不到的原因。我據實告訴他，但他不肯相信，要我納一筆小的罰款。我竟然被人定了說謊的罪，這使我何等的傷痛。我如何能證明我是沒有罪的呢？我想是沒有辦法的，我便在那裏痛哭。我從此便曉得一個真誠的人同時也要做一個謹慎的人。我在學校的疏忽，這是第一次，也是最末的一次。彷彿記得後來不知怎的校長把我的罰款蠲免了。

關於免却體操的事，經我父親書面的請求，後來得校長答應了。但是我雖然在廢止體操這件事上沒有吃虧，我却吃了一個別樣的虧。我一向以為書法的好壞，與一個人的教育沒有關係。直至我在南非洲看見在本地生長和受教育的律師和青年們所寫的字體，我才知道我自己的錯誤，但是欲圖補救，為時已晚了。

我在學校的時期還有兩段值得記載的回憶。我的婚事把我的學業耽誤了一年；校長因為我是一個勤奮的學生，便令我越過一級，以補班次的損失。我的英文程度是很差的，幾何又是一個新的功課。我因此便感覺困難，以為將兩年的功課，併在一年去念，希望未免過奢。我想仍然跑回原來的班次，但是這不但使我自己丟臉，先生的面子也過不去。這個思想便使我堅持下去。數學一門，我仍是刻苦

地研習，到了歐氏（Euclid）幾何第十三題的時候，我忽然覺得一切都很容易，只要用一點思想便沒有問題。以後我便不覺得幾何是一門難而乏味的功課了。

梵文却就比較困難了。幾何是不憑記憶力的，但梵文則處處都須熟讀。這門功課是從第四班起，到了第六班，我便有點灰心。教員是一個嚴厲的人，迫着學生念書。他與教波斯文的先生們適成反比例。教斯波文的先生，功課隨便，很能體諒學生的意思。有一天，我憑着衝動，竟跑到波斯文的班上去。教梵文的先生很難過，把我拉到他的身旁，說：『你怎能忘記你是一個維殊奈發（註一）的父親的兒子？難道你自己的宗教的文字都不念麼？如果你有困難，爲什麼不來找我？我要盡心教你們梵文。你再讀下去，便知道裏面有無窮的興味。你不要灰心，還是到我的班上來。』

他這種親切的態度使我慚愧。我不能不尊重他的善意。到了今日，我每逢想到吉列殊拿尙嘉潘地亞的時候，感激之心便油然而生。因爲我當時如果沒有學會那一點梵文，我便很難有研究聖書的興趣。我還深悔當時沒有多念一點梵文，因爲我現在覺得每一個印度的男孩和女孩都應當有梵文

（註一）維殊魯（Vishnu）是唯一至尊的上帝；他的信徒稱爲維殊奈發（Vaishnava）。他們戒殺生，所以是素食的。他們極重愛與慈悲。

的基礎知識。我更覺得在印度一切高等教育的課程裏面，除了白話文以外，都應當有教授印度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的地位。大家或以爲這許多文字不容易學，但我相信，如果我們的教育更能系統化，教這些文字的時候，也不用英文作媒介，學這些文字必定不是困難的，而且還是一件樂事。用科學的方法學會一種文字，其餘便會迎刃而解了。

甘 地 自 傳

第二章 學生時代

我在中學裏面少數朋友的當中，有兩個是比較深摯的。我和其中一個的友誼，並不長久；不是我放棄他，是因為我結交了其他的那個朋友以後，他就不與我往來了。我與這第二個朋友的關係，是我生活中的一個慘劇。這個交誼為期甚久；牠的起因是我自己生活革新的要求。這位同伴本來是我哥哥的朋友；他們是同級的。我知道他的弱點，但我却拿他當一個忠實的朋友。我的母親，我的大哥哥，和我的妻都告誡我，不要和他做朋友。為保持丈夫的尊嚴起見，我的妻的話我自然不聽，但我却不敢把母親和大哥哥的話置之度外。我向他們為那個朋友辯護，說：『他固然有你們所說的短處，但也有你們所不曉得的長處。他不能把我教壞，因為我和他交友，正是要使他學好。如果他能改過，我確信他是一個有為的人。請你們不要代我擔憂。』

我想我的話沒有使他們滿意，但他們却接受了我的解釋，讓我進行。我以後才知道我的見解是錯誤的。凡是有志使朋友革新的，在進行的時候，不應當和他太親密。真正的友誼，是精神的契合；在現

世裏這是不容易有的事。只有氣味相投的友誼是有益而能持久的。朋友是彼此交感的，所以在交誼中幾乎沒有把朋友改善的餘地。我以為所有不容他人加入的親暱友誼都不應當存在，因為人的學壞比學好更容易。而且凡欲與上帝為友的，必須孤獨，否則須與舉世的人為友。我的見解也許是錯誤的，但是我的結交摯友的企圖是失敗了。

當我初識這位朋友的時候，那扎科正在一個『改革』熱的狀態裏。他告訴我：我們的教員中有許多背着人喫肉飲酒。他也舉出那扎科許多有名的人，說他們也做着同樣的事，并且其中還有中學的學生。我聽見他那樣說，便覺得驚奇而且難過。我請他將這件事的原委告訴我。他說：『我們的民族所以不振，是因我們不喫葷。英國人所以能統治我們，就是因為喫肉的原故。我的身體很強壯，也跑得快，這是你所知道的，這也是因為我是喫肉的人，不會長血瘤；即或長了，好得也快。我們的教員和許多聞人不是傻子：他們所以喫肉是知道喫肉的好處的。你也應當這樣做。嘗試是最有滋味的事。你試一試，看看牠的效力如何。』

他這許多勸我喫肉的話，並不是在一次說出來的：這是在他多次談話中的雄辯的撮要。我的哥哥已經被他誘惑成功，所以他便幫着那個朋友向我進攻。我同我的哥哥和那位朋友比較起來，身體確是羸弱得多。他們都比我堅實，強壯，勇敢。這個朋友的技藝把我迷住。他能作異常迅速的長途跑，並

且擅長跳高和跳遠。加於他的身體的刑罰，無論多少，他都不在乎。他常常向我表演他的技藝，我便受了他的眩惑，因為他的長處，我都沒有。我爲什麼不應當像他那樣強壯呢？

而且我是一個膽怯的人：我怕賊，怕鬼，怕蛇：這些恐懼常在我的心中縈擾着。晚上我是不敢在室外走動的。黑暗對於我是一個恐怖。我幾乎不能在黑暗中睡眠，因為我恐怕這一邊有鬼，那一邊有賊，另一邊有蛇。如果室內沒有燈，我就不能睡。我正在英年的時候，怎好把我的懼怕告訴與我同睡的妻呢？我曉得她比我更有膽量；這是使我慚愧的。她不怕蛇和鬼，什麼黑暗的地方都敢去。我的朋友曉得我這一切的弱點。他告訴我他用手拿着活的蛇，能拒賊，也不相信有鬼。並且他說：這些本領自然都是喫肉的結果！

在學生裏面流行着一首那馬的俚歌。這首歌說：

英人雄糾糾，

印人何其小；

肉食者治人，

昂藏寓奇妙。

我受着這許多勢力的影響，後來終於降服了。我在這時候漸漸相信喫肉是好的，以爲牠能使人

強壯，有膽量；以爲如果全國一致肉食，便可將英國人打倒。

於是我們便規定了一天，開始我的試驗。這件事自然要秘密進行。我們甘地這一族是維殊奈發的信徒。我的父母更是篤信的人。我們甚至有家庭裏的神殿。還有在高查拉流行着的耆那教（Jainism）（註一）。他們的勢力是很普遍的，隨時隨地都可以感覺到。維殊教和耆那教徒在高查拉反對喫肉的熱烈是印度別的地方，或印度以外的地方所沒有的。我是在這樣的宗教環境裏面生長的；並且我是極端孝順我的父母。無論什麼時候他們曉得我破戒喫肉，他們便會憂惶心碎。況且我是摯愛真理的。我並不是不曉得如果我起首喫肉，我便要欺騙我的父母，然而我的心却是偏向着我那『改革』的事業。我並不是要順從口腹之慾，我沒有想到肉有什麼特別好的滋味，我只想使我自己和我的同胞能夠強壯勇敢，去打倒英國人，恢復印度的自由。士華納其（Swaraj 自治）這個名詞，我還沒有聽到，但我却已明白自由的意義。我既然感覺負着『改革』的使命，便覺得將所做的事隱匿着不告訴父母，不能算是違背真理。

（註一）耆那教在印度的創立與佛教同時，其主要教義之一爲戒殺生。亞希薩（Ahimsa）（見下文）之說所以能在印度的宗教意識占勢力者，基督教的信仰，實與有力。西印度的維殊奈發人，有時除了崇奉自己的宗教以外，還服膺着基督的人生哲學。

那一日來到了。我不容易把我當時的心境描寫出來。一方面我是抱着『改革』的熱望和好奇的心理，另一方面，我是懷着偷偷做事，不可以告人的那種羞愧。這兩種勢力那一種較強，連我自己都沒法判定。我們在河邊找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在那裏我生平第一次看見了肉。我們也帶着英國式的麵包。但是我覺得這兩種食物都毫無滋味。那山羊的肉堅韌如牛皮，簡直不能下咽。牠終於使我失意地走了。

那天晚上我便夢魘，不能安睡。每次快要睡着的時候，總覺得好像有一隻活山羊在我裏面哭叫，而我便悲憤地跳起來。然而我又安慰我自己，說我所做的事是應當的，於我又覺得釋然。我的朋友是不肯輕易放手的。他爲我預備許多珍羞，把肉放在裏面，而且使牠美觀。至於我們聚餐的地方，已不復在河邊的僻處，乃在一個省立會所；裏面的膳廳，椅櫟，都經我的朋友與大司務特別的佈置過。這樣的引誘自然發生了效果。我不復嫌惡英國的麵包；我也不復因山羊肉而動憐憫。我雖然不特別喜歡肉，但是有肉在裏面的菜，我都喜歡。這樣下去約有一年；但是我所享受過的葷筵不過六次左右，因爲那處會所不是每天能借用的，那些華貴的食品，所費也不貲。我爲這種『改革』的工作，並沒有什麼預算，所以每次都是他去付賬；我也不知道他是從那裏得來的錢。他因爲決心使我變成一個喫肉的人，所以總是不憚煩地去籌款，然而他的力量終是有限，所以後來這種宴會就不能常常舉行了。

我每逢偷赴這宴會的時候，家中的飯，便喫不下去。我的母親自然要我喫飯，并且要問我爲什麼沒有胃口。我總是說『今天我的消化不好，不想吃了。』這樣的托詞，很使我不安；我知道我在說謊，而且是向母親說謊。我也知道如果我的父母曉得我吃肉，他們要異常的傷痛。這些思想使我五內如焚。我於是發生以下的感想：『改革』別人是一件好事；因『改革』別人而喫肉是必須的；然而向父母說謊，比不喫肉更壞。所以在父母還活着的時候，我決不能這樣做。等到父母去世，我個人可以自由的時候，那時我便可以公開地喫肉。但是那個時候沒有來到以前，我應當禁制我自己。』

我把我的決定告訴我的朋友：從那時起，我沒有反覆過。我的父母從來不曉得他們兩個兒子所幹的事。這樣子，我因爲不要向父母說謊那一個純潔的念頭，便戒絕肉食。但我却沒有與那位朋友斷絕往來。我那引他使入正軌的熱誠反危害了我自己的品格，但是當時完全沒有感覺到這一回事。

我同那個朋友來往，幾乎使我做出不忠於我的妻的事情來。他有一次帶我到一個妓館去。他把我應有的知識都告訴我。一切都預備好了，連賬都付清了。我入了罪惡之窟，但是上帝以他無限的慈悲保護着我。我在裏面所看見的，使我瞠目結舌；我終於離開那裏，沒有做我的朋友所希望我做的事。我覺得我的人格已被摧毀；這個感覺使我慚愧無地。像這樣的事，在我的一生中，還有四次，而我每次都得到解救，但大半是由於幸運，而不是由於我個人的努力。從嚴格的倫理觀點看來，這些事情都可以

看作道德的墮落，因為牠是肉慾的暴露，與已成的事實同樣的壞。但是從世俗的觀點來說，一個人如果在肉體上沒有犯罪，便算是已經得救。我自己的所謂沒有犯罪，也不過是這樣解釋而已。人有的時候脫離了罪惡，好像是有天意似的；爲他自己是如此，爲他周圍的人也是如此。有時人無論如何抗拒試誘，終不免墮落；也有時人自己要犯罪，而上帝却把他救援出來。這些事的所以然；人的意志有多少的自由；他受環境支配的程度；命運究竟有無影響？——這一切都是疑團，而且永遠是疑團。

讓我繼續下去。這些事還不夠使我認識我的朋友的壞處。我和他還有許多可痛的經歷；直到我見了他所做的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不道德的事，我才恍然大悟。關於這些事我以後再講。但有一件事我必須在這裏提到，因為牠是在這個時期發生的。我同我的妻的不和，無疑地是因爲這個朋友的原故。我是一個專一的而且妒忌的丈夫。這位朋友便推波助瀾，煽動我對我的妻的疑惑。我沒有懷疑他的話的真實性，所以我便常常根據他的話，給我妻許多的痛苦。我這樣冷酷的行爲是決難自解的。只有一個印度的妻子能夠忍受這樣的磨折，所以我常想：女子是容忍的化身。一個僕人被疑惑了可以辭工；兒子同樣地可以和父親分居；朋友可以絕交；但一個妻子，即使她疑惑丈夫的時候，也只能安於緘默。但是如果丈夫疑惑妻子，她便到了絕境。她能到那裏去呢？一個印度的妻子，不能向法院請求離異；法律不能伸雪她的冤屈。我把我的妻逼到走頭無路，這是我永遠不能饒恕我自己的。

懷疑的毒瘤，直到我完全了解亞希薩（唯愛）（註一）的意義，才能從根拔除。我當時看見了婆羅馬查雅（克己）（註二）的光榮，才曉得妻子不是丈夫的奴隸，而是他的伴侶，他的同工，是他的一切憂愁和快樂的共享者。她可以選擇自己所要走的路，如同她的丈夫一樣。我每逢想到我在那些黑暗日子中的疑心，我便痛恨我自己的愚罔，荒淫，殘忍，和那輕信損友的癡直。

我還有其他的錯處是在結婚以前及剛剛結婚以後所做成的。一個親戚和我染了吸烟的嗜好。我們吸烟不是因為牠有什麼好處，也不是喜歡烟的味道。我們只覺得吞雲吐霧是一件有趣的事。我的叔叔也有這個嗜好；我們看見他抽紙烟，便想學他的榜樣，但我們是沒有錢的，所以我們便把叔叔丟棄的紙烟頭偷偷地拾起來吸。

這種紙烟頭不是常常有的，而且裏面也沒有許多可抽的烟，所以我們便起首偷竊傭人零花的錢拿來購買印度紙烟。我們自然不敢在長輩面前吸。這樣偷錢買烟的事繼續了幾個星期。後來我們

（註一）亞希薩 (Ahimsa) 照字面作天真爛漫或非武力解。在積極方面，實有愛的意義。譯者十年前將英文 Pacifism 一字譯為「唯愛」兼有消極積極兩方面的意義，似可作此字的正譯。

（註二）婆羅馬查雅 (Brahmacharya) 照字面解作引人到上帝那裏的行為。其通常的意義為自制，特別關於節慾的方面。

聽說有一種植物的梗，裏面有許多小孔，可以當烟吸的，所以我們又開始吸這樣的烟。這些事還不能使我們滿足。我們起首感覺不自由的難過：爲什麼我們做事必定要得到長輩的許可？我們覺得很痛苦，便決定去自盡！

但是我們怎樣自盡呢？我們從那裏可以得到毒藥呢？我們聽說鬧陽花子是一種厲害的毒藥。我們使到深林去，果然找到這種花子。我們以爲晚上行事最適宜。我們到廟裏去，把溶化了的牛油放在神廟的燈裏面，到神壇參拜一下，便要找一個僻靜的所在去自殺。但是我們的勇氣銷沉下去了。假如我們不馬上死去？究竟自殺有什麼好處？爲什麼不將就過不自由的生活？雖然這樣，我還是吞下兩三粒花子。我們不敢多吞，因爲我們兩人都是怕死的。我們決意到南治門迭去鎮靜一下，摒除自殺之念。我這才曉得：萌自殺之念易，而實行之則難。從那一天晚上起，我每逢聽見人家嚷着自殺，並不怎樣在意。

自殺之念究竟把我們兩人吸紙烟頭和偷竊傭人零錢的習慣革除了。從那時起直至成年以後，我總沒有抽烟的要求。我覺着抽烟是野蠻的，骯髒的，有害的，我不解世界各處爲什麼都有着那樣抽烟的狂熱。我最不能忍受在旅行中充滿着烟味而沒有新鮮空氣的車廂子。

我在十五歲的時候，還犯過一次更嚴重的偷竊。這一次我是從我的喫肉的哥哥的手鐲上偷出

一點金子來。他那時是欠着一筆約二十五個羅比的債。他的手鐲是純金的；剪出一點來並不困難。

金子是偷到了，債是還清了。但我自己却覺得不好過。我決志不再偷竊，並且要向父親承認這件事。但我不敢與他面談。我不是怕他打我；我記得他從來沒有打過我們。我是怕這件事要使他痛苦。但我覺得必須要冒險：我以為沒有祖白的承認，便不能有澈底的懺悔。後來我決定將認罪的話寫出來，呈給父親，求他饒恕。我把我所寫的親自遞給他；我所寫的不但是認罪，而且是請他給我相當的責罰。在末後，我還請他不要因我的過犯而自責，並應許他以後永不偷竊。

我把認罪書遞給父親的時候，真是心驚膽戰。他那時正患着癱症，困於病榻。這個臥榻只是一塊光的木板。我把認罪書遞給他以後，便坐在他的對面。他讀完以後，眼淚便像珠子流到雙頰，把紙也弄濕了。他閉了眼睛，稍停一會，便把那封書撕毀了。他讀的時候是坐起來的，現在他又躺下去。我看見我父親的痛苦，自己也掉下淚來。如果我是一個畫家，我定能夠將那天的情景全畫出來。這些情景在我的心中還是很清晰的。那從愛中出來的珍珠般的淚，潔淨了我的心，洗掉了我的罪。只有經驗過這樣的愛的知道愛是什麼東西。有一首聖詩這樣的說：

只有受過愛之箭的創傷者，

能知道愛的能力。

在我，這是亞希薩絕好的一個例證。我當時以為這只是父愛的表示，到今日我才知道這是純粹的亞希薩。當這樣的亞希薩籠罩一切的時候，牠便要變化一切。牠的力量是無限的。這樣超絕的饒恕，在我的父親並非生性如此的。我以為他一定要生氣，申斥，並自憫其額。但他却是異常的鎮靜；我相信這是因為我坦白自首的原故。坦白的自首，加上永不再犯的應許，如果是在一個理應接受這樣認罪者的面前陳述，是一種最純潔的懺悔。我的自首使我的父親覺得我是絕對可靠的，也使他對於我的疼愛增加至於無限。

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我正在十六歲。我的父親是犯着癩症。我的母親，家裏一個老僕，和我自己是他主要的侍者。我是擔負着看護的責任。我的任務是裹扎傷口，將藥遞給父親，和將要配的藥在家中配好。每天晚上我給他的腿按摩，等到他吩咐我去睡，或是他睡着之後，我才去睡。這樣的服役是我所寶貴的。就我記憶所及，我從沒有忽略過。我所有的時間，除了盥洗等事外，都用在上課和服侍父親這兩件事上。除非得他的許可，或是他覺得好些的時候，我是不會在夜間散步的。

在這個時候，我的妻正在懷孕。在今日看起來，這件事是我的一個雙重羞恥。第一是我在學生時期應當節慾，而我却没有這樣做。第二，我的慾念不但妨礙了我求學的天職，而且妨礙了那更大的天職，就是對於雙親的孝順。每天晚上，我的手在忙着給父親的腿按摩，我的心却在臥室的周圍迴翔着；

並且在那個時候，從宗教，醫學，及常識的觀點來看，都是不應當有性交的。我的職務完了以後，我總覺得歡喜，與父親告別後，便直到臥室裏去。

這時候我父親的病日趨嚴重；愛育吠陀的醫士們，赫金的醫士們，（註一）連本地的許多庸醫把他們所有的藥方都試驗過。一個英國的外科醫生也來診察過。他以為最後的補救只有施用手術。但是家庭的醫生却不以為然。他以為在這樣大的年紀，不應再施手術。這位家庭醫生是能幹而且有名的；他的意見自然被接受。手術是中止了；為手術而購備的許多藥品也歸於無用了。我的感覺是：如果家庭醫生贊成施用手術的話，傷口會很容易好，而且那位外科醫生也是在孟買很有名的。但是上帝却別有他的打算。死亡將到了，誰還能想到適當的治療？他已經不想再活着。他的身體漸漸的軟弱，到後來，連便溺都要在床上。他是不得已才這樣做的，他以前總是勉強起來做的，因為維殊奈發的規矩最重外部的潔淨。潔淨自然是要緊的，但是現在西方的醫學，可以使便溺沐浴那一類的事，都在床上做，病人一點不覺得麻煩，床上也沒有一點骯髒。我以為這樣的潔淨，與維殊奈發的教條並沒有衝突，但是父親當時却堅執着離開床去做這些事；這使我不但驚奇，而且非常的崇敬他。

（註一）愛育吠陀（Ayurvedic）的醫學即根據吠陀經的印度式的治療法。同歐式的治療名優羅尼（Yunani），習此術的醫士名赫金（Hakims）。

那可怖之夜終於來了。我的叔叔當時是在那扎科。我彷彿記得他是得到父親病重的消息才來的。他們弟兄實在好像手足一樣。我的叔叔竟日伴着父親，晚上叫我們都去睡覺以後，他自己還堅執着要睡在父親的旁邊。沒有人想到這是生死關頭的一夜，雖然大家知道隨時都可以發生危險。

大約是在晚上十點半或十一點鐘之間。我正在給父親按摩。叔叔自動的要來替我，這是我所喜歡的。我馬上到臥室裏去。我的妻——可憐的她——已經熟睡了。但是我在那裏，她怎樣能睡呢？我把她喚醒了。但是五六分鐘之後，僕人便來敲我的門。我驚慌地跳起來。「起來罷，」他說，「你父親的病很重了。」我自然知道父親是病着的，所以我便猜透了「很重」這兩個字的意思。我便馬上從床上下來。

「什麼事？真的告訴我罷。」

「你的父親過去了。」

一切都完了。我只有徒呼負負。我覺得羞愧交集，殼棘不安。我便跑到父親的臥室裏去。如果我當時沒有被色慾迷住，我一定繼續給父親按摩，而不致在他最後的幾分鐘，感到與他分離的痛苦。這樣子，他死的時候，我還能撫摩着他。但是現在，這個榮耀却被叔叔得到了。他是這樣深摯地愛着他的哥哥，所以這最後服侍父親的報酬終屬於他了。我的父親知到大限將到，所以用手勢叫人預備紙筆，寫着「預備後事」幾個字。他將臂上的符籙，和吐拉西（註五）珠子的金項圈都摘下來，丟在一邊。過了

一會他就斷氣了。

我上面所說的羞愧，就是我在父親危急的時候還去放縱情慾的羞愧。這一個污點，是我終身所不能洗掉與忘却的。我常常想：雖然我以為自己對於父親的孝心是渺無涯際，無論爲他犧牲什麼都可以的，但一到緊急關頭，因爲我被情慾捆綁着，我便無可原諒地失了依據。所以我常以爲我雖忠於我的妻，但却是一個荒淫無度的丈夫。我經過長久的奮鬥和許多的試煉，才得到最後的解放。

我在沒有結束我這一段雙重羞愧的故事以前，我要提到我的妻所生的那個弱小得可憐的孩子不到三四天便夭折了。牠還能有的運命麼？凡是已經結婚的都應當因我的榜樣而自警。

(註一)吐拉西是印度的神樹。

第三章 幼年時代

我從六七歲至十六歲在學校的時期中，除了宗教以外，什麼別的功課都有。教員們可以不必費力便能給我的東西，我可以說是沒有得到。雖然如此，我却是隨時撫拾了一些零碎的宗教知識。這裏所說的『宗教』是一種最廣義的說法，就是自我實現的意思。

因為我是維殊奈發的信徒，所以我常要到本族的神殿裏去參拜。我向來不高興到廟裏參拜，因為我不喜歡熱鬧，並且我聽見有不道德的事在裏面發生，因此我更沒有去的興趣。

但是我從這一方面沒有得到的，我却從家中一個老的女僕得到了。她名叫南巴，是我的保姆。她對於我的疼愛，我至今還記得。她因為我怕鬼，所以便教我反覆誦念拉馬那個名號（註二）。我雖然不大相信這一種治療法，但我却相信她那個人，所以我便在這個幼年的時候，試用這種方法來祛除我的懼怕。自然這只是一時的事，但是在兒童時候所種下的好種子並沒有落空。我想是因為這位良善的女人種了這一粒種子，所以我現在每在遇見困難的時候，便重複念拉馬的名號而總是見效的。

正在這個時候我的一位篤信拉馬雅那的表親給我和我的二哥安排學習拉馬勒薩。(註二)我們把牠念熟了，並且規定在每日早晨沐浴以後誦讀。我們在波班打的時候這件事總是繼續着的。但是一到了那扎科，我們便把牠忘却。其實我並不相信這些事；我的所以誦讀，只是要人曉得我的拼音的正確。但是我聽人在我父親面前談到杜拉西打的拉馬雅那本文的時候，我却得了一個深的印象。我的父親患病的時候，有一部分的時間是在波班打。在那裏，每天晚上都有人給他讀拉馬雅那。這個人名叫勒特，是十分崇奉拉馬的。有人說，他把自己的大麻瘋治好了，但是沒有用藥，只用一種在比利殊華廟裏曾經獻給至大之神的聖樹的葉子敷在患處，和反覆誦讀拉馬的名字。據說，他的信仰使他痊愈了。這件事是否確實，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我們是相信這個故事的。並且勒特有時用悠揚的聲音調給我們唱些小歌。他自己是體會入神，而聽者也是悠然神往的。我那時候大概是十三歲。他所給我的感力建立了我崇奉拉馬雅那的基礎。我以為杜巴西打的拉馬雅那是靈修書籍中最偉大的。

幾個月以後，我們便到了那扎科去，在那裏就沒有誦讀拉馬雅那，但却有時誦讀巴迦法。(註三)

(註一)「拉馬南馬」是反覆誦讀拉馬這個名號的句法。這是崇拜上主的一種表示。拉馬是那至尊者化為人形的稱呼。

(註二)即誦經句以求拉馬保護。

(註三)巴迦法是中世紀印度教最著名的經典，開發虔修的理想。甘地爲止息印回鬥爭，禁食廿一日，即常讀此經，精神上獲益不少。

我也有時候去聽，但讀者並不使人興奮。我現在覺得巴迦法是一本可以激起宗教熱誠的書。我曾讀古查拉提本而極感興趣，其後我在德里禁食二十一日時候聽到拉馬維亞讀這經的原文的一部分，我恨不得在幼年時代能聽到像他那樣虔誠的人讀這部書，使我在很年青的時候，便喜愛牠。幼年的印象最易深入，我在那時候沒有人給我多念這樣好的書，是我終身的一件憾事。

在那扎科的時候，我早就養成一種對印度教各宗派和其他姊妹教的容忍。我的父母常到本族神殿和希德及拉馬的廟宇去參拜，有時也帶我們小孩子們去，或派人送我們去。着那教的僧侶也常來看望我的父親，甚至破戒接受我們非着那教人的食物。他們和父親的談話是宗教和世俗的事都有的。此外他還有回教和巴爾西教的朋友，向他講到他們自己的信仰。他總是尊重他們所說的，很有興趣地聽着。因為我做父親的看護，所以我有機會聽他們談話。這些事便養成我對一切信仰容忍的態度。

惟有基督教在當時是一個例外，我對牠有一種憎惡。這是有原故的。在那個時候，基督教的傳教士每每站在學校附近的一個犄角，詆毀印度教徒和他們的神。這是使我難堪的。我大概只站在那裏聽過一次，但這已足夠使我不願再去。正在這時候，我聽說一個有名的印度教徒皈依了基督教。大家都談論着這件事，說：當他受洗時，他須吃牛肉和飲酒，並且以後要易服，改穿歐洲服式，還要戴上一頂

帽。這些事使我忍受不住了。我想：如果一個宗教要強迫人吃肉，飲酒，易服，這的確有玷宗教的名。我還聽說這位改教的人已經起首詆毀他祖宗的宗教，習俗，和他們的祖國。這些事都使我憎惡基督教。

(註一)

我能夠容忍其他宗教的那件事實並不是說我對上帝有若何活潑的信仰的意思。大概也在這時候，我看見父親所藏的那冊曼奴殊烈提(註二)裏面關於創造的故事和類似的事情，但這并不使我佩服，反使我趨於無神的態度。

我有一位表親，他的智力是我所佩服的。我將我的懷疑向他陳訴，但他不能替我解決。他只說：『你長大的時候，這些疑難你自己自然會解決，在你現在的年紀還不必想到這些問題。』我沒有話好說，但心中還是不痛快。

無論如何，曼奴殊烈提沒有教給我亞希薩(唯愛)之義。關於我的喫肉的嘗試，我已經說過。這部經似乎是贊成吃肉的。我當時也以爲殺死蛇蟲之類是合乎道德的，並且看作我的責任。但是有一件

(註一)這一段紀載曾經四十一年前住在那扎科的傳教士司各脫先生駁詰。甘地接受了他的非難，並指出這段紀載的根據，說還是他在幼年時候所「聽」見的。

(註二)這是印度教古經之一，擁護階級制，並載有創造及人類起源的傳說。

事在我的心中却是長得根深蒂固——即以道德爲一切事物的基礎，真理爲一切道德的本質的確信。真理現在成了我唯一的目標。真理的範圍逐日擴大，而我對真理所下的界說也隨之而廣闊。

有一段古查拉提的格言同樣的抓住了我的心靈。牠的教訓——以善報惡——變成我的生活法則。我因爲熱烈地服膺着這個教訓，便起首爲牠作許多試驗。以下便是格言中我認爲不朽的那一段話：

惠我杯水，報以美食。

與我寒暄，報以長揖。

錙銖之貽，重抵萬金。

爾命被救，赴義捨身。

哲人言行，爾宜敬佩。

善小必爲，其酬十倍。

至聖之域，人我界混。

以德報怨，其樂無邊。

我經過入學試驗以後，我的尊長要我到大學繼續求學。加地華和孟買兩處都有大學；因爲加地亞華的大學費用較廉，所以我就到那裏進了沙摩達大學。我是去了，但一切都茫無頭緒。什麼都是困難的。教授的講解，我聽不懂，但這不是他們的錯處，因爲那個學校的教授都是第一流人物。我到第一學期終了就回家去。

我們家中有一位老友和顧問，名叫達夫，他是一個機警而有學問的婆羅門教徒。正在我的假期

中，他碰巧來看我們。他同我的父母談到我的學業。他曉得我在沙摩達大學讀書，便說：『時代變遷了，如果你們沒有受過相當的教育，不要希冀繼承你們父親的要職。既然這個孩子還要繼續着求學，你們應當使他能夠繼承首相之職。學士的學位，要四五年才能得到。並且只能給他一個做小官的資格，沒有做首相的希冀。若是他，像我的兒子，去學法律，時間就更長了。到他畢業的時候，一定有不少的律師在競爭首相的職位。倒不如送他到英國去。我的兒子說學律師是一件容易的事，三年就可以回來，費用也不過四五千羅比。』

約希治——這是我們對於達夫老先生一個親暱的稱呼——轉過來，用誠摯的態度對我說：『到英國去，比較在這裏讀書，豈不更是你所願意的麼？』自然我是再歡迎沒有的了。我本來怕學校的功課困難，所以便立刻抓住這個機會，說：『送我到英國去，愈早愈好。但是試驗的手續，不是一時能完了的，好不好我到英國去學醫呢？』

我的哥哥截斷了我的話：『父親是不喜歡你學醫的。他說過：我們維殊奈發信徒不應當做支解屍體的事。父親是希望你當律師的。』

約希治也用柔和的聲音說：『醫科的學位不能使你做首相。我是希望你做首相，或比首相更高的職。只有這樣你才能擔起你家庭的重負。現在世事日非，你還是預備做律師好。』

約希治走了以後，我便做成許多空中樓閣。哥哥却是想到實際的問題：他應當如何爲我預備資斧呢？像我這樣年輕的人，是否應當獨自遠遊呢？我的母親更覺得難過。她是不願意與我分離的。她找出這樣一個藉口來：『伯伯現在是族中最長的，』她說，『我們應當先與他商量。假如他答應了，我們便可以考慮這件事。』

我去拜望伯父，行過禮後，把一切都告訴他。他想了一下，便說：『我不知道這件事與我們的宗教有無衝突。我所聞的一切，都使我懷疑。我所遇見的那些大律師，在他們的生活上，實在與歐洲人沒有分別。他們對於食物沒有禁戒；紙烟是不離他們的口的。他們衣飾的不莊重也同英國人一樣。這一切都是違反我們的族規的。我年事已大，將不久於人世，在我這風燭殘年的時候，我怎能許你航海遠行呢？但是我不願攔阻你。你母親的許可，倒是要緊的。如果她讓你去，那麼，祝你一路平安！告訴她我是不會干預這件事的。你去，我當求神默祐你。』

我回到那扎科後，便報告一切經過的情形。我的母親仍然不願意。她已經打聽許多關於出國的瑣碎的事。有人說青年人在英國是會墮落的；有人說他們是吃肉的；又有人說他們沒有酒就不能活着。『你曉得這一切的事麼？』她問我。『母親，親愛的，』我回答說，『你不能相信我麼？我決不向你撒謊，我誓不做這一切的事。如果有這樣的危險，約希治會讓我去麼？』

『你當然是可靠的，』她說。『但是我怎能放心呢？我的心亂了，不知道怎樣做才好。我去問士藝密罷。』

士藝密是屬於巴尼亞階級的，但現在已經做了耆那教的僧侶。他同約希治一樣，是我們家庭的顧問。他來幫我的忙，說：『我要這個孩子許下三個願，以後便可以讓他去。』他給我監督，我便發誓在英國實行獨身生活，不喝酒，不喫肉。經過這件事後，母親便允許我去，給我祝福。

我既得了母親的祝福，便歡欣地到孟買去，離開了我的妻和一個生了幾個月的小嬰兒。到了孟買，有朋友告訴我的哥哥，說印度洋在七八月間風浪很大。因為這是我的首次航海，他們要我等到十一月才放洋。還有人說有一隻船遇着颶風沉沒了。我的哥哥聽到這些話，便不肯讓我冒險立刻首途。他把我安頓在一個朋友那裏，便回到那札科去從公。他將我的旅費委托一位內兄保管，並囑託一些朋友隨時照料我。我在孟買度日如年，常常做夢去英國。

在這時，我們階級裏面的人因我的出國便鼓噪起來。巴尼亞人從沒有到過英國去的，如果我居然去了，我便要對簿公庭！他們召集了一個階級會議，傳我到會。我當時怎樣能夠忽然鼓起勇氣到那裏去，我實在不明所以。但是我沒有畏懼，沒有遲疑地去了。階級的首領是我們的一個遠親，父親在時與他很投契。他厲聲對我說：『照本階級的意見，你去英國的擬議是不合的。我們的宗教禁人航海遠

行。我們也聽說到那裏去就不得不遷就，要與歐人同飲食。」

我回答說：「我並不覺得到英國去是妨害我們的宗教的。我到那裏爲的是求學。而且我已鄭重地向母親應許不做你所最害怕的那三件事。我相信我所許的願能引我走正道。」

「但是我告訴你，」那首領回答說，「在那裏保守我們的宗教是「不」可能的。你知道我同你父親的關係。你應當聽我的忠告。」

「我知道那些關係，」我說，「而且你是我的長輩，但我自己是不能作主的，我不能改變我到英國去的決議。我父親的一個友人和顧問，他是一個有學問的婆羅門教人，沒有反對我到英國去，我的母親和哥哥也允許我去。」

「但是你要藐視本階級的命令麼？」

「我實在沒有辦法。本階級不應當干預這件事。」

我的話使首領動了怒。他斥責我，但我坐着不動。於是首領便宣佈他的命令：「從今日起，這孩子不是我們階級裏面的人。誰幫他的忙，誰到碼頭送他行的，都要納一羅比四安拿的罰款。」

這個命令對於我並沒有影響。我同首領告別了。但我不知道我的哥哥對此事有何反響。幸而他還是堅持着，叫我不管首領的命令，照着計劃進行。

我正在爲這件事發愁的時候，聽說有一位律師要在九月四日乘船到英國去。我去見我哥哥囑託照料我的朋友們。他們都主張我趁這個機會與這位律師同行。事情是很匆迫的了。我打電報給哥哥請示，他回電許我進行。我便向我的內兄取旅費。他提到首領的話，說他犯不着爲此事失去階級的資格。因此我便另找一位父執，請他給我墊出旅費和零用的款，由哥哥償還。他不但答應了，而且很鼓勵我一番。

我把船票購妥後，便預備我的行裝。有一位在這種事上有經驗的朋友來給我幫忙。他給我把衣服等物都預備妥當。所購的衣服，有的是我所喜歡的，有的我并不喜歡。領帶我後來很愛用，但當時却討厭它。那件短衫我也以爲太不莊重。但是當時一心要到英國去，這一切都管不了許多了。至於所帶的糧食是足夠旅程之用而有餘的。我所定的船位與那位律師的同在一個房間。我的朋友也請他沿途照料我。他是一個上了年紀而飽經世故的人。我那時只有十八歲，初出茅廬，毫無經驗。

九月四日我們離開了孟買，約在那個月的月底到了蘇安頓（Southampton）。我在船上穿的是一套黑衣服。朋友們給我買的那套白法蘭絨，我是留着上岸時穿。我以爲上岸時穿白的較爲體面，於是把那套衣服穿上。那時已經是九月底，上了岸才曉得穿白色衣服的只有我一個人。我的衣箱連鑰匙都交給一個旅行社的人照管，因爲我看見許多人都是這樣做的。只有我一個人穿白色衣服的

那件事愈想愈不好受。到了旅店以後，又曉得旅行社的東西要到第二天才能取出來，因為那天是星期日。我因此更覺侷促不安。我在蘇安頓打電報給一位麥達博士，他當天晚上八點鐘便來看我。他熱誠地歡迎我，但是笑我還穿着法蘭絨。我們說話的時候，我無意中拿起他的禮帽，要試試它多麼光滑，但是撫摩的時候，沒有懂得紋理，竟把絨毛弄亂了。麥達博士有點生氣，把我止住，但已來不及了。這件事給了我一個教訓。這是我學習歐洲儀注的第一遭。

我常常懷念着家庭和祖國。母親的愛好像是形影相隨。有時在晚上因思家而落淚，至於不寐。心中的悲苦是不能向人陳訴的，即使能夠，又有什麼用處呢？我所認識的一切都不能給我慰安，因為一切都是生疏的，無論是人，是他們的習慣，甚至他們的居所。英國的儀注，我是完全外行的，所以要不斷地留神着。素食的人還有特別的麻煩。我所能喫的菜品都是毫無滋味的。我便覺得進退兩難。在英國是不好受的；回到印度去更不是辦法。既然來了，便應當等着滿了三年：我內心的聲音是這樣的說。

甘 地 自 傳

第四章 在倫敦的生活

麥達博士來檢閱我的房間和它的陳設。「這個地方不行，」他搖着頭說。「我們到英國來，與其說是求學，母寧說是要得到一點英國人情風俗的經驗。爲這個原故，你應當住在一個人家裏。但是沒有這樣做以前，我想你最好跟我的一位朋友學習一下；他會指點你的。」

我很感激地接受了他的意見，搬到他的朋友那裏去。那位朋友極其和藹體貼，拿我當弟弟看待，把英國人的規矩教給我。但是我的飲食却成了嚴重的問題了。煮過的蔬菜，沒有用香料配合的，我覺得沒有滋味。主婦不知道應當給我預備什麼。早餐的麥糊還比較可口，但在午晚兩餐我總喫不飽。那位朋友常勸我喫肉，但我告訴他所許下的願，沒有順從他。在午餐和晚餐都有蔬菜，麪包，和菓子醬。我的胃口有時像餓鷹一般，但我只喫兩三片麪包，不好意思多要。午晚餐都沒有牛奶。有一次那位朋友發急了，袒白的對我說：「假若你是我的弟弟，我便會送你回國。你的母親不認得字，也不知道這裏的情形。在她面前許下的願有什麼價值？你的願不是個願，在法庭裏是不會承認這樣的願的。堅守着

這樣的願是純粹的迷信。你這樣執拗終使你在這裏不能有所得。你承認你曾經喫過肉而喜歡它。你不需要它的時候倒喫了，現在必須喫的時候，你却不要。」但我還是保持着強硬的態度。

那位朋友還是絮絮不休地勸我，但我的答覆永遠只是一個「否」字。他愈要爭辯，我愈固執。我每天禱告，求上帝保護，這禱告是有效驗的。我並不是有什麼清楚的關於上帝的觀念。這只是信仰的作
用，這信仰的種子是我那良善的保姆南巴給我種下的。

我在城內閒遊的時候，無意中在佛令頓街遇見一家素食餐館。這個發見所給我的快樂正如一個孩子得到心愛的東西的快樂一樣。我沒有進去以前，看見在附近門口的玻璃窗門後面擺着一些出售的書，其中有一本是薩爾脫的爲什麼要素食。我用一個先令購了這本書，便進到餐廳裏去讀它。我就在那裏飽餐一頓；這是到英國以後的第一次，這是上帝的助力。

我把薩氏的書，從頭到尾讀過一遍，深受它的感動。從讀這本書的那天起，我可以說是變成了一個自動的素食者。此時回想當初在母親面前許願的情景，不禁感慨交集。我從前禁肉的動機是忠於真理與履行誓約，但同時也覺得每一個印度人都應當喫肉。實在說來，我也希冀着有這樣一天我可以公開地，自由地喫肉，并且勸別人喫。但我現在已選擇了素食，宣揚這種主張是我以後的使命。

我從孟買帶來的衣服，現在看來，似乎與當地社會的習俗不大相稱，所以我就從海陸軍衣莊另

做了一套新的。我還買了一頂價值十九先令的禮帽。我猶以此爲未足，又花去十鎊買了一件在本特街做成的晚禮服，並且叫我那毫不吝嗇的哥哥給我寄來一條金鏢練。繫着一條已經打好的領帶是不體面的，所以我又學會自己打領帶的結。在印度的時候鏡子是一件奢侈品，只有家庭的理髮師來給我剃臉的時候才用得着。在這裏我每日要在一面極大的鏡子面前費去十分鐘打領帶的結和將頭髮照着規矩理好。我的頭髮并不柔順，所以每日要很費力才能將它梳好。每次把帽子戴上和脫下的時候，我的手便會不知不覺地放在頭上，將髮弄好。

似乎這一切還不夠，我又起首注意到其他做成一個英國式的紳士所必要的細節。於是便有人告訴我必須學習跳舞，法文，和演說術。我決定到一個跳舞班去；先付下三鎊，作爲第一期三星期的學費。我大約是上了六課。但我總學不會那有節奏的動作，因爲我不懂得鋼琴的調，所以沒有法子使步伐與時間融合。我應當怎樣辦呢？有一段故事說：一位隱者養一隻貓去防鼠，又養一隻牛使貓有牛奶吃，又僱一個人來看牛，如此不已。我的慾望同那隱者的家庭一樣，增加起來。我想我應當學梵亞鈴，使我得到聽西方音樂的技能。所以我又花了三鎊買一具梵亞鈴，花了一些教授的費用，還請了一位教演說術的教員，給他二十一個先令的初步學費。他給我介紹一本皮爾氏典型的演說家，我便買了。

但是皮爾氏的書却給我一個警告，使我醒悟過來。「究竟我並不是要輩一子住在英國的。」我這樣子對自己說。我去學演說術有什麼用呢？跳舞又怎能使我變成一個紳士呢？梵亞鈴我在印度也可以學的。我是一個學生，我還是應當讀書。如果我的品格能使我作一個紳士，那是最好的，不然，我何必一定做紳士呢？

我既打了定這個主意，便寫信給那位演說教師，說我以後不再上課了。我也寫一封同樣的信給那跳舞教師，又親自去見梵亞鈴教師，請她替我賣了那具梵亞鈴，不拘售價多少。她對我很和氣。我告訴她我怎樣從一個錯誤理想的追求覺悟過來。她對於我這改轍易轍的意思，很加以鼓勵。我那樣蒙昧可笑的生活，大約過了三個月，至於服飾的講究還繼續了幾年，但是從此以後，我是一個學生了。

請讀者不要想我的跳舞和其他類似的經驗是由於我的放縱。我始終是一個謹守的人。我所花的錢都詳細記賬。及至我分析我的開銷，我便知道應當節儉，於是我決定將生活費減少一半。我的賬目中車費一項很多，因為我在一個家庭居住，所以每星期要付賬一次。有時也要請家中的人到外面聚餐或赴什麼會。這一切都使車費增加。如果所約的是一位女友，照規矩男的應當付一切費用。而且在外用餐是一筆額外的開銷，因為每星期在人家應付的伙食費並不因此扣減。我覺得這些費用和其他因我的錯誤觀念所致的費用都可以省去。

於是我決定自己賃房居住，不再作家庭裏的寓公，而且斟酌工作的需要，隨時遷移，以便獲得新的經驗。我所挑選的地方離工作的地點只有步行半小時的遠近。這樣子，車費便可以減少。以前我無論到什麼地方總要乘車，另外找時間去散步。這個新的辦法一方面可以省費，同時每天也給我步行八至十英里的運動。這樣步行的習慣使我在英國差不多沒有疾病，我的身體也還強健。

不久以後，我看見一些關於簡單生活的書。我讀過以後，便放棄了我那成套的房間，賃了一間單獨的房間，並且買了一個烹飪的爐子。我便開始做我自己的早飯。這一頓早飯的預備，不過用二十分鐘，因為只要做麥糊和沖可可的開水。午飯我是在外邊吃的，晚飯是在家喫麵包和可可。這樣子，我每天的食用有一先令三便士就夠了。這也是我很用功的一個時候。簡單生活省却我許多時間，因此我的考試也及了格。我這樣節省，並不是一件難堪的事。其實這樣的生活使我的精神與行動可以得到調協，並且與我家的財力也更相稱。我的生活因此更覺率真，精神上的愉快也無窮盡。

四十年前，在英國的印度學生比較少。他們有一種習慣，就是要裝成未婚的樣子，雖然他們已經結了婚。英國的大學和中學的學生都是未婚的，他們以為學生生活與結婚不合。在印度的往昔，也有這樣的習俗，但在近代便有了童婚的制度。在英國這是從來沒有見過的。在英國的印度青年因此便羞於承認他們是已經結婚的。我自己也受了他們的傳染，毫不遲疑地冒認我是未婚的，雖然我已

經結婚生子。但這並不使我更快樂；只有我的羞怯使我沒有陷在更大的困難裏。

有一次在我的假期中，我在溫那的一個人家裏住。這樣的人家有一個規矩，就是主婦的女兒要請客人出外散步。有一天我的主婦的女兒同我到溫那附近那些可愛的小山上去。我走路並不慢，但我的女伴比我走得更快。她一面在我前頭走着，一面滔滔不絕地說着話。我對於她的許多話只有一個「是」或「否」來回答，至多也不過說：「是，多麼美！」她是像鳥一般的飛，我却是納着悶，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回家。我們到了山頂了。但是怎樣下來呢？雖然穿了高跟鞋，這位二十五歲的活潑的少女像箭一般馳躍着下山。我慚愧地掙扎下去。她站在山脚，笑嘻嘻地鼓勵着我，問我要不要她幫忙。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一半還是匍匐着，總算是爬下山去。她大笑着說：「妙哉！」這更使我加倍的慚愧。

但是我終於遇見困難了，因為上帝要為我割去這個不誠實的毒瘤。有一次我到不列頓去，在一家旅館裏遇見一個中人資產的老寡婦。這是我在英國的第一年。菜單都是用法文寫的，我沒有法子懂得。我碰巧與這位老太太同棹。他看見我是一個生客，知道我正在為難，便馬上對我說：「你似乎是個生客，不熟悉這裏的情形。為什麼你沒有要菜？我謝謝她，向她解釋我的困難，告訴她我不懂法文，不知道那些是素菜。『讓我帮你的忙罷。』她說：『我可以將菜單解釋給你聽，告訴你你可以喫什麼。』我從此便認識了這位寡婦，以後彼此做了朋友，在我留英的時期間和離開英國以後很長的時間，這個

友誼沒有間斷。她把她倫敦的住址給了我，請我每星期日到她家裏喫飯。有時她給我介紹一些年輕的女子，使我和她們談話。她尤其要我注意一個與她同居的女子，時常讓我們彼此獨對着。

這種應酬我是十分不擅長的。我不會引起談話的動機，也不能說笑話。但她却給我學習的機會，久而久之，我便喜愛與她談話，希望着星期日的來到。

這位老太太把她的網羅一天比一天的放大。她注意我們的會晤。也許她對於我們有她的計畫。我此時很覺得躊躇難決。『我恨不得早把我已經結婚的事告訴這位老太太。』我對自己說：『這樣子，她便不會想到我們訂婚的可能。但是現在還不為晚。如果我現在把事實宣布出來，可以省却以後更多的麻煩。我打定了主意，便給她寫了大致像下面的一封信：

『我們從在不列顛相識以後，你待我十分友善，你照料我如同母親照料兒子一樣。你也覺得我應當結婚，所以給我介紹一些年輕的女子。現在我因為怕惹出事來，所以要向你承認我實在不配你的抬舉。我早應當告訴你我是一個已婚的人。我知道在英國的印度學生每每隱藏他們已經結婚的事實，而我也學了他們的榜樣。我現在明白我不應當這樣做。我還要告訴你，我是在童年結婚的，而且已經生了一個兒子。我許久沒有向你講及這件事，這使我慚愧。但是可喜的是上帝現在已經給我勇氣，使我說誠實的話。你能夠饒恕我麼？我可以告訴你：我對於你給我介紹的那位少女並沒有什麼不

端的行爲。我知道我應守的規矩。你不知道我是已經結婚的，自然願意爲我們撮合。爲要使這件事不再發展起見，我不能不將事實告訴你。

「如果你接到這封信以後，認爲我有負你的厚意。我絕不會有怨言。你對我的善意和打算都使我永遠感恩不忘。如果自此以後，你仍然不嫌棄我，照舊看顧我，那更使我快樂。我必定不會辜負你的美意。」

這封信的稿子，經過多次的修改。寫成以後，胸中的重擔彷彿消失了。她馬上給我回信，大意是這樣的說：

「我收到了你那封坦白的信。我們兩人都很歡喜，并且痛快地笑了一場。我們很能原諒你所說的關於你的不誠實的過失。但是你能將事實告訴我們，那是最好的。我們還是要請你來；這一個星期日見面的時候，我們還要請你敘述關於你的童婚的一切經過，讓我們沾你的便宜，飽笑一頓。不用說，我們的友誼絲毫不受這件事的影響。」

我自從將我的不誠實消除以後，遇必要時，就不遲疑地將我已經結婚的事告訴別人。

我在英國快完了第二年的時候，碰見兩位通神論者。他們是弟兄，而且都是未婚的。他們與我談到紀達經。他們正在讀安諾得勳爵翻譯的天府之歌，又請我與他們一同讀原文。我覺得慚愧，因爲我

沒有讀過那首聖歌的梵文或古查拉提文。於是我不得不告訴他們我沒有讀過紀達經，但我說我很願意與他們同讀；雖然我的梵文知識很有限，我希望我對於原文的了解足使我鑒別譯文的是否準確。於是我便開始與他們讀紀達經。在第二章的以下幾句，給我一個很深的印象：

人若在物慾的事上注意，不久就要受牠的眩迷；

眩迷生愛好，愛好煽慾火，慾火若無羈的野馬；

藩籬既破，浩氣無存，終於於精神斷喪，身心同歸於盡。

我覺得這一本書是個無價之寶。我對此書的重視日日增長，到了現在，我簡直視他爲使人認識真理的無上作品。我在沉悶的時候，牠給我極寶貴的幫助。我幾乎把所有的英文譯本都讀過；我以爲安諾得所譯的最好。他對於原文很忠實，但他的書却不像是翻譯的。我雖然與這兩位朋友讀這本紀達經，但當時却没有加以什麼研究，直至數年以後，我才拿它當每日的讀物。

他們也給我介紹安諾得所著的亞洲之光。我以前祇曉得他是天府之歌的作者，及至看見這一本書，我讀起來比紀達經還要感覺興趣。我開始閱讀以後，便不能釋手。有一次他們問我到比力華斯基別墅去見比力華斯先生和畢桑夫人。畢桑夫人適才入了通神學會。她的信仰的轉變，成爲他們辯論的題目。這些朋友勸我入會，但是我很客氣地拒絕，說：「我對於自己的宗教還沒有什麼心得，我

不願意再加入別的宗教團體。我記得我聽從哥哥的話，讀了勃理華斯基夫人的通神學入門。這一本書引起我閱讀關於印度教的書籍的興趣。傳教士們會給我養成一種觀念，就是以為印度教是充滿着迷信的；這本書也給我把這種觀念排除。

大約也在這個時候，我在一個素食的公寓裏碰見一位從孟却斯德來的基督徒。他爲人和露可親。他向我講及基督教。我將我關於那扎科的回憶告訴他，他聽了以後很難過。他說：『我是一個素食者，我不喝酒。無疑地，許多基督徒也喝酒，也吃肉，但是喝酒吃肉都不是聖經所教訓的。請你讀讀聖經罷。』我接受了他的忠告，他便給我一本聖經。我彷彿記得他自己曾賣過聖經，我便向他買了一本有地圖，有索引和其他便利的聖經。我起首閱讀了，但我沒有法子把舊約讀完。我讀過了創世記。但其他各書總使我讀着就打瞌睡，但是爲要能夠告訴人說我已經讀過聖經，我便勉強把其他各書讀過。興趣是沒有的，也不了解。我尤其不喜歡讀民數記。

但是新約却給我一個不同的印象，特別是那篇深入我心的登山寶訓。我拿牠同紀達經比較。裏面說的：『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使我異常欣賞，并使我想起『惠我杯水，報以美食。』那一段話。我那種幼的理解便想把紀達經，亞洲之光，登山寶訓各種教訓連貫起來。我想到『克己』這個意思，以

爲它最能恰當地代表最高級的宗教精神。

我所讀的這幾本書引起我研究其他宗教家的生平的需求。有一位朋友介紹嘉賽爾(Carlyle)的英雄與英雄崇拜給我讀。我讀到先知的英雄那一章，才認識那一位回教先知的偉大，勇敢，與嚴峻的生活。

除了這一點對宗教的認識以外，我不能作進一步的研究，因爲預備考試使我沒有功夫讀其他的書。但是我心中已經有了一個打算，就是以後要多讀宗教的書籍，而且對於各重要的宗教要有相當的認識。

同時我對於無神論者又怎能不多少有點認識？每一個印度人都知道勃理路(Bradlaugh)的名字和他的所謂無神論。我會讀過關於無神論的一本書，但名字已經忘記。這本書沒有給我什麼影響，因爲我已經走出了無神論的撒哈拉沙漠。畢桑夫人——她是當時社會很注意的人物！也從無神論轉到有神論：這一件事使我反對無神論的態度更堅強。我會讀過她的書我怎樣做了一個通神論者。

大約在這個時候，勃理路去世了。他是葬在和金墳地。我參加了他的喪禮：我相信住在倫敦的每一個印度人都參加的。還有幾位牧師也去表示對他的最後敬意。我們送殯回來的時候，要在車站裏

面候車，在人羣當中有一位無神論者傲然向着位牧師挑戰似的說：『喂，先生，你相信上帝的存在麼？』

『我相信，』那位善士低着聲回答。

『你也承認地球的周線是二萬八千英里，』那位無神論者很自信地笑着說：『請你告訴我，你的上帝有多大他究竟在那裏？』

『好的，祇要我們理會，他就住在你我的心中。』

『算了，算了，別拿我當孩子哄，』那無神論者得意洋洋地看着我們說，那位牧師祇是謙卑地靜默着。

這一番談話更增加了我對無神論的偏見。

大約在這個時候，謙占特拉到英國來。我曾經聽人說過他是一個作家。我們在印度協會曼菱女士的家裏見面。我每逢到她的家裏去總是默默無言的，除了回答別人的話以外，自己總不講話。她把我介紹給謙占特拉。他是不懂英文的。他的服飾很古怪——一條笨拙的褲子，一件起了縐紋的，骯髒的，褐色的衫子；這是波斯教徒的模樣；沒有領子和領帶，一頂有縫子的絨帽，長的鬚子。他的體格并不魁梧。他的圓圓的臉滿佈着天花的疤痕；他的鼻子不尖不圓。這樣一個奇形怪狀的人，在一個時髦的社

會裏，自然給人特別的注意。

我們每天都見面。我們的思想與行動有大部分是相同的。我們都是素食的：我們時常同吃午餐。這正是我自己烹飪，每星期祇花十七個先令的時候。有時我到他的住所裏去，有時他到我這裏來。我的烹飪是英國式的，他却是除了印度式的以外，都不滿意。我有時拿紅蘿蔔作湯；他以爲這樣的口味是怪可憐的。有一次他找到了一點扁豆，煮好了拿到我這裏來，我喫得非常高興。這一件事使我們以後成功了一種交換的辦法：有時他把他的珍品帶來，有時我給他帶去。

那時曼菱主教長(Bishop Manning)的名字正在傳誦人口。碼頭工人的罷工得到迅速了結，是因爲約翰本氏(John Burns)和曼菱主教長的努力。我告訴謙占特拉，狄士黎利(DIsraeli)如何誇獎主教長的質樸。他便說：『我一定要見見這位聖人。』

『他是一個大人物，你怎能見他呢？』

『爲什麼？我自自辦法。我要請你用我的名義給他寫信。你要告訴他我是一個作家，我要爲他的人道工作當面恭賀他，並且要說我不懂得英文，所以要你同去當翻譯。』

我照他的意思寫了一封信。兩三日後收到曼菱主教長的回片，約我們見面。於是我們同去見主教長。我把平常會客的衣服穿上。謙占特拉却是一仍其舊，穿着向來的衫子和褲子。我想向他取笑，但

是他却占了我的上峯，說：『你們文明人都是怯弱的，大人物永不看人的外表，他們要看人的心。』

我們進了主教長的大廈。我們剛剛坐下，便有一位高而瘦的老先生出來與我們握手。謙占特拉便開始致辭，說：

『我不要再耽擱你的功夫。我是久仰大名，特來致謝你爲罷工者所做的好事。我向來有一個喜歡拜訪世界名人的習慣，所以今天特來麻煩你。』他是用古查拉提話說的，這自然是我的翻譯。

『我很歡你們來，』主教長回答說。我希望你們在倫敦的生活能夠如意，也希望你們與這裏的人士往來。願上帝祝福你們。說完了這幾句話，他便站起來與我們告別。

有一次謙占特拉穿着一件內衣和一條「道帶」(註一)——像我們在印度的模樣——到我那裏來。那位樸實的女房東開了門，慌張地跑過來。『有一個瘋子模樣的人，』她說，『要來看你。』我們到門口去，很想不到，看見謙占特拉繫着那塊「道帶」。我爲之愕然。但是他的臉除了平常的笑容外，沒有別的代表。

『但是街上的兒童不向你取笑麼？』

(註一)「道帶」(Dhoti) 是一塊圍腰及遮蔽下體的棉布。

『是的，他們跟着我跑，但是我不理他們，他們也就安靜下去了。』

謙占特拉在倫敦住了幾個月以後，便到巴黎去。他開始學法文和翻譯法文書籍。我的法文程度還夠使我校正他的譯文，於是他便將稿子給我看。這不是翻譯，實在是一部新的作品。

最後他決定到美國去。他費了很大的力量才買到了一張位置在甲板上的船票。在美國的時候，他有一次穿着內衣和「道帶」出去，便因為『服裝怪誕』的理由被控告。我記得法庭是認他為無罪把他放走了。

在英國取得律師的資格不算困難，但是執行業務却非易事。我是專攻法律的，但沒有學會如何開業。我會經用心讀過習律一助，但不曉得怎樣將它應用在我的業務上。

我正在研究法律的時候，心中已經充滿了這樣的疑團。我將我這些困難同一些朋友談論。其中的一個勸我向納奧路治請教。雖然我從印度帶來一封給他的介紹信，我總覺得不應當去麻煩這樣一位大人物。每逢他演講的時候，我總是去聽。我是坐在講堂的一隅，等到耳福和眼福都得飽足以後便自回家。他為要與學生們多有親切的接觸起見，創立了一個學會。我是常到這個會的聚會去，看見他對於學生們的關心知尊重，便私自欣慰。過了些時，我終於鼓起勇氣將介紹信呈給他。他說：『你隨時都可以來和我商量。』但我竟沒有去見他。

我現在忘記了是否也是那位朋友主張我去見品吉 (Frederick Pinoutt) 先生。他是一個保守黨員。但他的愛護印度學生是出於大公至誠的心的。許多學生去求他指導，我也請他給我晤見的機會；他許可了。這一次的晤見是我所永不能忘的。他像朋友那樣接待我，在歡笑之中消除了我的悲觀的態度。「請你放心罷，」他說，「做一個尋常的律師用不着非常的本領。普通的忠實勤奮，便足以他能夠維持生活。案子不都是繁雜的好罷，請你告訴我你讀過些什麼書。」

我把我所讀過的有限的書本告訴他以後，他顯然有點失望。但這不過是一會兒的事。不久，他的臉重復照耀着那可愛的笑容。他說：「我知道你的困難。你的書本知識很有限。你也不懂得世故。你甚至連本國的歷史也沒有讀過。一個律師應當通曉人情。每一個印度人更應當熟悉印度的歷史。這與律師的業務沒有關係，但這是你應有的知識。我曉得你甚至沒有讀過凱氏和馬列孫的叛變記。快去讀這本書，還要讀一兩本關於人情世故的書。」

這位長者所給我的幫助使我感激萬分。他的忠告沒有給我多少直接的影響，但是他的情誼却使我感奮起來。他那光風霽月般的臉深印在我的腦際。我相信他所說的一個成功的律師不一定要有出人的才幹，只要他是忠誠勤懇的便夠了。我自問在這兩點上還過得去，於是我便有點自慰。我法律的考試是及格了，而我在英國的居留也就此告終。

第五章 返 國

我離開倫敦的時候已經到了。我購了一張亞森號的船票，於六月放洋回國。我們到了亞拉伯海的時候，「時令風」已經起首吹着。過了亞典以後直至孟買，沿途風浪很大。船上差不多每一個客人都暈船，但我却是起居如常，在甲板上欣賞着浪花的飛濺。因為大多數的客人都不能起來，所以只有我們兩三個人喫早餐。盛麥糊的盆子是緊緊地拴在我們的衣裾上，因為怕它灑出來。

這外面的暴風似乎是裏面的暴風的一種暗示。外面的暴風沒有擾亂我的精神，但是我本階級裏面的那場風雨却是等着我去應付。還有我自己要開始律師的業務，也是覺着毫無把握。並且我既自命為改革家，也要計劃着將來應辦的事。這都是我所想得到的；豈知還有一些意外的事。

我的哥哥從加地亞華到碼頭來接我。那時他已經認識了麥達博士和他的兄弟。麥博士堅邀我們到他的家裏住，我們便去了。這一個從英國起首的友誼於是在印度繼續下去，直至兩家的人都成為永久的朋友。我在旅程的時候，是渴望着與母親見面。我並不曉得她已長辭人世，使我不獲再見慈

容。現在這惡耗來到了。我照着規矩，守那齋沐的制。我的母親是我還在英國的時候去世的，但是我的哥哥却不肯讓我曉得這件事。他是不願我在異國得到這個不好的消息。雖然如此，這件事還是給我一個很大的打擊，我在這裏不必多提到。我的願望多數已經被打得粉碎，但是我記得我並沒有怎樣過度的表示我的傷感。我甚至能夠制止我的眼淚，照常去做事。

麥達博士給我介紹了幾位朋友，其中一位是他的令弟格其芬，我同他後來成爲一個終身的朋友。在這幾位朋友中我所要特別提到的是那位詩人萊參。他是麥達博士一位哥哥的女婿，與格其芬合夥開一個珠寶店。他還不到二十五歲，但是我與他第一次晤會以後就確信他是一個品學兼優的人。他也是一個著名的沙他發但尼（即同時能記憶或處理一百種不同的事者）。麥達博士叫我看看他的記憶的本領。我把我所記得的歐洲各種方言的字全盤舉出來，請他背誦。他居然能照我原來的次序都念出來。我羨慕他的天才，但沒有受他的眩惑。最使我醉心的是他的經典上的知識，他的純潔的人格，和他那實現自我的熱烈要求。我曉得這最後的一件事是他生存的唯一目的。穆但南裏面以下的幾句話是他常常口誦心銘着的：

惟有我在日常的每一件事裏面都能看見他（指上帝）

我才是有福的；

他實在是一條線索，
維繫着穆但南的生命。

萊參比（「比」字加在一個名字の後面即「兄」的意思）的生意達數十萬羅比。他善於鑑別珍珠和鑽石。買賣上一切難題，他都能措置裕如。但是這些事都不是他的生命所寄托的所在。他的生活的中心是要面見上帝的那種熱情。在他的辦公棹上總有一本宗教書籍和他的日記。他每逢處理一件事務完畢以後，便打開那本宗教書或日記。他已經問世的著述，多半是從日記摘錄出來的。凡是在完結要公以後，馬上能夠寫述關於心靈界的奧秘的，那個人顯然不是一個做生意的人，而是一個真正尋求真理者。我看見他在事務繁忙的時候，仍然聚精會神地在心靈的領域內追逐着，如是者不祇一兩次，是常常這樣的。我從未見過他爲任何的事失却心理上的均衡。我們兩人本來沒有什麼世俗上的連繫，但我與他却十分的契合。我還是一位無名的律師，但是我們每次相見，他總與我作關於宗教的深摯談話。我當時雖然還在暗中摸索，對於宗教問題的討論，還不十分關心，但對於他的談話總覺得很有興趣。自此以後，我見過好幾位宗教家和各教的領袖，但他們都沒有給我像萊參比所給我那樣的印象。他的話直進到我的心坎裏。他的理智和道德上的誠摯同樣地使我欽佩。我深信他是能向我推心置腹，而且不會領我入歧途的，所以我每逢遇到什麼精神上的難題，總是跑到他那裏去。

雖然我對他是十分敬佩，我却不能認他爲我的格魯，（註一）使他以王者的資格，佔據着我的心靈。我心中這一塊空地還是存在，我還在追求着。我相信印度教關於格魯的理論，以爲沒有格魯就不能得到真正智識的那種說法，是包含着不少真理的。在世俗的事上，一個不完善的導師還可以對付，但在靈界的事上那就不然了。祇有一個已臻化境的大師配作格魯。所以人當不斷追求，以期止於至善，因爲所得的格魯若何，視其所追求者若何。精進不己是人類的權利，這個權利自有它的報酬，其餘的就在上帝的手裏。我雖然不能尊萊參比爲我的格魯，他却常常作了我的領導幫忙的人。有三位近代的人在我的生命上留着一個深的印象，使我傾倒——萊參比是因爲生活上的接觸；托爾斯泰是因讀他的上帝的國在你裏面，（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萊雪芹（Ruskin）是因爲讀他的到這最後的一個。（Unto This Last）

我的哥哥對我抱很大的希望。他名利的念很重。他的心胸寬大，薄於責人，性情也樸實，因此他的交遊很廣。他希望可以從此爲我得些顧客。他想像着我的業務不久一定很發達，因此他便聽任着家用爲我而膨脹。他也百計經營，預備着我出庭作律師。

（註一）格魯（Guru）即靈性導師之意。

我回國的時候，我的階級因爲我出國而起的風浪還是醞釀着。階級裏面分開兩派，一派馬上恢復了我的階級的地位，另一派還是堅決地拒絕我。我的哥哥爲討好第一派起見，在我沒有到那扎科以前，同我到納色去，在神聖之河沐浴，到了那扎科以後，又爲我設階級之謙，以示贖罪之意。這些事我都不喜歡，不過我哥哥的愛我是無限度的，我的敬他也是相等。因此我便機械地做了他所吩咐的事，把他的話看作法律。這樣，我那復入階級的問題就算解決了。

階級裏拒絕我的那一部分我是沒有與他們周旋。我對於他們的首腦却是沒有嫌怨。他們中間也有不喜歡我的，但我極力避免傷害他們的感情。我十分尊重本階級關於摒除的規定。照着這些規矩，所有我的親戚，連我的岳父母，甚至我的姊姊和姊夫，都不能招待我，就是在他們家裏喝一杯水也不行的。他們預備私自破壞這個禁例，但這却是與我那不肯背着人做事的脾氣不合的。

因爲我的行爲謹慎，所以階級總沒有來麻煩我。實在說起來，就是反對我的那一部分人待我也非常和氣。他們甚至在事務上幫忙我，而不希望我爲階級做什麼事。我相信這些可喜的事都是從我的不抵抗來的。假如我鼓噪着要他們恢復我的階級藉；假如我使階級分成更多的黨派；假如我觸了階級首領袖的怒，他們一定會報復的。若是這樣，我從英國回來的時候，就不會像現在安然無事，要陷在一個鬥爭的旋渦裏。

我與我妻的關係，仍然不很滿意。我在英國的居留並沒有把我的妒心治好，我在一切小事上還是存着猜疑，因此我一切的願望都沒有達到。我決定令我妻學習讀書作文，並且我自己要幫助她，但是我的色慾妨碍我們的進行。有一次我要她歸寧，等到她很難過的時候才接她回來。後來我知道這都是我的錯處。

我計劃在兒童教育上做一些改進的事。我的哥哥有兒女，我自己的兒子在我到英國時留在家裏，現在差不多是四歲了。我想教他們體操使他們頑強，并且要親加指導。這件事得着哥哥的贊助，所以有了相當的成功。與兒童作伴，於我總是一件快樂的事。與他們嬉戲頑笑的習慣到現在我還保存着。從那時起，我總覺得我可以作一個好的兒童教師。

在飲食上，「改革」的需要是顯然的。茶與咖啡在家中已經佔了一個位置。我的哥哥以為家中應當有一點英國的氣派，等候着我回來。因此磁器一類的東西，從前有特別的事情才用的，現在竟變成家常用品了。我的「改革」在這些新添的東西以上，又加上一些點綴：我提倡喫麥糊，並且把可代替了茶和咖啡。其實是在茶和咖啡之外添上可可。革履和靴子早已有，我又加上歐式衣服，使歐化得以完成。

家用這就加增起來。新的東西每天都添置。我們已經把一隻白象（指費大而鮮實用之物）控

在門口。但是我們怎樣維持這些費用呢？在那扎科開始執行律師業務未免是個笑話。我甚至連一個及格的威吉爾（註一）的學問也沒有，而我反要得到十倍於他的公費！沒有這樣蠢拙的當事人要來照顧我。就是有這樣的人，我難道還要在我的無學之上再加上自大與欺騙，使我欠世界的債更多麼？

有些朋友勸我到孟買去一些時，在那裏的高等法院得點經驗，學習印度的法律，并拉一些主顧。我接受這個提議，去了。我在孟買開始當家，我的廚子與我同樣地『蹩腳』。他是一個婆羅門教徒，名叫那非尚加。我不拿他當僕人看待，乃當他是家庭中的一員。他有時以水澆體，但永不沐浴。他的『道帶』是骯髒的，他的『聖繩』亦然。他對於印度教的經典一無所知。但是我怎樣可以得一個更好的廚子呢？

『喂，那非尚加，』我有時候問他，『你也許不會烹飪，但你連日常的崇拜都不懂嗎？』

『崇拜麼，先生？犁頭是我們的崇拜，鏟子是我們的儀式，我就是這樣的一個婆羅門教徒。我是靠着你的慈悲生活，不然，我就要務農去了。』

於是我便不得不做那非尚加的先生。我是有空着的時間，因此一半的烹飪是我自己去做，並且沿用英國烹調素食的方法。我買了一個爐子，與那非尚加一同管理廚房。我自己本來沒有與異教人共食的避忌，因此那非尚加也就沒有了。我們就是這樣快活地度日。我們當中祇有一件障礙物：那非

尙加沒有方法去掉他那骯髒的習慣，所以飲食總是弄不乾淨。

我在孟買至多祇能住四五個月，因為沒有入息來維持我的費用。我曉得在孟買執業是沒有希望的，所以我就離開那裏，回到那扎科去設立我的辦公處。在這裏我還算過得去。給人寫呈文稟帖，平均每月可以收進三百個羅比。這一點工作與其說是我自己的本領，毋寧說是得力於朋友的幫忙，因為我哥哥的夥伴有一個已經成立的業務。重要的呈文他都送到有名的律師那裏去辦理。我所擬的都是他的貧窮的當事人的文件。

在這個時候，我不能不與我那不給回扣的原則妥協。據說這裏情形與別的地方不同：在孟買，回扣是給與招徠主顧者的，在這裏却要給與介紹案件的威吉爾。還有，在這裏，如同在孟買一樣，所有的律師都拿出他們一部分的公費給回扣。在我自己這種情形之下，我哥哥的理論是無法駁回的。『你要曉得，』他說，『我是同着另一個威吉爾合夥。我總是願意把我們的案件中你能辦理的都交給你。如果你不把回扣給我的夥伴，你一定要使我爲難。你與我是組合營業的，你的公費是我們共同的收入，自然我也佔一分。但是我的夥計呢？假如他把同一案件交把另一個律師，他一定也從他那裏得回

(註一) 威吉爾 (Vakil) 即在印度已經考試及格的律師。

扣。』我覺得他的話很有道理，以爲我如果要做一個律師，就不能堅執着這個關於回扣的原則。我是這樣子同我自己理論，或者說得兀突一點，我是這樣子欺騙着我自己。我應當補充一句：我不記得我會爲其他任何案件給過回扣。

我此時已可勉強維持生活，但正在此時，我遭遇着生平第一個打擊。我從前會聽說過一個英國官員是什麼樣的人，但到現在還沒有面對面地遇見過一個。我的哥哥曾經做過新近去世的波班打的奈羅的秘書與顧問。在這個時候發生一件案子，說他在職時給長官出錯了主意。這件事已經報告給政治代表；他向來是不滿於我的哥哥的。這一位官員我在英國就認得他；他和我還算不錯。我的哥哥以爲我應當藉着這個友誼，爲他說一句好話。這樣子，他說，也許可以解除他對他的惡意。我殊不以此爲然，因爲我不願意利用一個留英時期中很淺的交誼去做這樣的事。如果我的哥哥是錯的，我去見這官員有什麼用處？如果他是沒有罪的，他應當照規矩上一個呈文，等候着這件事的結果。我的哥哥不贊成我的意見。『你沒有認識加地亞華，』他說，『你更沒有認識世界。這裏什麼都靠人情，你是我的弟弟，你向你所認識的這位官員爲我講一句好話，這是你的責任；你不應當逃避這個責任。』

我沒有方法推却；我便逆了我的意思去見這位官員。我知道我不應當見他；也覺得去見他是一件不體面的事。雖然如此，我終於請求見他，而他也允許了。我首先提起昔日的交誼，但馬上就感

覺到加地亞華不是英國，一個在職的官員與一個在假的官員完全是兩個人。那位政治代表承認我們是相識的，但是提到這個交誼，反使他剛硬起來。『我想你決不是到這裏來僱用這個交誼的！』這似乎是他的態度所表示的話。雖然如此，我還是把我的來由向他陳說，他不耐煩了。『你的哥哥是一個陰謀者，』他說，『我不願意聽你說什麼話，我沒有功夫。如果你的哥哥有什麼話說，讓他照着規矩訴陳罷。』這一個嚴峻的回答大概是我所應得的。但自私自目的是；我仍然陳說着。他站起來說：『你現在必須走了。』

『但是，請你聽我說完罷，』我說。這使他更忿怒。他把僕人喚進來，令他送我出去。僕人進來了，我還是遲疑着。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推我出了屋子。

我馬上寫了一封短札送過去，大意說：『你侮辱了我，你用你的僕人侵犯了我。如果你不向我賠不是，我就要告你。』

他的回信，立刻由他的隨從送來

『你對我不敬。我叫你走，而你不走。我只得令僕人送你出去。甚至他叫你出去的時候，你還不肯去，於是他不得不用一點力量推你出去。你要告我，聽你便罷。』

我把這個回信放在衣袋裏。回家的時候垂頭喪氣，把經過的情形都告訴我的哥哥。他覺得難過，

但不曉得怎樣安慰我。他把這件事告訴他的威吉爾朋友們，因為我不知道怎樣控告這位先生。麥達爵士此時恰好在那扎科，他是爲一個案件從孟買來的。但是像我這樣一個初出茅廬的律師怎敢去見他呢？是我將關於此案的文件由聘請他的那位威吉爾轉交給他，求他指教。『告訴甘地罷。』他說，『這些事是司空見慣的。他才從英國回來，血氣方剛，他還沒有認識英國的官員。如果他打算掙一點錢，在這裏舒服過日子，讓他把那封信撕毀，忍受了這個恥辱罷。他告這位先生，沒有好處，還怕免不了把他自己也毀了。告訴他，他還沒有懂得世故呢。』

這個忠告於我是毒藥一般的苦，但是我不得不吞下去。我忍受了這個恥辱，但是也得得到它的教訓。『我永遠不再使我自己陷在這樣一個虛偽的境地裏。』我對自己說，『我以後永不再把友誼這樣的濫用。』從那時起，我沒有違反過我這個決心。這一次的打擊把我整個的生活路線改變了。

無疑地，我不應該去找那個政治代表，但是他的凌人的氣概實在是超過了這一個錯誤所當得的。他不必向我下逐客令，其實我至多不過佔他五分鐘的光陰。但是他不耐煩聽我的話。他可以客氣地請我走，但是他太過特勢。後來我曉得他是一個急躁的人。

如果我繼續在那個地方執行業務，我大部分的工作必定是在他的庭裏。但是我決不肯和他敷衍，或討好於他。而且我既聲言要告他，也不甘緘默。在這個時候，我起首知道一點本地的政治內幕。加

地亞華是許多省分組成的，自然少不了一羣政客。各省間的猜忌和官吏的攘權奪利，是那裏的家常便飯。就是那些君主也聽別人的擺佈，讓那些阿諛奉承者出主意。這種空氣我看來是惡毒的；怎樣能夠不受它的污染是一個不易解決的難題。到了最後，我是煩悶得不可開交。我的哥哥很曉得我的情狀。我們都覺得如果我能在別的地方找到一點事做，我就可以離開這一種鉤心鬥角的空氣。但是如果不用一些請托，要做一個大臣或一個法官都是不可能的事。我與政治代表所關的意見又使我的業務發生阻礙。

那時候波斑打也行着代治制。我在那裏有一點工作，就是替君主多爭些權柄。我爲佃戶地租過重那件事去見那代治員。這一位代治員雖然是個印度人，他的氣餒比那位英國先生還大。所以我雖然當着那裏的差，我仍是有幾分失望。我覺得我的當事人沒有得到公道，而我也沒有方法主持公道。我至多只能向政治代表或總督上訴。他們大概會說：『我們不便干涉，』就把上訴撤銷。如果在這些事上有可依據的章程，還可以有辦法，但在這裏，那英國先生的話就是法律。後來我再忍受不住了；我想着離開這個腐化的環境。

正在這時候，波斑打有一家商店寫信給我的哥哥提議如下的一件事：『我們在南非洲有生意。我們的商店是大的。我們在那裏的法庭有一件重要的案，我們要得回來的款是四萬鎊。那件訟事已

經進行了不少的日子，我們已經請了最好的威吉爾和律師。如果你能派你的令弟到那裏去，我們和他自己雙方都得益處。他替我們指揮我們的顧問，比我們自己來得更妥當。他自己也可以趁此機會，到一個沒有到過的地方去，結識些新的朋友。」

我的哥哥同我討論這件事。我不曉得我只是做指揮顧問的事，還是要出庭；但我有意接受他們的提議。我的哥哥介紹我去見那新近去世的查費理先生。他是雅都納公司的股東；這個公司就是上面所說的商店。『這不是一件繁雜的事，』查先生說，『我們有歐洲人做我們的朋友，你將來是要認識他們的。我們在商店裏很用得着你。我們的信件多數是用英文的，你也可以在這上面幫我們的忙。你在這裏自然是我們的客人，沒有什麼費用。』

『你要我替你們做多麼長久的事？』我問，『報酬是多少？』

『不過一年。我們給你一個回國的頭等旅費，另外一百零五鎊，一切都在內。』

這些條件不像是給律師的一種待遇，實在是給商店僱員的待遇。但我無論如何是要離開印度的，到一個新的地方，得些新的經驗：這是不應當錯過的一個機會。而且我可以得一百零五鎊，寄給哥哥幫助家用。我於是接受了他們的提議，預備到南非洲去。

甘 地 自 傳

第六章 到奈托爾

雅都納先生在杜爾本等着接我。船到碼頭了，我看看船上來接朋友的人們。我見得印度人並不受人尊敬。我發覺認識雅都納的人對他都有一種藐視的神情，這一件事使我五內如焚，但雅都納是習慣了。望着我的人似乎都帶一點好奇心。我的服飾與其他印度人不同，我穿了一件燕尾服，還披着一塊頭巾。

雅都納是一個未嘗學問的人，但他有豐富的經驗，有深沉的智力，自己也感覺着這一種特長。他從練習上學會僅夠在談話上應用的一點英語，但這已足使他處理他的事務，無論是與銀行經理或歐洲商人來往，或向法律顧問陳述案情。印度人却是很尊敬他。他的商店是當時印度商店中最大的，至少是最大的一個。在這許多長處之中，他有一個短處，——他天性多疑。

他是個回教徒，很看重他自己的宗教，而且喜歡談論回教的哲學。他雖然不懂得亞拉伯文，但對於可爾經和普通回教文學的認識還算不錯。他善於徵引例證，隨時應用。我和他來往，使我得到一些

關於回教的常議。我們有時談得親切起來，使用很長的時間討論回教問題。

我到了兩三天，他便帶我去看特本法庭。在那裏，他介紹我見幾個人，並叫我坐在他的律師的旁邊。那庭長不斷的望着我，後來他命我把頭巾脫下。我沒有依從他就離開法庭了。因此我就曉得未來的鬥爭又在這裏等着我。雅都納給我解釋爲什麼有些印度人要脫去他們的頭巾。他說：那些穿回教服裝的可以不脫，但其他印度人進到法庭的時候，照例是要脫的。

這一點瑣碎的規矩，我要把它詳細地敘述清楚。在這兩三天的當中，我觀察印度人是分開好幾派的。一派是回教的商人，他們稱呼自己爲『亞拉伯人』。另一派是印度教徒，還有一派是拍爾西的書記。印度教的書記是無所偏倚的，除非他們投入『亞拉伯人』的隊伍。拍爾西的則自稱爲波斯人。這三派人彼此有些社交的關係。但是最占多數的是他密爾、特律古及北印度的訂有契約或自由的工人。這三種人所組成的一派。那些訂有契約的工人是到奈托爾來要做工五年的。其他的三派與這一派只有生意上的關係。英國人稱呼他們爲『咕哩』。因爲印度人多數係勞苦階級，所以所有的印度人都被稱爲『咕哩』或『阿三』。(註一)

(註一)『亞三』(Sammy)即 Swami 的轉音，他齊爾的名字多以此字作結尾。

因爲這個原故，我便得了一個「咕哩律師」的名，而商人也就被稱爲「咕哩商人了。」「咕哩」這字原來的意思因此便被忘却，而變成印度人一個普通的稱謂。回教的商人不高興被人這樣稱呼，便說：「我不是一個咕哩，我是一個亞拉伯人，」或說：「我是一個商人，」而那英國人，如果他是客氣的，便要向他道歉。

在這種情形之下，頭巾的問題是很有關係的。脫去一個印度頭巾無異忍受一場羞辱。所以我想我倒不如與那印度頭巾分手，改戴一頂英國帽子，免得受這恥辱和引起不快的爭辯。但是雅都納反對這個意思。他說：「你這樣做，必要發生不良的影響。那些堅持着要戴印度頭巾的，你將置他們於何地？印度頭巾很與你相稱，你若戴英國帽子，倒像一個侍者了。」

他這一段話夾雜着實際的智慧，愛國心和一點偏狹。他的智慧是顯而易見的；他固執着戴頭巾，純由於愛國心的衝動；他那樣輕慢地提到侍者又證明他所見的不廣。在訂約做工的印度人當中有印度教徒，有回教徒，有基督教徒。最後的一種是那些訂約工人皈依了基督教的兒女。就是在一八九三年的時候，他們的人數已經不少。他們穿英國服裝，多數充侍者謀生。雅都納反對我戴英國帽子，就是因爲這些人的關係。在一個旅館當侍者，大家認爲是一件不體面的事。

從大體上說，雅都納的話我是贊成的。我給報館寫信論到這件事，敘述我在法庭裏戴頭巾的理

由。報紙上關於這個問題有不少的辯論。我是被稱爲一個「不受人歡迎的過客。」這樣一來，我到了不過幾天，我的名字便意外地傳遍於南非洲。有的人是擁護我的，也有的人以爲我近於冒昧。

我到了杜爾本七八天以後，便離開那裏。他們給我買了一個頭等位置。如果客人要用舖蓋，照例須多花五個先令。雅都納堅執着要我定一份舖蓋，但我因不願示弱，並且爲節省起見，沒有答應他。雅都納警告我說：『小心着，這裏不同印度。感謝上帝，我們所入的，頗有餘裕。你當用的東西，請你不要慳吝。』

火車在晚上九點鐘到了奈托爾的都城馬列茲堡。舖蓋照例是在這裏發給的。一位鐵路的夫役來問我要不要。我說不要，他便去了。但一個客人跟着來，把我全身上下端詳了一回。他看見我是一個「有色」的人，便不高興起來。他馬上走開，帶了一兩個公務員來。他們一言不發；那時又來了另一個公務員，對我說：『跟我來，你必須到貨車間去。』

『但我有一張頭等票，』我說。

『那不管事，』他接着說，『我告訴你，你必須到貨車間去。』

『他們在杜爾本許我在這裏，我決不能到別的地方去。』

『不行，』那位公務員說，『你必須離開這裏，否則我叫路警推你出去。』

「你可以這樣做，」我回答說，「我不能自動出去。」

路警來了。他拿着我的手，推我出去。我的行李也被拿出來。我不肯到貨車間去，車也就開走了。我到候車室坐下，把手提包帶着，其餘的行李放在原來的地方，路員已經把它看守着。

這時正在冬天：在南非洲的高地，冬天有時候是奇寒的。馬列茲堡因為地勢很高，所以冷得特別厲害。我的外衣同行行李一齊放着，但我不敢去取，恐怕又遭侮辱，因此我就坐着發抖。屋裏是沒有燈的。一個搭客大概在午夜的時候進來，似乎要和我說話，但我是沒有這個興致。

我開始想到我的職務了。我是要為我的權利來鬥爭呢，還是就回印度去呢？或是把侮辱丟開不管，先將案件了結再回印度？沒有將任務完畢便跑回印度，這是怯懦。我現在所受的痛苦只是表面的，它只是歧視有色人種那個病根的一種症候。如果可能的話，我應當設法把病根剷除，甯可因此受苦。我所求的伸雪只是要把對有色人種的歧視消除。

我於是決定趁下一次車到普列特利亞去。第二天早晨我發了一個長電給鐵路局長，也給雅都納打電報。他馬上去見局長；局長以路員的辦法為然，但告訴雅都納說他已經告訴站長，使我平安到達目的地。雅都納打電報給馬列茲堡的印度商人和別的地方的朋友，囑他們到站接我，並招呼我。商人們到車站來，把他們自己所遭遇過的苦處告訴我，並給我解釋，說我所遇見的不是一件異常的事。

他們是要藉此來安慰我。他們又說，印度人乘頭二等的，總要準備着路員和白人的麻煩。那一天就是這樣聽他們訴說苦况就過去了。後來夜車到了，裏面有一個給我定下的位置。我現在在馬列茲堡購了我在杜爾本所不肯購的臥車票。

火車早晨到了却爾斯城。在那時候，却爾斯城和約翰納堡中間沒有火車，只有驛車。這車是在史丹特頓停止過夜的。我買了一張車票，這票并不因在馬列茲堡停頓一天便取消的。并且雅都納會給却爾斯城驛車經紀去了一個電報。

但那經紀想藉口推辭我。因此，在他曉得我是一個生客的時候，他便說：『你的票被取消了。』我據理答復他。他實在的理由并不是沒有座位。凡是搭客都要安置在車裏面的，但因我被看作『咕哩』，而且是陌生的模樣，這管理員想不便把我與白人搭客放在一起。在車箱的兩旁都有座位，管理員照例坐在一邊。這一次他是坐在裏面，把他的座位給我。我知道這完全是不公道的，而且是個侮辱，但我想，還是忍受着罷。我不能強硬地到裏面去。如果我提出抗議，那車便會不管我走了。這樣子又要耽擱一天；至於第二天又要遇見什麼事，那只有上天曉得！所以，雖然我心裏忿怒，我只好坐在車夫旁便坐着。大約在三點鐘的時候，車到了巴地哥。那管理員現在想坐在我所坐着的地方，大約他是要抽煙和換換空氣。於是他從車夫那裏拿了一塊骯髒的麻布舖在踏腳板上，對我說：『阿三，你坐在這裏罷，

我要坐在車夫的旁邊。」這一種凌辱是過於我所能忍受的。我戰戰兢兢地對他說：「這是你叫我坐的地方，雖然我應當坐在裏面。那個凌辱我是忍受了。現在你要坐在外面抽烟，要我坐在你的腳底下，我不能這樣做，但我可以到裏面坐去。」

我還在吞吞吐吐地說這些話的時候，那人便走過來，拿拳頭使勁打我的耳朵。他抓住我的手臂，要把我拉下去。我拉着車廂的銅欄杆，決意不放手，即使我的腕骨斷了。客人都看見這一回事，那管理員一面呪詛我，一面拉我，打我，但我還是不動。他是強者，我是弱者。搭客中有人動了憐憫，嚷着說：「漢子，由他罷。他說得對。如果他不能坐在那裏，讓他進來與我們同坐罷。」使不得，」管理員說。但在這個時候，他有點垂頭喪氣，停止打我了。他放了我的手臂，遠呪詛了我一回，命那坐在車廂那一面的赫頓達僕人坐在踏腳板上，我便坐在他空出來的位子上。

客人都坐下；吹過了哨，車便開了。我的心在心窩裏急速地跳着，不知道我究竟能否活着到達目的地。那人隔一會兒便怒目看着我，又用手指指着我，厲聲說：「小心着。等我到了史丹特頓，便要顯我的身手給你看。」我默然坐着，求上帝幫助我。

天黑以後，我們到了史丹特頓。我看見了一些印度人的面貌，便嘆了一口氣，好像釋去重負。我剛下了車，這些朋友便說：「我們到這裏來接你，領你到席斯的店裏去。我們已經接到雅都納的電報。」

我是很歡喜的，便同到席斯的店裏去。席斯和他的僱員都騰集在我的面前。我告訴他們一切的經過。他們聽了很難過，並述說他們自己痛苦的經驗來安慰我。

我要把這件事的始末告訴驛車公司的經理。我於是給他寫了一封信，把一切的經過在裏面敘述，並請他注意這個人對我的恐嚇。我又請他保證我次晨起程的時候，他把我和其他的客人安頓在車子裏面。經理回信這樣說：「從史丹特頓起，我們有一輛較大的車子，是另外一批人管理的。你所申訴的那個管理員明天不在那裏，你可以和其他的客人坐在一起。」這使我稍為放心。我自然沒有意思要控告那個凌辱我的人，所以那件事便在此告一段落。

那天早晨，席斯所派的人送我上車。我得了一個好座位，那天晚上安抵約翰納堡。

史丹特頓是一個小鄉村，而約翰納堡是一個大城市。雅都納也打了電報到約翰納堡，把穆罕默德金路丁的商店的名字和住址給了我。他們的僕人到驛上來接我，但我沒有看見他，他也不認得我。於是我決定到一家旅館去。我僱了一輛馬車，叫車夫到國家大飯店去。我到經理那裏，要他給我一間房間。他看了我一下，客氣地說：「對不起，我們客滿了。於是我叫車夫送我到金路丁的店裏去。雅特爾在那裏等着我，並竭誠歡迎我。他聽我講到旅館的經驗，大笑了一場。他說：『你要在旅館住，這不是夢想麼？』」

「爲什麼？」我問。

「你在這裏住幾天便曉得我們只能將就些住在這裏。爲賺錢的原故，不能不忍些辱。就是這麼一回事。」他跟着就把印度人在南非洲的苦處講給我聽。

稍遲一點，他對我說：「這個地方是不宜於你這一類人的。看哪，你明天就要到普力托勒去。是要乘三等車的。杜蘭斯哇的情形比奈托爾還要壞。頭二等票是永不售給印度人的。」

「大概你們爲這件事沒有持久的抗爭過吧。」

「我們是抗議過的；但我要承認我們自己的人平常是不乘頭二等的。」

「我把鐵路章程拿來看過一遍。裏面有一個罅漏。杜蘭斯哇的法令的措辭是不十分確定的；鐵路的章程更是這樣。」

我對雅特爾說：「我要乘頭等，如不能，我寧願乘馬車到普力托勒去。路程不過三十七哩。」

雅特爾叫我曉得這樣去要多費金錢和時間，但同意我乘頭等的提議，於是我們送一封信到站長那裏去。我在信上說我是一個律師，向來是乘頭等的。我也說，我要愈早愈好到了普力托勒。因爲來不及等他的回音，我告訴他我要在車站當面候覆。這當面候覆的一個主意是另外還有用意的。我想，如果站長用書面答覆，他一定說「否」，特別因爲他自有他對於「咕哩」律師的見解。我要穿着最講

究的英服去見他，設法叫他賣給我一個頭等票。於是我穿着燕尾服，帶着領帶，到車站去，拿着一鎊錢的票價，放在櫃臺上，要買一張頭等票。

「給我寫信的是你嗎？」他問。

「是的！——你如果能夠賣一張票給我，我必定很感激你。我今天必須到普力托勒去。」

他笑着，和譏地對我說：「我不是杜蘭斯哇人，我是荷蘭人；我懂得你的感覺，我是同情於你的。我給你一張車票，但有一個條件：如果車警讓你到三等去，你不要把我牽連在裏面。這就是說，你不要控告鐵路公司。我祝你一路平安。我看出來你是一個君子。」

說了這幾句話，他便把票辦妥。我謝謝他，並叫他放心。

雅特爾到車站來送行。這件事叫他意外地高興，但他警告我說：「如果你能安抵普力托勒，我將怎樣感激呢！但我恐怕車警不會讓你在頭等安坐着；即使他不麻煩你，乘客也不放你過去。」

於是我佔了一個頭等座，而車便開了。到了日美頓，路警來查票。他看見我在那裏，便很生氣，用手指作勢叫我到三等去。我把頭等票給他看。「這不管事，」他說，「到三等去！」

在這個車廂上祇有一位英國搭客。他代我抱不平。「你這樣麻煩那位客人是什麼意思？」他說，「你豈不知道他有一張頭等票麼？我並不嫌惡他與我在一起。」他又轉過來對我說：「就在你原來

的地方安坐着罷。」

那路警喃喃地說：「如果你喜歡與一個『咕哩』在一起，那又與我何干！」於是他走了。

大約晚上八點鐘，車到了普力托勒。我想雅都納的律師必定會派人到車站來接我。因為我特別說好，不要住在一個印度人家，所以我曉得沒有印度人來的。但那律師却沒有派人來。後來我曉得因為我是禮拜天到的，他若派人來，必要感到若干不便。我心中有點作難，不曉得可以到那裏去，因為我怕沒有旅館肯收留我。

普力托勒車站在一八九三年的時候與現在完全不同，燈光 is 黯淡的，搭客是稀少的。我讓別的客人先走了，以為等到收票人不忙的時候，我便可以把票遞給他，請他指示我到一個小旅館，或其他可以容身的地方去；不然，我就得在車站過夜。我應當承認，我連這一點幫忙也不敢去求他，因為我怕又要受他的侮辱。

站上的客人都走了。我把票給了收票員，便開始我的問訊。他却是客氣地回答我，但我知道他是不能幫我忙的。站在旁邊的一個美國黑人却與我談起話來了。

「我看你在這裏是完全陌生，也沒有朋友的。」他說，「如果你同我來，我可以帶你到一家美國人開的小旅館去。我很認識他，我想他可以收留你。」

我還是不大敢相信他，但我謝謝他，接受了他的提議。他帶我到約翰遜的家庭旅館去。他把經理拉到一旁，和他說話，那經理便答應讓我住一夜，但附帶着一個條件，即把我的飲食送到我的臥室去。

『我願叫你相信，』他說，『我并不岐視有色的人；但我只有歐人的顧客；如果我讓你在餐室喫飯，也許叫客人不高興，甚至要走了。』

『謝謝你，』我說，『雖然你只讓我住一夜。我現在多少知道這裏的情形，所以並不怪你，叫我在臥室喫飯也不要緊。我希望明天可以想個別的办法。』

我被帶到一個房間裏去，在那裏坐着等候開飯，並作冥想，因為只有我一個人在那裏。那個旅館並沒有多少客人，我以為侍者不久便會把飯端上來。但沒有想到約翰遜先生自己進來了。『我很慚愧，』他說，『要叫你在這裏喫飯。我因此對其他的客人說到你的事，問問他們嫌不嫌你在餐室喫飯。他們說他們不反對，並且說你喜歡在這裏住多久都可以。所以，請你到餐室喫飯，並且隨便在這裏住到什麼時候都可以。』

我謝謝他，到了餐室去，飽喫一頓。

第七章 在普力托勒

第二天早晨，我去見那位律師貝克先生。雅都納曾把他的爲人大略告訴我；所以他待我的客氣，並不使我奇異。他很和藹地見我，問了一些體貼的話。『我們在這裏沒有什麼律師的職務可以委托你，』他說，『因爲我們已經請了最好的顧問。這案子是複雜的，我所能請你幫忙的只是採訪必需的消息。你可以使我同當事人的來往便利些，因爲以後我要從他得到的消息都向你要。這一定是個好處。這裏對於有色人種的歧視是很厲害的，所以爲你這樣人找住處是不容易的。但我認識一位貧乏的女人，他是一個小商人的妻子，我想他爲增加入息起見，大概可以收留你。』

於是他把我帶到她的住處，與她私下說到我的事，她答應供給我食和住，每星期給她三十五先令。

貝克先生是一個熱心而不受職的基督教傳道者。他現在還活着，已經放棄了他的法律職務，擔任純粹傳教的工作。他是富有資財的。他繼續着與我通信，在信上總是說到一樣的題目。他以爲基督

教是最好的，並相信如果不認耶穌爲獨生子和人類的救主，便不能得到永久的平安。

我們在第一次見面的時候，貝克先生便探聽我對於宗教的見解。『我生出來是一個印度人，』我對他說，『但關於印度教我所知的很有限；關於其他宗教，我所知的更少。其實，在宗教的事上，我沒有什麼把握，我也不知道我在信什麼，我應當信什麼。』

貝克先生喜歡聽這一切。『我是南非洲總宜教會董事之一，』他說，『我自己出錢蓋了一座禮拜堂，按時在那裏講道。我對有色人種是沒有歧視的。我有幾位同工，每日一時聚集幾分鐘，祈求平安與光明。如果你能同我一齊到那裏去，我可以介紹你見他們。他們一定喜歡見你，我相信你也喜歡和他們在一起。我想給你一些宗教書籍叫你讀。自然那唯一無二的書是聖經，我特別希望你閱讀。』我謝了貝克先生，答應盡力常到一點鐘的祈禱會去。『我明天一點鐘就在這裏等你，我們同去祈禱。』貝克先生這樣說着，我們就告別了。

我當時沒有功夫仔細思量一切。我到約翰遜先生那裏，付了賬，搬到新寓所去，在那裏喫了午飯。那女房東是一位良善的婦人。她給我煮了一種素食。我不久便與那一家的人意氣相投起來。在這件事情以後，我去見雅都納所介紹的那位朋友。我從他那裏又聽見印度人在南非洲其他的苦處。他一定要我和他同住。我謝謝他，告訴他我已另有安排。他請我凡有所需，不要怕告訴他。

天黑了。我回家，喫過了飯，到我的房間去，躺在那裏，深沉地思想。我沒有什麼事可以馬上做的。我心裏想：貝克先生這樣深切地注意我，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我從他的宗教的同工們能得到什麼呢？我研究基督教究竟要到何程度？我對於印度教沒有澈底的認識，是否能夠明白基督教在宗教上的地位？我只能得到一種結論：我應當摒除情感，把我所遇到的加以研究；至於貝克先生那一個團體應當如何應付，我就只有聽着上帝的引導。我在沒有清楚明白自己的宗教以前，我不應當信奉另外一種宗教。這樣的思想着，我便睡着了。

第二天一點鐘，我到貝克先生的祈禱會去。我在那裏被介紹見赫理斯女士，賈碧女士和高實先生。每一個人都跪下祈禱，我也跟着這樣做。那些祈禱是照着個人的需要，為各樣的事懇求上帝。平常的格式是求他使那一天平安過去，也求他打開心門。現在他們又為我的福利加上一段誠懇的祈禱：「主呀，請你為這位新來的弟兄指示道路。你給我們的平安，請你也給他。願救我們的主也救他。我們的祈求都是奉耶穌的名。」在這些會裏，沒有唱詩或音樂。每天為一件特別的事祈禱以後，我們便各自去喫午飯，因為那正是午飯的時候。祈禱所佔的功夫不過五分鐘左右。

赫理斯和賈碧兩位女士都是上了年紀的處女。高實先生是桂格會的會友。兩位女士是住在一起的。她們每星期四點鐘在家裏有一個茶會；這個會她們請我隨時參加。每逢在禮拜天見面的時候，

我總把本星期我所寫的宗教日記給高實先生看。我也同他討論我所讀過的書和這些書所給我的印象。那些女客們常講到她們甜美的經驗和她們所得到的平安。高實先生是一位坦白堅毅的青年。我們有時同去散步；他也同我到其他基督徒朋友那裏去。我們彼此相熟一點的時候，他便起首把他自己所揀選的書給我讀，後來我的書架竟被那些書裝滿了。純然靠着信仰，我答應他讀所有的這些書，讀的時候，我們便討論它們。

正如他把各種的書介紹給我一樣，他也介紹給我一些他認為忠實的基督徒的朋友，其中有一次是介紹我到一個屬於勃萊茂兄弟會的家庭。高實先生所介紹給我的朋友有好幾位是好的。我覺得他們多數都是敬畏上帝的。但當我同這一個家庭來往的時候，勃萊茂兄弟會中的一個與我發生一種我所沒有想到的辯論：

「你沒有懂得我們宗教優美的地方。從你所說的看來，你的生活每一分鐘都用在懊悔着你的過失，和改過自新的事情上。這一種週而復始的造作，怎能使你得救呢？你是永遠不能得到平安的。你承認我們都是罪人。現在請你看看我們所信仰的是多麼完善。我們自己努力改過自新是沒有用處的；同時我們又必須得到救贖。我們怎能背着罪惡的重擔呢？我們祇有把它放在耶穌的身上。他是唯一的，無罪的，上帝的兒子。凡信他的，必得永生，這是他自己說的。上帝無窮的慈悲就在於此。如果我們

相信耶穌替我們贖罪，我們的罪就不會束縛我們。我們是免不了犯罪的；生在這個世界而無罪是不可能的。耶穌也是爲此而受苦，並替人類救贖一切的罪。惟有接受他的救贖的，可以得永遠的平安。試想你的生活是如何的阻礙不安，而我們所應許的是何等的平安。」

這一番議論完全不能使我佩服。我謙卑地回答說：「如果這是基督教，我便不能接納。我不希望從罪惡的結果得到救贖；我所求的是從罪惡的本身得到救贖。我沒有達到這個目的以前，我寧可過着不安甯的生活。」

那位勃萊茂兄弟會的信徒接着說：「我要叫你相信，你的努力是沒有效果的。請你把我所說的再想想看。」

那一位兄弟會的信徒真是言出必行。他自動的犯了罪，讓我曉得他是無所動於中的。

但我在沒有遇見這些兄弟會的信徒們的時候，已經知道所有的基督徒並不都相信這一種救贖論。高實先生自己便是一個敬畏上帝的人。他的心是清潔的，他也相信自潔是可能的。那兩位女士也贊成這種見解。到我手裏的那些書有的是充滿虔敬的。因此，雖然高實先生對於我最近這一次的經驗十分憂慮，我還是能叫他相信一個勃萊茂兄弟會信徒是非顛倒的信仰，不能使我對於基督教發生一種偏見。我的困難是在別的地方。這個關於聖經和關於它的已爲人所承認的解釋。

我在沒有多講到與基督教人士的接觸以前，要敘述一些同在這個時期中的其他經驗。泰洽穆罕默德先生在普力托勒的地位與雅都納在奈托爾的地位相同。凡有公共的活動是少不了他的。我在普力托勒的第一個星期就認識他。我告訴他我願意與那裏的每一個印度人認識。我的第一步是召集一個會議，到會的大半是麥門（註一）商人，雖然也有幾個印度教徒。在普力托勒的印度教居民其實是不多。

我在這一個會議的演說是我生平第一次的公共演講。我的題目是論到商業上的誠實，在演講之前，我頗有預備。我常聽見商人說在商業上是不能講誠實的。我當時不以爲然，現在還是這樣。直到現在有些商人的朋友還是說商業與誠實是不能並立的。商業據他們說，是一件很實際的事，誠實是屬於宗教的範圍的。他們以爲實際的事是一種事，宗教的事是另一種事。我在演說上竭力非難這種說法，使商人們覺悟到他們的責任。

我發見我們本國人的習慣與住在他們週圍的英國人的習慣比較起來是不合衛生的。我請他們注意到這一件事。我又鄭重地提到根除種族和宗教界線的必要。在結束的時候，我提議組織一個

（註一）麥門（Mehran）是回教中一個特殊的支派，其信徒多在印度的西岸。他們是業商的。

協會將印度居留民的苦處陳述於當局。我並聲明準備將我自己多餘的時間供他們差遣。

我以為那個會的結果尙稱滿意。據我記憶所及的，大家決定每星期開一次這樣的會。這些會大都是按期舉行，開會的時候，也自由交換意見。結果是在普力托勒的印度人，我沒有一個不認識或熟悉他的個人狀況的。這一件事促動我去見普力托勒的英國政治代表雅高白先生。他對印度人是表同情的；他沒有多少勢力，但他應允盡力幫我們的忙，也請我隨時去會他。

我和鐵路當局通信告訴他們，就是在他們自定的章程之下，印度人現在所受的旅行限制也是不應當的。我得一封回信，說凡是服裝正當的印度人都可以買頭二等票。這一個辦法並沒有多大好處，因為什麼是「正當」的服裝，是由站長決定的。那英國政治代表給我一些關於印度事件的文件。泰洽也給我同樣的文件。我從這些文件裏得悉印度人是如何殘忍地被逐出奧令治自由邦。這樣子，我在普力托勒的居留使我可以研究杜蘭斯哇和奧令治自由邦的印度人的狀況。我並沒有想到這一個研究後來有那麼大的用處。如果那件案在年內可以了結，我本想在年底，或更早些回家。但上帝却另有他的安排。

在普力托勒的那一年是我的生活中最寶貴的經驗。在這裏，我有機會學習公眾的事業，並且在這件事上得到相當的能力。在這裏，我的宗教精神變成一種活潑的力量；在這裏，我也得到一些關於

執行律師業務的眞確知識。在這裏，我所學習的正如一個資格還淺的律師向一個富有經驗的律師所學的一樣。在這裏，我也養成一種自信心，就是相信我做律師究竟是不會失敗的。在這裏，我還獲得了當律師成功的秘訣。

雅都納的案子不是小的，涉訟的款項是四萬金磅。因爲它是從生意交易上發生的，所以裏面涉及許多瑣碎的賬目。一部分的要求是根據已經交到的期票；另一部分是根據對方交付期票的應許。被告的辯護是說這些期票不是用合法手續取得的。

我對於這個案子是抱着最濃厚的興趣。我把所有關於這些交易的文件都讀過。我的當事人是一個極有能幹的人，他對於我是絕對信任的，因此我的事是易做的。我學了一點簿計學。我翻譯的能力也有進步，因爲信件多半是古查拉提文的，需要翻譯的原故。

雖然我曾說過我在宗教和公共事業上感覺濃厚的興趣，也時常分出一點光陰用在這些事上，這却不是我最注重的事。我首要的任務是爲這件案子預備。讀法律的書，在必要時查考法律的案子，在時間上，於我是有優先權的。結果，我對於這一件案子的了解，恐怕連兩造的當事人都比不上，因雙方的文件我都得到了。

我還記得品吉先生說，法律四分之三是事實。後來這種意見被南非洲新近去世的一位有名的

律師李安立先生充分地證實了。在我所經理的某一件案子裏，我見到雖然我的當事人的理由是充分的，法律却似乎是不利於他。在這爲難的時候，我去請教李安立先生。他也覺得這件案子的事實方面是很有利的。他突然喊出來說：『甘地，我曉得怎麼辦了：如果我們把事實方面弄好，法律方面就可以聽其自然。我們鑽研到這件案子的事實裏面去罷。』講了這幾句話以後，他叫我將這件案子再加以研究，然後再去看他。我把事實重新推敲過以後，我的眼光就改變了，同時我也無意中找到一件和這案頗有關係的南非舊案子。我是喜出望外，去見李安立先生，告訴他一切。『得了，』他說，『我們是要勝訴的，只是我們要曉得承審官是那一位。』

當我爲雅都納籌劃他的案子的時候，我沒有想到事實有那樣大的關係。事實就是真理；我們堅持着真理，法律便會來幫助我們。我見得雅都納的案子，事實方面是很有力量的，因此，法律方面當然是有利於他的。但我也見到如果訟事繼續下去，兩造必要同歸於盡，因爲原告和被告本來有親戚和同鄉的關係。沒有人知道這件案子到什麼時候才了結。如果繼續用法律來解決，案子便會無限期地延長着，雙方都沒有好處。因此，如果可能的話，兩造都願意早日把案子了結。

我去見泰洽，勸他進行公斷。我提議叫他去見他的顧問和他商量：如果能找到一個雙方可以信任的人，請他公斷，這件案子便可迅速地解決。律師的公費很快的增長，雖然當事人都是大商家，也不

容易支持。件案費了他們這許多心，使他們沒有時間做別的事。在這當兒，彼此的惡感也逐漸增加。他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設法和解。最後，泰洽答應了調解。人是委定了，案子由兩造在他面前辯論，結果是雅都納得了勝利。

我仍然不以此為滿意。如果我的當事人要對方立刻賠償，泰洽必定不能把全數清付。住在非洲的波班打麥門教徒有一種不成文的法律，就是甯死不肯破產。叫泰洽把三萬七千鎊全數加上，費用一次付清是不可能的。他決意不肯少付毫釐，而他又不願宣告破產。只有一種辦法，就是叫雅都納讓他分期交付不很大的數目。雅都納答應了這個辦法，讓泰洽分期交付，時間也延得很長。這個辦法的磋商告成，比公斷的磋商還要費事。但雙方對於這個結局都表示滿意，而雙方也都受公眾的推崇。我的欣慰是無限的。我已經得到做律師的秘訣，那就是把握着人性中善良的那一部分而深入人的心靈裏面。我認為律師的真正任務，是使有嫌隙者和好。這一個教訓深印在我的心裏，因此在執行律師業務的二十年當中，我用了大部分的時間使幾百件案子在法庭外和解了。我並沒有損失什麼，甚至我的收入也不受影響，至於心靈的影響，更不必說了。

在普力托勒的這個時候，我晚上常與高實先生出外散步，十點鐘以前回家是極少的事。但是在杜蘭斯哇有一條法律，就是沒有通行證的印度人，晚上九時以後不許在人行路上或在戶外行走。如

果警察逮捕我，又怎麼辦呢？高實先生對於這個問題比我還要關心。他不得不發通行證給他的黑種的僕人，但他怎能也發給我呢？只有主人可以給僕人發證。即使我要高實先生發證，而他甚至也允許了，他仍然不能這樣做，因為這便等於冒領。

因此，高實先生——也許是他的一位朋友，——便同我到國家律師寇魯斯博士那裏。我們碰巧是同一法學院出身的律師。關於我晚上九時以後沒有通行證不能出門的那件事，他很不以為然。他向我要同情，但他不給我發通行證：他給我寫一封信，准許我無論什麼時候出門，不受警察干涉。我每逢出外的時候，便將此信帶在身上。後來我始終沒有用過這一封信，但這不過是一件偶然的事。

關於人行路的章程，它所給我的影響，較為嚴重。我出外步行的時候，時常經過總統街走到一個廣場去。古魯格總統的住宅就在這一條街上，——這是一所極其尋常，不惹人注目的住宅，花園也沒有，其實與附近其他的房屋沒有分別。普力托勒許多富人的住宅比他壯麗得多，也有花園圍繞着。古魯格總統的儉樸是遐邇皆知的。只有門前站着的那位巡邏警察叫人曉得這是一所官舍。我時常在人行路上，在這位警察面前走過，而沒有絲毫的阻擾。

這一個值班的人是時常掉換的。有一次他們中的一個，甚至沒有叫我從人行路走開，便把我且推且踢的驅到街上去。我愕然不知所措。正在想質問他的時候，恰好高實先生騎着馬走過那裏。他招

呼我說：

「甘地，一切我都看見了。如果你控告那個人，我很樂意在法庭給你作見證。你這樣被人無禮地侮辱，我很難過。」

「你不必難過，」我說，「那個可憐的人，他知道什麼？凡是有色的人，在他看來都是一樣的。無疑地他待黑人，也同待我一樣。我立了一種規則，就是關係我個人不平的事，我不向法院聲訴，所以我沒有意思控告他。」

「這正像你的爲人，」高實先生說，「但請你務必再想一下。我們應當給這種人一個教訓。」他於是對那警察說話，申斥他一番。我不懂得他們說些什麼，因爲他們說的是荷蘭話，那個警察是個波爾人。但他竟向我道歉，其實這是不必的，因爲我已經饒恕他了。

我是再不往這一條街上走了。若是碰見了另一個人，他不曉得有過這一回事，便會如法泡製。我爲什麼要無故地招他再踢一下？我於是找了一條別的路去走了。

這一件事使我對於印度居留民的感情越發深刻。我同他們商量，如果有必要的話，可以做一個「試案」(Test case)，事前與英國的政治代表將關於規例一方面的事情打聽清楚。

我因此對於印度居留民的苦况，便詳加研究，不止是看書和聽別人的傳說，也有個人的經驗。我

從此便曉得，一個自重的印度人不應當在南非洲居住。我的心思便注意到如何改善這一種局面的那一個問題。

貝克先生很關心我的前程。他請我到威令頓大會去。更正派的基督徒每幾年便召集這樣的一個大會，使信徒們得到一種啓發或自潔。也可以說這是一個宗教的奮興會。主席是有名的安得烈墨雷牧師。貝克先生以爲那大會中使人感奮的宗教空氣和赴會者的熱忱誠篤必定會使我皈依基督教。

但他最後的希望是祈禱的靈驗。他對於祈禱的信仰是永不改變的。他確信凡是熱誠的禱告，上帝不能不聽。他舉出一些例證，像不列斯都的那位喬治穆勒：他是完全靠賴祈禱，甚至爲他世俗所需的東西，也是這樣。我抱着不偏的態度，聽他講述祈禱的效驗。我並給他一個保證說：如果我聽見呼召，沒有什麼能攔阻我，使我不皈依基督教。我給他這個保證是沒有遲疑的，因爲我早就學會了聽從內心的聲音。因此我就樂於順從它。若背着這個聲音做事，不但是困難的，而且是痛苦的。

我們便到威令頓去了。貝克先生要與一個有色人同行，殊覺不易應付。他有多次完全因爲我的原故，感到不便。有一天碰巧是禮拜日，貝克先生與同行的人不要在安息日旅行，我們便在途中停頓下來。那個車站旅店的經理，經過不少的爭吵以後，總算答應了收留我，但他絕對不肯讓我到餐室裏

面去。貝克先生不是容易遷就的。他要為旅店的客人們爭他們的權利，但我也曉得他的難處。我在威令頓也是與貝克先生同住。他是竭力使我看不出他所感受的不便，但我是一切都知道的。

這一個大會是忠實的基督徒的一個會集。我在這裏與墨雷牧師晤見，並曉得有許多人為我祈禱。聖詩中有些是我所喜歡的，它們真正美妙。

這個大會的會期是三天。我可以看出來赴會的人都是誠篤的；這一點是我所能欣賞的。但我覺得沒有什麼能使我改變我的信仰的理由。叫我相信只有做了基督徒才能進天堂或得救，這是不可能的。我把這個意思告訴了一些相好的基督徒朋友；他們都很驚愕。但這是沒有辦法的。我的困難尚不止於此。我不能相信耶穌是上帝化身的獨生子，惟有相信他的能夠得到永生。如果上帝能夠有兒子，那樣，我們大家都是他的兒子。如果耶穌是像上帝，或者就是上帝，那樣，我們大家都像上帝，或者都是上帝。我的理智沒有預備叫我相信耶穌的的確確用他的死，用他的血救贖了世界的罪惡。也許當他是個寓言，還有幾分道理在裏面。再者，照着基督教所信的，只有人類有靈魂，其他生物是沒有的，所以在他們，死亡就等於完全消滅。我的意見，正與此相反。我可以承認耶穌是個殉道者，是個犧牲的具體表現者，是個神聖的大師，但却不能以他為得未曾有的完人。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給世界的一個偉大的榜樣，但若以為這一件事有什麼玄妙和奇異的好處，我是不能這樣相信。基督徒虔誠的生活

所給予我的，並非別的宗教的人的生活所不能給的。我所聽到關於基督徒中革心洗面的事，在別的人的生活也有的。從哲學一方面來看，基督教的原理並沒有什麼奇特的地方。若論到犧牲的精神，似乎印度教徒是遠在基督徒之上。我不能認基督教為最完全或最偉大的宗教。

每逢有機會的時候，我便把心中這些翻來覆去的思想告訴我的基督徒的朋友們，但他們的回答不能使我滿意。我不但不能以基督教為最完全最偉大的宗教，我也不信印度教是那樣的宗教。印度教的短處是我所深切感覺的。如果在印度教裏面，有『不可接觸』的那種規矩，它只是它的腐敗的一部分或是一個贅疣。我不能了解許多宗派和階級的所以存在。說韋陀是上帝所啓示的是什麼意思？如果它是啓示的，為什麼不能說聖經或可蘭經也是啓示的？

不但基督教的朋友設法轉變我的信仰，回教的朋友也是一樣的。雅都納時常勸我研究回教；自然他對於回教總是說它好的。

我將我的困難寫信告訴萊參比；我也與在印度的其他宗教的領袖通信，也得了他們的回信。萊參比的信使我釋然：他叫我忍耐着，更深刻地研究印度教。他有這樣的一句話：『若用冷靜的眼光來談這個問題，我覺得沒有別的宗教比得上印度教思想的深邃，和它對於心靈界的體認，或它的博愛精神。』

我買了西理氏的可蘭經譯本，從事閱讀，也得到其他關於回教的書籍。我也與在英國的基督教朋友通信。其中的一個介紹我給米特蘭先生。我與他通起信來。他給我寄了一本完全的路。這是他與全斯福女士合著的書。這本書是否認流行的基督教信仰的。他也給我寄了一本聖經新詮。這兩本書我都喜歡。它們似乎是贊成印度教的。托爾斯泰的上帝的國就在你裏面使我傾倒。這本書給我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它的不凡的思想，深奧的教訓與求真的精神，使我覺得高實先生所給我的書似乎是無足輕重。

我在這個時候，所以日益注意為印度人民服務，就是因為我有實現自我的願望。這一個服務的宗教的觀念是我所服膺的，因為我覺得上帝只有從服務中被發見。所謂服務，在我便是為印度服務，因為這是與生俱來的，而我也自然高興去做。我到南非洲去，為的是要離開加地亞華的惡劣環境，並謀我自己的生活的，但我曾說過，我發見我在這些時候只是尋求上帝，努力自我的實現。

基督教的朋友們引起了我的追求學問的興趣：這一種求知慾幾乎沒有方法使它滿足。這些朋友不讓我安然自足，即使我自己想淡然置之。南非洲總傳道會的領袖斯賓塞華爾頓先生在杜爾本把我找着。我幾乎變成他家裏的一員。我所以能認識他，自然是有普力托勒的基督徒朋友的關係。華爾頓先生有一種不與人同的脾氣。據我所記憶的，他從來沒有請過我信仰基督教。把他的生命好

像一本打開着的書似的放在我的面前，讓我一覽無遺。華爾頓夫人是一位柔和而有能幹的女子。這一對夫婦的態度很與我合得來。我們彼此間根本不同的地方，我們是知道的。無論怎樣討論，也不能把它消除。然而就是意見不同，如果彼此都抱着寬大愛人，求真的態度，也有它的好處。我喜歡華爾頓夫婦的謙卑、忍耐，和忠於所事。我們相見的時候很多。

這一個交誼使我對於宗教的興趣不致銷沉下去。我在普力托勒的時候還有餘暇可以研究宗教，現在却不行了。但我所能有的一點時間，我是好好的利用着的。關於宗教的通信我還是繼續下去。萊參比是我的導師。有一位朋友給我那馬達尙加的書達摩維珈。它的序言很幫助了我。我會聽說過這位詩人所過的流浪生活。在序言上說到他怎樣因為研究宗教而發生了一個生活的革命。這一件事不禁使我神往。我逐漸愛好了這一本書，一頁一頁的細心閱讀。馬斯穆勒 (Max Müller) 的印度——她能教給我們什麼 (India-What Can It teach us) 和通神學會出版的優婆尼薩 (Upanishads) 我都喜歡讀。這些書使我越發看重印度教，並且逐漸認識它的優點。但這並不使我輕視其他的宗教。我也讀了華盛頓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的穆罕默德和他的繼承者的生平 (Life of Mahomet and His Successors) 和嘉賽爾對於這位先知的頌詞。這些書使我的對於穆罕默德起了一種敬仰。我也讀了一本叫作梭羅都士特拉的語錄的書。

這樣子，我便得了更多的關於各宗教的知識。這一種研究促進了我的自省的功夫，也使我養成一種卽知卽行的習慣。因此，從研究印度教的書籍所了解的一些瑜珈法（Yogic Practices）我便拿來實行。但我的進步是很有限制的。我便決定等回到印度以後，找專家來指導。這一個宿願，始終未償。我也把托爾斯泰的書細細的研究了一番。聖經簡要（The Gospels in Brief）做什麼（What to do）和他的其他著作給我留一個深的印象。我逐漸覺悟到博愛的無限可能性。

大約在這個時候，我認識了另一個基督徒的家庭。我接受了他們的提議，每星期日到衛斯理堂禮拜；他們也在這一天請我每一次都到他們家裏喫飯。那個禮拜堂沒有給我一個好的印象。會衆並不怎樣虔誠。他們似乎都是一些世俗的人，爲着消遣和從俗而去守禮拜。我有時在這裏不由自主地打瞌睡。我覺得慚愧，但有些在我旁邊坐着的也是如此。我才稍以自慰。我不能時常這樣做，因此，不久我便不去了。

那個請我每星期去喫飯的家庭和我的關係忽然終止了。其實，我可以說這是出於他們的警告。事情是這樣的。我的女主人是一個純良的女人，但有一點狹隘。我們時常討論宗教問題。我那時正重讀着安諾德的亞洲之光。有一次我們拿耶穌的生平與佛陀的生平來比較。『試看喬達摩是何等的慈悲！』我說，『他的慈悲不限於人類，乃是推而及於一切含生之物。我們想到那伏在他的肩上

的羊，能不油然而興感麼？我們在耶穌的生平裏面沒有看到這樣對一切生物的愛。」這樣的一個比較，使那位太太很難過。他的情感我是能夠了解的。我把話打斷了，便回到餐室裏去。他的兒子——一個不到五歲，天使般的小孩，——也同我們在一起。我在兒童當中最快樂的；這一個小孩與我早已做成朋友了。我對於他盆上的肉加以訕笑，並讚美我自己盆上的蘋果。那天真的孩子被我說服了，他便同我一齊讚美那水菓。

他的母親呢？她是驚惶了。他警告我。我抑制着自己，掉換了談話的題目。下一個禮拜，我仍舊到那家庭去，但頗有點惴惴。我覺得不應當不去。但那位太太替我把問題解決了。

「甘地先生，」她說，「我有幾句不得已的話，請你不要見怪。我的兒子同你在一起，沒有什麼好處。他每天總是遲疑着不肯喫肉，要喫水菓，並拿你的話來作根據。這是太過了。如果他不喫肉，他一定要羸弱起來，即使不致生病。我怎樣能忍受呢？從此以後，請你只同我們大人討論這些問題。和小孩討論，一定會發生不良的影響。」

「對不起，」我回答說，「我明白你們做父母者的感想，因為我自己也有兒女。我們很容易使這件不愉快的事情終止。我對於飲食的選擇當然比我所說的話更能影響這個孩子。我看最好我以後不再來。這自然不必損害到我們的交誼。」

『謝謝你，』她說，顯然地因我的話放寬了心。

雖然我所走的路不是基督徒朋友們願意我走的，我還是永遠感激他們，因為他們引起我對於宗教追求的興趣。我和他們的接觸是我所永不能忘的。以後那一年功夫，這樣甘美神聖的接觸不但沒有減少，而且增加起來。

第八章 杜爾本的暴動

在一八九六年的中間我回到印度去。因為從奈托爾到加爾吉達的船比到孟買的船更容易得到，所以我就上了一隻到加爾吉達的船去，因為那些訂有契約的工人是從加爾吉達或麥達拉斯登陸的。當我要從加爾吉達到孟買的時候，我在半路上誤了火車，要在亞拉哈巴停留一日。我為南非洲的事的宣傳就在那裏開始。我去見前導報的吉士尼先生。他客氣地與我談話，但坦白地告訴我，他是和那裏的殖民表同情的。可是他答應我，如果有什麼著作，他願意閱讀，並在他的報上刊佈。我所希望的也不過如此。

在印度的時候，我寫了一本小冊子講到南非洲印度人的情形。差不多所有的報紙都登載這一件事。這本小冊子也經過兩版，印的是五千份，分送到印度各地方去。在這一次的遊行，我得到機會晤見印度的領袖，並在孟買，布那，麥達拉斯演講。我不必詳細講到這些事，因為正在加爾吉達預備着一個公共聚會的時候，我收到一個從奈托爾寄來的電報，叫我立刻回去。這樣就把我的遊行打斷。我從

電報可以看出一個仇印的運動必定又在醞釀。我把加爾吉達未竟的工作放下，到孟買去。和我的家眷乘了第一隻開行的船。那一隻高爾蘭號已經由雅都納公司買過來，因為公司決定置一隻航行波班打和奈托爾之間的船。這是那個富於冒險性的公司的又一種新創的事業。波斯輪船公司的奈迭里號跟着從孟買開行到奈托爾去。這兩隻船總共約有八百搭客。

那時印度的鼓動已經達到相當重要的程度。印度的大報都登載這件事，路透社也打電報到英國去。這是我到了奈托爾才曉得的。路透社在英國的代表把我在印度的演講作成一個言過其實的提要，發了一個簡略的電報到南非洲去。這並不是一件罕見的事，言過其實的地方也不一定是故意的。忙碌的人，帶着成見，匆匆地把一種刊物讀過，做成一個撮要，其中便不免含有自己想像的產物。並且對於這一個提要的解釋是隨地而異的。因此，在不知不覺中，大家便使原文失去本來面目。這便是公共事業所必有之危險和限制。

在印度的時候，我曾批評過奈托爾的歐洲人。我很反對那訂約工人所要納的三鎊的稅。我會用靈活的描寫，講到一個名叫蘇勃拉文音的訂約工人的遭遇。他被他的主人毆擊；他的創痕我是見過的，他的案件是在我的手裏。當奈托爾的歐洲人讀到那段從我的演詞牽強附會地做成的提要的時候，他們都向我動怒。其實，我在奈托耳的時候為這件事所寫的比我後來在印度所講的還要利害，還

要詳細。我在印度的演辭實在經過縝密的考慮，沒有言過其實之處。我從經驗上曉得：我們每逢向一位陌生的人講到一件事，他總會附會出一些我們所沒有想到的意思來。因此，我在印度講到南非洲的情形時候，總是故意地說得比事實還要輕些。但是沒有多少歐洲人讀過我在奈托耳所寫的東西，若說喜歡讀的，那就更少了。至於我在印度所說所寫的，那就顯然不同了。讀路透社的撮要的歐洲人總有數千。再則，一件經電報傳遞的事情，大家總是認為重要的，雖然它的本身未必如此。奈托爾的歐洲人以為我在印度的工作有他們所想的那樣重要，如果是那樣，訂約僱工的那種辦法便會終止，幾百以種植為業的歐洲人便要受累，並且他們以為他們在印度得了一個不好的名聲。

奈托爾的歐洲人正在這樣奮激的時候，聽說我與家眷乘高爾蘭號回到奈托爾，又聽說那隻船載了三四百印度客人，奈迭里號也載了數目相等的搭客，同時到埠。這個消息更激起他們的怒火，使他們的情感爆發。奈托爾的歐洲人舉行了幾個大會，當地有名的人都去參加。所有的印度搭客，特別是我自己，都受了他們許多嚴厲的抨擊。高爾蘭和奈迭里兩隻船將要到埠的那一件事，他們指為一種對奈托爾的「侵襲」。演講的人說這八百個搭客是我帶到奈托耳來的，又說這是我要使奈托爾充滿了自由的印度人的第一步辦法。他們一致的議決，這兩隻船所有的搭客，連我自己，都不許登岸。如果奈托耳的政府不願或不能阻止搭客登岸，那大會所派定的委員怕要將法律拿在手裏，用強

制的辦法，阻止印度人登岸。兩隻船是同日到杜爾本的。

黑死病是一八九六年首次在印度發生的。這一個事實是被利用來阻止我們登陸。奈托爾的政府在法律方面是無能為力的，因為那時移民限制法還沒有產生。除此以外他們是完全和那歐洲人的委員會表同情的。政府裏面有一位衣士公先生在委員會的工作上很出力。

有一種規例在各埠實行着，就是如果在一隻船上發生一種傳染病，或有一隻船由一個有傳染病的埠進口，這一隻船在某一個時期內便要隔離與扣留。這一種限制只能在衛生的立場上施行，並須有本埠衛生官的命令。奈托爾的政府是濫用了他們的權力，以政治的理由實行上述的規例。雖然船上沒有傳染病，兩隻船都被扣留，過了普通的期限，至二十三日。在這時期中那歐人的委員會繼續着他們的活動。雅都納公司是高爾蘭號的主人，也是奈迭里號的經理。它受着重大的威嚇。他們勸公司把搭客送回去，否則他們便要使公司失掉它的買賣。但公司的股東並不是怯弱的。他們說即使公司倒閉也不要緊；他們必定奮鬥到底，不肯把這些無告而且無辜的搭客送回去；他們不是不懂得愛國的。一位向來贊助公司的拉復頓先生也是一個勇敢的人。

不消說，關於那兩隻船的搭客到奈托爾來的事我是並未預聞的。他們多半是曾在南非洲居留過的。其中有不少是再到杜蘭斯哇去的。甚至對這一類的搭客，那歐人的委員會也發出恐嚇的傳單。

船主把恐嚇的話讀給搭客聽。這些傳單聲明奈托爾的歐洲人正在暴怒的時候，如果印度人還是不識趣，想着上岸，委員會馬上便要到埠頭上來把印度人一個一個的推到海裏去。我將這一張傳單解釋給高爾蘭號的搭客聽。奈迭里號一位能說英語的搭客也照樣給船上的搭客解釋。兩隻船的搭客都拒絕回去。他們說，他們當中有好些是到杜蘭斯哇去的，有的是曾在奈托爾居留過的；無論如何，他們每一個人照法律都有登岸的權利，委員會儘管恐嚇，他們還是決心登岸，去證明這個應享的權利。

奈托爾的政府是束手無策。這樣一個不合法的限制能夠執行到什麼時候呢？二十三天已經過去了。雅都納沒有屈服，搭客也沒有屈服。二十三日之後，隔離的命令取消了，船也可以進口了。在這時候，衣士公先生設法把歐人委員會的怒氣平下去。在一個聚會上他說：「杜爾本的歐人已經顯出很可贊許的團結和勇敢。你們已經把力所能及的做了。政府也已經幫助你們了。印度人已被扣留二十三日。你們的情感和公共的精神也有過相當的表示。這必使帝國政府得了一個極深的印象。你們現在的行動已經使奈托爾的政府易於措置。如果你們現在用武力阻止了一個印度人登岸，你們自己要喫虧，也使政府陷於進退維谷的地步。但即使這樣做，你們阻止印人登陸也是不會成功的。這些搭客並不是都有錯處的。他們當中有婦女兒童。他們在孟買上船的時候，並沒有曉得你們的感想。因此，我勸你們回去，不要阻止他們。但我敢向你們保證，奈托爾的政府將來必要向立法委員會取得限制制

未來移民的相當權力。」這不過是衣士公先生演辭的撮要。聽他的人是失望了，但他在奈托爾的歐人裏面是似有勢力的。大家因為他的勸告就散開，而兩隻船也就進口了。

衣士公先生給我送一個信，勸我不要同着別的人一齊上岸，要等到晚上，他派海口警察總監護送我回家的時候再上去。他又說，我的家眷隨時都可以上岸。這並不是法律上的一種命令；它一方面是對船主的一個勸告，叫他不要讓我上岸，一方面是為我眼前的危險給我一個警告。船主是沒有權力強行阻我上岸的。我終於決定接受這個提議。我把家眷送到老友和當事人魯士東治的家裏，告訴他們在那裏等我。搭客都上了岸以後，雅都納的律師拉夫頓來接我。他也是我的一個朋友。他問我為什麼還沒有上岸。我把衣士公先生的話告訴他。他不贊成我等到晚上，像賊或罪犯一般，偷偷到市上去。他說：如果我不害怕，我可以同他步行進市，好像沒有事情的樣子。我回答說，這不是害怕不害怕的問題，乃是在禮貌上，我應否接受衣士公先生的提議的問題。我們還要想船主為這件事是否要負責。拉夫頓先生笑着說：「衣士公會給你做過什麼事，叫你必須聽他的話呢？你有什麼理由使你相信他是出於善意，而不是別有作用？在市上發生的事情和衣士公先生在裏面的擺佈，我比你知道的更多。」我搖着頭打斷他的話。

「我們就算認他為出於善意的罷，」拉夫頓先生接着說，「但你如照着他的話去做，你的面子

是要過不去的。所以我勸你，如果你已準備好的話，現在就同我去。船主是我們的人，責任也就是我們的責任。他只須向雅都納負責。他們對這件事的意見是我所知道的，因為他在這次的鬥爭裏顯出極大的勇敢。」我回答說：「既是這樣，我們就去罷。我沒有什麼要預備的，只帶上頭巾便完了。我們通知了船主便動身罷。」我們便向船主告別。

拉夫頓先生是杜爾本的一個著名老律師。我和他已經發生過密切的關係，遇見困難的案子，便找他商量，也請他做我先進的律師。他是一個勇敢的人，體格也魁偉。我們所走的路是在杜爾本的大街上。我們動身是在下午四時半，天上微微的被雲蓋住，太陽是看不見的。走着路到魯士東治的家至少要用一小時的功夫。碼頭上的人並不比尋常多。剛上了岸，便有幾個少年看見我們。因為只有一個印度人是戴着特別的頭巾，他們就馬上認得我，嚷着說：「這是甘地，這是甘地！打他！把他圍起來！」他們便向着我這裏來。有幾個起首向我擲石頭。幾個年紀較大的歐人加入少年的隊裏，這一羣搗亂的人，便慢慢的增加起來。拉夫頓先生想我們步行是危險的。於是他就喊了一輛人力車。直到現在，我還沒有坐過一輛人力車，因為我很不喜歡坐一輛用人拉的車子。但我當時覺得不得不乘這輛車子。我生平有五六次經驗到，凡上帝要拯救的人，即使他自己要跌倒，也不能夠。我當時沒有跌倒，實在不是我自己的功勞。拉這些車子的是蘇魯人。那些歐人和少年恐嚇着車夫說：如果他讓我坐他的車子，

他們便要打他，並把車子搗毀。於是那車夫說一聲「加」（否）就走了。我因此竟得免了乘坐人力車的羞恥。

現在我們只好步行了。羣衆還是跟隨着我們。往前走的時候，人數愈來愈多。我們到西街的時候，竟變成人山人海。一個身材高大的人抓住拉夫頓先生，把他從我那裏拉開。他因此不能與我在一起。羣衆於是開始辱罵我，拿石和其他可以抓得着的東西向我兩點般擲來。他們把我的頭巾扔在地上。在這當兒，一個大漢到我前面，以掌批我的臉，並且踢我。我差不多昏厥跌倒的時候，附近一所房子的欄干被我抓到。我喘過氣來，等到回復了知覺，便往前走。在這時候，我幾乎不敢希望能夠活着回家。但我記得清楚，就是在這個時候，我也沒有怨恨這一羣毆擊我的人。

我正在慢慢的走路的時候，杜爾本警察總監的妻，亞力山夫人正從對面過來。我們彼此是很認識的。她是一位有膽量的女子。雖然天上有雲，太陽將落，她還是打開她的傘子，保護着我，與我同行。歐人向來是不肯侮辱或傷害婦女的，特別是大家所愛戴的警察總監的妻。他們向我毆擊的時候，總要迴避着她。所以，她與我同行以後，我所受的損傷並不厲害。當是時，警察總監已經知道我被毆擊。他派一隊警察來保護我，他們把我圍起來。警察署就在我們的路上。我到了那裏，知道警察總監已經等着我們。他請我在警察局內躲避一下。我謝他的盛意，但推辭他說：「我必須到我的目的地。我相信杜

爾本的居民不是不講理的，我也自信沒有錯處。我感激你派警察保護我。亞力山大夫人爲我的安全，也給我不少的幫助。」

我到了魯士東治的家，沒有遇見別的事故。到的時候，天差不多黑了。高爾蘭號的醫官也來了，給我驗傷，傷口並不多。有一處暗傷特別的痛，但我仍然不能安然休息。幾千歐人在魯士東治的房子前面聚集。天黑以後，一些流氓也加入在裏面。羣衆派人告訴魯士東治說：如果他不是我交給他們，他們便要把他和我連同房子一齊燒了。魯士東治是一個良善的印度人，自然不肯屈服。亞力山大總監曉得了這種情形，便靜靜地帶了一隊偵探到羣衆裏面去。他派人拿一張凳子來，站在上面。這樣子，他裝着與羣衆說話，便佔據了魯士東治房子的進口，使他們不能闖進去。他已經派了偵探站在要緊的地方。他到了以後，馬上派一個屬員穿上印度衣服，塗了臉，裝作印度商人來見我，帶給我以下的一段話：『如果你要救你的朋友，他的客人和產業，和你自己的家眷，我勸你化裝作印度警察，從魯士東治的貨倉走出來，與我派來的人偷偷的從羣衆裏面走到警察署去。街角上已經有一輛車子等着你。這是我救你和其他的人唯一的方法。羣衆這樣憤激，我沒有方法可以制止他們。如果你不急遽照着我的話行，恐怕羣衆要把魯士東治的房子搗爲平地，那時就不曉得要喪失多少性命和財產。』我馬上把局勢看清楚，不到一會，便裝成一個警察，離開魯士東治的房子。那一位警察同我安然到了警察署。在

這當兒，亞力山大先生正唱着熱帶的歌並講着話，以娛羣衆。他曉得我到了警察署以後，便認真起來。

『你們要什麼？』他問。『我們要甘地。』『你們要他來幹什麼？』『我們要把他燒了。』

『他給了你們什麼損害？』

『他在印度玷污了我們的名譽，又圖謀把咕「哩充」塞了奈托爾。』

『如果他不出來，又怎樣呢？』『我們便要把這房子燒了。』

『他的妻和兒女都在裏面，還有其他的男女。你們把婦女孩子燒死，不以為恥麼？』『這個責任，

要你們來擔負。我們不想傷害別人，但我們要你把甘地交出來。』

總監微笑着告訴羣衆說，我已離開魯士東治的家，在他們當中走過，安然到了一個別的地方。羣

衆嚷着說：『這是謊語，這是謊語！』

總監說：『如果你們不相信你們的老總監，請你們從你們當中派一個三四個人的委員會出來。

其他的人要應許不進這房子，也要應許，如果委員會在這屋子裏找不到甘地，你們便要安安靜靜地回家。你們今日太過興奮了，不肯服從警察。這是你們的不是，不是警察的不是。因此，警察就向你們玩了一套把戲，他們把你們的目的物從你們當中送走，使你們輸了這一局棋。你們所委派的警察只是盡了他們的職。』

總監向羣衆說話時的那種閑雅和堅決的態度使大家不得不聽他的話。委員會被派定了。它把魯士東治的房子從上至下的搜查一遍，出來報告羣衆說，總監的話不錯，他已把他們打輸了。羣衆是失望的，但他們守約散去，沒有再滋事。這件事發生在一八九七年一月十三日。

在輪船隔離令解除的第二天早晨，有一家杜爾本報紙的訪員到船上來見我。他向我打聽一切的事。我很容易把別人加於我的罪名洗刷了；他也以我的話爲然。我詳細地給他解釋，說我並沒有絲毫言過其實之處。我所做的只是我的本分。如果我沒有盡這本分，我簡直不能被稱爲人。這些話第二天都在報上登載。歐人中有思想的都承認他們的錯處。報紙與奈托爾歐人的立場表同情，但同時也十分替我的行動作辯護。這一點不但把我的名譽提高，也增加了印度民衆的聲望。這件事證明印度人雖窮，却並非怯弱者，也證明印度商人能夠不顧利害，爲他們的人格，爲他們的祖國來奮鬥。這樣子，雖然印度民衆遭遇困苦，並在雅都納的身上損失奇重，我相信結局是完全有利於我們的。民衆藉此可以檢閱他們的力量，結果是增加了他們的自信力。我所得的經驗是極其寶貴的；我每逢想到那一天，便覺得上帝是預備我實行薩提阿格勒赫 (Satyagraha 卽真理的力量，或精神的力量 Truth-force or Soul-force)。奈托爾的事情在英國得到了回響。殖民地大臣張伯倫先生 (Mr. Chamberlain) 致電奈托爾政府，叫它對毆辱我的人提出公訴，並爲我主持公道。

衣士公先生是奈托爾政府的主任律師。他叫我去，把張伯倫先生電報的話告訴我。他爲我所受的損害表示抱歉，並因這一件事沒有什麼嚴重的發展，表示欣幸。他接着說：『我實在沒有意思叫你或你們無論那一個受着損害。因爲我怕你會受傷，所以我給你帶信，叫你在晚間上岸，但你不喜歡我的提議。我並不怪你接受拉夫頓先生的勸告。你喜歡怎樣做完全是你的自由。奈托爾政府完全接受張伯倫先生的要求。我們要把犯罪的人置之於法。你能指出毆擊你的人來麼？』

我回答說，我也許能指出一兩個，但已決定不對他們起訴。他們所有的消息是從他們的領袖那裏得來的；叫羣衆判斷是非，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如果他們所聽到關於我的事是正確的，他們自然會奮激起來，在憤怒之中，做一件錯誤的事。奮激的羣衆總是想用這種方法來主持公道的。如果有什麼人應當受過的，那就是歐人的委員會。路透社可以發表任何顛倒是非的電報；但歐人既知我要到奈托爾來，他們便應當把他們所聽到關於我在印度活動的疑點，當面向我質問。這是他們的職責，也是委員會的職責。

衣士公先生回答說：『我很明白你所說的話，我也能了解其所以然。你說不要對毆擊你的人起訴，這却是我所沒有想到的。你如果對他們起訴，我並不會感到絲毫的不快。但你既然表示決不起訴，我敢說，不但你對這件事的處斷是正確的，你這樣的自制也叫你將來更能爲你的民衆服務。我同時

也要承認，你不肯對毆擊你的人起訴，是叫奈托爾政府不致陷在一個進退維谷的地步。如果你喜歡的話，政府可以派人把毆擊你的人捕拿，但你自然知道這又要給歐人一種激刺，並引起各樣的批評，這是任何政府所不願遇見的事。但你如已最後打定主意不起訴，你應當給我寫一封信表明這個意思。我不能把我們這一席話的撮要寄給張伯倫先生，作為替我的政府辯護的資料。我應當把你的信撮要用電報寄去。我並不是叫你現在就把信寫給我，你最好和你的朋友商量，也要和拉夫頓先生商量。如果商量過以後，你仍然堅持着不起訴的主張，就請你給我寫信。但你的信應當說清楚，這是你自動主張的，必定這樣，我才能用這封信。」

我說：『我沒有想到你是為這一點找我來的。我為這件事沒有和什麼人商量過，我現在也不想和什麼人商量。我決定同拉夫頓先生上岸以後，我已打定主意，如果我受了損傷，我也決不抱怨。對毆擊我的人起訴，所以是不成問題的。為我，這是一個宗教的問題。』我說完了，便要了一張白紙，寫了他所要的信，遞給他。

傳 自 地 甘

第九章 波爾戰爭

當波爾戰爭(Boer War)在一八九九年開始的時候，南非洲的印度人應當作什麼那個問題，便馬上發生，要求解決。在波爾人中，男丁是全體列入行伍的。律師放棄他們的業務，農人輟了耕，商人罷了市，僕役也離開他們的差事。南非洲的英國人參加戰爭的並不像波爾人的踴躍，但在地角殖民地(Cape Colony)、奈托爾和露狄西(Rhodesia)有許多平民加入義勇隊。還有不少英國有名的商人和律師也效法他們。印度人受攻擊的一點是說他們到南非洲來，只為的是謀利，於英國人毫無好處。好像蛀木的蟲子，在木頭裏面把當中完全喫光了，印度人到南非洲來，只想把自己養肥了，正是一樣。如果國家被人侵犯，或是他們的家室被劫，他們也不會予以毫釐的助力。在這一種情形之下，英國人不但要拒抗敵人，還要保護着印度人。我們把這一段攻擊的話詳細考慮。我們覺得，這是證明這種攻擊的無根之黃金般的機會。但同時以下的意見，也有人提出：

「英人壓迫我們是與波爾人同樣厲害的。如果我們在杜蘭斯哇是受着虐待，我們在奈托爾或

地角殖民地也不見得好多少。如果有分別，也無非是程度上的分別。再者，我們多多少少總是一羣奴隸；我們既然知道波爾這樣的一個小國是爲着他的生存而鬥爭，爲什麼我們要助桀爲虐，叫他們被毀滅。最後，從實際的觀點來看，誰敢說波爾人一定打敗？設若他們勝了，他們豈能忘記今日之仇而不報復？」

在我們當中有一派有力的人，作以上的主張。我能夠了解這種主張，給它相當的地位，但究竟我不能贊同它。我爲我自己，爲全體印人，給它這樣的關駁：

「我們在南非洲的生存，祇靠着我們是英國籍民的那一個資格。在我們每一個呈文裏面，我們都維持着我們這種權利。我們以做英國籍民爲榮，——至少也使我們的官憲和世界的人得到這樣的印象。我們的官憲以保護我們的權利相號召，是因爲我們是英國籍民；我們現在還保留着的一些權利，也是用英國籍民那個資格來保留着的。如果我們眼看着英人和我們自己現在所處的危境，只因他們虐待我們的原故，而坐視不救，這未免喪失我們民族的尊嚴。這樣不關痛癢的行爲，只有使我們將來的困難愈發加重。這是一個碰到我們面前來的機會，叫我們可以證明別人對我們所施的攻擊是沒有根據的。如果我們錯過了這個機會，我們便等於『不打自招』。設若英國人待我們比以前更壞，或更譏笑我們，我們便不應當視爲一件怪事。爲這樣的一個錯誤，我們自己要完全負責。到那時候，

我們若說別人的攻擊是毫無理由的，那便是自欺。自然我們可以說，我們在帝國裏的地位，無非是奴隸，我們要改進我們的地位，但暫時仍不得不在帝國裏面。這是我們在印度的領袖的政策，也是我們的政策。如果我們想爭取自由，並得到我們在帝國裏面所應有的福利，現在我們便有一個黃金般的機會，那便是盡我們的力量，在戰事上幫助英人。從大體上論，自然波爾人是有理的，但一個國家的人民，不能把每一個人的意見都強它接受。執政者未必都是對的，但人民既矢忠於國家，對於國家的行動，平常總應當取遷就的態度，從事擁護。這是他們明顯的責任。

『再者，如果人民中的某一部分，從宗教的立場，認一個政府的舉動為不合道德的，這樣，他們在沒有贊助或反對它的時候，便應當竭力勸政府不要實行，甚至不顧性命的危險。我們並沒有做過這一類的事。我們眼前也不是有這一種難關，因此沒有人能說，我們是爲着什麼普遍的理由而不參加這個戰爭。所以，我們人民平常的職務並不是要問戰爭之當否，只是在戰爭確已爆發的時候，盡力之所能，去幫助國家。最後，我們若說，如果波爾人戰勝了，——這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我們的處境將更惡劣，波爾人也要用可怕的手段來報仇，這未免看不起義俠的波爾人和我們自己。爲這一種莫須有的事，浪費了我們一刻的思想，便足以表示我們沒有丈夫之氣，也叫人懷疑我們的忠心。一個英吉利人，不會費一刻的時間，想到如果英人打敗了仗，他自己會有什麼遭遇？將要去打仗的人說這樣的話，

不能不喪失他的人格。』

我的議論叫許多人佩服。但現在又發生一個實際的問題。在這一戰雲瀰漫的時候，誰來聽印度人微弱的聲音呢？這一個爲戰事服務的提議有什麼力量呢？我們裏面從來沒有人拿過武器。在一個戰爭裏面，就是不直接打仗的人，也要經過訓練。我們甚至連整隊開步走都不會。扛着行李，作長途的步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者，白人會拿我們當「咕哩」看待，侮辱我們，輕視我們。這些事怎能忍受呢？如果我們自告奮勇，我們又怎樣叫政府接受我們的請求呢？最後，我們得到一個結論，就是說：如果我們有這個志願，上帝必予以服務的能力；我們不必憂慮到如何去做那被分派給我們的工作，只要我們盡心訓練了自己；一到決定以後，便不要再想到工作的類別好壞，只要去幹，甚至侮辱，如果是免不了的，也要忍受着。

我們爲要使政府接納我們的請求，遇見了鉅大的困難。這是一段有趣的故事，但不必在這裏縷述。我只須說，我們的領袖受了一番看護傷病兵的訓練，得到體格健全的證書，並給政府上了一封正式的公函。這一封公函和我們熱誠地準備着接受政府任何差遣的表示，給大家一個很好的印象。政府回信致謝我們，但暫時拒却我們的請求。正在這時候，波爾人像巨潮般湧過來，大家怕他會到杜爾本來。傷亡的兵，到處聚了一大堆。我們不斷的繼續着請求，後來得了許可，組織了一個印人救護隊。我

們曾經表示，甚至醫院裏打掃的工作，我們也願意做。因此，救護的事，自然為我們所十分歡迎的。我們會提議，讓訂約工人也加入在裏面，因為那時政府所需的人，愈多愈好。他們便同僱主商量，叫他們讓訂約工人自告奮勇加入。這樣一來，便有差不多七百印度人組織一大隊，離開杜爾本到前線去。我們臨走的時候，接到衣士公先生的信，祝賀並鼓勵我們。他是奈托爾歐人義勇隊的首領；他的名字，我想讀者已經熟悉了。

這一切的事，在各英文報看來，好像是個晴天霹靂。誰也沒想到印度人會參加戰爭。布夫醫師，即會訓練我們做救護工作的，以醫官的資格，加入我們的隊伍。他是一位虔誠的宣教師；雖然他的工作多半在印度基督徒身上，他與各宗派的印度人都自由往來。歐人與印人各有他們的救護隊，二者同在一个地方，相並着做事。

我們不久便有了工作，而且是比我們所想更難的工作。輸送傷兵走七八哩路，是我們例行工作的一部分。但有時我們也要抬着重傷的兵走更遠的路，甚至二十五哩。從早晨八時起行，下午五時必須到達後方醫院，途中還要換藥。這真是極艱難的工作。只有一次，我們要在一日之內運傷兵走二十五哩。戰事開始的時候，英軍迭次失敗，傷兵很多。於是軍官不得不讓我們到火線去。但我應當叙明：當這件意外的事發生的時候，他們通知我們，說我們原來所訂的約，沒有把這種工作包括在內，所以布

羅將軍並沒有意思強迫我們在火線下工作。如果我們沒有準備受這種危險；但如果我們願意擔任的話，他們是很喜歡的。因此，我們便欣然接受了這種工作。我們當中沒有人受過子彈或其他的傷。雖然我們的隊常與歐兵和歐人所組織的臨時救護隊接觸，我們並沒有感覺歐人待我們有什麼輕慢，或不客氣的地方。組成臨時隊的歐人在戰前曾參加過排印運動，但他們看見印人棄却前嫌，在患難的時候來幫忙他們以後，竟一時的轉化起來。布羅將軍曾在公文上提到我們的工作。那三十七位領袖也得到戰事獎章。

當布羅將軍援雷迭斯密之役結束以後，我們的隊和歐人的隊都被解散。但自此以後，戰事還繼續很久。我們是常準備着重行服務，在解散的命令上也說，如果再有大规模的戰事，政府必定還要用我們。

在這裏，我必須提到一件可紀的事。當雷迭斯密被波爾人圍困的時候，除了英國人外，還有幾個零星的印度居留民。他們有的是商人，其餘是訂約的工人，或在鐵路上服務，或充英國紳士的侍役。其中的一個是巴護生。在雷迭斯密的指揮官給當地的每一個居留民分派各種職務。最危險和最重要的工作是分給那被稱爲「咕哩」的巴護生。在雷迭斯密附近的一個小山上，波爾人安置了一架野砲，那砲的射擊，把許多房子燬滅，還叫一些人喪失生命。那砲的子彈從砲身射出以後，必須經過一兩分

鐘，纔能到達一個遠距離的目的物。如果那被圍困的人得到一個甚至這樣急促的警告，他們也能在子彈落在城內以前，到了藏躲的地方，救了他們自己。每逢那砲在動作的時候，巴護生便在一棵樹上蹲伏着，他的眼睛望準了那小山，看見火光一閃，便打響了鈴子報告砲火將到，雷迭斯密的居民聽見鈴響，便藏起來，免得被砲火打死。

雷迭斯密的指揮官很嘉許巴護生寶貴的工作，說他忠於所事，沒有一次不打鈴。自然他的生命是常在危險中的。

甘 地 自 傳

第 十 章 治 疫 工 作

波爾戰爭告終以後，我在約翰斯堡住了些時。在那裏，我的業務繼續發展。在某一個時期中，我有過四個印度書記。我待他們彷彿家人父子一般。但這幾個人還不夠我支配。

我是智窮力竭了。事情是很快的積壓起來，無論我怎樣勤奮，也沒有方法將業務上和公共的事應付過去。我很願意僱一個歐人做書記，但我不曉得有沒有白人或白婦願意爲我這樣一個有色人做事。但我決心一試。我去見我所認識的一個打字機的經紀，請他爲我物色一位速記員。當時頗有這種人，他於是答應我去找。他碰見一位新從蘇格蘭來的女子，名叫狄克女士。他並不反對謀一種正當的生活，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而且她又是在窘境之中。那經紀便叫她來見我。她馬上給我一個好的印象。

「你不以替印度人做事爲嫌麼？」我問她。「殊不然，」這是她堅決的回答。

「你希望得多少薪水？」

『每月十七鎊十先令太多否？』

『並不多，如果你能做我所要的事，你什麼時候可以來？』

『現在就可以，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十分歡喜，便開始將函件口授給她。

不久，她與我的關係，像一個女兒或一個妹妹，比像一個速記打字員還多。我對於她的工作，差不多找不到什麼錯處。我常常叫她調度數千鎊的款項，賬簿也歸她管理。她得到我完全的信用，而且她還進一步，把心中的隱秘都向我陳述。她對於選擇丈夫的最後決定，也來徵求我們的意見，我還享有給她主婚的榮幸。狄克女士變成了麥克唐納夫人以後，便不得不離開我，但就是結婚以後，我每逢在很忙的時候請她幫忙，她總是沒有推却的。

但我現在要找一個恆久的速記打字員來替代她，幸而我又請到另一個女子。他是史麗新女士，是嘉倫白先生介紹的。她現在是杜蘭斯哇一個女學校的校長。她到我這裏來的時候，大概是十七歲。有時她的古怪脾氣使我和嘉倫白先生忍受不住。與其說她是來做速記打字員，毋寧說她是為得經驗而來的。對有色人種的歧視，在她的天性中是沒有地位的。她對於年齡經驗都滿不在意。甚至侮辱一個人，當面指責他，她也毫不躊躇。她的暴躁常陷我於困難，但她坦白真率的性情總是馬上就把困

難消滅。

她富有犧牲的精神。在一個長時期裏，她所得的不過六鎊，她從來不肯接受多過每月十鎊之數。我每逢勸她多拿的時候，她便罵我說：『我不是到這裏來領薪水的，我來是因為喜歡和你在一塊做事，我也喜歡你的理想。』她的膽量也同她的犧牲相等。她的品格如水晶般的瑩潔，她的膽量使戰士們失色。我生平很欣幸地遇見過幾個這樣的女子，她就是其中的一個。她現在是一個長成的婦人了。他現在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就不能像從前那樣清楚，但我和這位少婦的接觸，在我永遠是一個神聖的記憶。因此，我如果不把我知道的關於她的事說出來，我便對不起真理。她不分晝夜地從公。她在黑夜的時候，獨自一人因着差遣外出，若有人提議派人送她，她便生氣地拒絕。就是有膽量的印度人，求她指導的，也無慮數千。在薩提阿格勒赫（靈力運動）的時候，差不多每一個領袖都入了獄，祇剩她一個人領導着運動。她指揮着幾千的人，處理無數的文牘，還做印度人的意見（Indian Opinion）那週刊的經理。但她是永不怠倦的。

高哈理認識我的每一個同工。他們多數是他所喜歡的，他也常給他們一種品評。在所有印人和歐人的同工中，他最推許史麗新女士。『我很少見過有像史女士那樣的犧牲，純潔和勇敢。』他說：『在你的同工中，她允當第一。』

大約在這時候，馬丹傑爲創辦印度人的意見週刊來徵求我的意見。他已經開了一家印字館。我贊成他的提議，因此那週刊便在一九零四年出版。第一任編輯是曼蘇赫奈沙。但爲這報的工作，我是首當其衝，實在有許多時候，我是那報的經理。並不是因爲曼蘇赫不能管理，他在印度辦過許多新聞事業，但只要我一天在那裏，他便不肯爲那頭緒紛繁的南非問題寫文章。他對於我的見解極其信任，因此他便把社論一欄交我擔任。

經過這些年以後，我覺得這個報是與印人有利的。它始終就沒有被認作一件營業的事。這報一天在我管理之下，它的變遷就是我自己生活變遷的表示。印度輿論，像今日的少年印度（Young India）和奈發耆溫（註一）一樣，都是我生活一部分的反映。每一個禮拜我把全副生命都放在它的篇幅裏，發揮靈力運動的理論與實際。在十年內，即到一九一四年，除了我在監獄被迫着休息的時間以外，差不多每一個星期都有我的一篇文章。在這些文字裏，沒有一個字不經過我的思想考慮，沒有一個字是故意誇大其辭的，也沒有專門討好別人的東西。實在說，這一個報變成我練習自制的一個園地，和我的朋友與我思想接觸的一個媒介。好作批評的人在裏面也找不到有什麼可反對的地

（註一）奈發耆溫（Navajivan）是甘地在印度辦的古查拉提文的週報。

方。其實我曉得印度輿論的論調使批評者不得不抑制其筆鋒。若沒有這一個週報，靈力運動也許不能發動起來。這個報也給我一個研究人類天性的各方面的機會。因為我常常注意使讀者與編者發生一種親切純潔的關係，所以我接到許多讀者真情流露的信件。照着通信人脾氣的不同，有的是表示好意的，有的是批評或痛詆。研究體會，答復這些信件是我良好的教育。民衆與我通信，彷彿是一種可以耳聞的思想。我因此便得充分了解一個新聞記者的責任，也因為這個報能抓住民衆，所以未來的運動才能見諸實行，而且有那樣尊嚴和莫之能禦之勢。

在。這。個。報。的。出。版。的。第。一。個。月，我。便。認。定。了。服。務。是。新。聞。事。業。唯。一。的。目。的。新。聞。紙。是。一。個。大。力。量，但。正。如。奔。放。的。狂。流。能。把。田。廬。禾。稼。蕩。然。摧。毀，同。樣。地，沒。有。制。裁。的。詞。鋒。也。只。有。破。壞。的。功。用。如。果。這。制。裁。是。從。外。面。來。的，其。結。果。或。甚。於。沒。有。制。裁，所。以。唯。有。自。動。的。制。裁。是。有。利。的。

在各階級中有些最有功於我們，而我們印度教人特稱爲「不可接觸者」(Untouchable) 卽賤民的，被我們擯置於一市或一村之隅。就是在基督教的歐洲，猶太人也曾做過他們的「不可接觸者」。他們被規定的住處有一個討厭的名稱，叫「隔度」。同樣地，我們今日便成了南非洲的「不可接觸者」。

昔日的猶太人自認爲上帝的選民，以自別於其他民族，結果他們的後代遭遇一個奇異，甚至不

公平的果報。印度教人差不多照樣視他們爲亞利亞人(Aryas)或文明的人，而把他們本族的一部分視爲不可接觸者，結果，不但南非的印度教徒遭遇一種奇異，縱使是不公平的天譴，就連回教徒和拍爾西人也得到同樣的責罰，因爲他們與印度教徒是同國同色的。

我們在南非得到了「咕哩」那個討厭的名稱。「咕哩」那個字在印度祇是挑夫的意思，但在南非，它是有一個侮慢的涵義，如同我們所稱爲「不可接觸者」的一樣。劃給「咕哩」居住的地方名叫「咕哩地帶」。約翰斯堡就有這樣的一個地帶。印度人在那裏是擁擠不堪，而那地帶的面積又永不隨着人口而增加。除了馬馬虎虎地清除廁所外，市政廳簡直沒有其他清潔的設備，好的道路和燈就更不用說了。住在那裏的印度人太過不懂得公共衛生的方法，所以如果市政廳置之不理，他們便不會自動的講究衛生。

市政廳的漠視和印度居留民的無知，湊合起來使那個地帶十分的不潔淨。市政廳不特不從事改良，而且將他們自己的疏忽所造成的不潔淨，作爲一個藉口，要將那地帶消滅，並爲這件事從本地的議會得到驅逐居留民的權柄。

印度人正爲這件事發愁的時候，忽然發生一種名叫肺炎疫的黑死病，比橫痃疫還要厲害，還易致命。幸而發生疫症的地方不是印人地帶，而是約翰斯堡附近的一個金礦。礦裏的工人大半是黑人，

他們的潔淨係完全由白人僱主負責。鑛工裏面也有一些印度人，其中有二十三個忽然受了傳染，一天晚上回到住所的時候，疫病大發。馬當治那時正在爲印度輿論徵求讀戶，碰巧同時也在那地方。他是一個大無畏的人。他看見這些患病的人，不覺動了惻忍之心，就用鉛筆寫了以下一張字條給我：『黑死病忽然發生，你必須馬上到這裏設法，否則結果不堪設想。請你快來。』

馬當治勇敢地打開一所空屋的鎖，把病人都放在裏面。我騎自行車到了那地方，並將這件事寫信報告市書記官。那時正在約翰斯堡行醫的高佛立醫師聞信便趕來救護，作了病人的醫師和看護。但二十三個病人，我們那裏招呼得過來。我從經驗上得到一種信仰，就是說，如果我們的心是清潔的，災禍自然有人和辦法來應付。我那時有四個印度人在我的辦公室裏，——加利安達，門尼哥，還有兩個的名字我忘記了。加利安達是他的父親托我照應的。我在南非沒有碰見過像他那樣肯做事而願意服從的人。他那時不幸還沒有結婚，所以我便毫不躊躇把無論有多大危險性的職務委他辦理。門尼哥是我在約翰斯堡請來的。據我記憶所及，他也沒有結婚。所以我便決定犧牲了他們四個人，——無論說他們是我的書記，或同工，或兒子都可以。加利安達我是不和他商量的。其餘的三個人，經我問過他們以後，也都答應了。『你到那裏，我們也到那裏，』這是他們簡短而動人的回答。

那是一個可怕之夜，——警醒着和看護着之夜。我從前曾看護過不少的病人，但從未看護過患黑

死病的。高佛立醫師的膽量真是有傳染性。需要看護的地方並不多。給他們應服的藥，侍候他們的需要，把他們的床弄乾淨，安慰他們，——所需於我們的只此而已。這幾位青年孳孳不倦和無所畏忌的精神使我格外的高興。像高佛立醫師和馬當治那樣一個有經驗者的勇敢，我們是易於了解的。但這些青年的精神呢！

市書記官因我把病人放在空屋裏，照料他們，對我表示謝意。他坦白地承認市政委員馬上想不到方法應付這樣一件緊急的事，但答應盡力幫忙。市政府既覺悟到責無旁貸，便立刻從事設法辦理一切。

第二天，他們給我一座空的棚子，聽我支配，並提議將病人挪到那裏去，但市政府不負潔除那地方的責任。那座房子是凌亂而不潔的。我們把它潔淨起來，藉着幾個慈善的印人的力量，捐到了一些床和其他應用物品，便做成一個臨時醫院。市政府派一個看護來幫忙。高佛立醫師仍然總理一切。

那看護是一位慈祥的婦人。她自己是願意招呼病人，但我們很少讓她 and 病人接近，因為怕她受傳染。

我們仍在棚子的時候，已經死去二十人。這時候市政府正在忙着作其他的準備。離約翰斯堡約七哩有一所傳染病隔離醫院。我們把還活着的那三個病人送到那醫院附近的帳篷裏，並準備着把

後來的病人也送到那裏去。這樣子，我們便把應辦的事辦妥。過了幾天，我們聽說那位良善的看護染了病，馬上死了。

在疫症發生的時候，我曾給報紙寫了一封嚴厲的信，聲明市政府對於該管地帶衛生事宜的忽略和疫症的發生，應當負責。這封信使我認識了波樂先生。後來我與都克牧師的交誼，此信亦與有力。

傳 自 地 甘

第十一章 「到這最後的一個」

我在前面會說過，我曾在素食館喫過飯。我在那裏會到威士特先生。我們每晚在那裏晤會，並在飯後散步。威士特先生是一家印字館的一個股東。他在報上看見我關於疫症的信，因為在飯館找不到我，使他感覺不安起來。

我的同工和我，從疫症發生以後，便減少我們的食量，因為我凡在有疫的時候，總是這樣，這早已成爲一個規矩。因此，我在這些時候便已廢止晚食。我很認識那位飯館主人；我告訴他，我正做着看護染疫病人的工作，願意竭力避免與友人接觸，所以我要在其他客人未到以前便把午餐喫完。

威士特先生在飯館一兩天找不到我以後，有一天很早，我正要出外散步的時候，便來敲我的門。我開了門，他便說：「我在飯館找不到你，很怕你遇見了什麼事，所以特在早晨來看你，免得你又不在家。好了，我現在在這裏聽你差遣。我預備幫忙看護病人。你曉得我是沒有靠我生活的人的。」

我表示感激，並不假思索地回答他說：「我不需要你做看護。如果一兩天內再沒有染病的，我們

便可以自由。但有一件事。」

「是的，什麼事？」

「你能否到杜爾本主持印度輿論印刷的事？」

「你是知道我有一所印刷所的。我大概是能去的，但可否讓我到晚上再作最後的答覆。我們晚上散步的時候，可以談談這件事。」

我心中歡悅。我們談過了，他也答應去了。薪金多少在他是不成問題的，因為他志不在此。但我們決定每月給他十鎊和利潤的一部分。剛剛第二天，威士特先生便乘晚上的郵車到杜爾本去了。從那一天起，直到我離開南非的海岸，他是我一個共快樂，共患難的伴侶。

威士特先生是真實一個農家的人。他只有一個尋常的學校教育，但在經驗的學校和自助的努力裏，他得了不少的學問。我常覺得他是一位清潔，冷靜，敬神，愛人的英國人。

雖然我的同工和我解除了管理病人的任務，還有許多從治疫工作發生的事，必須處理。市政府對於那地帶的忽略，我已經提及。但市府對於白色市民的健康，却是非常關心。它現在像撥水一般化錢來制止疫病。我雖然不得不責市政府對於印人忽略的罪過，却要嘉許它對白人的注意；在這件事上，我也盡了力幫他們的忙。我得到一種印象，就是如果我不與市政府合作，它的工作一定更感困難。

它甚至用武力硬幹到底，也不會躊躇的。但這些事都避免了。市府人員對於印人的行動表示滿意，將來防疫的工作也就容易了。我用盡我的力量叫印人聽從市府的限制，但我不記得有那一個人會反對過我的主張。

那地帶有人嚴密把守着，除得特准外，不許進出。我的同工和我都有自由出入的通行證。目的是叫那地帶所有的人都出來，在離約翰斯堡約十三哩的帳篷裏住三星期，然後把那地帶焚燬了。帶了糧食和其他應用物品到帳篷裏住，自然要費若干時候，在這當中，便不得不有監守的人。人民都非常驚慌，但因我常在那裏，他們便放心。

居民遷出以後，那地帶便馬上被焚。正在這時候，也爲着同樣的原因，市政府把市內所有的木料都燒了，損失約在萬鎊。所以有這種嚴厲的處置，是因爲市內發現死鼠。雖然市府所費不貲，疫症是止住了，市內的人民重復可以自由呼吸了。

這一次的疫症把我對於較窮的印人的地位提高了，也把我的業務和責任加重了。我和歐人新發生的關係，漸趨密切，而我的道義上的職責也就加了不少。

我在素菜館認識了波樂先生，正如威士特先生一樣。有一天晚上，坐在我旁邊的一張棹子的一位青年，把他的名片遞給我，說願意見我。我請他到我的棹子來，他也就答應了。

『我是評論報的副編輯』他說，『我看見你在報上登着關於疫症的信，便渴想見你。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波樂先生的誠摯使我與他親近起來。就在認識的那天晚上，我們便發見我們在若干重要的問題上，意見似乎很相接近。他是喜歡簡單生活的。他有一種卽知卽行的特長。他的生活上有一些變遷不特迅速，而且是很根本的。

印度輿論的費用漸漸的大起來。威士特劈頭一個報告便載着驚人的消息。他寫着說：『我沒有希望從這件營業上得到你所希望的利潤。我恐怕還要虧折。賬目是不清楚的。有大筆過期的款項要追討，但是弄不出個頭緒來。這都要經過一番整理。但這一切都不必使你驚懼。我當盡力把事情弄妥當。無論有沒有利潤，我都留在這裏。』

威士特先生曉得沒有利潤的時候，本來就可以走，而我亦不能怪他。實在說，他還可以指責我，說我沒有確實的證據，便告訴他營業是有利潤的。但他始終沒有一個字的抱怨。也許威士特先生因爲這件事便認我爲一個易受欺騙的人。

我接到威士特先生的信後，便到奈托爾去。我拿波樂先生當心腹看待。他到車站來送行，留下一本書給我在路上看。這本書是萊雪芹 (Ruskin) 的到這最後的一個。(Unto This Last) (註1)

我一開始讀這本書，便沒有法子把它放下。它把我抓住了。從約翰斯堡到奈托爾是二十四小時的旅程。車是晚上到了特爾本。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我決意照着這本書的啓示去改變我的生活。在此以前，我沒有讀過萊雪芹的任何一本書。我在學校的時候，除了教科書以外，沒有讀過什麼課外的書本。我自從投身於社會以後，看書的功夫就更少了。因此，我不能說我有多少書本上的知識。我相信因有這種限制，我所失去的並不多。其實因為我讀得少，所讀的比較的更能消化下去。使我立刻而且很實在地變化的只有一本書，這就是到這最後的一個。後來我把這書翻成右查拉提文。

我相信我在萊雪芹偉大的著作裏發現了一件事，就是它反映着我自己若干深切的信念。這就是這本書所以能夠把我抓住，變化了我的生活的原因。一個詩人就是能把人心蘊藏着的善性呼喚出來的人。詩人感人的力量不盡相同，因為各人的造就有深淺之別。

我對於萊氏的教訓的了解是這樣的：

一、一個人的好處包含在全體的好處裏面。

二、一個律師的工作與一個理髮師的工作有同等的價值，因為用工作來謀生是一切人同享的權利。

三、勞動的生活，即耕田和手工的生活，是有價值的生活。

第一點是我所知道的。第二點我只是模糊地認識。第三點我從未想到。萊雪芹給我清楚地說明，第二點和第三點都包含在第一點裏面。我天明便起來，預備把這些原理實行。

我將這件事的始末和威士特先生談及，告訴他萊雪芹的書所給我的影響，並提議將印度輿論挪到一個農場裏去，叫每一個人在那裏都要勞動，支取同樣的生活費，在餘閑的時候，從事印刷的工作。威士特先生贊成這個提議，我們並決定無論什麼種色國籍，每月一律支取三鎊的生活費。

但這十個印刷工人是否都願意到農場去住，以僅能維持生活為滿足，實在是一個問題。所以我們提議凡不能贊同這個辦法的，可以照舊領他們的薪水，希望可以逐漸達到為該村一分子的目的。在印刷工人中有我的一個堂兄弟名叫察干拉甘地。我將我的計畫在告訴威士特先生的時候，同時告訴了他。他有一個妻和兒女，但他從小就願意跟我練習作事。他對於我有完全的信仰。所以他沒有經過討論便贊成了我的提議，從那時起，一向都同我在一塊。還有一位機器匠名叫高文山美也願意來。其餘的沒有加入我們的組織，但答應無論我把印字館搬到那裏，他們都願意去。

我想我不過只用兩天功夫便同這些人把事情安排妥。我登一個廣告徵求一塊在特爾本附近

(註一)此書有開明書店譯本，譯名為給那後來的。

臨近火車站的地。有人以一塊在腓力斯的地來應徵。我同威士特先生去看過以後，便在一星期內購了二十英畝的地。那裏有一小股幽雅的泉水，還有幾株橘子和芒果樹。與它相連着的有八十英畝的一塊地，裏面有更多的菓樹和一所破爛的村舍。我們把這塊地也買過來，兩塊地合共花去一千鎊。

魯士東治在這些事情上總是我的帮手。他把一個大棚子的捲槽鐵塊和其他曾經用過的建築材料給我使用。有些曾和我在波爾戰爭同做過事的印度木匠幫我爲印字機蓋一座棚子。

我有一些親戚朋友同我從印度來有所經營的，現在都有了一些事情做。我想叫他們贊成我的計畫，到腓力斯來。他們是爲求財而來的，所以不容易說服他們，但有些人答應了。在這些人當中，我只提出麥甘樂甘地的名字。其他的人都回去做生意。麥甘樂甘地永久的棄去他的商業，同我一塊兒做事。他的能幹，犧牲與專一，使他在原來與我同作這樣道德的試驗者當中佔了最前的位置。若論到他那無師自通的手藝，他的位置，也是唯一無二的。

這樣子，腓力斯村便在一九零四年成立，而印度輿論雖然在許多困難之中也在那裏印刷。

叫那報在腓力斯村首次出版，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我沒有準備着兩件事，那第一期便會完全出不成了。我是不大願意用一副發動機來推動那印字機的。我們這村子的農業也是用手工來做的，所以我想一切都用人力較爲相稱。因爲這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便裝了一副燒油的發動

機。但我曾向威士特先生提議，叫他有所準備，因為恐怕那發動機萬一不好使用。因此，他便預備了一個可以用手推動的輪子。

第一夜是不能忘記的。字都排好拴起來了，但那發動機却不肯動彈。我們從杜爾本找了一位工程師來把那機器安好。他和威士特盡力叫它動，但沒有成功。大家都着急起來。最後，威士特在懊喪中來見我，他的眼睛都濕了。『發動機總是不動，』他說，『我恐怕報是不能依時出版的了。』

我安慰他說：『如果是這樣，我們也沒有辦法。但爲這件事流淚是沒有用處的。我們盡了人事再看吧。那用手推的輪子怎樣呢？』

『我們那裏有人來運用它呢？我們的人力是不夠的。那輪子要用四個一班輪班去替換，而我們的人已經疲倦到不能支持了。』

村子的建築工程還沒有完成，所以木匠們還在那裏。他們睡在印字間的地板上。我指着他們說：『我們不能利用他們麼？』我們可以整夜的工作。我想這一個辦法還可以試試。

『我不敢喚醒這些木匠，』威士特說，『我們的人實在太疲倦了。』

『好吧，我去和他們交涉。』我說。

我便把木匠們叫醒，要求他們合作。他們並不需要勉強。『如果我們不能在緊急的時候幫忙你，

我們還有什麼用處呢？你們去休息，我們來推這輪子。在我們，這是容易的事。」我們自己的人自然是準備好的。

威士特很高興，我們開始工作的時候，他唱着一首讚美詩，我與木匠們合了夥，其餘的也都加入輪班，這樣子，我們一直做到早晨七點鐘。剩下的事情還很不少。所以我向威士特提議，讓工程師再試試叫發動機走動，如果這次成功，我們便可以依時完工。

威士特把他叫醒，他馬上到機器間去看哪！看哪！他一開了機器，它便發動起來了，印字間所有的人歡呼起來。「這是怎麼講呢？為什麼我們昨夜費了這許多力氣一點沒有用處，今天早晨却又這樣容易開呢？」我問。

「很難說，」威士特說，「機器有時候好像我們一樣，也需要休息的。」

我雖然建立了腓力斯村，我在那裏祇能每次作短時期的耽擱。這是我一件終身的憾事。我原來的意思是逐漸放棄律師的業務，在腓力斯住下，用勞力工作來維持我的生活，以發展腓力斯村為我的快樂。但這個願望沒有實現。我從經驗明白，人做的計畫常有時候被上帝破壞，但我也曉得如果尋求真理是我們最好的目標，無論我們的計畫經過若何的波折，結果總不會有損於我們，而且是時常比我們所預期的更好的。腓力斯意外的轉變和意外的事件當然都不是有害的。

爲要叫大家都用勞力的工作來謀生起見，我們將印字間附近的地照三英畝一段把它分開。我自己也得了一段。在這些地段上面，我們不得不拿捲槽的鐵塊來蓋房子，雖然我們不願意這樣做。我們的意思是要蓋些泥房子，用稻草來作頂，或蓋些普通農人用的小磚房子，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爲費用更昂，費時更多，而大家又急於安頓下去。

我回到約翰斯堡以後，便把重要的變遷告訴波樂先生。他曉得他所借給我的書有那樣的效果，便覺無窮的快慰。『我可以參加你們的新試驗嗎？』他問。『自然可以，』我說。『如果你喜歡的話，你可以加入這村子。』『我是準備好了。』他回答說，『祇要你肯收留我。』因此，他就到了我們那裏來。他的堅決，使我心折。他給他的上司一個月的通知，叫他解除他在評論報的職務，到時候，他便到了腓力斯來。他長於交際，不久便得了大家的心，變成我們那家庭的一員。他素性質樸，因此對於腓力斯的生活，不但不以爲苦，而且習以爲常，如魚之得水。

第十二章 蘇魯人的叛變

不久以前，報紙上載着蘇魯人在奈托爾『叛變』的消息。我對於蘇魯人沒有仇怨；他們沒有損傷南非的印人，並且對於那『叛變』還有重大的疑點。但我那時相信大英帝國是爲着全世界的福利而生存的。我對她沒有懷着壞意，這是由於我真實的忠忱。因此，那『叛變』的是非不會影響到我的決斷。奈托爾有一個自衛義勇隊，它可以招募新人的。我讀悉這一隊人已被動員去撲滅這個『叛變』。因爲我當自己是奈托爾的居民，而且與那地方有密切的關係，我便寫一封信給總督，聲明如有必要，我是準備着組織一個印人救護隊。他馬上回信許可。我沒有想到他會這樣迅速地接受我的提議。幸而我在沒有寫信以前，一切都已準備好。我已決定，如果我的提議被接受，我便拆散那在約翰斯堡的家。波樂可以住一所較小的房子，而甘地夫人便要到腓力斯去居住。她在這一次的決定完全與我合作。我不記得在這些事上她會有那一次逆過我的意。所以，總督的回信一到了，我便到杜爾本去徵求人員。我們不需要一大隊人。我們所有的是二十四人，除我以外，其中有四個是古查拉提人。其餘

都是從前曾經訂約的工人，只有一個是未曾訂過約的自由工人。

爲給我一個職位和便利工作，並與現行規例相符起見，總督送給我一個中尉的暫時官銜，並聽我遴選三個少尉，一個班長。我到了那『叛變』的地點以後，便曉得那裏實在沒有可以稱爲『叛變』的那一回事，也看不見有什麼抵抗。那一件亂子所以得到那一個過甚其詞的叛變的名稱，就是因爲有一個蘇魯的首領勸人不要繳納一種向蘇魯人徵收的新稅，並且他曾刺傷一個收稅的官員。無論事情是怎樣的，我是與蘇魯人表同情的。因此，我到了總司令部，曉得我們的工作是給受傷的蘇魯人作看護以後，我便覺得非常高興。那主任醫官歡迎我們。他說白人們不願意做受傷的蘇魯人的看護，因此他們的傷口便潰爛起來，而他也就束手無策。他以為那些無辜的人，得到我們爲他們服役，真是如天之福，所以他便把綑帶消毒藥水等給我們，帶我們到臨時醫院去。蘇魯人看見我們自然是很高興。白色的兵士們起先從那把我們與他們隔離的欄干張望過來，想勸我們不要替他們包扎傷口。因爲我們不理他們，所以他們便忿怒起來，辱罵蘇魯人。後來我逐漸與這些兵士們接近，他們也就不再干涉了。

我們所照料的受傷者並不是在戰場上受傷的。有一部分是被認爲奸細捉過來的。司令長官判決把他們笞打，所以他們便受了重傷。這些人的傷口，因爲沒有人照料，便潰爛起來。其餘的都是友善

的蘇魯人。雖然他們領到一種徽章，以示別於「敵人」，但兵士們把他們看錯，因而向他們射擊。除了這一項工作以外，我還要給白色兵士配藥，分給他們。這於我是容易的，因為我曾在布夫醫師的小醫院裏受過一年的訓練。這一項工作使我與許多歐人有密切的接觸。我們是附屬於一個迅速移動的隊伍。這一隊所接到的命令，就是曉得那裏有危險，便開到那裏去。他們大部分是騎兵。我們的帳篷移動以後，我們便步行跟着，扛着擡牀。有兩三次，我們一天要走四十哩。但我們無論到那裏去，我總感謝上帝，使我們有他的工作可做。那些本來友善的誤被槍傷的蘇魯人，我們要用抬牀送到帳蓬去，並做他們的看護。

我從蘇魯的「叛變」得到許多新的經驗和許多思想的資料。波爾之戰叫我認識戰爭的慘酷還不如這一個「叛變」的清楚。這不是個戰爭，簡直是將人來打獵。不但我的意見如此，就是許多和我談論過的英人也是這樣的看。每天早晨聽着爆竹般的鎗聲在無辜的村落轟炸着，使身歷其境的人着實難過。但這一點苦味，我竟吞嚥下去，特別因為我這一隊人的工作只是給受傷的蘇魯人當看護。我知道若沒有我們，蘇魯人便沒有人照顧。因此，這件工作使我可以自慰。

但還有許多使人不能不思想的事。這是一個人烟稀少的地方。這些素樸和所謂「未開化」的蘇魯人的村落是散布着在山嶺與谷澗之間，數目很少，距離也很遠。在這寂寞的環境中走着，有時候帶

着受傷的，有時候沒有常使我陷於深沉的思想中。

我想到婆羅摩利利（註一）和它所含蘊着的意義，我的信念便益深固起來。我當時還沒有認識節慾是自我實現的不可少的條件，但我清楚地曉得，凡欲以其全副心靈爲人類服役的，就不能不節慾。我感覺着我將來做這類服務工作的機會必定更多，如果我還是縱情家室之樂，養育兒女，我便不能勝任愉快。簡單地說，我不能同時爲着靈與肉而生活。就拿現在而論，假如我的妻正在懷孕，我必不能讓我自己冒這樣的險。如果不照着婆羅摩利利生活，服役家庭與服役社會便不能沒有衝突。若照着它生活，則兩者都能融和起來。這樣思想的時候，我便急於許下一個最後的願。這一個決心給我一種鼓舞。同時想像力也得到施展的機會，使我看見前途無限服務機會的遠景。

我到了腓力斯以後，便將婆羅摩利利這一個題目高興地向察干拉，麥甘樂，威士特和其他的人談及。他們贊成我的意見，並以爲許願是必須的，但他們也舉出實行的困難。他們裏面便有人勇敢地開始實行婆羅摩利利；據我所知，有的已經成功。我自己也縱身跳到裏面去，——我是許下一個終身實行婆羅摩利利的願。我應當承認我當時沒有曉得這件事的關係那樣鉅大。就是到了現在，我還可以

（註一）Brahmacharya 絕對禁慾或守貞之意。

看得見我面前的困難。許願的重要是逐漸的明顯起來。沒有婆羅摩利利，生活似乎是乾燥無味，並且與野獸無異。野獸生性不知自制；人的所以爲人，是因爲他有自制的能力。我們的宗教經籍，對於婆羅摩利利的讚美我從前認爲過度的，現在我逐日更清楚地感覺它的正當，並以爲它是建立在經驗上的。

我見到婆羅摩利利有那樣奇妙的力量，但知道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是一件只限於肉體方面的事。婆羅摩利利始於肉的自制，但不止於此。到了完全的地步，它甚至不許有不潔的思想。一個婆羅摩利利的忠實實行者，甚至口腹之慾也不敢放縱，若不如此，他有待於成就的正多着呢。

在我，就是實行肉體上的婆羅摩利利已經不容易了。到了今日，我可以說我已有了若干的把握，但我仍沒有達到思想上完全的自主。這一層是必不可少的。

並不是說我缺乏意志或努力，但是不正當思想究竟從那裏來，作突然的侵襲，這仍然是我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我相信人是握着肩閉不正當思想的鑰匙的，但這一個鑰匙要每一個人自己去找。聖者和先知會把他們的經驗留給我們，但他們沒有給我們留下什麼普遍而沒有錯誤的法規。因爲純全而無錯誤的那個階段，祇能藉着上帝的恩惠而達到，因此，尋求上帝的人會給我們留下像拉摩納摩那樣的經籍。這些經籍因爲這些人自律的嚴峻，操守的廉潔，所以彌覺可珍。我們若不能無限制

地靠賴上帝的恩典，完全控制思想是不可能的。這是每一本宗教經籍所有的教訓；我在追求着完全的婆羅摩利利的時候，每一分鐘都感覺到這個教訓的真實性。

這時候在約翰斯堡所發生的事情好像叫我這一種自潔的功夫變成薩提阿格勒赫的初步工作。我現在知道在我的生活中，所有因這一個誓約而達到極頂的重要事件，都在冥冥中做了這個運動的準備。被稱為薩提阿格勒赫的那個原則，在這名稱沒有成立以前，已經先存在了。實在說，當這名稱出世的時候，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它是什麼。在古查拉提文中，我也曾用『消極抵抗』那英文句子來敘述它。在一個歐人聚會裏面，我覺得他們對於這個名詞的解釋是太過狹義的；他們以為它是弱者的工具，以為它可以含着仇恨，在最後還可以變成暴動。因此我不得不反對這些解釋，而說明印度這一種運動的真實性質。我知道印人必須造一個新字來表示這一個鬥爭。

我搜索枯腸，總找不出一個恰當的名稱來，因此我便在印度輿論上懸賞徵求讀者的意見。結果麥甘樂甘地造成薩達格勒赫(Sadagraha)這個名詞(Sat—真理, Agraha 實力)得了這個獎。但為叫它更清楚起見，我把那字改為薩提阿格勒赫(Satyagraha)，從此它在古查拉提文便成爲這個鬥爭的通用名詞。這一個『靈力運動』的歷史，從大體上說，就是我在南非生活的歷史，特別的，是我在那裏對於真理的實驗的歷史。

甘地夫人生平會有三次因重病差不多死去。她的病是用家常藥品治好的。在第一次，靈力運動已經進行，或將近開始。她常常流血。一位醫界的朋友主張用手術，經過一點遲疑，她便答應了。她是十分衰弱，因此那醫生施手術的時候，不能用蒙藥。手術經過良好，但她感受許多痛楚。然而她是臨之以驚人的勇敢。醫生和他的妻以全副的精神來看護她。這是在杜爾本的事。醫生讓我到約翰斯堡去，囑我不必為病人憂慮。

幾天以後，我接到一封信說嘉雪脫比（即甘地夫人）病更沉重，在床上也不能坐起來，而且曾有一次不醒人事。醫生知道若沒有得到我的許可，他不能給他酒或肉。於是他給我打電話到約翰斯堡，請我許他給她牛肉茶喝。我打電話回去，說我不能給這個許可，但如果她的病狀可以叫她說話，他可以與她商量，她願意怎樣做便怎樣做。『我不能為這件事徵求病人的意見，』醫生說，『你自己必須回來。如果你不讓我自由規定病人的飲食，我便不能為你的夫人恢復健康的事負責。』

我同日乘車到杜爾本去，見了醫生以後，他靜靜地把以下的消息給我洩露：『我給你打電話的時候，已經把牛肉茶給甘地夫人了。』

『喂，醫生，我認為這是一件欺騙的事，』我說。

『給病人規定藥品和飲食，沒有什麼欺騙的問題。』他回答說，『實在說來，我們做醫生的，只要

能救人命，且以誑騙病人和他們的親戚爲美德。」

我深爲痛心，但仍鎮靜着。醫生是個好人，也是我們個人的朋友。他與他的妻子使我感激不盡，但我沒有預備容忍他那醫學上的道德。

「醫生，請你告訴我你現在要怎樣辦。我決不許我的妻喫肉，即使她因此致命，除非她自己願意喫。」

「你的見解是你自己的事，但她什麼時候在我診治之下，我便有權照我的意見給她任何東西喫。如果你不喜歡這樣做，很對不起，我不得不請你把她送到別的地方去。我不能看着她死在我的屋裏。」

「你是否叫我馬上把她帶走？」

「我什麼時候說過要你把她帶走？我只是叫你給我完全的自由。如果你可以這樣辦，我和我的妻都要爲她盡我們所能的，而你也可以離開這裏，不必有什麼掛心。但如果你不明白這一點簡單的道理，那便等於強迫我叫你把她從這裏帶去。」

我記得我的一個兒子也同我在那裏。他完全與我同意，說嘉雪脫比當然不應當喝牛肉茶。我接着就和我的妻商量。她實在是太軟弱了，不應當和她商量這件事。但我覺得這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我

把醫生和我的談話告訴她。她給我一個堅決的回答：「我不要喝牛肉茶。在這世界，生爲人類是一件不易有的事情；我甯願死在你的懷抱中，也不要叫我的身體受這樣可憎的東西的褻瀆。」

我懇求她；我告訴她，不一定要聽從我的話。我給她徵引一些例子，說有些印度的朋友，有時拿肉和酒當藥來吃喝，而並無禁忌。但她不肯遷讓。「不，」她說，「請你馬上把我送走。」

我心中喜悅，但決定把她送走的時候，未免有點奮興。我將她的決心通知醫生。

「你真是個忍心的人！」他喊着說，「她病到這個樣子；你還把這件事告訴她，你應當覺得羞愧。我告訴你她不宜於搬動。她連一點震動都受不住。如果她在路上死了，我也不以爲奇怪。但如果你堅執着這樣做，那就聽你便罷。如果你不肯給她牛肉茶喝，我就連一天都不肯冒險留她在這裏。」

我們於是決定即刻離開那地方。那時正在細雨霏霏，而到車站又有些路程。我們要從杜爾本乘火車到腓力斯，再從那裏走兩哩半的路，才到我們的村子。我無疑地是冒着一個極大的險，但我信靠着上帝進行。我叫人預先送一封信到腓力斯給威士特，請他預備一副吊床，一瓶熱牛奶，一瓶熱水，還要六個用吊床來擡甘地夫人的人，到車站來接我們。我僱了一輛人力車，在那危險情形之下把她放進去，便一同出發，去趁那下一班的車。

嘉雪脫比並不需要鼓勵。她倒來安慰我說：「我不會有什麼事的，不要擔心。」

她是瘦骨支離，已經幾天沒有滋養料。車站上的月臺是很長的，因為人力車不能拉進去，所以我們在到達火車以前不得不走一段路。於是我抱着她走到火車裏去。我們從腓力斯用吊床抬她，在那裏，因為水療的功用，她慢慢的恢復了力氣。

到了腓力斯兩三天以後，有一位印度人到我們那裏來。他聽見我們拒絕了醫生的勸告，因而抱着同情心來規勸我們。當那人來的時候，我的第二和第三個兒子，曼理樂和南達，都在那裏。他徵引曼努（註一）的話來主張喫肉無損於宗教之說。我不喜歡他在我的妻的面前來作這種爭辯，但我為禮貌起見聽從他。曼努的話我是熟悉的，用不着它來決定我的主張。並且我知道有一派人認曼努為一部僞經。但即使它不是，我素食的主張，與宗教的經訓沒有關係，而嘉雪脫比的信仰又是不能動搖的。她對於經籍從未問津，但她的祖先的傳統宗教已經夠她用了。我的兒子們自然是信我所信的，所以他們就不管那印度人的話。但嘉雪脫比馬上打斷他的話。『先生，』她說：『無論你說什麼，我總不願意用牛肉茶來叫我痊愈。請你不要再麻煩我。你若願意的話，可以和我的丈夫和兒子們討論。我自己的主意是打定的了。』

（註一）Manu 為印度教最初制定法律的人。

我讀過一些論素食的書，書裏面說鹽並不是人的飲食的必需品，並且說沒有鹽的食品，反與健康有益。書上說，我自己也曉得，羸弱的人當戒豆子。我是很喜歡豆子的。嘉雪脫比經過手術以後，在一個短時期間，稍好一點，但不久又流起血來，而那病似乎是不容易好的。單用水療法，似乎不能奏效。嘉雪脫比對於我的治療方法，沒有多大信用，雖然她不拒絕它。她當然不找外面的人來幫忙。因此，在我所有的療法都失敗以後，我便懇求她戒去鹽和豆子。我無論怎樣勸她，——我還引了一些有權威者的話——她總不答應。最後，她向我挑戰似的說：『就是有人勸我的話，我也不肯把這兩樣東西戒去。』我同時感着痛心和欣喜，——欣喜的是我得到一個機會表示我對她的愛。我對她說：『你錯了。如果我有病，醫生勸我戒去這些或其他的東西，我必定沒有遲疑地聽從。看罷！我沒有醫生的勸告，我決定戒除鹽和豆子一年，無論你是否要這樣做。』

她異常震動，很憂愁地喊着說：『請你饒恕我。知你如我者，決不當這樣激動你。我應許戒去這些東西，但請你體上天之意，收回你所許的願罷。這太使我難過了！』

『你肯戒去這些東西是最好的，你戒了以後，我知道與你更有益處。至於我，我不能把一個誠心許下的願收回。我相信這願是與我有益的，因為所有的節制，無論動機是什麼，總與人有益。你不要管我吧。這是一件試驗我的事，也是幫助你實行的一種道德助力。』

因此她就放手。『你太倔強了，誰的話你都不聽！』他哭着說。我記載這一件事，因它是薩提阿格勒的一個例子，也是我生平最甘美的一段回憶。

在這事以後，嘉雪脫比的健康就很快的恢復了。這是戒除鹽和豆子的結果，或是以後其他變遷的結果；這是因爲嚴守其他生活規則的結果，或是因這件事而發生的欣悅的結果，我都不得而知。無論如何，她不久就好了，流血也完全停止，而我這『庸醫』的名聲也就因此而增進了。

至於我呢，我因這些新的限制，獲益不淺。這過去的東西，我從沒想念過。一年容易過去，而我的官覺也較從前更爲馴服了。這一個試驗，叫我更趨向於自制的努力，因此，直到我回到印度許久以後，我還是戒除這些東西。

我會叫我的好幾位同工試驗過沒有鹽和豆子的食品，這在南非的成效是好的。在醫學上，對於這個試驗的價值，意見也許不同，但在道德上，所有的自制都與心靈有益，這一點我是毫無疑義的。一個有自制力的人，與一個耽於逸樂的人的食品當然是不同的，正如他們生活的方法的不同一樣。有志於婆羅摩利利的人往往因採用適於逸樂生活的行徑而致失敗。

第十三章 精神訓練

兒童們的精神訓練，較之他們的體力與智力訓練尤為重要。在精神訓練這件事上，我所賴於宗教書籍的地方不多。自然我相信每一個學生對於他自己的宗教，都應當有一些基礎的知識，對於他自己的經典，也應當有相當的認識。因此，我盡力把這種知識供給他們。但在我看來，這只是智力訓練的一部分。我遠在負責教育托爾斯泰村（註一）的兒童以前，便曉得精神訓練是一件特殊的事情。發展精神就是建立人格，認識上帝，實現自我。我以為這是訓練兒童的一種主要工作，其他的訓練，如果沒有精神的陶融，都沒有用處，甚至有害。

這種精神訓練究竟應當怎樣進行呢？我教兒童們熟讀和背誦聖詩，我也將關於德育的書講給他們聽。但這太過不能使我滿意。我和他們發生比較親切的接觸的時候，便曉得精神訓練不是能從書本得來的，正如體力訓練要從體力運動得來，智力運動要從智力訓練得來，所以精神訓練也只有從精神運動的方法。這一件事要靠教師的生活與人格。如果我是一個撒謊的人，我教兒童說真實的

話是白費氣力的。一個怯弱的教師不能使他的學生驍勇，一個放縱的人也不能使他的學生懂得自制的價值。我因此便見得我對這些與我同住的兒童，必須永遠用以身作則的方法去教他們。這樣他們竟變成我的教師，叫我曉得我不得有正直純良的生活，即使只是爲他們的原故。我可以說，我在托爾斯泰村所給我自己隨時加添着的紀律與限制，大半是因着這些委托給我管理的兒童的原故。

其中的一個是個粗野不羈，好撒謊，好打架的孩子。有一次他大大的發作起來。我勃然大怒。我從來沒有責罰過我這些孩子，但這一次我是十分生氣。我設法同他講理，但他毫不退讓，甚至想誑騙我。最後，我隨手拿起一枝界尺，向他的手臂打了一下。我打的時候戰兢起來，我敢說，他也看見了。在他們，這是一個完全新的經驗。那孩子哭出來，求我饒恕他。他的哭不是因爲受打痛楚；如果他這樣做，的話，他儘可以對我如法泡製，因爲他是一個十七歲而身材碩大的青年。但他曉得我不得已而用這笞打方法的痛苦。自此以後，他再沒有不服從我的時候。但我仍然懊悔着那一次所用的武力。我恐怕我那天向他所表示出來的不是我的靈力，而是我自己裏面的獸性。

我向來是反對體罰的。我記得只有一次我向我的兒子施以體罰。因此，我即到現在還不能

(註一) 按此村在約翰斯堡附近，與腓力斯村性質相同。

決定我那天用界尺打人是否一件正當的事。大約它是不正當的，因為它是由於忿怒和懲責別人的衝動。如果它只是我自己難過的一種表示，我認爲還可以自圓其說。但這一件事的動機是混雜的。它激動了我的思想，並教給我一個改正學生行爲的更好的方法。我不知道那個方法在當時是否有效。那孩子不久便忘記了那件事。我並不覺得他以後有什麼大的進步。但那件事叫我更明白教師對於學生的責任。那些男孩子們以後還常有不規則的行爲，但我永遠沒有用過體罰。因此，我從在我管理之下的男女孩子的精神訓練的經驗裏，慢慢的更能了解精神的力量。

這是在托爾斯泰村的時候，凱倫白先生叫我注意到一個我從前沒有理會過的問題。我會說過，村裏的男孩子有的是頑皮而不肯受約束的。他們當中也有游手好閑的人。我的三個兒子每天同這些孩子接觸着，其他與我的兒子們相類的別的孩子也是這樣。凱倫白不以這種光景爲然。他所注意的是我的兒子們不應當和那些野孩子在一起的那一點。

有一天他說出來了。「你叫你的孩子和那些壞孩子在一起，我不贊成。」他說，「這個辦法，只能有一個結果：他們將來一定要學壞的。」

我不記得當時這個問題是否使我爲難，但我記得這樣對他說：「我怎能把我的孩子和那些游手好閑的孩子分開呢？我對於兩者都是負着相同的責任的。這些孩子們是我請他們來的。老實說，恐

怕他們和他們的保護人以爲到了這裏來是給我做了一個人情。他們在這裏感受許多不便，這是你和我也都知道的。但我明白我責任之所在。我必須叫他們在這裏，所以我的兒子們也必須同他們在一起。我想你決不要我從今天起叫我的兒子感覺他們是比其他的孩子更高尚的。叫他們有這種感覺。便是把他們領入歧途。與別的孩子來往於他們是有益的。他們也因此可以自動的分別出善惡來。爲什麼我們不能相信，假如他們真有好處，他們自然會影響到他們的同伴呢？無論如何，我不能不叫他們在這裏；如果這是帶着危險的，我們便只好去冒險。」

凱倫白先生搖頭不答，但我以爲結果不能說是壞的。我的兒子們並不因這種試驗而變得更壞。我更以爲他們實在有所得。如果他們有一點點自高的心理，這個心理是被打破了。他們也學習了和各樣的孩子往來。他們是受着試驗，在紀律裏面生活。這一次和其他的試驗使我曉得，如果將好孩子和壞的一齊教育，並將他們混在一塊，好孩子不會有所損失，設若這個試驗是在他們的父母和保護人小心監察之下舉行的。

把孩子們用消過毒的棉花捆起來，未必就能使他們不受試誘或污染。但若把各種的男女孩子放在一起，在一起教育，那就使父母和教師都受一種嚴重的試驗。他們不得不隨時監視着這些孩子。我逐日更覺得清楚的一點，就是使男女孩子在適當的情形下長大和受教育，是一件極不容易

的事。如果我要做他們真正的教師和保護者，我就必須感動他們的心，與他們共憂樂，幫助他們解決問題，把他們奔放的熱情納之於正軌。有一次我在約翰斯堡得到一個消息，說學院 (Ashram) 按即指甘地所建立之村) 裏面有兩個人有墮落的行為。靈力運動有什麼表面上的成敗，我倒不在意，但這一個消息的來到，却像一個霹靂。同日，我乘車到腓力斯去，凱倫白先生堅執着和我同行。他看見我當時的神氣，他不忍叫我一個人去，因為他碰巧是給我帶這個使人難堪的消息來的。我在路上便看清楚了我的責任。我覺得學生的墮落多少總要由保護人或教師負責。我在這一件事情上的責任是像白晝般的清楚。我的妻已經警告過我，但因為我生平是易於相信別人的，所以我沒有理會她的話。我也覺得除非我有一種懺悔的舉動，犯罪的人不會曉得我的痛苦，也不會曉得他們陷溺之深。因此我便決定自動斷食七日，並許下一個願，在四個半月以內，每日只吃一頓飯。凱倫白先生想勸阻我，但沒有效果。最後，他贊成了這一種懺悔的表示，並堅執着要加入。我不能拒絕這種毫無偽飾的愛。

這一個決定使我釋去心中的重擔。我對犯罪的那些人的忿怒逐漸的平淡下去，而代之以至純的憐憫。在這樣輕鬆的心境之下，我到了腓力斯。我作進一步的調查，並搜集其他一些必須知道的細節。我的苦行使每一個人都感到痛苦，但那裏的空氣，却因此便清明起來。每一個人都藉此曉得犯罪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而我與那些男女孩子的關係，也更堅強真實起來。不久以後，從這件事發生了

一種情勢，使我不得不斷食十四日。它有甚至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效果。

我敘述這些事件的目的並不是要證明凡學生有失德的事，教師便應當從事禁食。但我以為有的時候的確要用這種嚴峻的辦法。採取這種辦法的人自然應有清楚的眼光和精神的素養。如果在師生之間沒有真正的愛心，如果學生的過犯沒有打動教師的心弦，如果學生對於教師沒有相當的尊敬，那樣禁食是沒有功效，而且甚至有害的。在這些情形之下，雖然是否應當禁食是一個問題，但教師對學生的過失所應負的責任是沒有問題的。

第一次苦行沒有給我們什麼困難。我尋常的工作都不必停止。讀者大概還記得，我在這一段時間內，完全是素食的。第二次禁食的後半使我有點難受。我當時並沒有完全懂得拉摩納摩的驚人效力，而我忍受痛苦的能力也因此而減少。我也沒有懂得禁食的技術，尤其是無論怎樣起惡心或不快，都必須飲水那一件事。也因為第一次禁食那樣容易過去，所以第二次就以爲可以隨便些。在第二次禁食期中，我喝水很少，因為喝水要使我感到不快，並作惡心。咽喉因此便覺乾燥而無力，等到最後那天，我便只能用極低的聲音說話。雖然如此，在必須寫字的時候，我還是能夠口授。常有人讀拉摩雅納和其他的聖書給我聽，而我的氣力也足夠使我在重要的事情上做磋商顧問的工作。

我生平的各樣遭遇聯成一種勢力，使我與各種信仰，各種社會的人有親切接觸的機會。我從他

們所得的經驗，可以保證我這一段話，就是說我從來沒有在人與人之間分出界線，無論是親是疏，是本國人是外國人，是有色的，是無色的，是印度教徒或其他印度宗教的教徒，無論是回教，拍爾西教，基督教或猶太教。我可以說在我的心中沒有這一切的分別。我不以此為我的一種美德，因為這是我的天性，並不是我自己努力的結果。若論到亞希薩（非武力），婆羅摩利利（獨身）及其他主要的美德，我是充分的感覺我要不斷的為養成這些美德追求着。

我在執行律師業務的時候，我的書記時常與我同住。他們當中有印度教徒，也有基督教徒。我不記得我除了拿他們當作我的至親以外，我還用過什麼別的態度看待他們。我把他們看作家裏的人，如果我的妻為這件事有什麼反對，我們彼此之間便會有使人不快的事情發生。書記中有一個是基督教徒，他的父母是個「不可接觸」者。

屋宇是西式的，房間都沒有洩水的設備。每一個房間有它自己的污水桶和用具。我們不願意叫僕人來執潔淨之役，因此這些事都是由我的妻或我來料理。書記們住在這裏既然是當作在自己的家一樣，自然是料理他們自己的用具，但那基督教徒的書記是新來的，所以我們便要替他料理他的臥室。甘地夫人料理其他客人的東西是沒有問題的，但替一個曾經做過賤民的人潔淨他的用具，在她似乎未免太過。我們因此便爭吵起來。他不忍讓我去做這件事，而她自己又不願意做。直到現在，她還

能想像着她當時在鬱怒中紅着眼睛，珠淚往臉上直流，拿着污水桶下樓梯的情景。但我那時是一個慈祥而執拗的丈夫。我對她是以師長自居的，因此，我使用着盲目的愛，使她屈服。其實，她勉強去拿那些器具，不能使我滿意，我願意她欣然地做。於是我高着聲對她說：『在我的屋裏，我受不了這種無理取鬧的事。』

我的話像箭一般射着她。她喊着來駁我說：『你自己的房屋自己享用去，讓我走罷。』我那時竟把我的身分忘却了。憐憫的泉流也枯竭了。我抓住她的手，把這無告的婦人拉到與外面樓梯正對着的大門去，預備把門打開，將她推出去。她淚如泉湧，說：『你不知道羞恥麼？你真要不管你的身分到這個地步麼？我到那裏去呢？我在這裏沒有父母親戚來收留我。因為我是你的妻，你便以為我要任你拳打腳踢麼？我勸你檢點你自己，把門關上，別叫人看見我們這樣的胡鬧。』

我還是裝着倔強的樣子，但却十分感到羞愧而把門關上。我的妻固然離不開我，但我也離不開她。我們有很多的爭吵，但結果總是和好起來。我的妻有非常的忍耐力，所以勝利總屬於她的。

現在我能用比較超然的態度來敘述這件事，因為這件事發生的那個時期，我僥倖已經脫離了。我不再是一個盲目的，自是的丈夫，對我的妻也不再願以師長自居。在現在，若甘地夫人喜歡那樣做的話，她可以使我不快，正如我以前使她不快一樣。我們是經過試煉的朋友，彼此不再以對方為肉慾

的對象。在我生病的時期中，她始終是我忠實的看護，服勞而不望酬報。

上述的那件事，是在一八九八年發生的。我那時還沒有關於禁慾的觀念。我想妻子是滿足丈夫肉慾的器具，生出來聽丈夫支使，而不是他的助手，他的同志，與他共甘苦的一個伴侶。

讀者看到這一段神聖的回憶以後，不要想我們是怎樣一對理想的夫妻，或以為我們彼此間的理想是完全相同的。大約甘地夫人不知道她有沒有離我而獨立的理想。就是到現在，也許我有許多事情，不能使她同意。我們沒有討論過這些事，我知道討論也是沒有益處的，因為她沒有受過父母的教育，而我在應當教育她的時候，也沒有這樣做。但她充分地具有一個偉大的性格，這是多數印度教的妻子所同具的性格，這就是：無論她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意識地也好，非意識地也好，她總以追踪我為一件幸事，而我在努力實行自制的生活的時候，她也從沒有攔阻過我。因此，我們雖然在理智上相差很遠，我常有一個感覺，以為我們的生活是自足的，快樂的，進步的。

甘 地 自 傳

第十四章 奈托爾的靈力運動

高哈理離開南非不久以後，^(註二)便發生了一種要在奈托爾提倡靈力運動的情勢。他以為那人頭稅可以在一年之內廢止，而這個案也可以在下屆的聯邦議院會議提出來，却想不到史密斯將軍 (General Smuts) 在議會席上說因為奈托爾的歐人反對廢止人頭稅，所以聯邦政府不能通過廢止該稅的議案。但他的話是不對的。奈托爾的議員，在一個代表四個殖民地的團體裏面，不能單獨有所動作。再者，史密斯將軍應當代表內閣，將議案提出於議會，至於是否通過，則不必置問。但他沒有這樣做，因此我們便得了一個很好的機會，把他這種不公道的賦稅，也作為我們抗爭的一種理由。我們所以這樣做，有兩種原因。第一，如果在鬥爭正進行着的時候，政府有了一種應許，而後來又食了言，我們抗爭的程序，自然要把這種失信的事也放在裏面。第二，對像高哈理那樣一個代表印度的人，爽了約，不但是一種對個人的侮辱，而且是對全印度的侮辱，既是那樣，就不能緘口不言。

祖國被人侮辱，是不能忍受的一件事，所以我們覺得靈力運動者不能不把他那三鎊的人頭稅

也放入鬥爭的程序裏面。這稅既然在鬥爭的範圍裏，那些訂約的印度工人便可以參加的機會。讀者應當注意，這一個階級的人，直到現在，還是置身於鬥爭之外的。我們這個新的政策，一方面增加了我們的負擔，同時也為我們開闢了一塊招募「戰鬥」員的新田地。

直至此時，靈力運動這一件事，在訂約工人裏面，連談話也不會談到的，他們更沒有受過參加的訓練。因為他們是不識字的，所以不能看印度輿論或其他的報紙。但我見到這些可憐的人，很留心觀察這個鬥爭，也了解這個運動，他們當中還有人以不能參加為可惜。但當聯邦的當局爽了約，我們把廢除人頭稅也列入程序以後，我還不曉得他們當中有什麼人參加這個鬥爭。

我寫信將這食言的事告訴高哈理；他聽見了異常心痛。我請他不要着急，並向他保證，我們必定奮鬥到死而後已，要從杜蘭斯哇政府吝嗇的手中，把廢稅的事實絞出來。我回印一年的事，不得不擱置，而我也不能決定什麼時候可以去。高哈理是一個注重數目字的人。他叫我把它們這和平軍最多和最少的實力，和戰鬥員的名字告訴他。據我記憶所及，我告訴他最多六十五六人，最少十六人。我把

(註一)高哈理到南非來是要設法廢除一種不公道的人頭稅。稅額是三鎊，凡已恢復自由的訂約工人，無論男女大小都要繳納。這稅的用意是使工人不得受訂約的拘束，因為訂約工人是免納的。高哈理走的時候，以為這稅是可以廢除的了。

名字寄去，並告訴他，爲這樣少的人數，我不希望從印度得到經濟的援助。

我們正在準備繼續鬥爭的時候，又發生了一件冤屈的事，叫婦女也有參加這個鬥爭的機會。有些勇敢的婦女已經自告奮勇，要來參加。當那些靈力運動者，爲着沒有執照牌在街上販賣而被捕入獄的時候，他們的妻子已經表示願步他們的後塵。但我們覺得不應當叫婦女在異國入獄。

上帝好像在冥冥中爲印度人預備着勝利的材料，並更清楚地指出南非的歐人的不公道。這樣子，便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

有許多人是結了婚才從印度到南非來的，也有的印度人是在南非結婚的。在印度，並沒有關於普通婚姻登記的法律，所以宗教的儀式便足使它發生效力。這一種風俗也應當在南非的印人中通用。雖然印人在南非居留已有四十年之久，凡照着印度各種宗教儀式舉行的婚禮，從來沒有發生過什麼問題。但在這時候，地角大理院的院長西爾勒先生，在一九一三年三月十四日判了一件案，說除了照着基督教儀式舉行，並經婚姻登記處登記的婚姻以外，其他在南非所舉行的婚禮，都沒有法律上的效力。

這一個可怕的判詞就是這樣子把照着印度教、回教、祆教（Zoroastrian）的儀式舉行的婚禮一筆勾銷。在南非許多已經結婚的印度婦女，照着這個判詞的解釋，便失去做他們丈夫的妻子的資

格，而降爲妾媵，他們的後代，也失去承繼父母的產業的權利。在婦女與男子無異，這是一件不能忍受的事。南非的印人便因此大大的鼓噪起來。

照着我通常的習慣，我寫信給政府，問他們是否同意於西爾勒的判詞，如果是同意的話，他們是否願意修正這一條法律，使照着結婚人的宗教習慣而舉行的，在印度被認爲合法的婚禮，得以發生效力。政府當時無意聽我的話，所以沒有答應我的請求。

靈力運動協會開了一個會議，考慮是否應當爲西爾勒的判詞上訴抗爭。他們的結論是：爲這類問題上訴，是不可能的。如果上訴的話，必須由政府提出，或者，如果印度人願意那樣做，他們也可以提起，不過要得政府由檢察官公開表示贊助他們。在沒有滿足這些條件的時候去上訴，便等於容忍印度婚姻的失去效力。即使上訴失敗了，靈力運動還是要實行的。在這樣情況之下，似乎最好不爲那件不可以言語形容的侮辱上訴。

現在到了危急的關頭，連一天或一小時都不能等待。到了婦女的人格受了侮辱，就不能再事忍耐。我們決定不管人數多少，舉行堅強的靈力運動。我們現在不但不要阻止婦女們參加鬥爭，我們還決定請她們與男子一同加入戰線。我們先請住在托爾斯泰村的姊妹們。我告訴他們參加這個運動有什麼危險。我也給她們解釋，說她們要準備着在飲食、衣服，及個人行動上受限制。我警告她們說：她

們也許在監獄裏被派作苦工，洗衣服，甚至受獄吏的凌辱。但這些姊妹們都是勇敢的，不怕這些東西。其中一個行將臨盆，還有六個是手中抱着嬰兒的，但他們全體一致的熱心參加，而我又簡直不能阻止她們。這些姊妹們除了一個以外，其他都是他密爾人。以下是她們的名字：

Mrs. Thambi Naidoo, Mrs. N. Pillay, Mrs. K. Murugasa Pillay, M. Ars Perumal Naidoo, Mrs. P.K. Naidoo, Mrs. K. Chinnaswami Pillay, Mrs. N. S. Pillay, Mrs. R.A. Mudalingam, Mrs. Bhavani Dayal, Miss Minachi Pillay, Miss Baijum Murugasa Pillay.

因犯罪而入獄是容易的，但無罪而入獄就困難了。罪犯是要逃脫，而警察是要去追捕他的。至於一個沒有犯罪而故意叫人捕他的人，他們除非不得已，必不肯捕他。因此，這些姊妹們第一次的嘗試沒有什麼成功。他們沒有拿着通行證從威連尼京入杜蘭斯哇，但他們沒有被捕。她們沿街販賣什物，但警察仍然不理她們。這些婦女們究竟怎樣才能被捕，現在成爲她們的一個問題了。在男子裏面沒有多少人預備入獄，那些願意的，事實上又不容易辦到。

我們現在決定採取一個留在最後應用的辦法。這一個辦法在那時候的情形完全達到我們所期望的。我已經想到在緊急的時候，把腓力斯的居留民完全犧牲了。那算是我對真理的上帝最後的

獻祭。在腓力斯居留的人，大半是與我接近的同工和親戚。我的意思是除了主持印度輿論和十六歲以下的兒童外，其他的人我都叫他們入獄。在那時情勢之下，這是我所能做到的最高度的犧牲。我在致高哈理函中所提到的那十六位健兒是腓力斯村的開創者。有人提議叫這些朋友們越界到脫蘭斯哇去，在入境的時候，因沒有通行證而被捕。

沒有通行證而從奈托爾入杜蘭斯哇境是一件犯罪的行爲；從杜蘭斯哇到奈托爾也是一樣。如果那些姊妹們在進奈托爾境的時候被捕，那是最好的，但如果他們沒有被捕，我們便安排好叫她們繼續前進，在奈托爾煤礦中心點的紐加素駐下，勸訂約的印度工人罷工。那些姊妹們的土語是他密爾，但他們也能說一點印度的普通話。煤礦工人大半是從麥達拉斯來的，說的是他密爾或德魯古話，雖然也有不少是從北印度來的。如果工人因着姊妹們的鼓動而罷工，政府不得不把她們連同工人一齊捕去，這樣子，工人們大概會更加熱心起來。這是我想出來而對杜蘭斯哇姊妹們暴露過的策略。

我到腓力斯去，將我的計畫與居留人談論。我最先和住在那裏的姊妹們商量。我知道叫婦女入獄那個步驟是含着嚴重的危險的。腓力斯的姊妹們多半說古查拉提話。她們沒有杜蘭斯哇的姊妹們的訓練與經驗。再者，她們多數與我有親戚的關係，也許她們想只是爲我的原故而入獄。如果她們後來在真正試煉的時候退縮起來，或受不了監獄的苦處，她們也許因被勸而認錯，這不但給我一個

很大的打擊，也叫這運動受嚴重的損失。我決定不將這件事向我的妻暴露，因為她對於我的提議不能說『否』，而她若說『是』，我又不知道她的話究竟有多少價值。我知道在這樣一件嚴重的事情上，丈夫應當讓妻子自動的取她自己所喜歡的行徑，即使他什麼行徑都不取，丈夫也不應當怪她。我和其他的姊妹談論這件事，她們馬上贊成表示願意入獄。她們向我保證說：無論發生什麼事情，她們在監獄總到期滿為止。我的妻從旁聽到我與姊妹們的談話，便對我說：

『你不把這件事告訴我，我很難過。我有什麼缺點，使我沒有入獄的資格？你叫別人走的路，我也願意走。』

『你曉得，如果有人使你痛苦的話，我是最後的一個。』我回答說。『若說我不信任你，那是不成問題的。如果你入了獄，我只有覺得歡喜，但我不願意叫人想這是我所出的主意。在這樣的事情上，每一個人的行動，都應當靠着自己的力量和勇敢。如果我先問你，你也許只爲着我的請求而去。你若在法庭上顫慄起來，或被監獄的苦况嚇倒了，我倒不能怪你，但我自己怎樣呢？那時，我怎樣還能收容你，又怎樣能自白於天下呢？我所以沒有請你參加，就是因爲有這樣的懼怕。』

『如果我受不了牢獄的生活而認了錯以求省釋。』她說，『你可以和我斷絕關係。如果你和我的兒子都能喫苦，爲什麼我不能呢？我必須參加這個鬥爭。』

「那樣，我就必須讓你參加。」我說，「我的條件你是知道的，我的脾氣你也知道的。就是現在，如果你喜歡的話，你可以把這件事再考慮一下，如果在熟思之後，你決定不參加這個鬥爭，你可以自由退出。你要明白，甚至現在改變主意，也並不是一件可恥的事。」

「我沒有什麼要思想的，我是完全決定的了。」她說。

我也向其他的居留民提議，請他們每一個人自己決定，不要跟從別人。我用各樣的方法，至再三，叫他們注意這一個條件，就是，無論這個鬥爭是長期的是短期的，無論腓力斯村是興旺是衰落，無論他或她在獄裏是享着健康或是患着病，不要有一個人中途變節。大家都準備好了。那一批人中只有魯士東治是腓力斯村以外的人。我們的各種會議，是瞞不過他的。我們的加加治——（註一）這是我們用親人口氣稱呼他的名字——在現在這樣的事上，不是一個可以留在背後的人。這「進攻」的隊伍是由以下各人組合而成的：

Mrs. Kasturbai Gandhi (即甘地夫人), Mrs. Jayakunvar Manilal Doctor, Mrs. Kashi Chhaganlal Gandhi, Mrs. Santok Maganlal Gandhi, Parsi Rustomji Jivanji

（註一）加加(Kaka)即叔叔之意

Ghorghodu (即魯士東治) Chhaganlal Khushalehand Gandhi, Ravibhai Manibhai Patel, Maganbhai Haribhai Patel, Solomon Royepen, Raju Govindu, Ramdas Mohandas Gandhi (即甘地第三公子) Shivpujan Badari, V. Govindarajulu, Kuppuswami Moonlight Mudaliar, Gokuldas Hansraj, and Ievashankar Ratansi Sodha.

這些『進攻者』將以不帶通行證越境入杜蘭斯哇而入獄。在上列名單中，有些名字如果揭露出來，警察大概不會把本人捕去，這一點我想凡是看過這個名單的讀者都會明白的。在我自己實在是如此的。我被捕兩三次，但邊界上的警察以後就不再麻煩我了。沒有人得到這一隊人已經首程的通知；自然這個消息也沒有送到報館裏去。並且那一隊人奉命不得向警察暴露他們的名字，並要聲明將在法庭上將名字宣佈出來。

警察們對於這類的案件是熟悉的。印人藉故就捕，既已成了習慣，他們常常不肯將名字說出來，當作一件好頭的事，因此，警察對於腓力斯那一隊人，看不出有什麼特異的行爲來，便把他們逮捕了。他們受審之後，得到一個監禁三個月兼做苦工的判決。這是一九一三年九月廿三日的事。

在杜蘭斯哇失望的姊妹們現在入了奈把爾境，但並不因沒有通信證而被捕。於是她們到紐加索去，照預定的計劃做事。她們的勢力像野火般發展。那三鎊的人頭稅所演成的痛史，使工人們立

時受了感動，他們就罷了工。這個消息從電報傳到我這裏來。我是一半歡喜，一半憂疑。我應當做什麼呢？我沒有準備着這一個驚人的覺醒。我沒有人材和金錢來應付這當前的事工。但我對於我的職責已經看清楚了。我必須到紐加索去盡我所能做的。我立刻起程到那裏去。

政府現在不能再讓那些勇敢的姊妹們自由地進行他們的活動了。她們也被判監禁三個月，和腓力斯那一隊人同在一個監獄裏。

第十五章 消極抵抗者

這些事件不但把南非的印度人，而且把祖國的人民，深刻地鼓動了。麥達爵士對於我們的圖謀，到現在還是持着模稜的態度。在一九零一年的時候，他很勸我不要到南非去。他以為印度沒有得到自由以前，對於海外的印度移民決不能有所援助。初期的靈力運動沒有給他多少的印象。但婦女入獄那一件事比什麼都能打動他的心。照他自己在孟買市政廳所說的話：他想到那些在監獄裏的婦女，血便沸騰起來。

婦女們的勇敢是不能以言語來形容的。她們被禁在馬烈茲堡監獄，諸事都不方便。她們的飲食是最壞的；她們的工作是洗衣。直至將近期滿以前，外面的食物是不許送進去的。有一位姊妹許下一個宗教的願，只食某種食物。經過多少困難以後，獄吏才許她吃這種食物，但他們所供給的東西不是人所能喫的。那姊妹被釋的時候，已是瘦骨支離，用了很大的力，才把她救回來。還有一個帶着一種可致死的熱症出獄，因此被釋後幾天便去世了。

我怎能忘記華妮阿瑪呢？她是約翰斯堡的一個少女，年只十六歲。我見她的時候，她還是臥在床。上。因為她身材甚高，所以她那瘦損的身體益覺難看。

「華妮阿瑪，我問，『你不因入獄而懊悔嗎？』」

「懊悔？」她說，「如果我再被捕的話，我還是預備入獄。」

「但如果這事致你於死呢？」我接着問。

「這也不打緊，」她回答說，「誰不願意為祖國死呢？」

談話以後不到幾天，華妮阿瑪便不在人世，但她已給我們留下一個不朽的名字。各處都開追悼會，印人並決定建華妮阿瑪堂以紀念這位印度女兒空前的犧牲。不幸地，這決議還沒有見諸實行。那時發生了好些困難。印人內部自己爭吵起來；主要的工作人員也一個一個的走了。但無論是否用石或灰來建了一所紀念堂，華妮阿瑪的事業是永存的。她用自己的手蓋了她的服務之殿。華妮阿瑪這個名字在南非靈力運動的歷史裏，是與印度共存的。

這些姊妹們的犧牲是絕對純潔的。她們不懂得法律上的細節。她們多數人的國家觀念是薄弱的；她們的愛國心是從信仰來的。她們有的是文盲，不能閱報。但他們曉得印度人的榮譽將受一個致命的打擊。她們的入獄是一個從心坎裏發出來的呼聲與祈禱。這實在是犧牲中的最純潔的。這樣誠

心的祈禱，是上帝所悅納的。犧牲的效力完全在其純潔的程度。上帝是饑渴着要人崇奉他。他喜歡接納那寡婦用虔敬的心，即無私心，去獻上的一文錢，而償之以百倍。那率真的蘇丹馬（註一）只獻了一掬的米，但那小小的貢獻使多年的饑荒終止了。許多人入獄，未必一定發生效力，但單單一個純潔之士的真誠的犧牲也決不會枉費的。沒有人能說，誰在南非的犧牲蒙上帝的悅納而結了果子。但我們準知道華妮阿瑪的犧牲是結了果子，而其他的姊妹的犧牲也是一樣的。

無數的人在已往，在現在，在未來，為國家為人類去消耗了他們自己；照理是應當這樣的，因為誰都不知道誰是純潔的。但靈力運動者必須自信，即使在他們當中只有一個人像水晶般的純潔，那人的犧牲已夠使運動的目的達到。世界是建立在薩提阿（*Satya*）即真理的磐石之上。阿薩提阿（*Asatya*）作非真理解，亦作「不存在」解；薩提阿，或真理，亦作「存在的」解。如果所謂非真理解甚至不存在，它的勝利便沒有討論的必要了。真理既然是「存在的」，自然是永不能毀滅。這是靈力主義的要領。

婦女的入獄好像有一道符咒的效力。紐加索附近的礦工，放下他們的工具，整了隊陸續進城。我得到這個消息以後，便馬上離開腓力斯到紐加索去。

這些工人沒有他們自己的房屋。礦主們給他們造房子，在路上安設電燈，把水供給他們，結果是

使工人完全依靠他們。杜爾西達說過，依靠人的即使在夢中也得不到快樂。

罷工的人向我報告許多不平的事。有的說礦主停止供給他們的電燈和水，有的說他們把罷工者的家具從住處擲出來。有一位伯丹人名叫衣伯拉謙，把他的背給我。『看啊！』他說，『他們把我管打得多厲害。我讓這班無賴走了，因為這是你的命令。我是一個伯丹人；伯丹人總是打人，而不肯被打的。』

『兄弟，幹得好，』我回答說，『我看只有這是純粹勇敢的行為。如果我們有像你那樣的人，我們是必定勝利的。』

我這樣的恭賀他，但同時也想到，如果有許多人得到像這位伯丹人所得到的待遇，那罷工是不能支持下去的。拋開管打的那件事不講，如果煤礦公司停止光、水和罷工者其他便利的供給，我們並沒有多少可以抱怨的餘地。但無論有沒有充足的理由可以抱怨，罷工者在這樣情形之下，是不能繼續下去的，而我也要為這種困難找一條出路；若不然，就甯可他們認了輸去復工，也勝於無聊地等着，然後再去工作。但我是向來不肯採取自餒的政策。因此我提議，說工人唯一的行徑就是離開他們

(註一)據印度傳說，蘇丹馬為一窮人，盡其所有的一掬米，獻普利殊那。

的主人的住所，度遊方化緣的生活。

工人的數目，不是幾十，乃是幾百，並可以很容易的加到幾千。我怎樣去供給這日益增加的羣衆的飲食和住處呢？我不想向印度求經濟的援助。從祖國外溢的那道金河，那時還沒有開始流動。印度的商人是十分害怕，也沒有準備，公然的幫助我，因為他們與煤礦的主人和其他的歐人都有商業上的關係。我每逢到紐加索去，總在他們那裏居停，但這一次，因為我不願使他們爲難，便決定到一個別的地方去。

我沒有方法給他們安排住處，只有頭上的青天是他們現在的房頂。幸而天氣很好，沒有雨，也不冷。我是相信那些商人不會不供給我們的飲食的。紐加索的商人給我們預備鍋子和一袋一袋的米。別的地方也將米，豆子，蔬菜，香料等盡量的送過來。這些捐輸出乎我的意想之外，並不是每一人都願意入獄，但大家都一心一德，情願將所有的拿出來，貢獻給那運動。那些沒有什麼可以拿出來的，便來充義務的工作人員。我們需要有知識，有名望的義務員來照料這些沒有名望，沒有受過教育的人。這些義務員是源源而來的。他們給我們一種莫大的幫助，他們當中他有許多人被捕。這樣子，大家都盡所能，我們的道途也便平坦起來了。

我們有一大羣的人，數目也隨時增加。叫他們常在一個地方，在無業的時候照料他們，這即使不

是不可能，也是一件帶有危險性的事。他們大都不諳衛生。他們當中有些是囚犯謀殺，盜竊，奸淫等罪而入過獄的。但我覺得我自己不配評判這些罷工者的道德。如果我設法分別他們的善惡，好像把山羊和綿羊分開一樣，那簡直是愚不可及。我的任務只是領導罷工，不能將感化的工作混在裏面。我自然要叫他們在駐紮的地方遵守道德上的規則，但我不應當追問每一個罷工者以往的事。

我想出一個辦法來了。我必須把這個『軍隊』送到杜蘭斯哇去，叫他們像腓力斯那一隊一樣，平平安安地入了獄。杜蘭斯哇的邊界離紐加索三十六哩。在奈托爾和杜蘭斯哇的交界有兩個村落叫做却爾斯頓和伏爾克勒斯。最後我們決定步行。我和那些有妻子兒女的工人商量，他們有些人遲遲不敢答應。但我這時沒有別的可走的路了：我只得硬着心腸，向他們宣言，那些不願意走的可以自由回到礦裏去。他們沒有一個人願意這樣做。我們決定凡是四肢失了功能的可以由鐵路載運，而所有健全的人都聲明願意步行到却爾斯頓去。那整隊的步行預計兩天之內可以完了。等到竣事以後，大家都以走了這一步棋為幸。那時紐加索的歐人預料將有瘟疫發生，正用看各種的方法去預防。

我在杜爾本與礦主晤見，曉得他們頗被這個罷工所感動，但我不希冀這一次的晤談會發生什麼大事。靈力運動者的謙卑是渺無涯際的。他不肯錯過了任何一個調解的機會。如果別人認他為怯弱，他也不去計較。凡具有信仰和從信仰所生出來的能力的，即使被人輕視，也不在意。他所靠賴的，只

有他。自己。內。蘊。的。能。力。他。對。於。一。切。的。人。都。以。禮。相。待。這。樣。子。他。便。能。培。植。和。轉。移。世。界。的。輿。論。使。它。同。情。於。他。的。企。圖。因。此。礦。主。的。招。請。極。爲。我。所。歡。迎。我。會。見。他。們。的。時。候。看。見。那。裏。的。空。氣。充。滿。了。當。時。緊。張。熱。烈。的。情。緒。他。們。的。代。表。沒。有。讓。我。解。釋。這。事。的。情。勢。便。逕。行。審。問。我。我。給。他。們。適。宜。的。回。答。

「你們有權可以使這個罷工終止。」我說。

「我們並非官員。」他們回答。

「雖然你們不是官員。」我說，「你們可以做的事很多。你們可以替工人們鬥爭。如果你們請政府廢那三鎊的人頭稅，我相信他們不會拒絕的。你們也可以養成歐人對這件事的輿論。」

「那三鎊的稅與罷工又有什麼關係呢？如果工人對於鑛主有什麼要伸訴的事情，你應當正式和他們談判。」

「除了罷工以外，我看不見工人手上還有什麼別的利器。那三鎊的稅，實在是爲着礦主的利益而徵收的。他們要工人替他們作工，但不願意他們以自由人的資格而作工。所以，如果工人以罷工爲達到廢除那三鎊稅的方法，我不見得這對礦主有何不合宜或不公道之處。」

我現在不能把那談話完全記憶起來。我見得礦主們知道他們自己是理虧的，因爲他們已經和政府磋商這件事。

我在往返杜爾本的途中，看見那罷工和罷工者和平的行動，已經對路警和其他的人們發生極良好的影響。我照平常的習慣乘坐二等，但甚至在那裏，路警和其他的職員，都來圍繞着我，向我打聽一切，並祝我成功。這些職員們看見那些貧窮的，不識字的，愚昧的工人所表示的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深以為奇異。堅定和勇敢這兩種美德，甚至在對手的方面，也會留下它們的印象。

我從那裏回到紐加索去。工人們仍然從各方面湧進來。我清楚地把這件事的原委向那『軍隊』解釋，並告訴他們，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他們仍然可以回去做工。我把礦主們恐嚇的話給他們提起，並為他們想到將來的危險，也將監獄裏的苦況描寫出來，但他們並不畏縮。他們勇敢地回答，請我不必為他們擔心，因為他們是慣於受苦的。

我們現在只有整隊步行了。工人們在一天晚上得到通知，叫他們準備第二天清早起程，在行程中的規則，也有人給他們讀出來。管理五六千的一羣人，不是一件好頑的事。除了每一個『兵』每日所得的一磅半麵包和一磅糖以外，我在路上不能再給他們別的東西。如果可能的話，我要設法向沿途的印度商人徵求一點別的東西，但如果辦不到，他們就必須以麵包與糖為滿足。我從波爾戰爭和蘇魯『叛變』所得到的經驗，為這一次的事很用得着。這些『進攻者』不要有一個人帶着比必需的還多的衣服，也不要有一個人在路上動用別人所有的東西。如果他們遇見歐人的官員或非官員辱

罵他們，甚至毆打他們，他們都應當忍耐着。他們也要任人逮捕。他們對於以上各點，都有人給他們解釋。設若我首先被捕，便應當有人挨次代我領導那「軍隊。」我把我爲這事所預備好的名字給他們宣佈。那些人都能明白這些訓令，而我們的隊伍也就安全地到了却爾斯頓。那裏的人很幫助我們。他們把房屋借給我們用，也讓我們在禮拜堂的空地上做炊爨的事。我們在途中所供給的食品到了紮營地點的時候，便要告罄，因此，我們便需用一些烹飪的鍋子。這些東西都由商人們踴躍供給。我們存儲着充足的米糧等物，其中的一部分是商人們捐輸出來的。

却爾斯頓祇是一個小村，人口不到一千。祇有婦孺住在房屋裏面，其餘的都露宿。我們在却而斯頓停留的時候，有許多甘美的，也有少數痛苦的回憶。甘美的一方面是關於衛生上的事。這衛生官碧禮高醫師看見人口驟然增加了許多，雖然有點驚慌，但並不用什麼嚴厲的手段來處置。他反來見我，給我一些提議，並表示願帮我的忙。對於食水，道路，和衛生器具的清潔，歐人是講究，而我們是忽略的。碧禮高醫師請我不要讓人將水潑在道上，或將垃圾隨便傾倒。使我們的人遵守這些規則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好在那些「遊方」者和同工的人減輕了我們的責任。我歷來的經驗都給我證明，凡做公僕的，如果只去服役，而不以專斷的方式去發號施令，他便能做出許多的事。如果他能夠做些勞力的工作，別人便要效法他。這也是我在此次運動中所得的經驗。我的同工和我對於打掃，清道等工作，從

來沒有加以遲疑，結果，別人也很熱心去做。嘉倫白那時已在却爾斯頓。史麗新女士也在那裏。她的勤勞，準確，和正直，是不能以言語來頌讚的。在印度人中，新近去世的奈都和基特法也同我們在一起，還有其他的人都很努力工作，給我們很大的幫忙。

我想到那些人的恆心和忍耐，便想到上帝的偉大，而爲之五體投地。在衆廚子之中我是首領。有時食品中放水太多，有時候是沒有煮熟。我在世上沒有見過多少人很愉快地把那些食物吞下去。在另一方面，據我在南非監獄裏的觀察，甚至那些被稱爲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如果食物給得少一點，或是烹調不好，或是送來稍遲，他們便要生氣。

住在杜爾本的麥得勃曉得他密耳的姊妹們在紐加索被判入獄以後，便覺得忍無可忍。她因此同着她的母親漢妮法比和一個七歲大的男孩到伏爾勒斯去尋事就捕。母女都被捕了，但政府不肯捕那孩子。他們要麥得勃在檢察處打指摸，但她勇敢地拒絕這番侮辱。最後，他們母女都被判監禁三個月。

工人的罷工現在正在全盛的時候。男子和婦女都在礦區與却爾斯頓之間走動着。在這些人中，有兩位帶着小孩的婦女。小孩的一個因不堪風露死了。其他的一個，在渡河的時候，從母親的手裏掉下水裏淹死了。但這兩位勇敢的母親，並不因此而懊喪，仍舊繼續前進。她們的一個說：「我們不要爲

死者傷悲，因為無論怎樣傷悲，他們是不會回來的。我們應當為活着的人工作。」我在窮苦人中時常看見這樣沉着的俠氣、純樸的信仰和澈悟的見解。

却爾斯頓的男子和婦女，都在困難中以超脫的精神，各盡職守，因為我們到那邊界的村子裏去，並不是負着和平的使命。如果有人要得着平安，他必須求之於內心。在表面上，好像處處都掛着和平的幌子似的。但像密蘭比（註一）那樣一個篤信的人，是在這樣的風波中，將盛着毒藥的杯子舉到唇邊，怡然泰然地一飲而盡。蘇格拉底也是在這樣的時候，在黑暗幽獨的囚室裏，從容就義。他給他的朋友和我們介紹了那個奧妙的道理，就是說，凡要得到平安的，必須向內心尋求。有了這種不能形容的平安，靈力運動者便住在營帳裏，把明天的事置之於不問。

我給政府寫信，說我們到杜蘭斯哇來並無意久居，目的只在為政府的失信作有效的抗議，並藉以表示我們喪失自尊心以後的苦惱。如蒙政府就地，即在却爾斯頓，將我們逮捕，他們便可以使我們釋去一切的憂慮。我們的運動並沒有什麼隱秘的地方。如果有人秘密地進了杜蘭斯哇境，我們固然不喜歡，但我們不能為任何人的舉動負責，因為我們所與周旋的是幾千個不相識的人，而除了愛以外，對他們又無其他的制裁。最後，我向政府保證：如果他們廢除那三鎊稅，罷工便可以取消，訂約工人亦可以復工，因為我們並不要他們參加我們為其他不平的事而發起的普通鬥爭。

當時的情勢如何，我們很看不清楚。我們不知道政府什麼時候要逮捕我們。但在這緊急的時候，我們不能爲政府的答復等候多日。我們因此決定，如果政府不逮捕我們，我們便要馬上離開却爾斯頓入杜蘭斯哇境。如果我們沒有在路上被捕，這一枝『和平軍』便要每日走二十四哩，連走八日，以期到達托爾斯泰村，在那裏住下，直等到鬥爭告終，在當中的時期，在村中工作自給。嘉倫白先生已經預備一切。他的意思是叫那些『遊方者』幫助我們蓋些泥房子。只有一個困難，就是雨水天將近到了，而大家必須在下雨的時候，有一個遮蓋的地方。但嘉倫白先生勇敢地相信總有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伏爾勒斯是比却爾斯頓大一倍的城市。一個歐人的大麵包房自願和我們訂約供給麵包。麵包房的主人並沒有『趁火打劫』抬高價格；他所給我們的麵包，都是拿最好的麵粉做的。他從鐵路把它運來。鐵路的職員是歐人；他們不但忠實地把它送來，而且在途中很能小心，並予我們以若干的便利。他們知道我們心中沒有惡意，也不要傷害什麼人，只用自己受苦的方法來求伸雪。我們四週的空氣，因此便成爲清潔的，並繼續着這樣。本來在人類的心中內蘊着而蟄伏不動的愛現在已都被激動。

(註1) 密蘭比 (Mirambai) 是一個聖哲的皇后，她的宗教詩歌流行於印度。

起。來。每。一。個。人。都。覺。悟。到。我。們。全。是。弟。兄，無。論。我。們。自。己。是。基。督。徒，猶。太。教。徒，印。度。教。徒，回。教。徒，或。其。他。的。人。

夜闌人靜，我正預備着就寢的時候，忽然聽見步履的聲音。我看見一個歐人拿着燈走過來。我知道他的來意，但不必有什麼準備。

『我是奉命來逮捕你的。我現在要把你捕去。』

『你要帶我到什麼地方去？』

『暫時到車站上去，等有車的時候再到伏爾勒斯去。』

『我不必通知什麼人便可以同你去；但我必須對我的一位同工吩咐幾句話。』

傳 自 地 甘

第十六章 監禁與勝利

我於是把睡在我旁邊的奈都叫醒。我把逮捕的事告訴他，囑他不要在早晨以前把那些『遊方者』驚醒。破曉的時候，他們必須繼續整隊前進。太陽未出以前，隊伍就應當開動，等到休息進食的時候，他便要將我被捕的消息宣佈出來。如果在這以前，這一班人被捕，而又有人問起我，他便可以據實以告，不然，他們便應當照着程序前進。奈都並沒有懼怕。我告訴他，如果他被捕了，應當怎樣辦。嘉倫白先生那時候正在伏爾勒斯。我和警官同去，乘車到了伏爾勒斯，但檢察官因為證據沒有齊備，要求等到十四日再開審。那案件於是展了期，而我使用五十鎊保證金被釋出來。嘉倫白先生已經給我預備好一輛車，馬上送我回到那些『進攻者』的隊伍裏去。杜蘭斯哇導報的特務記者要和我們同行。我們邀他一同乘車，後來他發表了一篇很有精采的文章，把那件案子和沿途所見的，連我重見我們的羣衆的情形都敘述出來。他們熱烈地歡迎我回來，心中充滿快樂。我們繼續前進，但政府不能讓我自由，所以我在八日那一天再在史丹頓被捕。史丹頓的人送給我們一些罐頭的糖醬，因為要分給大眾，所

以耽擱的功夫比較多一點。

我吩咐大家繼續前進，然後與逮捕我的地方官離開那裏。我到了法庭以後，便立刻曉得我的同工們也有些人被捕。他們一共有五個人，即奈都馬哈拉治，新哈那納蘇和納謙甘。政府不願看見大家這樣踴躍就捕，也不喜歡叫被釋放的人將我的話傳到外面去。因此他們決定將嘉倫白，波樂和我三個人分開，將我從伏爾勒斯送走。還要將我放在一個沒有印度人能夠來看我的地方。

於是我被送到寶芳叮的監獄去。那裏只有五十個印度人，他們全數都是旅館裏的侍者。囚人中只有我一個是印度人，其餘的都是歐人和黑人。我並不以這個隔離為嫌，我反把它當作一種幸福。我現在不必再遇事留神，我歡忻地預期着一種新鮮的經驗。我多年，特別從一八九三年以後，沒有時間讀書，現在可以有一整年沒有間斷的讀書時間，這使我異常快慰。在寶芳叮的監獄裏，我要有多少靜默的時間都可以。不方便的地方是有的，但都可以忍受得。獄裏的醫官變成我的朋友。獄吏們只在行使職權的方面着想，而那醫生則以獄中人的利益為念。在這時候，我是一個純粹的果食者。我的食物是香蕉，番茄，花生，檸檬，和橄欖油。如果這些食品中有那一樣是壞的，我便要挨餓。醫生很小心地開單把這些東西要來，並替我加上杏仁，核桃，巴西仁。凡是給我喫的東西，他都親自檢視一番。在我的囚室裏，空氣是不夠的。醫生想盡方法要把我的囚室的門打開，但沒有效果。獄吏聲言，若把門打開，他便

辭職。他不是一個壞人，但他向來走慣了一條路，不會改絃易轍。

嘉倫白先生被送到普力托勒監獄，波樂先王被送到日徹頓監獄。其實政府可以省去這許多麻煩。他們好像一個故事裏面所說的巴定頓夫人，手拿着掃帚去制止狂流。奈托爾的印度工人很有覺悟，世上任何權力都不能阻止他們。賣珠寶的商人把金在試金石上磨擦，如果他看不清楚那塊金是否純淨的，他便把它放在洪爐裏，將雜質打鍊出來，叫剩下的都是純金。南非的印人也經過這樣一番試驗。他們經過了火中的鍛鍊，除非他們能從這鍛鍊的各階段中沒有損傷地跑出來，他們的身上就不能帶着保證純全的印記。這些遊行者不是乘着專車去遊覽，他們是去受烈火的洗禮。他們在途中的時候，政府甚至連飲食都不管。到了奈托爾的時候，他們經過起訴的手續，便馬上被送到監獄裏去。這些事都是我們所預料到，甚至願望着的。但政府如果把數千的工人放在獄裏，費用便要增加，而且似乎是入了印度人的圈套。當這時候，煤礦便要停工。這一種情勢若是維持下去，政府便不得不廢除那三磅稅。於是他們想出一個新的辦法來。政府把礦場用鐵絲網圍起來，聲明這是東地和紐加索的監獄的分所，并委派礦主的歐人職員為獄吏。這樣子，工人們便不得不俯首受制，馬上在礦裏開工。僕人和奴隸有一個不同的點。如果僕人離開了職守，只能對他提起民事訴訟，若奴隸離開了主人，便可以用武力帶他回來。工人們現在就簡直淪為奴隸。

這也就夠了。工人們都是勇士，他們完全拒絕在礦裏工作，結果他們遭了毒打。那些作威作福的人踢他們，罵他們，還給了他們許多沒有記載過的凌辱。但工人們耐心忍受了這一切的苦難。

我們將關於這些暴行的消息打電報到印度，向高哈理報告。甚至有一天沒有接到詳細的音信，他也打電來詢問。高哈理在病榻中將新聞往外傳播，因為他那時正患着重病。雖然他在病中，他還是堅執着要自己處理關於南非的事件。他是不分晝夜地工作。後來全印度都沸騰起來，而南非的問題便成了當日一個中心的問題。

哈定治公爵 (Lord Hardinge) 就是在這個時候在麥達拉斯 (Madras) 發表他的有名的演說。那篇演說激動的南非和英國的人。總督照例是不能公然對帝國中其他的分子加以批評的，但哈定治公爵不但嚴厲地批評聯邦政府，而且熱烈地替靈力運動者辯護，並贊助他們對於不公平的立法案所舉行的『抗法運動』 (Civil disobedience)。

哈定治公爵的舉動在英國受了若干的批評，但他並不因此而懊悔；他以為他是不得已而出此，並無不是之處。哈定治的堅定的態度使各方面的人都得了一個好的印象。

我們暫時把這些困在礦裏的勇敢而不幸的工人放下不提，再說到奈托爾其他地方的光景。礦區是在奈托爾的西北，但印度工人人數最多的地方是在北部和南部的海岸。我與北部海岸的工

人很爲熟悉，他們當中有許多人與我在波爾戰爭共過事。我和南部海岸的工人沒有這樣接近過，我在那裏的同事也很少。但是罷工和被捕的消息像閃電一般傳遍各地，因此，有幾千的工人意外地，自動地從北部和南部的海岸出來響應。有些人把家具都賣了，因爲他們想這是一個長期的鬥爭，而他們又不希望叫別人養活他們。我入獄的時候，曾警告我的同工，不要再讓別的工人加入罷工。我想只有得着礦工的幫助才能得到勝利。如果全體的工人——約有六萬左右——都罷工出來，維持他們的生括是很困難的。我們不能叫他們全體整隊步行：我們既沒有人去管理他們，也沒有錢去供給他們的飲食。並且有了這一大羣的人，就沒有法子避免和平的破裂。但是水閘既已打開了，狂流便不得不變成一個氾濫的局面。各處的工人都自動的罷了工，義勇員也分布着站崗，去照料他們。

政府現在採取一種鐵血的政策了。他們完全用武力制止工人罷工。騎着馬的武裝警察追逐罷工的人，把他們帶回工場去。工人有一點小小的紛擾，便放鎗制止。有一隊罷工的人反抗把他們帶回工場去的企圖。他們有的人還擲石頭。警察向他們開鎗，傷了好些人，也有死的。但工人們沒有被他們懾服。義勇員經過極大的困難，才把一個在維魯林附近的罷工阻止了，但並不是全體工人去復工，有的因爲害怕而藏起來。

有一件應當記載的事。許多從維魯林出來的工人，無論當局怎麼設法，都不肯回去。當時帶着兵

在場彈壓的魯金將軍將近下令開鎗。勇敢的蘇拉治——他是新近去世的魯士東治的兒子——那時還不到十八歲，從杜爾本到這裏來。他跑去拿着將軍所乘的馬的繮子，喊着說：『你決不要下令放鎗。我願負責勸我們的人和平復工。』魯金將軍被這位青年的膽量鎮壓住了，便答應給他時間去試驗他的愛的方法。蘇拉治用道理來曉諭那班工人，而他們也就聽了他的話去復工了。這樣一來，許多性命的喪失，便因一個青年的機智、勇敢和愛心而得以避免。

現在在腓力斯居住是有點危險的，但甚至那裏的兒童，也有膽量去做危險的事。威士特這時是被捕了，雖然沒有捕他的理由。我們本來說好，威士特和麥甘樂甘地兩人，要竭力設法避免被捕。因此，威士特並沒有叫政府可以藉口捕他的事情發生。但我們不能希望政府以靈力運動者的便利爲念。凡是因着自由行動而使他們不得寧靜的人，他們不必等到有所藉口才去逮捕。政府想着這樣做，那便足夠當作一種理由。

威士特被捕的消息用電報送達高哈理以後，他便提議從印度派出一些幹員到南非去。在拉荷舉行的一個擁護南非的靈力運動者的會議中，安得烈（C. F. Andrews 即本書編輯者）把他所有的錢財都爲他們捐輸出來。從那時起，高哈理便注意到他。威士特被捕的消息到了以後，他便打電報問安得烈是否願意馬上到南非去。安得烈不久便回信說可以去。他的愛友皮爾生同時也準備着

去。這兩位朋友便乘了最先開行的船，離開印度到南非洲去。

但那鬥爭現在將近告終了。聯邦政府沒有權力把幾千無辜的人監禁着。總督是不能容許這件事的，而全世界的人，也等着要看史密將軍對於這件事如何處置。聯邦政府現在做了處在同樣情形之下的別的政府所做的事。這件事不必調查。兩方的曲直是大家所知道的，而印人之應得伸雪，也是大家所承認的。史密斯將軍也看出有不公平的事來，知道應圖補救。但他現在處在一個進退維谷的地步，好像一條蛇把一隻老鼠滿滿地吞在口裏，嚙也嚙不下去，吐也吐不出來。他已經對南非的歐人有過一種諒解，就是他不曾把那三鎊稅廢除，也不執行其他改革的辦法。但他現在不得不將稅廢除，並進行其他改善的立法案。凡是順從民意的政府，要從這種窘人的境地裏擺脫出來，便委派一個委員會，使它只做一種名義上的調查，因為實際上它的建議是早已安排好的。照普通的習慣，委員會的建議，當為政府所接收，而政府便帶着執行建議的假面具，去把他們從前會拒絕過的公道給人。史密斯將軍派了一個三人的委員會；但印人有幾種要求，他們決定，如果政府不答應，他們便拒絕與委員會發生任何的關係。要求的一項就是釋放靈力運動被監禁的人，另一項是印人至少應有一人加入委員會。第一項要求，是局部的被委員會自己接收了；他們向政府建議，『為使調查充分的澈底起見，』將嘉倫白先生，波樂先生和我，無條件的釋放。政府接收了這個建議，於是我們這三個人，經過遠

不滿六個月的監禁，便被釋放了。被捕的威士特也被釋放了，因為政府找不出他有什麼錯。

這些事都是安得烈和皮耳生到達以前發生的。因此，他們在杜爾本登陸的時候，我便能親去迎接。他們見我的時候，驚喜過望，因為他們在途中並不曉得這件事。這是我與這兩位義俠的英人首次的晤見。

我們三人被釋以後，都覺得失望。我們對於外面所發生的事，毫無所知。委員會的消息使我們爲之愕然，但我們知道我們不能和他們有任何的合作。我們覺得應當在裏面至少有一位代表。於是我們到了杜爾本以後，在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寫了以下的信給史密斯將軍：

「我們贊成委員會的委派，但我們反對衣士林和威利兩位先生在裏面。我們對於他們個人並沒有反對；他們都是著名而有能幹的市民。但因為他們兩人會屢次表示不喜歡印度人，他們很有持了偏私態度而不自知的可能。人不能將成見馬上改了。若以爲他們兩位忽然可以變成兩個不同的人，那是反乎自然律的。但是我們不要求把他們從委員會除名。我們只提議在他們之外另加幾個不偏袒的人。我們願意提出甄尼斯爵士和史雷納先生兩個名字；他們都是以公道著稱的。第二，我們請求將所有被監禁的靈力運動者釋放。如果這事辦不到，叫我們在監獄以外是困難的。現在沒有理由叫靈力運動者還被禁在獄裏。第三，如果我們向委員會提出證據，就必得讓我們到訂約工人做着

工的礦和工廠裏去。如果這些請求不被接收，我們很對不起，不得不另尋入獄的方法。」

高哈理聽見我們有再度遊行的企圖，便給我們打了一個長電，說這個舉動將使哈定治公爵和他陷在一個困難的地步。他竭力勸我們不要遊行，要向委員會提出證據，以助他的進行。

我們現在是左右為難了。如果委員會的人選不能照着印度人的意思去擴充，他們已立誓對委員會加以抵制。也許哈定治公爵不喜歡，也許高哈理感到痛苦，但我們言既出口，怎能將它收回呢？安得烈請我們注意到高哈理現在的「孱軀」和我們的決定所要給予他的打擊。其實我並非沒有想到這一切。領袖們聚了一個會並最後決定，如果委員會的人員沒有增加，我們仍將進行抵制。我們於是給高哈理打了一個長電。裏面的詞句，經安得烈同意，其大意如下：

「我們知道你是怎樣的痛苦。我們本想忍着重大的犧牲，去聽從你的主張。哈定治公爵曾予我們以最寶貴的幫助，這樣的幫助，我們是始終要接收的。但我們很願意使你明白我們所處的地位：這是幾千人立下一個永不反覆的誓約的問題。我們鬥爭的全部是建立在誓約基礎之上的。如果不是因為誓約約束的力量，現在有許多人已經退却了。如果數千人一度自食其言，所有道德的制裁，將要馬上消滅。那誓約是經過縝密的考慮才立的，它並沒有什麼不道德的地方。我們希望就是你也勸我們對於這樣性質的一個誓約，無論有何事變，都要公同遵守。請你把這個電報給哈定治公爵看。我們

不願意叫你被放在一個虛偽的地位。我們開始這個鬥爭，有上帝做我們的見證，他的援助是我們唯一的力量。」

這個電報到達了高哈理以後，於他的健康有不良的影響，但他對於我們的幫助，還是有加無已。他爲此事致電與哈定治公爵。他不但沒有把我們棄置，還爲我們的立場辯護。哈定治公爵也是繼續幫助我們。

我同安得烈到普力托勒去。正在這時候，聯邦鐵路的歐洲工人舉行一個大罷工，使政府的處境困難，達於極點。我被邀趁着這個好機會，開始印人的遊行，一面幫助了鐵路的罷工者，一面促成我們自己的勝利。我在答復的時候，聲明印度人不能幫助鐵路的罷工者，因爲他們並非故意與政府爲難。他們鬥爭的目的是完全兩樣的。即使我們要遊行，我們也要在鐵路罷工終止以後，另定開始的時間。我們這個決定給人以極深的印象。路透社也爲此事打電到英國去。安赫爾公爵 (Lord Amphil) 從英國打電報來祝賀我們。南非的英國朋友們也嘉許我們這種決議。史密斯將軍有一位書記官滑稽地對我說：『我不喜歡你們的這些人，也不願意幫助你們。但我應當怎樣辦呢？你們在急難的時候幫助了我們。我們怎好向你們下手呢？我每每竊願你們像英人罷工者那樣用武力，這樣，我們便馬上曉得怎樣處置你們。但你們連仇敵都不肯傷害你們。只願以自己喫苦來博取勝利，永遠不肯超過你。』

們自己所定的義俠和禮貌的範圍。這樣一來，我們便束手無策了。』史密斯將軍也曾有過同樣的表示。

靈力靈運者以義俠待人，這並不是第一遭。當北部海岸的印度工人罷工的時候，如果所有已經割下來的甘蔗，不運到製造所去壓碎，埃次康山的糖商便要受很大的損失。於是一千二百個印度人回去作工，直到完竣以後，才去加入他們其他罷工同胞的隊伍。還有一次，杜爾本市政廳的印度工人罷工的時候，那些在市裏擔任衛生工作或在醫院侍候病人的，都被送回去，他們也欣然復職。如果衛生事務停頓了，而醫院裏的病人也沒有人侍候，市內或致有瘟疫發生，病人也失了醫藥的照應，這樣的事，無論那一個靈力運動者都不願意它發生的。所以這一類的員役，便免其參加罷工。靈力運動者在採取每一個步驟的時候，必須想到對方的地位。我見得這許多義俠的行爲，在各處都留了一個目不能見，但很有潛力的印象，並且增加了印度人的聲譽，預備了一種促成解決的空氣。

爲哈定治公爵所派，乘着專船來的饒伯森爵士 (Sir Benjamin Robertson)，將於我和安得烈到普力托勒去的時候到達。但我們沒有等候他便起程，因爲我們要在史密斯將軍所定的那一天到達普力托勒。其實也沒有等他的理由，因爲最後的結果無非是惟力是視。

安得烈和我到了普力托勒。但去見史密斯將軍的只是我一個人。將軍的心思正用在鐵路罷工

的事情上。這罷工的性質很爲嚴重，所以聯邦政府宣佈戒嚴。歐人的工人不但要求工資，而且想把政權拿到自己的手裏來。我與史密斯將軍第一次晤見，時間是很短的，但我見得他已不像遊行開始時那樣趾高氣揚了。在那時，將軍差不多連話都不肯和我講。那時靈力運動的威嚇是與現在無異的，但他不肯進行談判。現在他是准備和我磋商了。

我們於是成立了一個臨時的協定，而靈力運動是最後一次停止了。好些英國友人爲此而欣悅，並應允幫忙我們作最後的解決。叫印人同意於這個協定是一件很難的事。有人引一九〇八年那件滑稽的事來提醒我說：『史密斯將軍曾一度失信於我們，而你並沒有因此而得教訓，還去信任他，這是多麼可惜的事！他這次還是要失信的，到那時，你若提議恢復靈力運動，誰還來聽你呢？難道我們可以隔些時便去入獄一次，而每次總因爲相信了一個輕誓背約的人而準備失敗麼？』

我知道這些議論，必定會有人發出來，所以我聽到以後並不爲奇。無論靈力運動者有多少次受人欺騙，他總是信任對方的，只要沒有使他信任的充分理由。在靈力運動者痛苦與愉快是一樣的，因爲他不會只因畏懼受苦，便毫無根據地不信任他人。從另一方面說，因爲他只靠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也不以受對方的欺騙而介意。即使迭次被騙，他仍然是繼續着信任，因爲他相信真理的力量可以因此充實起來，而勝利也可計日而待。在各處都召集會議，我後來竟把印人說服了，叫他們贊成協

定裏面的條文。印人現在對於靈力運動的精神更能了解。在這一的協定，安得烈是個調人，也是證人。如果我堅執着不肯接收這個協定，印人便不免受人指謫，而以後六個月中所得到的勝利，也就會困難叢生了。梵典的作者說：「饒恕是勇者的裝飾，」靈力運動者抱着這樣的態度，永不叫人在他們的身上有找出錯處的機會。不信任是軟弱的一個標記，而靈力運動是包含着摒除一切軟弱，也就是摒除一切不信任的意義。敵人不是要消滅的，是要折服的，因此，當然沒有不信任的餘地。

當鬥爭完竣的時候，高哈理是在英國。他給我送信，叫我到那裏會他。所以在一九一四年七月，我便同嘉倫白嘉雪脫比乘船到蘇安頓去。

我們在馬狄拉聽說大戰隨時可以爆發。我們正進英國海峽的時候，知道戰事的確開始了，於是船便停了一些時候。將船從沿着海峽安設的水雷當中拖出來，是一件困難的事，所以差不多用了兩天才到蘇安頓。

宣戰是在八月四日，我們是六日到倫敦。

我到英國後，知道高哈理被困於巴黎。他爲着健康到那裏去，因爲巴黎和倫敦間的交通斷絕了，所以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可以回來。我不願意沒有見到他便回去，而又沒有人確知他何時可到。

我在這當中有什麼可以幹的呢？我對於大戰有什麼責任呢？與我同時入獄的一個靈力運動者

雅答占尼亞那時正在倫敦學習法律。因為他是靈力運動者最優秀的一個，所以他被派到英國去，以便取得做律師的資格，回到南非去代替我。（註一）

我同着他，並由他的介紹，與日非拉麥達博士和其他在英國讀書的人會商。經過商議之後，我們召集了一個在英國和愛爾蘭的印度居留民大會。我將我的意見向會中陳述。

我覺得僑居英國的印度人應當在戰爭裏有他們的份。英國的學生已經向軍中投効，印人不應當落在人後。這個主張很有人反對。他們說：印人與英人有天淵之別。我們是奴隸，他們是主人。主人有急難的時候，奴隸怎能和他合作呢？奴隸豈不應當乘主人之危以求他的自由麼？這番議論我當時並不以為然。我知道印人和英人的地位彼此不同，但我不相信我們已經淪為奴隸。我覺得錯誤在英國各個官員方面的，比在英國制度方面的多，而且我們可以用愛將他們感化。如果我們想藉着英人的幫助與合作來增進我們的地位，我們便應當在他們有急需的時候，博得他們的同情。雖然制度是錯誤的，我當時並不以為它是不可忍受的，如同我今日那樣感覺。但如果我今日對那制度失了信用，因而不肯和大英政府合作，當時那些朋友，不但對制度失了信用，就是對官員也失了信用，他們又怎能

（註一）雅答占尼亞不幸早死，南非的靈力運動因而受極大的損失。

和它合作呢？

反對我的朋友，以為這正是大膽宣佈印人的要求和改進印人的地位的時候。但我想我們最好在這個時候乘人之危；在戰爭的期內，不拿我們的要求，當作一種要脅，於事理較為洽當。因此，我照着原議，請凡願意參加的，都來報名充義勇員。響應的人很多，差不多各省各宗教都有代表。

我寫信給克勞公爵，把這些事實告訴他，並表示我們願意受救護工作的訓練，如果這是接收我們這個請求的先決條件。克勞公爵經過一點遲疑以後，便接收我們的請求，並因我們肯在危急的關頭，為帝國服務，表示謝意。

倫敦在這些日子的狀況是很可觀的。大家沒有驚惶的樣子；每一個人都盡力幫忙。健全的成年人開始受戰鬥員的訓練，但老弱的人和婦女可以作什麼呢？如果他們願意做的話，他們有許多事情可做。所以他們便去為受傷者縫製衣服及裹傷布這一類的東西。

（編者按：甘地因為患胸膜炎，須到溫帶養病，於一九一四年十二月離開英國回到印度去。）

甘 地 自 傳

第十七章 返 國

我沒有到達印度以前，從腓力斯起程的那一隊人已經先到了。照預定的計畫，我是在他們之前的，但因為我要在英國策劃關於戰爭的工作，預算好了的事情便完全被推翻。我既曉得將無期地被阻於英國以後，便想到覓地安置腓力斯那一隊人的問題。若是可能的話，我願意他們都住在印度過他們在腓力斯所過的生活。我不知道有什麼真理學院（ashram）（註一）我可以主張他們去，所以我給他們打電報，叫他們去見安得烈，聽他為他們佈置。

他們最先把安頓在一個印度教革新派的學校，這個學校的校長，麻哈瑪（Mahatma，按此即印人對甘地的稱謂，或譯作聖雄）文殊蘭待他們如同自己的兒女一樣。以後他們就被送到善提尼吉旦的真理學院（Shantiniketan Ashram）。在那裏，詩哲太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和他的同人都用殷勤的愛心來招待他們。他們在這兩處所得的經驗，與他們和我都有好處。

我嘗笑着對安得烈說：詩人，（按指太戈爾）文殊蘭，和露特拉，就是他的三位一體。在南非的時

候，他時常談起他們，娓娓不倦。我在南非許多甜美的回憶中，安得烈關於這偉大的三位一體週而復始的談話，可算是最甜美，最活躍的。因此安得烈叫腓力斯那批人也和露特拉發生關係。露特拉是沒有真理學院的。但他有一個家；他完全把它給腓力斯那一家人使用。他們到了一天以後，他和他家裏的人使他們處處感到便利，不覺得離開腓力斯而有所失。我在孟買登岸後，才曉得腓力斯那一批人是在善提尼吉且，所以我見了高哈里以後，便急於與他們晤見。

我到孟買的那一刻鐘，高哈里便通知我，說總督願意見我，並說照規矩我最好在離開普拿以前來見他。於是我晉謁總督。寒暄以後，他說：

「我向你請求一件事。我希望你無論何時想對政府有所舉動，都到這裏來見我。」

我回答說：「我很容易應許你，因為我是個靈力運動者，照例要曉得對方的意見，在可能範圍以內，設法對他諒解。我在南非是照着這規矩行事的，在這裏我也要這樣做。」

威令頓公爵向我道謝，並說：「你什麼時候來見我都可以；你可以見得政府並非故意與你們爲難。」

（註一）真理學院爲宗教大師訓練生徒，砥礪德行，兼作個人修養的地方。

我回答說：「我是因爲有了這種信仰，才能支持下去。」

在此事以後，我到了普那去。我不能把關於這個寶貴的時期所有的回憶敘述出來。高哈理和印度服務社 (Servants of India Society) 的社員以充溢的友情來待我。他請他們與我晤見；我和他們坦白地談論到各種的問題。高哈理很希望我加入服務社，我也有同樣的思想。但會員們覺得，我的理想和做事的方法，與他們的很不相同，讓我入會或有不便之處。高哈理却相信，我雖然堅持着自己的主張，我還是願意，而且可以容納他們的主張。

「但他們還沒有曉得你是抱着妥協的態度的。」他說，「而他們對於他們自己的主張又是固執着不肯放鬆的。我希望他們可以接納你，若不能的話，千萬請你不要想，這是因爲他們不敬愛你的原故。他們不願意冒險，因爲他們恐怕妨礙了他們對你的尊敬。但無論你是否正式入會，我是一樣看待你的。」

我把我的意見告訴高哈理。無論我是否做會員，我願意辦一個真理學院，與腓力斯那一家人住下，地點最好在古查拉附近；因爲我覺得我爲古查拉服務，便是間接爲國家服務的最好辦法。高哈理贊成我的意見。他說：「你的確應當這樣做。無論你談話的結果如何，真理學院的經費，請你務必讓我籌劃。這學院我當它是自己的。」

我心中異常快慰。我既不必負籌款的責任，在遇見困難的時候，又準知有人來指導幫忙，這是一件很可欣幸的事。

於是他把德夫博士請了來，囑他在服務社的賬簿內給我開一個戶頭，把我為學院所用的款項和其他的公費隨時給我。

我從這裏到了善提尼吉旦。師生們以誠摯的友誼來接待我。歡迎會是質樸、藝術、和愛心三者兼而有之的一個盛會。

腓力斯的一家在善提尼吉旦都分別得了住處。麥甘樂甘地做他們的首領；他的職務是叫人嚴守這個腓力斯真理學院的規則。我見得他的愛心、知識、和忍耐，使他在善提尼吉旦芬芳四射。

安得烈和皮耳生都在那裏。在那些孟加拉的教員中，有幾個和我們比較接近。照着我自己的習慣，我很快地和師生們合在一起，和他們討論自助的問題。我向教員們提議：如果他們和學生們都不僱用廚子，自己做飯，教員們便可以按着學生們身體上和道德上的需要，管理廚房，這便可以叫學生們從一個自助的實例上得些觀感。他們當中有一兩個搖首不以爲然。也有些竭力贊成我的提議。學生們歡迎這個辦法，也許是由於他們好奇的天性。於是我們開始試驗。我請詩人發表意見；他說他不介意，祇要教員們贊成。他對學生們說：「這個試驗裏面藏着自治（Swaraj）的鑰匙。」

皮爾生爲要使這個試驗成功，逐漸將身體也弄壞了。他把全副精神放進去。他組織一批人去切菜，另一批人去洗米。別的人擔任廚房和四週的潔淨。看見他們拿着鋤鏟去工作，使我心中愉快。但若希望師生們以如魚得水的精神從事勞力的工作，那未免是太過了。他們爲此事每天有討論。

有些人很早就露出倦態。但皮爾生是一個孜孜不倦的人。我們常見他帶着笑容，在廚房裏面或附近做着什麼事。他自願擔任把較大的器具弄乾淨。有一班學生在從事這件工作的人面前奏着說：『雪陀』（註一）使他們忘却他們的辛勞。大家都高興地做事，使善提尼吉旦像蜂窩一般的忙。

我本想在善提尼吉旦住些時候，但天意却不許我這樣做。我在那裏不到一個禮拜，便接到一個從普那來的關於高哈理逝世的電報。善提尼吉旦的人都哀傷逾恆。他們全體向我致唁。他們在真理學院的神殿內舉行一個特別的會來追悼這位國殤。這是一個莊嚴的典禮。同日我與我的妻和麥甘樂到普那去，其餘的人仍在善提尼吉旦。

安得烈與我們同行，到布爾溫爲止。『你想印度也有可以舉行靈力運動的一天麼？』他問我，『如果有，你想是什麼時候？』

『很難說，』我說，『在一年之內，我不打算做什麼。因爲高哈理會叫我應許他在印度旅行，藉廣聞見，並在這學習期內，不發表任何關於國事的意見。即使過了一年以後，我也並不急於說話，或表示

什麼意見，所以我想在五年以後，沒有舉行靈力運動的必要。」

到了普那舉行喪禮以後，我們不期而討論到服務社的前途，和我是否應當加入的問題。這個入社的問題是很難解決的。高哈理在生的時候，我不必請求入社。我祇須服從他的意見，而這也是我所願意的。我現在既投身於波濤洶湧的印度公共生活裏，便不得不有一個可靠的舵工。從前高哈理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而我在他蔭庇之下，也覺得安穩。如今他既去世，我只得自己去奮鬥，而我也覺得應當請求入社。

那時社員多數在普那。我向他們遊說，設法消除他們對我的懼怕。但我看得出來，他們不是一致的一部分人贊成我入社，另一部分竭力反對。我知道這兩派人對我的友愛並無軒輊，但他們忠於服務社的心似乎更大一點，至少不在愛我的心以下。因此，我們的一切討論，都只限於原則上的問題，而不是意氣上的爭辯。反對我的那一派說：在重要的事項上，他們與我彷彿南轅而北轍。他們恐怕我入會以後，服務社原來的宗旨便要大受影響。這是過於他們所能忍受的。我們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以後便散開，等後來再作決定。

(註1)「雪陀」(Sitar) 為印度一種絃樂。

我回家的時候，心中很爲躊躇。若祇有少數的人贊成我入社，是不是對的呢？這個舉動是否將使我不忠於高哈理呢？我很清楚地見得，社員們對於是否許我入社的問題，意見既然如此紛歧，我最好把我入會的請求撤消。這是我爲忠於服務社，忠於高哈理所應當採取的行徑。這是在一剎那間決定的。我寫給沙特烈先生請他不要繼續開會。那些反對我的很爲此表示欣慰。這個決定使他們不致陷於進退維谷的地步，並使我們的友誼益加親切。我把入社的請求撤消，反使我變成一個實在的社員。我的經驗告訴我，我不做一個正式的社員更爲恰當，反對我的人實在是有道理的。經驗也證明，我們關於原則上的意見是極不一致的。但這些不同之點既經認識以後，我們並不因此就生疏起來，或發生什麼嫌怨。我們仍舊像兄弟一樣，而那服務社在普那的家，也變成我的一個聖地。

雖然我沒有正式入社，我從此以後，可以說是一個精神上的會員。精神上的關係比物質上的關係更爲寶貴。和精神分離的物質關係，好像沒有靈魂的軀殼。

今年，一九一五，正是金巴賽會（註一）之期。這是每十二年一次在赫華舉行的。我本來沒有多少意思要參加這個會，但我要到高魯古學院去晤見文殊蘭。高哈理的服務社派了一大隊人到賽會裏工作，關錫魯是他們的領袖，德夫醫生是他們的醫官。他們請我派腓力斯的人參加，因此麥甘樂甘地已先我而行。

到赫華去的旅程是特別難堪的。有時車廂裏面沒有燈。過了撒哈倫布，我們便被裝在運貨和牲畜的車子內。這些車子是沒有蓬的：上面是酷烈的太陽，脚下是灼人的鐵板，我們差不多被烤熟了。在這樣的途中，旅客的口渴的苦況是可想而知的，但正宗的印度教徒在這時候還不肯喝水，如果那水是回教人的。他們要等到有了印度教徒的水才喝。我們要注意，這樣的印度教徒在有病的時候，醫生叫他們喫酒或牛肉菜，或是一個回教或基督徒的藥劑師給他們水喝，他們都毫不遲疑，連問也不問！

德夫醫生掘了一些坑子做廁所。他要僱用糞夫來做清除的工作。這正是腓力斯那隊人可以做的事。我向德夫醫生提出來，他便高興地答應了。但實在做事的是麥甘樂甘地。我的任務是專坐在帳篷內，和許多未見我的信士討論宗教問題。我連一分鐘的餘暇都沒有。因此，我在赫華可以見到南非的鬥爭給予全印度一個多麼深刻的印象。

但這並不是一個可羨的地位。我彷彿是陷在魔鬼和深淵之間。在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我是受着國內幾千百萬人同受的艱苦，如乘坐三等車之類。但我一到了有人認識我的地方，他們就把我包

(註一)金巴賽會 (Kumbha fair) 是印度教徒到恆河淨身的一種宗教會集。

圍起來，於是我又成爲一個「達善」(註一) 狂的犧牲者。這兩種情形，那一種更可憐，我是無法決定的。

金巴賽會的期到來了。我到赫華來並不是抱着信士參神的目的。我從來沒有想到以朝參爲進德之助。據說有二百萬人在那裏。他們未必都是僞善者，或爲着遊玩而來。無疑地，他們當中有無數的人，是爲着功德或自潔而到那邊去的。這樣的信仰，對於人的靈性，究竟有多少提撕的力量，那是很容易斷定的。因此，我終夜作深沉的思索。這一班虔敬的人，生在僞善之世，出汗泥而不染，在造物主的面前，是沒有愆尤的。如果到赫華來，本身就是一件罪過，我便應當公開反對這件事，並在賽會的日子離開赫華。如果不然，我便應當有一種自動的苦行，爲那裏流行着的罪惡而懺悔，並藉以潔淨我自己。

這於我是很自然的，因爲決志嚴守紀律是我的生活的基礎。我想起許多人優渥地接待我，都未免使他們添了許多無謂的麻煩。我因此決定限制我的飲食，並在日落以前喫晚餐。我深信，如果不是這樣限制自己，將來接待我的人，一樣的要感覺許多不便，這樣，我便不是服役人，而是叫人服役我。所以，我決定在二十四小時以內，食品不過五事，入夜後不進食。這個辦法的困難，我是澈底的思想過的。但我不願意使它有什麼破綻。假如我生了病，而我把藥物也當作五樣食品中的一樣，這會使什麼事情發生呢？我最後決定，如無如何，不要有什麼例外。在這十五年中我總是守着這個願。這是一種嚴

厲的試鍊，但我可以證明它也是我的保衛者。它使我的壽數增加了幾年，並使我免去許多疾病。到了高魯古學院，晤見身體魁偉的文殊蘭，使我心中釋去重負。學院的寧靜和赫華的喧鬧，做成一種奇妙的對照，叫我馬上就感覺出來。麻哈瑪（指文殊蘭）以充溢的友愛待我。這班奉行婆羅摩刹利的人處處都很週到。我在這裏初次會見南馬達治院長。我立刻見得他是一個多麼有力量的人。我們對於幾種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們的友誼不久便深摯起來。我和南馬達治及其他的教授用很長的時間來討論學院裏添設實業教育的問題。臨別的時候，我們真是依依不捨。我從那裏到了喜列希吉士。

我到了以後，有許多遊行的僧人來看我。其中的一個特別和我接近。腓力斯那幫人也在那裏，他們引起他許多的問話。我們談到宗教，他曉得我對於宗教有甚深的感想。他看見我從恆河沐浴回來，光着頭，也沒有穿上身的衣服。他因為我頭上沒有「飾嘉」（按卽束着的髮）身上又沒有聖絲，甚覺難過。他說：

「你是一個有信心的印度教徒，而沒有束髮，也不帶聖絲，我看見甚覺難過。這是印度教的兩種

（註一）達善（Darshan）是瞻仰一個神或聖者的豐采之謂。

外表的象徵，每一個印度教徒都應當有的。」

關於這件事是有一段歷史的。我在十歲大的時候，看見婆羅門教的孩童們將成串的鑰匙，用聖絲拴住，拿來玩弄。我頗艷羨他們。當時加地亞華的維殊亞階級的人（譯者按，即第三階級，以務農爲業，甘地一族屬之）還沒有帶聖絲的習慣。但那時有人提倡一種運動，強迫前三個階級的人遵守這個規矩。結果，甘地族人裏面，有幾個戴了聖絲。有一個婆羅門教徒把絲送給我們，雖然我沒有用鑰匙的機會，我也要了一串來玩弄。後來絲壞了；我不記得我對它有什麼留戀。但我沒有找新的來替換。我長大以後，在印度和南非都有人以善意勸我重戴聖絲，但沒有什麼成功。我的理由是這樣：如果首陀階級（Shudras）按即第四階級，以勞工爲業，是不許它戴的，那末其他的階級有什麼權利可以戴呢？

我在首程赴英的前夕，把『飾嘉』解下來，因爲我恐怕我光着頭的時候，叫人取笑，並且——我當時是這樣的想——在英人的眼中，將被看爲一個野蠻人。老實說，這種怯弱的心理愈來愈厲害，竟使我在南非的時候，叫我的堂弟察甘樂甘地也把『飾嘉』取消。他戴飾嘉是爲着宗教的原故。我怕它會影響到他的公共事業，所以不管他是否難過，要他把它放棄。我把這一段歷史向那僧人和盤托出，並說：

『我不要戴聖絲；因為無數的印度教徒，雖不戴聖絲而仍爲印度教徒，所以我也沒有戴它的必要。再者，聖絲本來是精神重生的一種象徵，戴之者應先決志追求一種更高尙更清潔的生活。在現在的印度教和印度裏面，戴聖絲的人，是否都有這個決心，實在是一個疑問。除非印度教能將『不可接觸』那個規矩廢除了，把一切地位高下的區別取消了，把其他許多在裏面蔓延着的罪惡和虛偽擺脫了，不然，印度教徒就沒有帶聖絲的權利。所以我現在是反對戴聖絲的。但你勸我戴『飾嘉』的話，是值得考慮的。』

那僧人不以我關於戴聖絲的意見爲然。我認爲不應當戴聖絲的理由，在他以爲正證明我應當戴。直到現在，我的態度差不多還是一樣。我以爲只要各派的宗教一日存在，每一教便有採用特殊的外表的象徵的必要。但如果拿象徵當作靈物來崇拜，或拿它來證明自己的宗教的優越，那便應當把它放棄。

至於『飾嘉』我是因畏怯而放棄的，所以我同朋友們商量過以後，便讓它再長起來。

當我偶爾經過亞米達哈的時候，有許多朋友勸我在那裏住下。他們自告奮勇籌款，爲我蓋一所真理學院和一所住宅。我對於亞米達哈好像有一種夙好。我是一個古查拉人，所以我想我對於國家最大的服務是要用古查拉語言來做媒介的。並且因爲亞米達哈是古代手工紡織業的一個中心點，

所以若要恢復鄉村手工紡織業，這似乎是一個最適宜的地方。那個城是古查拉的首都，因此，那裏的富人的資助，希望可以比別的地方來得更容易。我自然和亞米達哈的朋友討論到『賤民』那個問題。我聲明我要利用最後的機會，為學院招一個『賤民』的學生，祇要他具備了其他的資格。

真理學院就是這樣成立的。我們同在一個地方喫飯，並盡力像一家人那樣生活。我們開辦了不到幾個月的功夫，就遇到一種沒有想到的試鍊。我收到達嘉寄來的一封信，說：『一個謙卑而誠實的賤民家庭願意加入你們的真理學院，你可以接納他們嗎？』

我心中有點為難。我沒有想到怎麼快就會有賤民的家庭請求入院。我馬上把這封信給院內的同人看。他們都歡迎這一家人來。我於是寫信給達嘉，告訴他我們願意接納這個家庭，如果他們能夠遵守學院的規矩。那個家庭的人是杜大悲和他的妻坦妮本。還有一個正在學走的女兒，名叫樂雪密。杜大悲曾在孟買當教員。他們都願意遵守院規，於是就入了院。但這件事使幫助我們的朋友們發生了一點鼓噪。最先的一個困難，是關於井的使用。這個井的管理權有一部分是屬於屋主的。管理吊桶的人反對說，桶裏滴出來的水要沾污他。於是他便辱罵我們，並侵犯了杜大悲。我吩咐每一個人忍受着他的嫚罵，但要照舊去汲水。那人看見我們不還罵他，便愧怍起來，以後就不再麻煩我們了。但一切的資助現在都被停止了。同時還有一個謠傳，說有人提倡對我們斷絕社交的關係。這一切我們都準

備好了。我告訴我的同伴，如果我們被抵制，得不到普通應用的東西，我們還不要離開亞米達。我們甯願到賤民的區域裏去，用我們所能得到的勞力工作，來維持我們的生活。

事情是逐漸的發展下去，等到有一天麥甘樂甘地給我一個警告，說：『我們的錢都用完了，下個月便不能支持下去。』

我淡淡地回答說：『那麼，我們便到賤民的區域裏去。』

我遇見這樣的難題，並不是第一次。在所有這樣的遭遇裏，上帝總是在最後的一刻幫我的忙。麥甘樂給我警告以後的不久，一個小孩走來告訴我，說有一位客人在外面坐在車子裏，等着見我。我於是出去見他。『我要給你們這個學院一點幫助，你願意接收麼？』他問：

『當然的，』我說，『我承認我現在正在智窮力竭的時候。』

『我明天這個時候到這裏來，』他說，『你在不在這裏？』

『在的，』我說。他便走了。第二天，恰在約定的鐘點，汽車走近我們的地方，喇叭響起來。兒童們走來給我報信。那位客人沒有進來，我出去見他。他把價值一萬三千羅比的紙幣放在我的手裏，便開車走了。我從來沒有期望得到這樣的幫助，而這個幫助人的方法，又是多麼的新鮮！那客人從前沒有到過學院。據我記憶所及的，我祇會過他一次。沒有晤見，沒有問訊，祇給了幫助便走了！這於我是一個絕

無僅有的經驗。這一筆款，使我們把遷到賤民區域裏去的事暫時攔起來。我們覺得，在一年以內我們是很安穩的。

外面的風波平息以後，學院裏的風波又起來。雖然在南非的時候，賤民的朋友，常到我這裏來，同住同食，我的妻和其他的婦女似乎不大喜歡在學院裏收容他們。我的耳目很容易看出，她們對於坦妮本雖不是憎惡，至少也是冷淡。經濟的問題倒沒有使我發愁，但這內部的風潮却是過於我所能忍受的。坦妮本是一個尋常的婦女。杜大悲是一個稍稍受過教育而頗有見地的人。我喜歡他的耐性。有時他也發脾氣，但大致而論，他是很能容忍的。我懇求他忍受較小的凌辱。他不但答應了，而且勸他的妻也這樣做。

我們接收了這一家人，使學院得了一個很好的教訓。我們一開頭便向世界宣言，說我們不能容許賤民制度的存在。要幫助學院的人既然曉得我們的態度，這方面的工作就簡單得多了。學院的經費日漸增加，而捐助的人大都是正宗的印度教徒。這件事也許可以證明賤民制度已經從根本動搖了。自然還有許多其他的證據，但印度教徒的優秀分子肯幫助一個甚至讓賤民與別的人同食的學院，這個證據已自有相當的力量了。

我從前在南非曾經應付過的一個問題，現在在印度也發生了。所謂訂約工人是那些訂約到海

外去做工五年的人。照着一九一四年的史密斯——甘地協定，到奈托爾去的移民的三鎊稅是廢除了，但從印度來的一般移民的問題還是要應付。

一九一六年三月，馬拉維雅治在帝國立法院提出一個廢除訂約制度的動議。在接收這個動議的時候，哈定治伯爵宣言，他曾『得到帝國政府在相當時期內廢除這個制度的應許。』但我覺得這樣一個空空洞洞的應許，不能使印度滿意。我們應當鼓吹將那制度馬上廢除。印度人所以容忍了這個制度，完全由於忽略。現在大家可以用有效的方法來攻擊這個制度的時機到了。我會見一些領袖，在報紙上作文字的宣傳，使輿論能夠實在的贊成馬上廢除的主張。這是不是靈力運動一個很好的題目呢？我以為無疑地是。在這時候，總督對於『終必廢除』這一句話的意義，已不再事隱諱。據他說，這是『在一個使更代的辦法得以成立的合度時期內』廢除之的意思。

因此，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馬拉維雅治便要求提出一個立刻廢除的動議的許可。柴士福伯爵不肯答應這個請求。我遊行全國，去鼓動大眾的時期到了。

我沒有開始工作以前，我想應當先去拜會總督。於是我請求晉謁。他馬上許可了。馬非先生（現在是馬非爵士）是他的私人秘書。我和他有密切的接觸，與柴士福伯爵也談得投契，雖然他祇答應幫忙，而沒有切實的代表。我的遊行是從孟買開始。耶向傑貝德擔任帝國市民聯合會的名義召集

會議。討論的題目是規定一個時期，請政府在該時期內廢除訂約制度。提議共有三種：（一）在五月三十一日廢除；（二）於可能的最短期內廢除；（三）立刻廢除。我是主張限期廢除的，因為如果政府在期內沒有答應我們的請求，我們便可以決定怎樣應付。沙馬爾達爵士（印人——譯者註）主張立刻廢除。他說：『立刻』是比五月三十一日更短的一個時期。我說：人民未必懂得『立刻』這兩個字的意義。如果我們要他們做些什麼，我們必須用一句更切實的話。『立刻』的解釋是隨人而異的，——政府可以這樣解釋，人民可以那樣解釋。至於『五月三十一日』這是沒有人能誤會的。如果到那一天政府沒有做什麼，我們就可以進行別的。我們於是決定五月三十一日為政府宣佈廢除訂約制度的最後日期。這個提案在公共會議內通過；印度各處的會議也隨着把它通過了。

貝德夫人費盡力量，組織一個婦女請願團去見總督。從孟買來的婦女中，我記得參加請願團的，有大達夫人和新近別金女士。請願團有很大的效力。總督的答復很使他們鼓舞起來。

經過此事以後，我便到嘉那基，加爾吉達和其他的地方。各處的聚會都很好，人民也異常熱烈。運動開始的時候，我沒有想到有這樣的情況。

在那些日子，我時常是獨自旅行的，因此得到許多奇異的經驗。偵緝部的人員是隨時都尾隨着我。但因為我沒有什麼隱秘，所以他們也不來侵犯我，而我也不給他們什麼麻煩。幸而我那時候還沒

有得到麻哈瑪 (Mahatma, 卽聖者或大人物) 那個名號, 雖然認識我的人, 見了我也時常大聲呼喊這個名字。有一次偵探們在幾個站都來攪擾我, 要我的車票來看, 把號數記下。我自然很迅速地回答他們所有的問題。同行的旅客把我誤認爲一個『薩都』 (Sadhu) 或一個『法基爾』 (Fakir) (註一) 他們看見我在每一個站都受了騷擾, 便代我抱不平, 對偵探們辱罵。『爲什麼你們無端來攪擾這個可憐的薩都呢?』他們這樣提出抗議。『不要把你的票給這班無賴看!』他們對着我說。我溫和地對他們說:『把票給他們看, 並無麻煩。這是他們的職務。』客人們還不满意; 他們越發對我表示同情, 並竭力反對對無辜的人的這種待遇。

其實偵探們並不是一種麻煩。真正的苦惱是乘着三等車旅行最苦的經驗是從拉荷到德里。我是從加拉基經拉荷到加爾吉達。在拉荷是要換車的。在車上找不到座位。客人都滿了, 能進去的是憑着體力, 有時如果門關了, 還是從窗口扒進去。我要在爲聚會而定的日期到達加爾吉達。如果我乘不着這班車子, 我便不能按時到了。我上車的希望差不多是絕了: 沒有人願意接納我。一個脚夫看見了我的窘狀, 過來對我說:『你給我十二安那 (Annas), 我便替你找一個座位。』『可以的,』我說, 『如

(註一) 以化緣修行的人。

果你會給我找到座位，我就給你十二安那」這青年從這節車走到那節車向客人懇求，但沒有人理他。車將近開的時候，有些客人說：「這裏是沒有座位的，但如果你願意，你可以把他推進來。他是要站着的。」『好不好？』那少年腳夫問。我立刻答應了，他便從窗門把我的身體塞進去。我是上了車了，腳夫也得他的十二安那。

晚間才是一件苦事。別的客人都對面坐着。我站了兩小時，手是握着上層臥舖的鍊子。這時候，有的客人不斷的來攪擾我。『爲什麼你不坐下？』他們向。我。沒法給他們解釋，說我沒有地方坐，但他們仍不容我站着，雖然他們自己是伸直身體，臥在上層臥舖上。他們這樣攪擾我，並不覺得厭倦，我總是溫柔地回答他們，也不以爲嫌。最後，他們軟化了。他們有人問我的姓名，我告訴了他們，他們便覺得慚愧。他們向我道歉，並讓出地方給我。於是我的忍耐得到報酬了。我是疲倦不堪，頭已經暈眩起來。上帝在我最需要的時候，幫助了我。

我是這樣胡亂地到了德里，從那裏再到加爾吉達。加爾吉達會議的主席馬哈拉查做了我的東道主。這裏的人，正如嘉那基的一樣，是無限的熱心。有幾個英國人也參加那個會。

五月三十一日以前，政府宣佈從印度出國的訂約移民停止了。

我抗議這件事的第一個請願書是在一八九四年草擬的。我那時希望這種「半奴隸制」——這

是漢達爵士(Sir W. W. Hunter)對於這種制度的稱謂——有一天可以終止。現在這工作是完成了。從一八九四年開始的時候，就有許多人幫忙，但我不能不說，我們那準備着要舉行的靈力運動實在促進了它的成功。

第十八章 杉伯蘭

杉伯蘭是着那嘉王（註一）的土地。那裏現在遍地都是芒果林，正如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它是滿植藍靛的。杉伯蘭的佃戶照法律規定，在每二十分地中，要拿三分來給地主種藍靛。這制度名叫『田家達』。

我要承認我從前連這名字也沒有聽見過，至於杉伯蘭是在什麼地方，我就更茫然了。我對於藍靛的種植完全是門外漢。我會見過小包的藍靛，但沒有夢想到它的種植和製造是要經過幾千個工人辛苦的勞力的。蘇克拉就是受着壓制的這幫人中的一個。他充滿着熱誠，要為幾千受苦的同工洗滌這藍靛的污點。我到樂腦去赴一九一六年大會的時候，他一把抓住我。『法基爾巴布（註二）要把我們的苦况告訴你。』他說，同時叫我務必到杉伯蘭去。所謂法基爾巴布並非別人，仍是普拉薩。他在杉伯蘭做了我的可敬的同工者；他現在是比赫一切公共事業的主腦。蘇克拉帶他到我的帳篷來。他那時穿的是黑絨衣服，並不使我注意。我想他必定是一個欺騙無知農民的律師。我從他那裏聽到一

些關於杉伯蘭的狀況以後，便照我平常的規矩回答他，說：『我沒有親眼看見那裏的情形以前，不能發表什麼意見。請你在大會裏提出議案，但暫時最好把我放開。』蘇克拉自然要從大會裏得到幫助。普拉薩提出對杉伯蘭人民表示同情的議案，並經一致通過。他要我親自到杉伯蘭去看看農民們的苦況。我告訴他，我要把杉伯蘭放在我的旅程之內，在那裏住一兩天。『一天就夠了，』他說，『你可以親眼看見那裏的狀況。』我從樂腦到了哥波去。蘇哥拉跟着我去。『杉伯蘭離這裏很近，請你去住一天罷。』他這樣堅請我。『請恕我這一次，』我說，『但我答應稍遲一點去。』我回到沙巴麻地的宗教學院去。那隨處都有他的腳踪的蘇哥拉又在那裏。『請你定日期罷，』他說。『好的，』我說，『我某日在加爾吉達，請你那時候來見我，與我同去。』我不知道應當到什麼地方去，做什麼，看什麼。我沒有到加爾吉達以前，蘇哥拉早已到了那裏守候着。我於是被這位無知的，率真的，而同時堅決的農民所征服。一九一七年初，我們離開加爾吉達到杉伯蘭去，我們看來正像一對鄉下人。我連乘什麼車都不曉得。他帶我上了車，我們在一塊兒坐着，早晨到了伯特拿。

(註一) 耆那嘉王 (King Janaka) 是印度教傳說中的一個王，兼王者與哲人之德而有之。杉伯蘭位於喜馬拉山脚。

(註二) 法基爾即律師之意，巴布是一種尊稱。

這是我到伯特拿的第一次。我沒有可以留我住宿的朋友，我本以為蘇哥拉在伯特拿總有一些勢力。但我在路上多認識了他一點後，便曉得滿不是怎麼一回事。他什麼都不懂得。他認為是他的朋友的那些律師們，實在不是那樣的人。可憐的蘇哥拉，看來多少有點像他們的僕役。在他那樣的當事人和他們的律師的當中，好像有一道恆河，水漲時那般深的鴻溝把他們隔開。蘇哥拉把我帶到在伯特拿那裏普拉薩（註一）的住處去。他是到了普力或其他的去。屋裏有一個僕人，但他並不招呼我們。我帶了一點喫的東西，但我也需要一些菓子，我的同伴給我從市上買了來。在貝哈爾那地方，賤民的制度是雷厲風行的。僕人們正用着井的時候，我不能向裏面汲水，因為他們不知道我是屬於那一個階級的，恐怕我的桶裏的水要沾污他們。這一切我完全不以為奇，因為這些事我已習慣了。這些饒有意味的經驗，使我愈發敬重蘇哥拉的為人，同時也使我對他更加認識。我現在曉得他不能領導我；我必須自己作主。

我是在倫敦認識海格的；他那時正在讀法律。一九一五年——那是他當回教公會會長的那一年——我在孟買國民大會看見他的時候，他重叙舊交，並請我無論什麼時候到伯特拿去，都到他的家裏住。我想起這個邀約，便給他寫了一封信，把我此行的目的告訴他。他馬上乘汽車來，堅請我接受他的招待。我謝了他，並請他指導我趁最早的一班車到我的目的地去。他提議我先到慕賽華坡去。當天晚

上就有火車開到那裏，於是他送我上了車。

克伯蘭尼校長那時正在慕賽華坡。我自從到過喜特拉巴以後，便聽見他的名字。蔡特南醫生對我講過他的重大的犧牲，他的簡單生活，和他資助蔡特南醫生辦學院的事。他曾做過慕賽華坡國立學校的教授，我到那裏的時候，他剛辭了職。我給他打電報，告訴他我將到那裏；他同着許多學生到車站來接我，雖然那車是半夜到的。他沒有自己的寢室，是與莫甘尼教授同住的。這位教授事實上便變成我的東道主。一個國立學校的教授，收留像我這樣的一個人，當時實在是一件異常的事。

克伯蘭尼把關於貝哈爾，特別是狄爾赫那一個分區的窘迫情形告訴我，並給我大概指出我所要做的事情的困難。他和貝哈爾人已經發生密切的關係，並會對他們說過我此次來貝哈爾的使命。

普拉薩從達本格來了；那仁特立是從蒲利來的。這一次普拉薩使我對他得到了一種印象：我覺得他是謙卑的，真率的，良善的，還有一種超絕的信仰。這些都是貝哈爾人的美德，我心中爲此而欣悅。

我不久便和他與他的朋友們結成終身的友誼關係。他隨即把所有的事實告訴我，並從他的法律經驗上給我解釋農民們的待遇。

(註1) 普拉薩(Rajendra Prasad)後來變成甘地最忠實的弟子的一個，直到今日，還是如此。

他講完之後，我對他說：「農民們既然因為被摧殘而發生恐怖，法庭是不能幫助他們的。對他們真實的救濟是使他們解除懼怕。很明顯地，除非我們已經把『田家達』那個制度在貝哈爾廢除，我們是不能休息的。雖然我想在兩天之後，可以離開這裏，我現在曉得這件工作也許要佔去甚至兩年的功夫，而我在必要的時候也準備着化這樣多的時間。」

普拉薩的頭腦非常的冷靜。「我們可以盡力幫忙。」他安然地說，但請你告訴我們，你所要的是什麼樣的幫忙。」於是我們就坐談到午夜。「你們的法律知識，我是不大用得着的。」我對他們說：「但我需要書記和繙譯的幫忙。也許我們還要嘗到鐵窗的風味，但我雖然很喜歡叫你們冒這種險，你們必須要覺得你們是可以支持的，然後才去。不說別的，就是使你們變成書記，無限期的放棄你們的職業，也不是一件小事。本地的方言，我覺得難懂。我們不能爲任何的工作給予報酬。我們應當本着愛心和服務的精神來做事。」

普拉薩馬上明白我的意思，他現在輪流向我和他的同伴反覆問訊。他要探悉我所說的一切的含義：他們服務期限的久暫，人數的多寡，以及是否可以輪流工作，然後他又問律師們，準備犧牲到什麼程度。

到了最後，他們給了我這個保證：「我們有若干人可以做你所吩咐的任何事件。又有一些人，你

要他們和你多麼長久在一起都可以。至於要我們準備着入獄，那於我們是一件新鮮的事，我們可以盡力設法容納你的意見。」

我的目的是要調查杉伯蘭農人的情形，並明白他們對於種藍錠的商人所抱的不平是什麼。爲要達到這個目的，我便要會見幾千的農人。但我在開始調查以前，覺得必須曉得商人那一方面的事，並且須見分區的地方官。種植商人聯合會的書記坦白的告訴我，我是一個局外人，商人與佃戶之間的事，我管不着，但如果我有什麼意見，可以用書面提出。我客氣地回答說：我不以我自己爲局外人，如果佃戶們要我來調查，我當然是有權調查的。

我又去見地方官。他從事威嚇我，勸我馬上離開狄爾赫。我把這一切的事都向同工們陳述，並告訴他們，也許政府要阻止我進行這件事，並且我入獄的日期，或者比我所預料的更早些。若然，我最好在莫地哈理，若可能則在比地亞被捕，因此，愈早到那裏愈好。杉伯蘭是狄爾赫分區所屬的地段，莫地哈理是它設治的地方。蘇哥拉的住處是在比地亞的附近，那裏的佃戶是杉伯蘭最貧窮的。蘇哥拉要我見他們，而我也急於要這樣做。

我於是當天和同工們起程到莫地哈理去。我們聽說，離開約有五英里之遙，有一個佃戶被虐待。我們決定第二天早晨去看他。到時候，我們騎着一個象到那裏去。我要附帶補敘一句話，那就是：在杉

伯蘭騎象，正如在古查拉乘牛車一樣的尋常。我們還沒有走到一半的路，便有從警察署派來的一個差役說，署長傳語致候。我曉得他的意思，便上了那差役租賃了帶來的車子。他於是給我一個要我離開杉伯蘭的通知，隨即用車子送我到應當到的地方去。他要我給他一個得到通知的憑據，我便寫着說，我的調查沒有完竣以前，我沒有意思離開杉伯蘭。我跟着便接到一個傳票，要我第二天受審，爲的是不服從政府的命令。我整夜沒有睡，爲要寫信並給普拉薩指示機宜。關於那個通知和傳票的消息，像野火般散佈。聽說莫地哈里在那一天有空前的景象。哥樂巴布的家都充滿了人。幸而我在晚上已經把一切的事情都辦妥，所以對於羣衆便有方法去應付。我的同工們着實是我最大的臂助。他們忙着爲羣衆維持秩序，因爲我到那裏，他們便跟到那裏去。在我和官吏之間發生了一種友誼。從法律上來說，我對於一切通知都可以拒絕接收。但我沒有這樣做，我完全接受了，我對於官吏的行爲也是無可疵議的。他們於是見得我對於他們個人並無干犯之意，我祇是要對於他們的命令予以民事的反抗。他們因此便覺得安心，不來窘迫我們，反利用我們的幫助來維持羣衆的秩序。但他們眼見他們的威權已在動搖。人民在那一個時候對於刑罰已無所懼怕；他們新認識的那位朋友給他們運用愛的能力，而他們也服從了這愛的能力。

讀者應當記得，在杉伯蘭沒有人認識我。農人們都是愚昧的。杉伯蘭在恆河的極北，正在喜馬拉

山脚與尼泊爾接壤。它的地勢是與印度其他的部分隔絕的。在這一帶地方，差不多沒有人知道有一個國民大會。

我和同工們商量，決定不用國民大會的名義來做什麼事。我們是重工作而不重名義，求實質而不求幻影。國民大會那個名詞，是政府和它的支配者——種植的商人——所不喜歡的。在他們，國民大會無非是律師們爭吵的一個所在。國民大會並沒有派人到這裏來，為我們的工作有所準備。蘇拉哥自己又不能號召那幾千的農人。可以說，從來沒有人給他們做政治的工作。他們對於杉伯蘭以外的世界，是一無所知的。然而羣衆待我，正如待一個忘年的朋友一樣。這不是誇張的話：我這一次與農民們晤聚，就彷彿與上帝，與亞希薩與真理對面相見一般。我所以從人民得到我的稱號，（按指麻哈瑪）細想起來，無非因為我愛他們。而我的愛他們，又無非是我對於亞希薩不可動搖的信仰的一種表現。

那天在杉伯蘭的事，是我生平所不能忘記的。在農民們，在我，這都是一個可紀念的日子。照法律來講，我是受審判的人，但真正受審判的，乃是政府。政府的起訴人，法院的院長，和其他的官吏都覺得為難，不知應當從那裏下手。政府起訴人要求院長延期開審。但我起來反對，請院長不要延期，因為我要供認，我違背離開杉伯蘭的命令是有罪的。我又宣讀以下一段簡短的陳述：

「我請法庭許我簡略地陳述，我為什麼採取了似乎違背政府根據刑律一百四十四條而發的

命令那個嚴重的步驟。在我的愚見，這是地方政府和我意見不同的一個問題。我到這裏來的動機，是爲人道爲國家而服務。我是應一個緊急的請求，到這裏來幫助農民們的。據他們說，他們受着種植藍靛商人不平等的待遇。我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以前，自然不能幫助他們。因此，我便到了這裏來，如果可能的話，要得到地方政府和種植商人的幫忙，去研究這個問題。我沒有其他的動機，也不能相信我之來此能夠擾亂治安，或引起生命的損失。我自問在這些事上有過不少的經驗。但地方政府所見與此不同。我很能體諒他們的苦衷，也很知道他們祇能憑着他們所得到的消息來辦事。我是一個奉公守法的市民，所以我第一個感覺當然是要服從政府的命令。但我若這樣做，就未免對不起那些請我到這裏來的人們。我覺得我現在祇有在這裏才能幫助他們。因此，不能自動的撒手不管。在這個責任的衝突當中，我祇好把要我離開他們的責任放在地方政府的身上。我是充分的了解，在印度的公共生活中，佔着像我現在所佔的位置的人，應當很小心的以身作則。我深信在我們現在這樣複雜的組織中，一個自重的人，若要採取一種適當而名譽的行徑，去應付像我所處的這種局勢，就祇有做我所決定做的事，那就是接受不服從的處分，而不提出抗議。

『我作以上的陳述，並不希冀我應得的刑罰有所減免，我祇是說明我的所以違背命令，並非因爲不尊重當局，實在因爲要服從我們生命中更高的法則，那便是良心的聲音。』

現在再沒有延期開審的理由了；但因為院長和政府的起訴人都沒有想到我會取這種態度，院長遂延期裁判。在當中的時候，我把詳情電告總督，伯特拿的朋友們，和馬拉非亞（註一）及其他的人。我沒有到法庭去接受判決以前，院長派人給我帶一封信，說副總督（註二）已經下令將我的案件撤銷，征收員也給我寫信說，我可以自由進行調查，並可從官吏們得到我所需要的幫助。我們沒有人想到這件事會這樣迅速地滿意地解決。

我去見征收員希各先生。他似乎是一個好人，願意盡力主持公道。他告訴我，無論我要看什麼文件，我都可以向他要。於是這個地方便得了一個抗法運動（Civil Disobedience）第一次的直接實事教訓。這件事在當地和在報紙上都有人自由討論，而我的調查也因此得到意外的宣傳。

我的調查需要政府保持中立態度。但這調查並不需要報紙訪員，或報紙上的社論的贊助。實在說，杉伯蘭的情勢是極其複雜而困難的，所以過當的批評或色彩太過濃厚的報告，都容易破壞我希望做的事。於是我寫信給各主要報紙的主筆，請他們不必派訪員來，因為凡是應當登載的東西，我

（註一）正宗印度教中第一階級（Brahman 即知識階級）的一位有名的領袖。

（註二）基特爵士（Sir Edward Gait）。

總給他們送去，叫他們可以隨時得到消息。政府容許我在杉伯蘭的那種態度，叫杉伯蘭種植的商人，不喜歡；並且我知道，就是官吏們也不會喜歡的。雖然他們不能公然地說什麼。因此，不正確或供人誤解的報告更加容易激動他們，而他們的憤怒必定不會向我發洩，而是向那些可憐的，戰戰兢兢的農民們發洩。這樣子，我爲這件案搜索事實的目的便要受着嚴重的阻礙了。雖然我作了這種種預防，商人們還是用狠毒的手段造成一種反對我的空氣。報紙上滿載着誣蔑我和我的同工們的材料。但我極度的謹慎，和事事求真，絲毫不苟的那種精神，使他們不得不將他們的刀鋒轉變了方向。商人們對於普拉薩的攻擊，無所不用其極，但他們愈攻擊他，他便愈得人民的欽敬。

在這樣一個複雜的情勢裡，我覺得最好不請別省的領袖來。馬拉維雅治給我寫信說，無論我什麼時候要用他，祇要通知他就可以，但我沒有麻煩他，因而這鬥爭是避免了政治的意味。但我偶爾給領袖們和主要的報紙寄出一些僅叫他們曉得這些事而不能發表的報告。凡是一件起因和政治無關的事，——雖然它的結果也許是政治的，——我們叫它帶有政治的意味便是妨礙了它，使它不越過非政治的界線便是幫助了它。無論在那一方面爲人民服務，而沒有自利之心存乎其間，最後對於國家必有政治上的幫助。詳記杉伯蘭調查的經過就無異敘述農民本身的歷史，這自然是辦不到的。杉伯蘭的調查是對真理與亞希薩一個勇敢的試驗。這試驗表明了它們改正人類錯誤的無上威權。這調

查不能在哥樂巴布的住宅舉行，除非叫他把它幾乎完全騰讓出來。但那時莫地哈里的人民還沒有消除他們的懼怕，甚至連一所房子都不敢租給我們。但普拉薩機智地弄到一所空的木屋，四圍還有許多空地，我們於是遷到那邊去。

進行這件事而沒有經濟是不大可能的。從來沒有人爲這一類的事向公衆募過款。普拉薩和他的朋友大部分是做律師的。他們或是自己捐款，或因有特別的事故，向朋友募捐。我已決定不要接受農民們任何的捐輸；我也決定不爲此事向全國募款。因爲這樣做便使它帶着政治的意味。孟買的朋友願意捐助一萬五千羅比，（註一）但我致謝他們，而不肯接受。我決定盡力從住在杉伯蘭外的貝哈爾富戶募到應用的款，如果還不夠，便向仰克的朋友麥達博士設法。麥達博士馬上答應了，凡有所需，必定寄來。於是我們便不必再爲這一個題目擔心。我們大概是不會需用巨額的款項的，因爲我們要顧慮到杉伯蘭的窮困，竭力撙節。後來竟不出我們的所料。我記得我們所化的全數不過三千羅比，還從捐得的款裏面剩下幾百羅比。

在起初的時候，我的同事們所過着的奇特生活，從費用方面而言，實在是一個笑柄。每一個律師

（註一）即一千金鎊或五千金圓。

都有一個當差，一個廚子，因而每人便要有一所自己的廚房。他們的晚餐有時候到半夜才喫。雖然費用是他們自己支付的，這種不規則的生活，究竟使我厭煩。我們現在已經變為深交，彼此沒有可以誤會的地方，所以他們對於我的譏笑殊不在意。最後，大家商妥將當差取消，將廚房合併，並嚴守一定的時刻。因為大家不全是素食者，而設兩個廚房費用又未免太大，於是他們決定祇要一個素食的廚房。大家也覺得食物必須簡單。

這些辦法既大大的減輕我們的開銷，並在工作緊張的時候，給我們省出許多時間和精力。成羣的農民到那裏去向我們陳述；他們是源源而來，把院子和花園都塞滿了。同他們設法叫我避免會見那些為瞻仰丰采而來的人，他們的努力是有效的。我們至少用五六個義務員將口述的話筆記起來，但雖然這樣，還有些人到晚上還得不到陳述的機會便走了。這些陳述並不都是必需的，其中有許多是重複的，但人民非如此不滿意，而我也能體諒他們對於這件事情的感覺。筆記的人要遵守若干的規則。每一個農民都要嚴密地經過反覆的問訊，凡不合格的都遭摒棄。這樣辦法要多費許多光陰，但多數的陳述便因此有了顛撲不破的價值。將陳述筆記的時候，偵緝部總有一位官員在場。我們本來可以阻止他們的，但我們自始即決定，不但不要以他們在場為嫌，並且要以禮待他們，並供給他們消息。這於我們毫無害處，而事實上農民們因為是在這些官員面前陳述的，便更覺得無所畏懼。一方面

他們過度的懼怕可以消除，同時因有官吏在場，言過其實的弊病，也可以受着限制。設阱害人是偵緝員的分內事，所以農民們自然是要小心的。

因為我不願激惱種植商人，祇想用溫柔來勝服他們，所以遇到有人嚴厲地指謫他們的時候，我必定寫信給他們，並約期和他們晤見。我也把農民的苦况向種植商人協會陳述，並聽取他們對這件事的意見。商人中有的恨惡我，有的不置可否，也有幾個以禮相待。普拉薩與那仁特立兩人真是世無其匹的。他們的忠誠，使我不能沒有他們的幫助而前進一步。他們的弟子或他們的同伴常和我們在一塊。他們都是貝哈爾人。他的主要的工作，是把農民們所陳述的筆記起來。

克伯蘭尼教授除了和我們共同奮鬥以外，沒有別的辦法。雖然他是一個新地人，他比一個在貝哈里生長的人還有貝哈理的風格。我沒有見過多少像他那樣能入鄉隨俗的人。他叫人不能覺着他是一個從外省來的。他可以說是我的主管門房。在這一時期，他的全副精神都放在使我避免那些要來瞻仰丰采的人們那件事上，他推却那些人，有時用他的源源不竭的幽默，有時用他的非武力的恐嚇。到了晚上，他便執起教員的職務，將他從歷史研究或觀察所得的饜其同伴，並使畏縮的來客壯起膽來。

海格已經在長期幫助者的名單上簽了他的名字。這些人是隨時聽候着我的差遣的。他每月總

來探聽一兩次。他當時所過的那種膏粱文繡的生活，和今日的簡單生活比較起來，適成一個極端的對照。他同我們所發生的那種關係，使我們覺得他是我們當中的一個，雖然他的時髦的衣服叫一個生客得到另外一種印象。（註一）

（註一）他在一九二九年去世以前，完全渡着宗教隱士的生活。

甘 地 自 傳

第十九章 開拉

我在貝哈爾多得了一些經驗以後，便感覺如果沒有適宜的鄉村教育，要在那裏做一種有恆久性的工作是不可能的。農民們真是愚昧得可憐。他們不是讓他們的兒童閒遊着，便是叫他們在藍靛農場裏從早到晚做工，每日賺幾個銅元。在那些日子，一個男工人的工資不過十比士（註一），女工不過六比士，童工三比士。每日能賺四安那（註二）的，那便是最幸運的人。我和同工們商議，決定在六個鄉村裏開辦初級學校。我們同鄉民們所訂的一個條件，就是他們要供給教員們的食宿，其他的費用概由我們擔任。鄉民們差不多是沒有現錢的，但他們很可以供給貨品。其實他們已經表示，願意捐助糧食和其他的原料。到那裏去找教員却是一個大問題。我們在當地很難找到那些肯為一份僅足糊口的薪金或完全沒有報酬而工作的人。我的主張是永遠不要把兒童交托給平庸的教員們。他們的學問還不如他們的道德的重要。

於是我發出一個徵求義務教員的公啓。應徵的人很踴躍。德士潘地派蘇文和盤特力來。高哈理

夫人則來自孟買，維殊安比晏夫人來自普那。我又派人到學院去叫高大樂，蘇仁特蘭那，和我的兒子德夫達來。大約在這個時候，德西（註三）和巴力克同他們兩位夫人，也投身到我這裏來。我的妻也從沙巴麻地被請了來擔任工作。這是一個很有力量的隊伍。亞芳蒂加比和安南狄比都是受過相當的教育，但德西夫人和巴力克夫人僅識一點古查拉文，而嘉雪脫比（即甘地夫人）連那個也沒有。她們怎能用北印度文來教授兒童呢？我對她們說明，我希望於她們的，與其說是將文法教給兒童，毋寧說是教他們潔淨而有禮貌。就文字而論，古查拉文，北印度文，和馬拉刺文，都沒有她們所想的那樣大的分別。無論如何，在初級的班次教授粗淺的字母和數字，並不算是一件難事。結果是這幾位太太們所擔任的班次成績最佳。這個經驗養成了她們的自信力，並增加他們對工作的興趣。亞芽蒂加比的學校變成一個模範的學校。她把全副精神和她的特長都放在工作裏面。我們藉着這些太太們，也多少能與鄉間的婦女接近。

（註一）十比士（pice）等於金圓五分。

（註二）四安那（annas）等於金圓八分。

（註三）德西（Mahadev Desai）在這些年中變成甘地最忠心的書記和朋友。甘地遺本自述能從古查拉文譯成英文，亦大半是

他的力量。

但我不肯以辦理初級教育爲滿足。那些鄉村都是不潔淨的，街上穢物堆積；井的四週全是泥濘，惡臭觸鼻，院子裏面也骯髒得使人難堪。年長的人對於清潔教育是非常的需要。他們全都患着各樣的皮膚病。於是我們決定能做多少衛生的工作就做多少，並設法深入他們生活中的各部分。這件工作是需要醫生的。我們請印度服務社將德夫醫生借給我們用。我和他已經是個深交；他毫不遲疑地報効服務六個月。教員們都要在他手下做事。他們都得了一個明白的訓令，囑他們對於涉及政治或商人虐待農民這一類的事，都不要干預。凡有所陳訴的人都要叫他們來見我。各人都不許越過他的職守。那些朋友們都異常認真地照着這個訓令做事。我不記得有過甚至單單一次的犯規則的事。在可能範圍以內，我們叫每一個學校都有一個男的或女的管理人。這些義勇員們還要料理關於醫藥衛生的事。關於婦女們的工作，是要婦女們去出頭接洽的。

醫藥的工作是很簡單的。供給義勇員們的藥品只有草麻油，金雞納霜，和硫磺膏。如果病人舌上有苔，或患便秘，便用草麻油。發熱的是先服草麻油，後服金雞納霜，至於瘡疥之類，是先將患處洗淨，然後將硫磺膏敷上。病人不許將藥帶到家裏去。遇有複雜的症候，便去和德夫醫生商量。德夫醫生在每個星期中，有一定的時間到每一個區域裏去工作。

這一種簡單的療法有許多人採用。這裏流行病的種類不多，用簡單的療法便可見效，不需專家

的幫忙。照這樣看來，我們的辦法實在沒有什麼新奇的地方。在人民方面，這種佈置是最為恰當的。

衛生是一件困難的事。人民自己並不準備做什麼。甚至田間的工人們也不肯擔任他們自己的潔除工作。但德夫醫生不是一個容易灰心的人。他和他的義務員集中他們的力量，去使一個鄉村達到完全潔淨的地步。他們把路和院子都掃乾淨，把附近的水池填好，並以和悅的態度，勸村民們從他們自己的人裏面徵集義務員。在有的鄉村裏，他們造成人民感愧的心理，使他們不得不從事工作。在別的鄉村裏，人民是極其踴躍，甚至修理道路，讓我們的汽車通過。這些甜美的經驗，也不是沒有痛苦的經驗來和它們混合起來的，那就是人民瘦不關心的情形。我記得有些鄉民坦白地表示不喜歡我們的工作。

我在許多敘會裏提到一個經驗，在這裏不妨再敘述一遍。貝提哈法是一個小村，裏面有我們的一所學校。我碰巧到了一個在那裏附近的更小的村落，在那裏看見一些衣服很醜醜的婦女。我叫甘地夫人問她們為什麼不把衣服洗乾淨。她對她們說了。其中的一個把甘地夫人帶到她的茅舍裏，對她說：『看哪，這裏沒有什麼箱廚放着別的衣服。現在我身上所穿的是我所有的唯一的衣服。我怎麼洗它呢？』告訴麻哈瑪治（指甘地）給我買一套新衣服，我便答應每天洗澡，換乾淨的衣服。

這一個茅舍並不是一個例外。而是許多印度鄉村一個經常的現象。在印度無數的村舍中，人民

所過的生活是沒有家具，沒有可換的衣服，只有一塊遮體的破布的。

我還要講到一個經驗。在杉伯蘭竹和草都不缺乏的。他們在貝提哈法所立的學校，就是用這些材料做的。有人——也許是附近種植商人的人——一天晚上把它放火燒了。大家以為不宜再用竹和草來蓋一所村舍。學校是由蘇滿和甘地夫人管理的。蘇滿決定蓋一所恆久的房屋。他華華不倦，以身作則，竟得到許多人和他合作，不久便蓋好了一所磚房子。現在不怕這房子被燒燬了。這樣子，義務員們有了學校，衛生的工作和醫藥事業，便得到鄉民的信仰與尊重，並在他們的身上有一種良好的勢力。但我應當很抱歉地承認，我要把這件建設工作放在一個永久基礎上的那個希望沒有實現。義務員是為短期工作而來的，我又不能在外面再找些人來加入，而恆久的義務員在貝哈爾是得不到的。我在杉伯蘭的工作完結以後，當時在外面正預備着的工作便把我拉了去。雖然如此，在杉伯蘭幾個月的工作是根深蒂固的，直到今日，我們在那裏還可以看得見它的影響。

我上面所說的這種服務事業正在舉辦的時候，記述農民們苦況的工作也有長足的進展。記下來的陳訴有幾千個。它們是決不會沒有影響的。來陳訴的農民們，人數增加不已，因此種植商人的怒火益發燃熾起來。他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要為調查的事與我們抗爭。

有一天我接到貝哈爾政府的一封信，說我的調查，已經延長到一個很可觀的時間。雖然信裏的

話很客氣，但它的意義却是明顯的。

我回信說，調查非延長不可；除非人民已經得到救濟，我無意離開貝哈爾。我又說明，政府不是沒有辦法叫我的調查停止的，那就是承認農民們確是受着冤抑，設法替他們申雪，或是承認農民們已經做成了一個應由政府派人調查的案情。

副總督愛德華該特爵士 (Sir Edward Gait) 叫我去見他，表示願意派一個委員會，並請我做委員之一。我把其他委員的名字都探訪出來，和同工們商量過以後，便答應加入委員會，但附有以下的條件：我要爲此事隨時和我的同工們商量，政府應當承認我仍然是農民們的辯護人，如果調查的結果不能使我滿意，我仍然要自由地領導他們，並做他們的顧問，去決定採取應有的行動。

該特爵士接受了這個條件，隨即將調查的事公佈。佛蘭克雪萊爵士被任爲委員長。委員會審查的結果，認農民們的聲訴爲有理的，並認種植商人的榨取的一部分爲不合法，建議由種植商人退還，並將「田家達」制度以法律廢除之。

委員會之得以提出全體一致的報告書，和土地法之得以照委員會建議通過，該特爵士都甚與有力。若非他採取一個堅決的態度，用他所有的智謀來應付這件事，恐怕報告書是不會一致，而土地法也不會通過的。種植商人們運用了他們神通廣大的權力。雖然土地法是根據報告通過的，他們還

是加以強頑的反對，但該特爵士始終堅持，把委員會的建議完全實行。

存在了將近百年的『田家達』制度於是得以廢除，而杉伯蘭『種植商人的王國』亦隨之而終止。一向被壓迫着的農民們，現在稍稍可以抬頭，而藍靛污點永遠洗不掉的那種迷信也就破除了。我們想把這件建設的工作再繼續下去幾年的工夫，多設些學校，並以更有效的方法，為鄉村做些深入的工作。地步是已經預備好了，但正如已往時常所遭遇的一樣，上帝不喜歡讓我實行我的計劃。

杉伯蘭的鬥爭了結以後，在開拉一帶因為普遍的農事歉收的原故，發生了一種近乎荒災的現象。農民們正在考慮，請求免征當年的田賦那個問題。我還沒有為農民們有什麼具體的策劃以前，德嘉爾已經向區官報告，並當面討論此事。潘地亞和巴力克也來加入這個鬥爭，並藉着伯特爾和新近去世的巴雷克爵士的力量，在孟買立法會議裏面作一番鼓動。為這件事向總督請願的團體不止一個。我這時候是古查拉公會的會長。公會向政府上呈文，打電報，並甚至對於區官的侮辱與恐嚇都一概容忍着。官吏們這一次的行為實在是太過可笑而不莊重，在今日看來，似難置信。

農民們的要求，清楚有如白晝，同時又不走極端，很有可以接受的理由。照着田賦的章程，如果收成是在二分五或二分五以下，農民們便可以要求將當年的田賦完全停征。據官家的報告，收成是在二分五以上，而農民們則認為是在二分五以下。但政府置他們的話於不理。最後，所有的請求都失敗

了，我與同工們商量過以後，便對農民們主張實行靈力運動。

除了義務員以外，我在此次鬥爭中的主要同志是伯特爾，邦克爾，安那蘇雅本，雅吉匿，德西，及其他。伯特爾加入運動的時候，把他的方與未艾的律師業務停止了，以致後來總不能完全把它恢復過來。我們的總機關是設在安那達雪林，因為得不到別的可以容納我們全體那麼大的地方。靈力運動人員要簽立以下的誓約：

「我們知道我們鄉村的收成是在二分五以下，所以請政府將田賦停征一年，但政府沒有答應我們的請求。所以我們在下面簽名的人鄭重地聲明，決不自動把本年全部或剩餘部分的賦稅向政府繳納。我們聽從政府採取它所認為適當的法律步驟，並情願擔當因罷稅而發生的結果。我們甯可讓我們的土地被沒收，而不肯因自動納稅，使人以為我們所說的話是假的，或使我們喪失我們自己的尊嚴。但如果政府答應在全區內緩征本年第二屆的田賦，我們當中有能力的人便可以把賦稅的全部或剩餘的部分繳納。現在能夠繳納的所以還不繳納，就是因為如果他們繳納了，較窮的農民便要發生恐慌，以致變買家具或舉債來納稅，因而又叫他們自己受苦。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覺得為幫助貧民起見，甚至那些有力繳納的，現在也應當暫不繳納。」

這運動得到一個意外的終結。很清楚的，人民已經疲敝了，而我也不願意叫他們抱着不屈不撓

的精神而陷於絕境。我正在四處探索，想找到一種結束這個運動而同時叫靈力運動者可以接納的體面方法。這樣的一個方法很意外地出現了。我得到一個消息，說如果有錢的農夫繳納了窮的便可以許其緩付。我去問征收員，門拉達所報告的這種辦法，是否適用於全境。關於這一類的事，只有征收員有權決定。他回答說：門拉達信中所提的緩繳辦法，已經有明令公佈了。這是我所沒有想到的，但如果是事實，人民宣誓的目的便已達到了。讀者可以記得，誓約正是以此為目的。因此，我們便表示對於這個辦法的滿意。

但這個結局殊不使我欣悅，因為它缺少了每一個靈力運動終了時所應當有的莊嚴。征收員還是照舊行事，彷彿沒有經過協定一般。雖然窮人可以緩繳賦稅，但沒有人得到實惠。人民應當有權決定誰是貧窮的，但他們也無力行使這個權利。所以雖然大家為着這個結局而慶祝靈力運動的成功，我却覺得怎樣高興，因為它缺少一個完全勝利的要素。靈力運動的終結，除非它使運動者比起首時更有力量，更有精神，就不能認為是有益的。

杉伯蘭是在印度僻遠的一隅，並因為報紙到不了這裏，所以不能吸引外來的遊客。開拉運動的情形就與此不同了。古查拉人對於這個鬥爭十分注意，因為這在他們是一件新鮮的事。他們準備傾出所有的資財叫這個運動成功。叫他們曉得靈力運動不是單靠錢財可以推行的，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靈力運動需要最少的就是金錢。雖然經過我的規勸，孟買的商人仍是給我們寄下來，並過於我們所需要的，以致運動終了的時候，還有餘款。

同時靈力運動的義務員不得不學習簡單的生活。我不敢說他們已經充分的了解簡單生活的意義，但他們生活的方法確已大大的改變。

這門爭在農人們也是一件新鮮的事，因此我們便要挨次到村莊裏解釋靈力運動的道理。主要的事是叫他們明白官吏不是人民的主人，乃是他們的公僕，因為他們的薪水是從人民的捐稅來的，所以人民不必怕他們。再者，叫他們曉得循禮守法的精神應當和大無畏的心理聯合起來，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他們一旦曉得官吏們是不必懼怕的，我們又怎能叫他們對於官吏的凌辱不加以報復呢？但是如果他們失掉了循禮守法的精神，這便要破壞靈力運動，好比把一滴砒霜放在牛奶裏面。我後來覺出來他們對於循禮守法的這個教訓還沒有我所想的那樣了解。經驗告訴我，循禮守法是靈力運動最困難的部分。所謂循禮守法不只是臨時在外面表示出來的溫和言語，它是一種內蘊的溫和，和以善意對待敵人的願望。這些美德，都應當在靈力運動者的一舉一動裏表示出來。

在起首的時候，雖然人民表示出不少的勇氣，政府似乎並無採取強硬辦法之意。但人民後來還是抱着堅決的態度，於是政府便開始用高壓的手段。差官們將人民的牲畜變賣了，並把凡拿得動的

東西都押扣起來。有的人是接到罰款的通知；還沒有收割的莊稼，也有被押扣的。這樣一來，農民們便失掉了勇氣，有的是把稅付了，有的把能變賣的動產放在官吏面前，叫他們押扣了來抵償應付的稅。還有的人是預備奮鬥到底。

這些事情正在進展的時候，巴力克的一個佃戶把那塊地的稅付了。這件事引起大家的驚愕。巴力克爲圖補救起見，馬上把那塊地捐出來，作慈善事業之用。他因此便保存他的名譽，而且爲別人立下一個好榜樣。

爲要使驚懼的人們得到一種心理上的鍛鍊起見，我勸人民在潘地亞指導之下，把一塊據我的意見不應當押扣的地上種着的洋蔥拔去。我以爲將種着的莊稼押扣，即使是照着法律辦理的，從道德上來說是錯的，並且簡直等於掠奪，因此人民便有將洋蔥拔去的責任，雖然那地是已被押扣的。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叫人民學習借端生事，以期被罰或入獄。在潘地亞，這正是從心所欲。在沒有人爲一件照着靈力運動的原則去做的事而吃過苦的時候，他不願意這鬥爭便終止了。於是他自告奮勇，到那塊地將洋蔥拔去，還有七八個朋友幫他的忙。

政府是不能看着他們不管的。莫漢樂和他的同伴的被捕更鼓起人民的熱心。入獄的懼怕既已消滅，壓迫適足使人民壯起膽來。開審的那一天，他們成羣的人把法院包圍起來。潘地亞和他的同伴

被定了罪，得到一個短期監禁的處分。我以為這個判決是錯誤的，因為照着刑律的解釋，將洋蔥拔去不能算爲『盜竊』。但他們沒有提出上訴，因爲我們的政策是要避開法庭。

人民列隊護送『罪犯』們入獄；在那一天，潘地亞從民衆賺得『洋蔥賊』那個徽號，直至今日，他還是享有着。

第二十章 戰務會議

慘酷的歐戰還在進行着。現在是到了一個危急的關頭，於是總督把各界的袖領請到德里去開一個戰務會議，我也被請出席。在這時候，總督金士福和我之間有一種親善的關係。我應召到了德里去。我本來是反對參加這個會議的，主要的理由是：像阿萊氏弟兄們那樣的領袖沒有被請。他們那時正在獄中。我只見過他們一兩次，雖然我聽過許多關於他們的事。大家都很稱贊他們的服務和他們的膽量。我那時還沒有和沙哈發生什麼密切的關係，但露特拉校長和安德烈會對我講到過許多稱贊他的話。我在加爾吉達的回教公會裏，曾會過喬利希和季查先生，也見過安德烈博士和拉文博士。我是要得到回教徒中的優秀分子來做我的朋友，也要藉着回教徒最純潔最愛國的代表們去認識回民的心理。因此，我爲要同他們結交起見，無論他們要我到那裏去，我都用不着有人來勉強我。

我在南非的時候，早就曉得在印度教徒與回教徒之間沒有真摯的友誼，因此，我每逢碰到使他們可以解除團結的障礙的機會，總不肯放過。我向來不肯用阿諛的委曲求全的方法去做調解的工

作，但我在南非的經驗使我確信，我的亞希薩主義將要在印回團結那個問題上遇到最嚴厲的試煉。我現在還是這樣相信。在我生活中的每一分鐘，我都感覺上帝在試煉我。我既抱着這個堅強的信念，所以從南非回來以後，我很覺得與亞萊氏弟兄們結交的重要。但我還沒有很認識他們的時候，他們就入獄了。穆罕默德亞萊在獄吏許他的時候，常從比杜爾和金特華拉寫信給我。我請求晤見弟兄們，但沒有成功。我在他們入獄以後被回教朋友們請去參加在加爾吉達舉行的回教公會會議。他們請我演講，我所講的是回民關於營救亞萊弟兄們的責任。

我接着就和政府通信，請求將弟兄們釋放。我會爲這件事研究弟兄們關於基拉法運動的意見。

（譯者按：基拉法運動 the Kalifat 是在歐洲大戰後發生的。回教教主（Caliph）於土耳其戰敗之後，忍辱作城下之盟。戰勝的協約國對於教主的權位且有吞滅之勢。這件事自然影響到回教最關重要的地方。照向來的規矩，回教教主之職是由土耳其皇（Sultan）兼任的。印度七千萬的回民會向協約國要求，如果回民參加對土戰爭，教主的政治和宗教的權力都不得有所損害，教主對於聖城麥加（Mecca）和麥典拿（Medina）的保管權亦不該受任何干涉。英首相洛愛喬治關於此事曾於一九一八年一月有印度回民認爲滿意的答覆。但大戰停止以後，協約國對土皇的待遇顯與洛愛喬治所應許的背道而馳。印度北部的回民因此大爲鼓噪，發起一個擁護教主的運動，名爲基拉法

運動。甘地彼時正從事於印回聯合的工作，對此運動認為是合理的，而竭力贊助。此事與甘地的印度自治運動極有關係，因原書未及，故附錄於此。）

我會和我的回教朋友討論過，覺得我如果真正要做回民的朋友，我便應當為營救弟兄們和解決基拉法那兩件事竭力幫忙。這件事的絕對是非，我不願意過問，只要他們所要求的無傷於道德。在宗教的事情上，各人有各人的信仰，而每一個人的信仰在他自己是至高無上的。如果所有的人，在宗教所有的事上，只有一種信仰，那麼，世界上便只有一種宗教。我見得回民關於基拉法的要求不但不背於道德上的原則，而且也經英首相認為是公道的。因此，我覺得我應當盡力幫忙，使首相的宿諾得以履行。

朋友們和其他的人會批評過我對於基拉法問題的態度。雖然如此，我覺得我和回民合作，並無不合，我的態度沒有修改的必要。倘有相同的事件發生，我也是要採取同樣的態度。所以我到德里的時候，便滿擬把這件事向總督陳述。當時基拉法的問題還沒有發展到後來的那個地步。

我到了德里以後，關於我出席會議的事，又發生了一種波折。安得烈對於我在此時參加戰事會議，提出疑問。他告訴我，英國的報紙正為着英意密約事爭辯着。如果英國和歐洲另一個強國締結了一些帶有侵略性的密約，我怎麼好去參加那個會議呢？安得烈這樣的問。我對於這些條約一無所

知，但在我，安得烈的話已經夠了。因此我寫一封信給金士福公爵，說明我因為那些密約的原故，對於出席戰務會議頗覺躊躇。他請我去和他討論這件事。我與他和他的秘書莫費先生有一個長時間的討論，結果我答應參加會議。

總督的議論大概如下：「你當然不相信總督是曉得英內閣所做的一切的事的。我並不說英政府是不能有錯誤的。但如果你承認帝國從大體上說是一個善的力量；如果你相信印度從大體上說是受了和英國發生關係的好處，你是否也要承認每一個印度國民在危急的時候，都有幫助帝國的義務。英國報紙關於密約的記載，我已經讀過。我可以給你保證，我所知道的只限於報紙上的記載，並且你也知道報紙是慣於造謠的。你是否應當僅僅根據一個報紙上的記載，便在這樣一個緊急的時候，拒絕幫忙政府？你在大戰終止以後，可以提出任何道德問題，並隨意質問我們，但現在却不要這樣做。」

這番議論並不是新鮮的，但提出者的那種態度和提出來的那個時候都使我覺得它是新鮮的，因此我便答應赴會。至於回民的要求，我是寫信請總督處理。我終於出席會議了。總督對於招募那件事極願得我的贊助。我請總督許我說印度土語。他答應了，但提議我兼說英語。我不打算演說；我只說了一句話：「我受責任心的驅使，竭誠擁護這個議案。」許多人因我說印度土語向我道賀。他們說，據

大家所記得的，在這一類的會裏說印度土語是個創舉。我因為他們的道賀，又因為發見了我是在一個總督的會議裏說印度土語的第一個人，就想到祖國的尊嚴而覺得難過。我幾乎想把自己蟄藏起來。試想在本國所舉行的一個會議裏，所討論的又是關於本國的事，而本國的語言竟列為禁條，及至像我這樣一個偶然出席的人用印度土語來演說，便被人認為一件可慶祝的事，這是怎樣的一個悲劇！這些事件叫我們想到我們的地位是如何的低微。

我在會議裏所講的那一句話，在我是含蓄着不少的意義的。這個會議和我所贊助的那個議案，是我所不能忘記的。我還在德里的時候有一件必得做的事。我要給總督寫一封信。在我，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為政府和人民的利益設想，我都覺得我有解釋我為什麼出席會議，並述明人民對政府有何希冀的義務。我在信內，對於像帝樂克和阿萊氏弟兄們那樣的領袖之沒有被請出席表示遺憾，並述明人民在政治方面最低限度的要求，和回民由於大戰所造成的局面而提出的要求。我請求將這封信公佈，總督是欣然的許可了。

那封信要寄到閃羅去，因為總督在會議後馬上到了那裏去。在我，這信是極關重要的，而郵遞又必致把它耽擱。我要省時，但又不願隨便派人送去。我要得一個可靠的人，親自把它帶去，送到總督公署裏。安得烈和魯特拉校長提出劍橋傳教會的愛爾蘭先生的名字。他答應送那封信，但必須經他看

過，認為滿意才行。我並不反對，因為那信不是私人的。他讀過了，認為滿意的，便表示願意辦這件事。我要給他二等的車費，但他推却了，說他向來是坐三等的。他果然乘了三等，雖然那是一夜的路程。他的誠樸和語言的率直，使我一見傾心。這封從一個純潔的人的手送了去的信收了我所期望的效果：我的心是放寬了，我的障礙是掃除了。

我其他的一種任務是招募新兵。除了在開拉，我能從那裏起首呢？除了我自己的同工，我能找誰來應募呢？於是我到了那地亞後，便馬上與伯特爾和其他的朋友們商議。有的覺得不容易贊成這個提議，贊成的又怕它不能成功。我所要的這一班人，與政府之間本來沒有什麼好感。他們從政府的官吏所得到的那種痛苦經驗，現在還清楚地存在記憶中。然而他們還是贊成開始工作。但我在起首進行的時候，便馬上曉得不對了。我的樂觀遭遇了一個無情的打擊。在從前抗稅的運動裏，人民很樂意把車子免費送給我們使用，並且我們要用一個義務員的時候，便有兩個人來投効。現在呢，不要說義務員，就是出租去租車子也有困難。但我們並不因此而失望。我們決定不用車子，步行出發。我們的行程每日約二十英里。如果人民連車子都不肯供給，叫他們供給飲食，那更是笑話。於是我們決定每一個義務員要把必需的食物放在他的行囊裏。舖蓋是用不着的，因為那時正是夏天。

我們到處都有聚會。人民是到會的，但只有一兩個人應募。「你是一個許願實行亞希薩的人，你

怎樣能叫我們拿起鎗來殺敵呢？」政府會爲我們做過什麼事，值得我們去和它合作呢？他們常拿這些問題來問我們。但是我們不慌不忙的工作逐漸發生效力了。報名的人很不少，我們並且希望把第一批送走以後，別的人便源源而來。我開始同政府商議關於應募者住宿的問題。

每一個分區的招募員都仿照德里的辦法舉行會議。其中的一個會議是在古查拉舉行的。我的同工和我都被請參加。我們是出席了，但我覺得我在這一個會議裏的地位，比在德里的還不如。在這個充滿着奴隸性的空氣裏，我很覺得偏促不安。我有一個很長的演說，但所說的話都不是官吏們所願聞的，並且很有幾句逆耳之言。

我會發過傳單，請人民報名應募。我主張人民應募的理由，其中有一點是招募員所不喜歡的。我的話是這樣的：「英國統治印度，幹過許多壞事，其中最壞的一件，從歷史的眼光看來，就是剝奪全印度的武裝的那個法令。如果我們要把這個武裝法令取消，如果我們要學習使用武器，這是一個黃金的机会。如果中等階級在政府遭遇艱難的時候肯出來幫助它，政府的疑忌便要消滅，而武裝的禁例也就會撤銷了。」

在這個招募的時期中，我幾乎把身體糟蹋了。在那些日子，我的食品大宗的是花生醬和檸檬。我知道花生醬多喫是有害處的，然而我竟讓自己多喫了。結果我患了輕的痢疾。我沒有理會它，照舊到

學院去，因為我習慣是偶爾到那裏去的。我在那些日子是很少喫藥的。如果我少喫一頓飯，我覺得必定會好的。第二天，我廢止了朝食，那病似乎稍好一點。但我知道，若要叫病完全好了，我必須把斷食時間延長，並且即使要喫什麼，也只能限於果汁。那天是一種節氣，雖則我曾對甘地夫人說過，我在午餐的時候不要喫什麼，她還是引誘我，而我也就遷就了她了。因為我之誓不喫牛奶或用牛奶做成的東西，她就給我預備一種甜麥糊，裏面加了一點油。此外還有一滿碗叫「噉」的那種東西。因為我喜歡這個食品，所以我便喫了，希望只喫它一點，叫我可以嘗嘗滋味，同時叫我的妻喜歡。但魔鬼正在等候它的機會。我並非僅喫少許，我是盡量的喫。這已夠把死亡的天使召來了。在一小時之內，我的痢疾轉劇。當天晚上我不得不回到那地亞去。到沙巴麻地車站不過是一英里多一點的路，但我走得很費力。華拉比從亞米打巴上車與我同行。他看得出來我是有病的，但我不讓他曉得我的痛苦是多麼難受。

我們大約是十點鐘到了那地亞。我們總機關所在的印度教安那學院離車站只有半英里；但我我那就等於十英里了。無論如何我總算到了這地方，但刀割般的痛楚是逐漸加劇。我的朋友把我圍起來，為我異常擔憂。他們是一片愛心，侍候週到，但却不能減除我的痛苦。我的固執更使他們沒有辦法。我拒絕醫藥的療治，情願為我的過錯忍受責罰。於是他們在旁邊看着，束手無策。我在二十四小時內大約瀉了三四十次。我斷了食，起首的時候連果汁也不喝，胃口是完全沒有了。我一向以為我的身

體是鐵一般的健強，但我現在曉得它無非是一團泥土。它已失却一切的抵抗力。甘諾格醫生來懇求我喫藥，但我推却他。他要爲我注射，我也拒絕了。在那些日子，我對於注射的見解實在幼稚得可笑。我以為用來注射的藥必定是一種獸類的液。後來我知道醫生所要給我的注射是一種植物質，但這發見已經太遲了。瀉仍是繼續下去，叫我全身失却力量。身體的疲乏更促成了一種叫人瘋狂起來的熱症。朋友們更加着急，又叫了一些別的醫生來。但病人不聽他們的話，他們能作什麼呢？

安巴樂（註一）和他的良善的妻到那地亞來，和我的同工商量以後，便把我挪到他們在阿米打巴的平房裏去。沒有人能享受比我在這一次的病所享受到的更多的至愛無私的服役。但微微的發熱還是繼續着，叫我的身體逐漸消瘦起來。我覺得那病必定要延長下去，也許還要致命。在安巴樂的家裏，他們那種無微不至的愛心就像甘露一般洒到我的身上，使我感覺不安起來。我要他們把我挪回學院裏去。因爲我苦求不已，他們便聽了我的話。

我正在呻吟床席之間的時候，華拉比給我報告一個消息，說德國完全戰敗了，招募員也發出不再募兵的通告了。這消息給我一個大大的安慰，因爲我不必再爲招募的事情擔心了。我現在試用水療法，稍稍見效，但叫身體恢復原狀是一件很難的事。許多醫學的顧問給我出了無數的主意，但我總不肯叫我自己喫東西。有兩三個人勸我喫肉湯，作爲許願不喫牛奶的一種解救的方法，並引證阿育

吠陀 (ayurveda) 的話來作他們主張的根據。其中的一個更竭力勸我喫雞蛋。但我對他們的回答統統只有一個「不」字。我以為飲食的問題是不能用經典的權威來決定的。這個問題與我生活的全部是息息相關的，而解決問題的原則，在我已不復和外面的權威有什麼關係了。求生害仁的事我是不願意做的。我怎能一面把一種原則鐵面無私地要我的妻子、兒女和朋友們都遵守着，一面又讓我自己把它違反了。我這生平第一次長期的疾病給我一個唯一無二的機會，叫我可以查驗這些原則而試行之。有一天晚上，我的希望斷絕了。我覺得我已經在死神的門前。我派人通知安娜蘇雅本。

(註二) 她跑到學院來。華拉比同甘諾格醫生來；醫生按我的脈，說：『你的脈很好，你絕對沒有危險。這是極度疲弱所致的一種神經衰弱病。』但我仍然不肯相信。我一夜沒有睡眠。天亮了，但死亡沒有來到。然而我還是感覺着我的死期已近，因此當我在醒着的時候便叫院裏的人給我念紀達經。我是不能誦讀，更不願意說話，因為稍一說話，腦際便緊張起來。生的興趣是完全消滅了。因為我從來不願為生存而生存，所以現在那樣無告地生活着，自己不能做什麼，而要朋友和同工們幫忙一切，眼看着身

(註一) 安巴樂 (Sheh Ambalal) 是阿米打巴的一個實業家和慈善家，他和他家裏的人是甘地的學友。

(註二) 即安巴樂的妹子，甘地忠實的信徒，也是阿米打巴勞工運動的領袖。

體遂漸清瘦下去，那真是一種痛苦。

我正在臥着等死的時候，有一天達華格醫生帶着一個異樣的人從馬哈拉實達拿來。他不是有名聲於時的，但我一見了他，就知道他是像我那樣一個有偏好的人。他來是要在我身上試驗他的治療法。他在孟買的格蘭德醫學差不多把書念完了，但沒有取得學位。後來我知道他是一個婆羅摩沙馬治會的會員。凱爾嘉——這是他的名字——是一個特立獨行，性情固執的人。用冰來治病是他的「拿手」，他要我試用這個療法。我們給他起了一個「冰醫生」的名字。他十分相信他發見了一些合格的醫生所沒有發見的東西。我對於他的療法只相信到某一個程度為止；我恐怕他的結論有時候是在匆忙中得到的。但無論他的發明有何價值，我是讓他在我的身體上做試驗了。他的外部療法我倒不反對，那只是將冰敷在身體的各部分上。雖然我不能承認他所給我的治療有他所說的那樣效果，但它的確給我灌輸了一種新的希望，並且這種心理自然的影響到身體上去。我逐漸覺得有一點胃口，也可以緩緩的步行幾分鐘。現在他提議把我的食品改革一下。「我敢向你保證，」他說，「如果你喫生雞蛋，你必定更有力量。雞蛋同牛奶一樣，是無損於你的。你當然不能把它列入肉類之內。你知道雞蛋並非都有生殖作用的麼？市上是有滅過菌的雞蛋發賣的。」不過，就是滅過菌的雞蛋我也不打算喫，但現在這一點的進步已夠使我對於社會事業重感興趣了。

在我的健康還沒有怎樣恢復的時候，我偶然在報紙上看見剛剛發表的羅拉委員會的報告書。(註一) 它的建議使我驚奇。我把我的疑懷告訴華拉比。他差不多每天都來看我。『我們必須設法應付，』我對他說。『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能做什麼呢？』他用這問話來回答我。『如果我們可以找到即使寥寥幾個人來簽字反對，』我回答，『而政府居然無所顧忌，將那建議通過，使它成爲法律，那麼我們便應當馬上舉行靈力運動。如果我不是病到這個樣子，我必定個人單獨去抗爭，並且叫別人也跟着我這樣做。但在我現在這種沒有辦法的情形之下，我覺得我不配擔任這件工作。』

談話的結果是決定召集和我接近的少數人來開一個會議。羅拉委員會的建設，據我看來，絕不是它的報告裏所載的證據所能許可的，而且我覺得凡是有自尊心的人都必不肯遵從這樣的一種建議。

我們所要召集的會議後來在學院舉行了。被講的人不到二十。靈力運動的誓約是在會裏起草的。我記得到會的人每一個都簽了名。邦克爾對於這個運動極其熱心。我從這一次就看出他是一個

(註一) 羅拉委員會 (Rowlatt Committee) 的任務是要報告是否要用一種非常的立法手段去應付那時在孟買發生的革命運

動。報告是主張用嚴厲的處置，犯人不經審訊即可監禁。

組織的能手，並且作事孳孳不倦。因為靠現有的組織去運用像靈力運動那樣一種新的利器，似乎是完全沒有希望，我便出主意叫他們組織一個靈力運動促進會。會員多數是從孟買來的，因為總機關是在那裏。有許多會員已經開始在靈力運動的誓約上簽名，又有人印發傳單，並在各處舉行民衆大會，一切情形都同開拉運動一樣。但我自始就看到這個協進會不會支持得很久。我覺得我所主張的真理和亞希薩已經爲一部分的會員所不喜。雖然是這樣，我們這個新的活動在創始的時候頗有蓬勃之勢，並迅速地發展。

工作在進展着的時候，我求生之念也隨之而加強，因此便很着急地想痊愈。醫生們勸我能到馬狄蘭（註一）去，說我在那裏要好得快些。於是我就去了。但馬狄蘭的食水是硬性的，使我極感不便。還不到一個星期，我便不得不離開馬狄蘭了。邦克爾現在以我的健康保護者自任。他堅要我和達拉醫生商量。於是達拉醫生便被請來了。他的當機立斷的本領使我心折。他要馬上給我開刀，我也毫不遲疑地答應了。他以爲就在我的臥室施行手術也沒有什麼妨礙，於是第二天便照這樣辦。結果是完全成功。但這還不能使他滿意。『除非你喫牛奶，』他說，『我不能使你的身體復元。除此以外，你如能有鐵和砒質的注射，我敢擔保把你的身體再造起來。』

『你可以替我注射，』我回答說，『但牛奶是另外一個問題；我是立誓戒它的。』

「你所立的誓是什麼性質？」醫生問。

我把這件事的源本和立誓的理由都告訴他。我的妻站在楊旁聽着。

「但無論如何，你對於羊奶是不會有什麼反對的。」她插進來說。

醫生也乘機搶進一句：「如果你肯喫羊奶，那就夠了。」

我被屈服了。實行靈力鬥爭的熱望，使我求生之念益覺堅強。這樣，我便祇守了誓約的形式，而犧牲了它的精神，因為我立誓的時候，雖然祇想到黃牛和水牛的奶，但實際上各種動物的奶都應當包括在內。而且我既然認為奶類不是人的自然食品，我又怎樣可以喫奶呢？但我雖然曉得這一切，我究竟是答應了喫羊奶。求生的意志較服從真理的心更為有力，而這崇拜真理的人為要推行靈力運動起見，便對他的神聖的理想，有了一次的妥協。這一件事的回憶每每使我感覺不安，也叫我時常設法將羊奶戒除。但到現在，我還沒有脫離這個嗜好，因為為人服役的那個念頭仍然佔據着我的心。這些關於食物的試驗，是我對於「亞希薩」的研究的一部分，所以於我是寶貴的。它是我的一種消遣，也使我得到喜悅。然而我今日對於喫羊奶的問題還不是從食物的觀點來看，而是從真理的觀點來看，

(註一)馬狄蘭是離孟買不遠的一個小鎮。

因爲我以為吃羊奶是違反我所許下的願的。似乎我對於真理的理想的了解，比我對於『亞希薩』的理想的了解更多。我的經驗告訴我：如果我放棄了對於真理的把握，我便永遠不能解釋『亞希薩』之謎。履行所許下的願。應當形式與精神並重，這是真理的理想所要求的；我現在却是把許願的精神拋棄，祇守着它的形式：我所以覺得慚愧者實在此。但我雖然有這樣清楚的認識，我對於前途仍然沒有把握；換句話說，我還沒有循着直道行走的勇氣。無論這是疑惑，或是信仰之不篤，這二者在實質上是一樣的，因爲疑惑總是信仰不篤的結果。因此，我日夜的祈禱都是『主呀，請你把信心給我。』

傳 自 地 甘

第二十一章 羅拉案

對於羅拉委員會報告的反對當時是日益嚴重，而政府實行委員會的建議的決心，亦日益堅強。羅拉案是公佈了。印度立法院的會議我生平祇到過一次，而那一次就是辯論這個案子的時候。薩士推治（註一）有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說，對政府作嚴重的警告。總督似乎是着魔一般的聽着。他目不轉瞬地看着薩士推治，當他滔滔不絕地逞他烈火般的雄辯。他的話是那樣的真切而充滿情感。當時我以為總督免不了深深地受他的感動，然而事實却並不如此。你若叫一個人覺醒，他必定要先已熟睡了；如果他只是裝着睡的，你的努力不會對他發生什麼效果。這正是政府所處在的地位。議院的手續祇是一篇官樣文章，其實政府的主意早已打定了。因此，薩士推治嚴重的警告實在是多此一舉。在這樣情勢之下，我自己若說什麼話，也無非是曠野裏的呼聲。我誠懇地向總督呼籲，或用私函，或用公牘，明明地告訴他政府的舉動，使我除了重復舉行靈力運動以外，別無其他辦法。但這一切都無補於事。

議案還沒有在公報上發表，成爲法律。我的身體是十分軟弱，但當我接到馬達拉斯的邀請的時候，我便決定冒險作長途的旅行。我那時還不能夠高聲在會議裏演講。每逢我站起來想作時間稍長的講話，我的全身便會發抖，脈搏也要加速起來。我覺得我對於他密爾人和特利古人有一種特殊的職責：這是我從南非洲工作所得來的感覺。他們也從來沒有使我失望。請柬是由已故的愛仁嘉簽字的，但我隨後在到馬達拉斯的路上曉得主動的人却是那扎高巴拉查理。這是我認識他的第一次。他是最近才離開沙林，因已故的愛仁嘉和其他朋友緊急的請求，到馬達拉斯來執行律師的業務。我們在馬達拉斯就是住在他的家裏。

我們每天在一起討論未來鬥爭的計劃，但是除了舉行公共集會之外，我想不到有什麼其他的程序。如果羅拉議案最後成爲法律我也不曉得怎樣用『抗法運動』來反對它。我們若要不從從它，總得政府先給我們機會；若沒有這個機會，我們不能對於其他的法律施以民事的不服從。如果是這樣，我們行動的範圍是什麼呢？這些和其他許多同樣的問題就是我們討論的主要題目。我們正在這樣躊躇着的時候，就得到羅拉議案已經公佈爲法律的消息。那天晚上，我正爲這件事思索，不知不

(註一)薩士推治是當時立法委員之一。

覺地便睡着了。當夜我離破曉還很早的時候就醒來，比平常略早一些。我是還在睡與醒之間的那個矇矓狀態裏，忽然有一個意思來到我的心頭——彷彿像夢一般。清早的時候，我便把這件事的經過說給那扎高巴拉查理聽。

『昨夜我在夢中得到一個意思』我說，『那就是叫全國的人都舉行『哈達爾』』(註二)靈力運動是一種自潔的舉動，而我們的鬥爭又是一個神聖的鬥爭，所以在鬥爭的起頭，有一種自潔的表示，似乎是很恰當的。全印度的人要在那天停止買賣，禁食祈禱。因為回教人禁食不能過一日，所以期限應當是二十四小時。各省是否都給我們響應，很難預定，但我覺得孟買，馬達拉斯，比哈和新特是可靠的。即使祇有這幾個地方能夠實行，我們也應當覺得滿意了。』

那扎高巴拉查理立刻贊同我的意見。其他的朋友曉得以後，也表示歡迎。我起草了一個短的宣言。『哈達爾』是定在三月三十日舉行，但隨後改在四月六日，因此，民衆祇得一個短時間的預告。因為事情是馬上要辦的，所以不能有更早的通知。但誰能預料到這件事的效果呢？印度全國，自南至北，自東至西，無論是城市或鄉村，在那天都舉行完全的『哈達爾』。那是一個空前的奇景。

我在南印度作短期的旅行以後，便在四月四日到了孟買，我是接到邦克的電報囑我四月六日到那裏。但在這時候德里已經在三月三十日舉行了『哈達爾』。在那裏，薩哈蘭 (註二) 和亞治馬甘

的話等於法律。通告將「哈達爾」延期至四月六日的電報到達那裏已經太晚了。德里從前沒有看見過這樣一個「哈達爾」。印度教徒和回教徒聯合起來，直如一人。薩哈蘭被請到沁馬麻士吉（註三）去演講。他竟去了。這一切都是過於地方官吏所能忍受的。當遊行的隊伍向着車站前進的時候，警察制止他們，并向他們開鎗，結果死傷了一些人。政府壓迫的力量於是在德里開始。薩哈蘭以緊急的請求，叫我到德里去，我回電說我過了四月六日便馬上到德里去。

德里所遭遇的事，都在拉可與安烈沙大同小異地重演着。薩提亞波和吉殊魯都從安烈沙來信緊急地請我到那裏去。我當時和他們完全不認識，但我告訴他們，說我希望從德里到安烈沙去。

在四月六日的早晨，孟買的市民數千人結隊到周巴地海灘去，在海裏沐浴，浴畢便整隊遊行，到達渠華去。遊行的隊伍裏面有少數婦人和孩子，也有回教的人。有些回教的朋友把我們從達渠華帶到附近的一個禮拜寺去，叫我同奈都夫人在那裏演講。（註四）著拉著尼提議請我就在當時當地給

（註一）哈達爾（hartal）即罷市誌哀之意。

（註二）薩哈蘭是印度教中一個革新支派的首領。

（註三）沁馬麻士吉（Jumna Masjid）是德里的回教大禮拜寺，是遭印度教徒被請到那裏演講的創舉。

（註四）甘地和奈都夫人都是印度教徒，所以這是一件表示印回聯合的非常事件。

民衆舉行服用國貨及印回聯合的宣誓。但我反對這個提議，以爲宣誓不應當在匆忙的時候舉行，並以爲我們應當以民衆現在已做的事爲滿足。既經舉行的宣誓，以後便不應當違反。所以，服用國貨的意義和從印回聯合所發生的重大責任，都應當爲民衆所深切地認識。最後，我提議凡願舉行宣誓的，應當於次晨爲此事再行集合。

不用說，在孟買所舉行的『哈達爾』是完全成功的。關於『抗法運動』的發動，已經有了充分的準備。我們爲此事會有過一番討論。我們決定『抗法運動』的對象應當是羣衆容易不服從的那些法律。那時的鹽稅極爲一般人所反對，並且在最近一些時候已經有一個取消它的有力運動。我於是提議人民不管鹽法，在各人家內，用海水來製鹽。我還有一個關於遠禁書籍的售賣的提議。我那已經被禁的兩本書，印度自治 (Hind Swaraj) 和 沙忽達雅 (Sarvodaya) (註1) 此時正用得着。將它們公開地印刷和售賣似乎是實行『抗法運動』最好的辦法。於是我們將書印了，並決定在那天晚上終止禁食後，那個鉅大的集會完竣的時候將書發售。

在四月六日的晚上，一隊義務員跑出來向民衆售賣。奈都和我都乘着車出去。不久，書都賣完了。所得的書價都拿來充『抗法運動』的經費。這兩種書每本的定價是四安那，但差不多沒有人照着定價購買的。許多人把他們袋裏所有的錢都傾倒出來。爲付一本書的價，五羅比和十羅比的紙幣像雪

片般飛來。我還記得我賣過一本得了五十羅比的代價！人民都有人給他們解釋說買違禁的書有被捕和監禁的可能。但在那時候他們已經把一切的懼怕都拋開了。

隨後我們曉得政府爲自己的立場便利起見，認爲原來被禁的那些書沒有出售，而我們所售的乃是翻印的書。政府把這些翻印的書當作原書的新版本，以爲將它們售賣並不違法。這消息使大家都失望。

第二天早晨又召集了一個舉行關於服用國貨和印回聯合的宣誓的會。到會的祇有寥寥的幾個人。那天到會的幾位姊妹們，我現在還清楚的記得。男人們到會的也很少。我已經把誓約起草，隨身帶着。我在沒有給他們舉行宣誓以前，先把這件事的意義給他們詳細地解釋。到會人數的少倒沒有使我難過或驚異。我看民衆的態度表示着這一個特質：他們歡迎熱鬧的團體工作，而不喜歡安靜的建設工作。這一種態度到現在還沒有改變。

在四月七日的晚上我起程前往德里和安烈沙。我在七月八日到達茂特拉以後便聽見我有被捕的可能消息。我的火車還沒有到巴爾華車站，我便接到一個書面的命令，裏面說，因爲我有擾亂

(註一)沙忽達雅即萊雪片的給那最後的一個的古查拉提文譯本。

地方秩序的可能，所以不許我入本午境。警察叫我從火車下來，但我拒絕他，說：『我是爲着一個緊急的邀請到本午去，我去，不是要擾亂秩序，却是要安定人心。我很抱歉不能服從這個命令。』

後來火車到巴爾華。馬哈德夫狄西陪伴着我。我請他到德里去把新近發生的事情告訴薩哈蘭並叫人民安靜着。我叫他解釋我爲什麼決定不服從對我發出的命令，並預備受違令的處罰，還要說明，即使我受了處分，如果人民能夠保持極端的鎮靜，勝利必定屬於我們。

在巴爾華車站，我從火車裏被帶出來，由警察監視着。一個從德里來的火車不久便到了。我被放在一個三等車裏面，警察跟着我走。到了茂特拉以後，我便被帶到警察署去，但警官們沒有人能告訴我，他們要將我怎樣處置，後來要帶我到那裏去。第二天早晨四點鐘的時候，我被叫醒，并被放在一個到孟買的貨車裏去。晌午的時候，他們又要我在沙會麻墟堡下車。警察署長包令先生乘郵車從拉可到了；現在是由他管領着我。我被放在一個頭等車廂裏，與他同乘。我現在是從一個普通的囚犯變作一個『紳士』的囚犯。那官員開始滔滔不絕地讚揚奧地維雅爵士(Sir Michel O'Dwyer)。他說：爵士對我個人並無指責之處，但他怕我到了本午便會發生擾亂秩序的事，諸如此類的話。最後，他勸我自動的回到孟買，並答應不越過本午的境界。我回答說：我不預備服從那個命令，並且我不預備自動回去。那官員知道沒有別的辦法，便告訴我，他不能不以法律加之於我。『但你要拿我來做什麼？』

我問他。他說他自己也知不知道，祇好聽候着命令。『目前我是帶你到孟買去，』他說。

於是我們到了蘇拉。在那裏，我被交給另一位警官看守。當我們到孟買的時候，他對我說：『你現在恢復自由了。』但你好好在航海區附近下車，我可以叫車在那裏停止，』他接着說，『因為在高拉巴多半有一大羣的人。』我告訴他我準備聽他的話。他引以為幸，並向我致謝。我於是在航海區下了車。有一位朋友正乘車走過。他招呼我同乘，把我送到雅非力去。那朋友告訴我，我被捕的消息使人民極為憤怒，他們的激昂，已經達到瘋狂的地步。他又說：『在皮墩尼（註一）附近，隨時都有發生暴動的可能；地方官和警察都已經到了那裏。』

我剛剛到達目的地，蘇班尼和安拿蘇雅本便到了，要我馬上乘汽車到皮墩尼去。『民衆已經不耐煩了，而且是十分的憤激，』他說，『我們不能使他們寧靜下去，必須你親自出馬。』

我上了汽車。將到皮墩尼的時候，我已看見一大羣人聚在那裏。民衆見了我便歡喜若狂。他們立刻結成隊伍，喊着『祖國萬歲』和『上帝至尊』的口號，聲震天地。遊行從雅德諾滿街出發，正要向克羅佛街市前進的時候，忽然在前面發見一隊乘着馬的警察。他們到了那處，為的是要阻止他們向

（註一）皮墩尼是孟買最繁盛的地方。

着炮台的方向繼續前進。那一堆人是擁擠得水洩不通。他們幾乎突破了警察的防衛線。在這一種情勢裏，我的話決沒有被聽的機會。正在那時，指揮官下令將羣衆驅散，於是乘馬的警察便向着羣衆衝將過去，前進的時候，把手中的矛揚着。有一會兒我以為我將要受傷，其實我是過慮，那些矛祇是觸着我的車邊，執矛的人是迅速地走過。羣衆的隊伍不久便被衝散，他們在慌亂之中，馬上變成一堆亂民。有的是被人踐踏，還有的是被壓受傷。在那鼎沸般的人海中實在沒有給馬走過的空隙，也沒有叫羣衆可以潰散的出路。於是騎士們就在羣衆中橫衝直撞，殺開一條去路。我不大相信他們懂得他們所作的是什麼事。當時的情景，見了實在使人戰慄。騎士和人民合在一塊，成了一個瘋狂似的大混亂。

羣衆是驅散了，遊行也消滅了，而我們的汽車也得以進行無阻。我吩咐將車停在警察署長的門口。我下了車，把關於警察暴行的事向他申訴。在那直達署長辦公室所經過的樓梯滿佈着武裝的兵士，其勢洶洶，如臨大敵。走廊上的空氣也很緊張。我被請到辦公室的時候，看見包令先生和格理佛先生同坐着我。把我所眼見的情景向署長報告。他簡略地回答說：「我不要叫那遊行隊向砲台前進，因為在那裏免不了有擾亂。我是曉得人民不會聽勸告的，所以我不得不命騎馬的警察把羣衆衝散。」

「但是，」我說，「你必定知道這會惹出什麼事來。那些馬自然會把人民踐踏。我覺得殊無派騎士去彈壓的必要。」

「你不能下這樣的斷語，」格理佛先生說，「我們做警官的比你更曉得你的主張會對人民發生什麼影響。如果我們不用嚴厲的手段來處置，事情不久便會發展到我們所不能控制的地步。那些民衆必定會不受你的約束。他們很容易受着煽動而犯法，因為他們不懂得應當保守着和平的態度。對於你的用意我是毫無疑義的，但人民不會了解你。他們是要受本能的支配的。」

「人民的天性是和平的，不是強暴的，」我回答。

我們就是這樣子辯論下去。最後，格理佛先生說：「比如你確知道人民已經不遵從你的教訓，你將怎樣辦呢？」

「如果我確知道是這樣，我便要停止抗法運動。」

「這是什麼意思？你不是告訴包令先生說你被釋之後便要馬上到本乍去麼？」

「是的，我本打算乘下一班車去，但今天是不成問題了。」

「如果你忍耐着，你必定會曉得人民對你是取那樣的態度。你知道在阿米達巴現在所發生的事情麼？你知道在安烈沙已經發生的事情麼？到處的人民都幾乎瘋狂了。實在說，我還沒有得到所有的事實，因為有的地方的電線被割斷了。這一切的紛擾都應當由你負責。」

「我可以向你保證，我無論在那裏發見紛擾，必定馬上制止。但如果我在阿米達巴也發見擾亂，

我必定覺得傷痛而且驚奇。我不能爲安烈沙負責，因爲我從沒有到過那裏，那裏也沒有人認識我。但即使在本乍，我也確知道這一點，那就是，如果本乍政府沒有阻止我入本乍境，我對於那裏治安的維持，必定可以有不少的助力。因爲他們阻止了我，反而把人民激怒了。」

我們是這樣絮絮不休地辯論下去。我們總不能趨於一致。我告訴他，我要到周巴地海灘的一個聚會裏演講，並要叫人民鎮靜。我於是向他告別。那聚會是在周巴地的沙地上舉行的。我講了許多話來說明非武力的重要和靈力運動本身的限制。我說：「靈力運動是誠實者的利器；靈力運動者要矢守非武力的原則，如果人民不能在思想、言語和行爲上恪守不渝，我便不能忠實地推行這個運動。」

安娜蘇雅本已接到關於阿米達巴擾亂的消息。有人散播一個謠言說她也被捕了。廠裏的工人聽見這個謠言便都瘋了，罷工暴動，還把一位警官打死。我於是到了阿米達巴。我在路上就聽說他們曾圖謀在奈狄亞車站附近把路軌拔起來，還有一位政府的官員在維林甘被人謀殺，而阿米達巴也在戒嚴令之下。人民是驚慌得了不得。他們縱情暴動，現在他們是自食其賜，好像還債一般，還要加上利息。

一位警官在站上等着我，要把我護送到警察署長普拉特先生那裏去。我見他的時候，他是在盛怒之下。我溫柔地向他說話，爲那些擾亂表示歉意。我說我感覺沒有宣佈戒嚴的必要，並聲明預備與

他合作去恢復秩序。我請他許可在沙巴麻地學院舉行一個市民大會。這個提議得他首肯，而大會便舉行了。我想是在四月十三那個星期日。戒嚴令是在當天或第二天取消的。我演講的大意是叫人民曉得他們的錯處，我自己是宣佈禁食三日，以示懺悔，也請人民以同樣精神禁食一日，並叫參加過暴動的人承認他們的錯處。

我自己的職責我是看得清楚如白晝的。那些工作人員，我會用許多功夫和他們在一起，爲他們服役，信任他們，然而他們現在竟參加了暴動，這於我是多麼難過的一件事。我覺得他們的過錯我應當擔當一分。我一面是叫人民認錯，同時也請政府赦免他們的罪。但兩方面都沒有聽我的話。新近去世的納門比爵士和阿米達巴其他的市民來見我，請我停止靈力運動。他們的請求是多此一舉，因爲我已決定人民一天沒有恪守和平之訓，靈力運動便一天要停止進行。那幾位朋友很高興地走了。但是對於我的決定，還有人不滿意。他們以爲如果以各處都已平靜爲發動靈力運動的條件，羣衆的靈力運動便沒有可能。我很抱歉不能與他們同意。我曾在他們裏面下過工夫，本希望他們可以應用非武力的辦法，預備受苦，如果連他們都不能放棄武力，靈力運動當然是不可能的。我堅決地認定，凡欲領導民衆作靈力運動的，應當能夠叫他們守着所希冀於他們的有界限的非武力範圍。我到今日還是這樣主張。

在阿米達巴大會以後，我差不多馬上就到奈狄亞去。我在這裏首次用『喜馬拉亞山般的錯誤』那個名詞來形容我沒有看清楚當時形勢的那個事實。這個錯誤我已經約略的感覺到，但到了奈狄亞以後，我看見那裏實際的情景，又聽到在開拉區內有許多人被捕的消息，便恍然大悟。知道我開拉和其他地方的人民，在沒有成熟的時期舉行抗法運動是一個帶有嚴重性的錯誤。我那時正在一個民衆大會裏演說。我承認鑄成大錯的這件事，從那時起，使我受了不少的譏笑。但我絕不後悔，因為我總是相信，只有我們將自己的錯處用凸鏡來照它，使它放大，而對於別人的錯處，却用相反的方法去處置，我們對於二者才能得到一個公正的評判。我以為一個打算實行靈力運動的人更應當兢兢業業地遵守着這個原則。

讓我們來看看這個『喜馬拉亞山般的錯誤』究竟是什麼。一個人若要取得實行抗法的資格，他必定要對於國家的法律先已甘願地敬謹地服從着。在一般的時候，我們所以服從那些法律，為的是怕犯法的刑罰；在那些沒有道德關係的法律，特別是那樣。一個靈力運動的人是意識地遵守着社會的法律，因為他認為守法是他的天職。只有用這樣權量計較的精神去服從社會上的法律，一個人才有對它加以評判，而定其善惡優劣的資格，也只有這樣，他才有在清楚地劃定的範圍內實行抗法的權利。我的錯誤就在我沒有照着這種應有的限制而行事。在人民沒有取得應有的資格以前，我便

叫他們舉行抗法運動，而這個錯誤，在我看來，是喜馬拉亞山般的大。我入了開拉境以後，關於靈力鬥爭的一切回憶都湧現腦際，我便覺得稀奇，爲什麼這樣顯然的一件事我就沒有覺察。我現在曉得，人民在舉行抗法運動以前，必須深切地了解它的意義。

但我們也可以很合理地問：「慣於規避法律的人民——一般的人民大都是如此的——怎能叫他們忽然了解抗法的意義，或嚴格地在應有的範圍內活動呢？我也承認，叫數十百萬的人履行上述的理想條件，當然不是容易的事。既是這樣，所以在沒有重新舉行羣衆的抗法運動以前，便應當先養成一隊久經試煉，心地純潔，深明運用靈力的意義的義勇員。他們可以把這些道理給人民解釋，並且以極度的警惕，把他們納於正軌之內。

這些思想正在心中迴旋着的時候，我便到了孟買，在那裏招募了一隊靈力運動的義勇員，藉着他們的幫忙，把靈力運動的深刻意義教給民衆。我們的辦法是印送關於這個題目，帶有教育性質的單張讀物。這工作正在進行的時候，我便曉得叫人民對於靈力運動的和平方面發生興趣是一件困難的事。並且應募的義勇員還未足額。就是這些應募的也沒有照着規矩受有系統的訓練。經過若干時候，應募的人不但沒有增加，並且逐漸減少。我於是明白，關於抗法運動的訓練的進行，不會像我所想的那樣迅速。

奧地維雅爵士要我爲本乍的事變負責，而一些浮躁年輕的本乍人又把施行戒嚴的責任歸到我的身上。他們以爲如果我沒有停止抗法運動，查倫華拉比的屠殺就不會發生。還有人更進一步恐嚇我，說我若到本乍去，便要暗殺我。但我覺得我的立場十分清楚，凡有理解的人，對它決不能有誤會的餘地。

我很着急地要到本乍去。我從來沒有到過那裏，因此更急切地要親眼看見那裏所發生的事。請我到本乍去的沙地亞巴博士，吉殊魯博士和周達里那時都入了獄。但我確實相信政府不敢把他們和其他的囚犯監禁太久。我每達到孟買去，總有一大堆的本乍人來看我。在晤見的時候，我是給他們說幾他勉勵的話，這便使他們鼓舞起來。我的自信有着傳染的力量。但我到本乍的計劃不得不屢次改期。我每次請求總督的許可，他總是說「時期還沒有到」，而事情也就拖延下去了。

正在這時候，漢德委員會宣佈要爲本乍政府在戒嚴期間所做的事舉行調查。安得烈也到了那裏。他描寫那裏的情形，信使人肝胆欲裂。這些信使我得到一個印象，那就是從戒嚴律所發生的殘暴事件，實在比報紙上所報告的更爲厲害。他敦促我，叫我立刻去同他在一起。同時馬拉維亞基也打電報來叫我馬上到本乍去，我再復打電報給總督問他我現在是否可以到本乍去。他回電說我在十月十七日以後便可以去。

我到達拉可時所見的光景是永遠不能從我的記憶洗刷去的。車站上從這一頭到那一頭簡直是人山人海。全市的人都跑出來，緊張地等候着，好像要迎接一個多年闊別的親屬，而且是歡喜若狂。

第二十二章 安烈沙議會

我正在進行調查本乍暴行事件的時候，就聽到一些關於政府的專制和官吏的蠻橫的故事。這些事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使我十分傷痛的。一個在大戰時曾以最多的兵士供給英政府的省區，竟能俯首忍受着這些兇狠的暴行，這一件事實在我驚奇。起草議會調查報告書的責任是委托給我；凡是要略知本乍事件的真相的，我都要請他讀這報告書。在這裏，我只願意說，在那本報告書裏沒有半句誇張的話。它的每一個紀載都有事實爲之證明。還有，那些已經發表的證據無非是委員會所有的證據的一部分。凡是稍有可疑之點，都不許付印。據我所曉得的，報告書裏的每一個紀載都從來沒有被否認過。

議會的調查正在開始的時候，我便接到一封公函，請我出席一個在德里聚集，討論基拉法事件的印回聯合會議。在請柬上簽名的人有金薩希，據信上說，薩哈蘭也要出席。信上還說，不只基拉法問題，連護牛問題（註一）也要在會議裏討論。因此，據他們的意見，解決爭端，此正其時。

他們在這裏提到護牛問題是我所不喜歡的。我的回信說，我一面答應設法出席，同時我也不喜歡把這兩個問題混在一起，或把這件事當買賣來做。我主張把問題分開，就事論事。

我心想着這些事，便出席會議。到會的人不少，雖然沒有後來那些數萬人的大會那樣大觀。薩哈蘭也到了會，我和他討論上述的問題。他贊成我的主張，讓我在大會裏陳述。我也與金薩希討論這件事。我提出意見說，如果基拉法問題有它正當和合法的根據，如我所相信的；如果政府的處置實在是太不公平，那樣，印度教人便應當予以援助。他們不應當在這裏提出護牛問題，或以此為與回人磋商的条件，正如回人不應當以停止宰牛為取得印人對於基拉法事件的援助的代價。但回人如能為尊重印人宗教上的情感起見，自動的停止宰牛，這當然是另一件事，而且是一件最體面的事。但如同人為民族間的友誼計而停止宰牛，他們便不應當以印人是否為基拉法事件予以援助為決定的條件。這兩個問題應當分別單獨討論，而議決事件亦應當只限於基拉法問題。我的主張頗得到會諸人的贊同。但是雖然我發表過這個意見，回人因為要對於印人在基拉法問題上的援助表示感

(註一) 印度教以牛為有益於人類的動物，牠不但耕田，也供給牛奶，且為獸類中的最溫柔者，故應加以保護；惟回教則以牛供食品與祭品之用，是以護牛問題為印回重要爭端之一。

激之意，在以後的會議裏，常常提到他們關於停止宰牛的責任。在某一個時期中，似乎他們確實要把這件事終止。

莫漢尼也到了這個會議。我從前就會過他，不過到了這裏我才曉得他是怎樣的一個戰士。幾乎從最先的時候，我們的意見便彼此相左。在會議所通過的議案中有一條是叫印人和回人都舉行服用國貨的宣誓，並且也要實行當然與它相附而行的抵制外貨。「嘉迪」運動（註一）那時還沒有相當的地位。這一個提案莫漢尼自然不能接受。他的目的是用抵制來對英帝國施以報復，那就是說，如果爲基拉法問題得不到公道的解決。因此，他另外提出一個純粹抵制英貨的動議。我從原則的立場來反對這個提案，我那時所用的理論現在爲大家所熟知了。我也把我對於亞希薩的意見向大會陳述。我的論點給會衆一個深的印象。莫漢尼的演說得到會衆熱烈的鼓掌，因此，我恐怕我的演說只是一個曠野裏的呼聲。其實我的所以說話，無非以爲如果不把意見向大會陳述，未免不忠於所事。但事情却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而且使我覺得欣幸：到會的人對於我的演講加以極度的注意，在講台上的人，亦予以充分的援助，先後站起來表示他們贊成的意見。那些領袖能夠見到對英貨的抵制不但不能達到它的目的，而且，如果議案通過了，他們自己也要成爲一個笑柄。在會議裏面的人幾乎沒有一個沒有在他們身上服用某種英國製造的貨。因此，在座的人便有許多覺得，通過一個連投票贊成

的人都不能實行的議案，結果只有害處。

「只有抵制外國布匹不能使我們滿意。」莫漢尼說「因為誰能知道國布的產額到什麼時候才夠供給我們的需要呢？我們要有一點對英人能馬上發上效力的事。你的抵制外布的提議讓它保留着，這倒無妨，但你還要給我們一點能收急效的事做。」

我一面聽着他，一面就覺得，在抵制外布之外，還需要一點新的東西。馬上抵制外國布匹，在我看來，似乎是很清楚地不可能。在那時，我還沒有曉得，如果我們願意的話，我們可以製造國布，足夠為我們一切衣服之用。這是我後來才發見的。同時，就在那個時候，我也知道只靠織布廠來實現抵制外布的計劃恐怕終要失敗。莫漢尼演說完了之後，我還是在這個兩難的狀態裏。

我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北印度語和回教土語來應用，頗覺不便。這是我第一次向着一個大多數是從北方來的回教人的會衆作一個辨論式的演說。我會用回教土語在加爾吉達的回教公會演說，但那不過是幾分鐘的事。在這裏就不同了：我所要應付的是一個有批評的態度，雖然沒有敵意的聽衆，而我是^{the}要叫他們贊成我的意見。但我已把畏羞的心理完全拋開。我到那裏去不是要用無瑕玷的，

(註1)「嘉迪」(Khadai)即在國內紡織的布。

彫琢過的德里回教人的土語去演說，乃是要用我所有的一點支離破碎的北印度語向會衆陳述我的意見。在這一點上我是成功了。那個會議給我直接地證明，只有北印度語和回教土語混合起來的語言能夠成爲印度的國語。我如果用英語演講，我就不能對聽衆發生那天所發生的效果，而莫漢尼也許就不會說出他那帶挑戰性的話了。或者他就是說了，我也不能那樣有效地反駁他。

我不能找到一句適宜的北印度語或回教土語來表示我心中所有新意思。後來我使用『不合作』那幾個字來描寫它，這個名詞我是在這個會議裏首次使用。在莫漢尼演說的時候，我已覺得，如果用武力是不可能或不相宜的，他所說的對政府作有效的抵抗只是一句空話，因爲他同政府在不只一件事上合作。對政府唯一的真實的抵抗就是停止與他合作。這是我想到不合作這句話的來由。我那時還沒有清楚地認識他所有的多方面的意義。據我所記憶的，這個會議通過一個關於不合作的議案，但是經過幾個月以後，這個主張才得到進展，在那以前，它只是在會議的紀錄裏被埋葬着。

本乍政府不能將幾百的本乍人長久的監禁着，因爲他們的被監禁，是根據着戒嚴法，而所有的證據又都不是充分的，並且辦理這案件的，都是一些有名無實的法庭。這件很狠惡地不公道的案子受着各方面的反對，因此繼續把他們監禁是不可能的。多數被囚的人都在會議開始以前被釋。赫基山樂和其他的領袖都。是在會議正在進行時被釋的。阿理氏弟兄也是從監獄直接到那裏去。人民的

喜樂簡直是沒有止境。潘迭慕狄樂奈魯 (Pandit Motilal Nehru) 是那次會議的主席；他犧牲了他很發達的律師業務，把本乍作爲他的總辦公處的地點。

英皇所宣佈的改革方案那時適已頒發。這方案連我都覺得不滿意，別人更不用說了。但我那時覺得那方案雖然有缺點，還可以接收。我在英皇的宣言中感覺新哈爵士在裏面的意見，而它的措辭也呈露一線的希望。但那些久經戰陣的勇士，如已故的樂加門亞狄勒和地殊班都 (註一) 亦他蘭真達斯二人都搖首不以爲然。馬拉維雅基却守着中立。

馬拉維雅基把我安置在自己的住室裏。我因爲與他同住一室，所以對於他的日常起居都能詳細觀察。我所看見的使我驚奇而欣悅。他的住所有一種近乎貧民免費公寓的神氣。從室的這一隅走到那一隅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因爲它是太過擁擠。還有許多不速之客隨時到裏面去，佔他多少的時閒都隨他們便。在這斗室之一隅，擺着我的布床，彷彿很莊嚴的樣子。

我就是這樣的每天與馬拉維雅基討論一切。他時常好像一個哥哥，親愛地把各人不同的主張給我解釋。我見得我的參加關於改革案的討論是不可避免的。我既然負了起草本乍事件報告一部

(註一) 樂加門亞即人民所愛者之謂，地殊班都即國人之友之意。

分的責任，便覺得對於此案其他未了的事件，我也應當注意。有些事情是要向政府接洽的。還有那基拉法的問題。我那時還相信蒙得久先生不會把印度的鬥爭出賣，或讓它被出賣。阿理氏弟兄和其他獄囚的被釋也似乎是一個好的徵兆。在這樣情勢之下，我以為正確的辦法是接受，而不是拒絕，改革方案。

赤他蘭真達斯却不以為然。他堅決地主張拒絕這個方案，因為它是完全不澈底，不滿意的。樂加門亞是多少守着中立態度，但他已決定援助赤他蘭真所贊成的任何決議。與這些思想深沉，久經鍛鍊，為大眾所敬仰的領袖的意見相左，這於我是一件異常痛苦的事。但在另一方面，我的良心的聲音是很清楚的。我想離開會議，告訴馬拉維雅基和慕狄樂說，如果我不出席會議的剩餘部分，為大眾都有好處。這樣子，我便不必暴露我和那些被人尊敬的領袖們在意見上的分歧。

但我的提議不為這兩位前輩所贊同。有人把我的意見暗中傳達給赫基山樂。『這樣辦是斷乎不可的，』他說，『這必要傷本乍人的感情。』我與樂加門亞，地殊班都及金那先生討論這件事，但找不到一種辦法。最後我把我的難處告訴馬拉維雅基。『我看不出有什麼妥協的希望，』我告訴他，『如果我提出動議，會衆又要分裂，必須投票解決。』

『你千萬不要缺席，』他堅決地說。

我是屈服了；我把提案寫好，心驚膽戰地擔任動議。馬拉維雅基和金那先生是預備着贊助這個提案。我能夠看出來，雖然我們意見的不同完全沒有使我們發生什麼惡感；雖然我們的演說，除了冷靜的推論以外，沒有別的東西，人民對於意見紛歧的那件事，是深惡痛絕，連提也不願意提；他們所要的是全體一致。

演講還在進行的時候，講台上的領袖們已經自由地用字條交換意見，要把這個問題解決。馬拉維雅基是用盡方法，想把紛歧之點彌縫起來。正在那時，基雅南達把他的修正案遞給我，用他那溫柔的態度，請我設法使會衆避免分裂。他的修正案甚合我的意。那時馬拉維雅基已經向各方面觀察，希望可發見一線光明。我告訴他，基雅南達的修正案，似乎雙方都可以接收。接着看這修正案的是樂加門亞；他說：『如果達斯贊成，我也不反對。』地殊班都（即達斯）後來軟化了。馬拉維雅基是充滿着希望。他把那寫着修正案的字條搶了去，在地殊班都還沒有確實說出『可以』那句話以前，便向大家嚷着說：『出席的弟兄們，你們必定喜歡曉得協妥已經成立了。』那時的情景實在不容易敘述出來。鼓掌之聲，使議場爲之震撼，而會衆愁慘的面孔也露出欣悅的光輝來。

第二十三章 嘉迪運動

嘉迪運動 (Khadi Movement) 在開始的時候，已經使我日益加以注意。在一九零八年，在我的印府自治那本書裏面，我會把手搖紡機當作救治印度日益加劇的貧困的萬應藥。在那個時候以前，我記得我還沒有看見過一具紡機。在那書裏面，我以為任何可以使印度消滅民衆極度的貧困的，同時便可以使她得到自治。就是在一九一五年我從南非洲回到印度以後，我也還沒有看過一具紡機。當沙巴麻地靈力運動學院成立之初，我們曾用過幾具紡織機。但剛剛起頭的時候我們便遇到另一種困難。我們所有的人，不是自由職業者，便是業商的，沒有一個是手工業者。在我們沒有使用紡機以前，我們需要一個紡織專家來告訴我們怎樣紡織。後來我們從巴蘭坡找到這樣的一個人，但他沒有把他的藝術全盤傳授給我們。雖然這樣，麥甘樂甘地却不肯就此罷休。他有運用機械的天才，不久便把這手藝學會，並且在學院裏面逐漸訓練了幾個新的紡織員。

我們所訂定的目標就是叫我們可以完全服用自織的布。我們因此便放棄了用印度棉紗做成

的廠布。這個辦法的採用，使我們得到許多經驗。它使我們可以從直接的接觸，知道織工的生活狀況，它們產額的多少，他們購買棉紗的困難，和受人欺騙，債務日增等問題。我們還不能馬上織造我們所需要的布。光陰過得很快，而我也益覺不耐煩。每逢看見一個似乎對於手紡工有所知的生客，我都向他打聽關於手紡的藝術。我只向婦女打聽，因為如果偶爾還有手紡工人在一個僻陋的地方活着，只有婦女們能知道她在那裏。

我在一九一七年曾被我的古查拉提朋友們邀去當布羅治教育會議的主席。我就在那裏發現了那位異乎庸俗的婦人甘嘉本。她是一個寡婦，但她的冒險精神是沒有止境的。她所受的教育，照着那個名詞的普通解釋來說，並不很多。但以膽量和常識而論，她確實超過一般受過教育的婦女。她已經超脫「不可接觸」的觀念，無畏地在被壓迫的階級當中行動和服役。她有她自己的資財；她的需要也很簡單。她有一個飽經鍛鍊的體格，無論到那裏去都用不着護送的人。馳騁也是她所習慣的。我在高特拉會議裏和她有更親切的認識。我把我關於「察卡」（註一）的煩悶向她傾吐出來。她答應我要為這紡機的事作一種熱誠的不斷的訪問，這使我心中的重負頓覺減輕。

（註一）「察卡」（Charaka）即紡機。

最後，甘嘉本在古查拉經過長期的漫遊，竟在巴路達省的維雅坡地方找到那架紡機。那裏有許多人家有紡織機，但久已將它們當作廢材，束之高閣。她們對甘嘉本表示，如果有人答應把紡線的棉條供給她們，並購買她們所紡成的紗線，她們便預備重理紡業。甘嘉本把這可喜的消息傳達給我。供給棉條是一件困難的事。我把這件事告訴蘇本禮，他答應叫他的廠供給足額的棉條，這便解決我的困難。我把蘇本禮交過來的棉條送到甘嘉本那裏去，不久便製成棉紗，其產額之鉅，使我們窮於應付。我從他那裏不斷的收取這些棉條，頗覺不安。還有，我覺得用廠製棉條是個根本的錯誤。我於是向甘嘉本提議找一些可以供給棉條的梳棉匠。她秘密地擔任這件工作，僱了一個梳棉匠。他要每月三十五羅比的報酬。我那時覺得任何酬金都不算太高。她訓練了幾個年輕的人，把梳好的棉做成棉條。於是甘嘉本的事業的發達，超過了我們的期望。她又找到一些織工，把維雅坡所紡成的紗線造成布匹，於是維雅坡的土布不久便享了盛名。

這些事正在維雅坡發展着的時候，紡機已經在宗教學院迅速地佔了一個位置。麥甘樂甘地還用他的機械的天才，把紡機改進了許多。紡機和附件起首可以在學院裏製造。學院織成的第一匹土布，每碼價值十七安那。布雖然粗，價雖然貴，我還是不遲疑地勸朋友們購買，而他們也甘願出這一個價錢。

我在孟買抱病，但我還可以在那裏尋找紡機。後來我碰巧找到兩個紡工，便把他們帶到我的住宅來。那機輪起首在我的室內軋軋作聲，狀至愉快。我可以沒有誇張地說，我的健康的回復，機輪的聲音實大與有力。我預備承認。這由於心理關係，比生理關係更多，但即使是這樣，我們也可以明白，心理對於生理的影響，是何等的偉大。我自己也從事紡線，但我當時並沒有為這件事用許多功夫。

從起首的時候，嘉迪運動便很受廠主們的批評。一個有能幹的廠主名叫蘇本尼的，他不但把他自己的知識和經驗傳授給我，也叫我曉得其他廠主的意見。他們當中有一個所發表的議論給我一個新的印像。他一定要我見他，並為我們的晤見安排時間。他首先發言。

「你知道在這以前也曾提倡過國布運動？」

「我是知道的，」我回答。

「你也曉得在那『瓜分』的時期中，廠主們會充分的利用這個運動。在它的全盛時代，我們把布價提高，還作了一些更壞的事。」

「是的，這件事我聽人說過一點，並且很覺得痛心。」

「我能夠明白你的所以痛心，但我看你是沒有應當痛心的理由的。我們不是為慈善而做生意，我們是為利錢而做生意；我們必須使股東們滿意。一件貨品的價錢是根據需求的多寡而定的。供求

的公例，誰能把它限制呢？孟加拉的人民應當知道，因為他們的鼓動把需求的量增加，勢必使國布漲價。」

我把他的話打斷：「孟加拉的人，像我一樣，是天真爛漫的。他們充分的相信，廠主們在國事危急的時候，絕不會極端的自私自利，毫無愛國心腸，把祖國出賣，甚至把洋布冒充國產。」

「你相信人的天性，我是曉得的。」他接着說，「我就是為這個原故，請你屈駕到這裏來，叫我能夠警告你，不要像這些樸實的孟加拉人，陷入那樣的錯誤裏。」

講完了這幾句話，廠主便向站在旁邊的書記招手，叫他把廠裏所製成的東西的樣本拿來。他指着它說：「你看，這是我們廠裏最近的产品。這一種布銷路極廣，它是用廢布製成的，價錢自然便宜。我們把它運到北方，遠至喜馬拉亞山谷。我們在全國各地都有經理，甚至你的聲音或你的代理人所不能到的地方都有。你因此可以見得，我是不需要更多的經紀的。況且，你應當知道，印度的布的產額，遠在需求之下。因此，國布運動說來，無非是一個出產的問題。我們什麼時候能增加產額並改良質地至相當的程度，洋布的進口便什麼時候會自動的停止。我對你的忠告，就是不再照着現在的辦法去提倡這個運動，而要在開辦新廠的事情上注意。我們所需要的，不是用宣傳的方法叫人多買我們的貨物，乃是要增加出產。」

「如果我已經做着你所說的這件事，你豈不應當爲我的工作祝福？」我問。

「那怎麼能夠呢？」他喊起來，似乎有點莫明其妙。「但也許你是想着提倡開辦的布廠，如果是那樣，當然應當恭賀你。」

「我所做的，不盡和你所想的相同，」我給他解釋，「我是要把紡機恢復。」

「那是什麼呢？」他問，似乎更不了解我的意思。我把關於紡機的一切和我怎樣費了許多功夫才把它找到的故事都告訴他。我接着說：「你叫我不變成布廠事實上的經紀，這我是完全和你同意的。這樣辦，對於國家是害多於利的。在以後的一個長時期中，我們的布廠不愁沒有主顧。我的工作應當是，而且現在就是，爲手織布的生產組織起來，並設法將這樣造成的國布推銷。因此，我現在是集

中我的精神在國布出產的那件事上。我把這一種國貨運動當作我們的救星，因爲我可以藉着它爲那些只有一半時間有工作而僅得半飽的印度婦女找到工作。我的意思是要叫這些婦女紡紗，並把從這些紗所織成的布給印度的人民穿着。我不知道這個運動能成功至何程度。現在只是剛剛起頭，但我對它有完全的信仰。無論如何，它是沒有害處的。即使它在國布的產額上，只增加了一點，也算是一種切實的成績。你從此可以見得，我所提倡的運動，沒有你所想的壞處。」

「如果你組織這個運動，是有着增加產額的用意，」他回答說，「我並不加以反對。在這用機器

的時代，手紡機能佔什麼地位，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但就我一人而論，我願祝你成功。」

讓我繼續述說不合作運動的故事罷。阿里氏弟兄所鼓動的關於基拉法問題的風潮，正在激昂的時候，我和已故的阿都巴里和其他的人詳細的討論這件事，特別關於回教人能實行非武力主義至何程度的問題。後來大家都同意，以為回教在政策上並不反對非武力，並以為如果他們為這種政策會立過誓，他們便應當忠實奉行它。最後關於不合作的議案在基拉法大會被提出來，經過長時期的磋商後，便被通過。我還記得很清楚，有一次在阿拉哈巴，一個委員會怎樣的為這個問題，會商達旦。在始初的時候，已故的亞治馬金對於非武力不合作這個辦法，頗為懷疑。後來他的疑團冰釋，他便以全副精神，參加這個運動，給了它很有價值的貢獻。

這時候回教徒對於不合作運動，已表示接收。於是全印會議委員會便決定在一九二零年九月，為該會議舉行特會，去討論不合作問題。這特會有着大規模的籌備。拉治拔雷被舉為特會的會長。從孟買到加爾吉達有專車給會議及基拉法代表乘坐。代表和來賓在加爾吉達雲集。我被推選為這將有重大事故發生的大會草擬不合作提案。

我在提案裏說，不合作的目的，是要為本邦和基拉法的惡行得到伸雪。我的意見不為拉加華察理所贊成。「如果我們宣佈不合作，為什麼必要提到某種惡行呢？」他這樣駁我。「不給我們自治，是

我們國家所忍受着的最大的惡行。不合作也應當以此爲對像。」我很容易地接收他的提議，把要求自治也列入提案。這提案經過縝密的而且頗激烈的討論便通過了。

慕迭樂治是加入這個運動的第一個人。我還記得我爲這個提案和他有過融洽的討論。他主張把若干字句修正，而我也接收了他的意見。他答應把地殊班都拉過來贊助這個運動。他的心是傾向這個運動的，但他懷疑人民推行的實力。直等到奈波會議的時候，他和拉治拔雷才一心一意地贊成這個運動。

我在特會中很感到狄樂去世的損失。我到現在還是堅決地相信，假如他還活着的話，他在那個時候，必定爲我祝福。但即使不是這樣，而他反對了那個運動，我仍然要對於他的反對表示敬意，而以之爲我的利益，我的教育。我們的意見常有參商，但永不至於反目。他常常叫我相信，我們彼此間的交誼是極其密切的。就是在現在執筆的時候，他死時的情景，還是像一幅靈活的圖畫，住我的心中呈露。大約是在半夜的時候，雅忽嘉把他的噩耗從電話傳過來。我那時被同伴們圍繞着。我不知不覺地喊出來：「我的長城壞了。」不合作運動這時正在全盛時代，而我也正懇切地希望得到他的鼓勵和靈感。

在加爾吉達特會所通過的接受不合作運動程序的議案，須得在奈波舉行的年會追認。這裏也

有一大堆代表和旁聽人趕來。那時議會代表的數目還沒有規定。這次的人數大約有一萬四千。拉拔雷極力主張把關於抵制學校一條略加修正。我接收了他的修正案。同樣地，地殊班都也提出幾種修正來，在那以後，不合作的提案便一致通過了。

議會的目的成爲一個熱烈討論的題目。在我所提出的憲章裏面，議會的目的是取得自治的資格，如果可能，仍爲大英帝國的一部分，否則脫離大英帝國。議會裏面有一派主張將目的限於只在英帝國內求自治的那一點。這一種意見是馬拉維雅基和金那提出來的。但他們沒有得到多少贊成的票。再者，憲法草案規定必須用『和平合法』的手段去達到目的。這一個條件也有人反對，理由是說，所採取的方法，不當受任何限制。但議會經過坦白的使人折服的討論以後，便接受了原來的草案。

關於印回聯合，廢除『賤民』界線，相國布運動等提案，也在這次議會通過。從此以後，議會的印度會員便負起把『賤民』觀念從印度教革除的責任，而議會也藉着國布的提倡，使它和那些瘦骨支離的印度貧民，發生一種生活上的關係。爲基拉法而推行不合作，也是議會促成印回聯合的一個實際步驟。

現在這一本書要告結束了。我從此以後的生活，是極之公開，差不多沒有叫人不曉得的事。並且，從一九二一年以後，我在工作上和議會的領袖們，有着那樣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在敘述我以後的生

活的各階段的時候，不能不提到我和他們的關係。因為洛加門亞，薩哈蘭，地殊班都，沙哈，和拉治拔雷雖然都已不在人世，我們僥倖還有許多曾經當過議會領袖的人在我們中間，與我們共同工作。議會
的歷史還在創造的過程中，而我在已往七年關於真理的主要試驗，都是藉着議會的媒介做的。因此，
如果我要繼續着述說我的試驗，我便不能不提到我和這些領袖們的關係。至少在現在，我是不能這
樣做，即使只因禮貌的關係。最後，我對於我現在的試驗，還不能下切實的結論。因此，我覺得把我的叙
述在這裏完結，是我的很明顯的責任。實在說，我的筆也本能地不讓我繼續寫下去。

我在這裏和讀者告別，心中不無耿耿。我把我的試驗看為是很有價值的，但我不知道我是否已
為它們盡了我的敘述的能事。我只能說，我為忠實的描寫起見，我從來沒有苟且將事。從我所得的印
像，並從我追求的實況，來敘述真理，是我孳孳不息的努力。這一種嘗試會給我以心理上不可形容的
平安，因為使懷疑的人，確信真理和唯愛，是我的夙願。

我一般的經驗使我確信，除了真理以外沒有別的上帝，而實現真理的方法便是唯愛。如果這書
的每一頁沒有把這意思宣佈出來，我便覺得我為寫這書所費的心血，都是徒勞而無功的。即使我在
這件事上的努力沒有成效，錯處不在原則而在工具。我對唯愛的追求，無論它是怎樣誠摯的，究竟還
沒有達到完全的地步。因此我在一剎那間所窺見的一點真理，絕不能把它的不能敘述的光輝，形容

於萬一。這光輝的強烈，實百萬倍於我們每日所見的太陽的光。實在說，我所看見的，無非是這偉大光明最微弱的一線。但我至少可以根據着我的經驗誠實地說，只有完全實現了唯愛的，才能完全體認真理。

若要與瀾漫宇宙的真理的精神面對面地相見，我們就必須愛受造之物之最卑微者，如同愛我們自己一樣。一個有志於此的人，因此便不能對生活的任何方面取超然的態度，就是爲這個原故，我對真理的追求，使我不得不投身於政治。我可以毫不遲疑的，並以最謙卑的精神來說，凡以爲宗教與政治沒有關係的，他們只是沒有懂得宗教的意義。

與一切含生之物合爲一體，若沒有自潔的工夫，是不可能的。沒有自潔，而欲實行唯愛，那只是夢想。一個心地不清潔的人，永遠不能認識上帝。因此，自潔的範圍，就必須達到生活的各方面。自潔的努力是富有傳染性的，所以自潔的結果當然使自潔者的環境也潔淨了。

但自潔的路途是崎嶇的。一個人若要達到完全的潔淨，就必須超出愛增迎拒的逆流之上，要在思想言語行爲上變成一個「忘情」的人。我知道我自己還沒有得到這三方面的清潔，雖然我在這事上已經不斷地努力。因此，世人的獎譽都沒有使我動心，有時反使我難過。在我看來，征服潛藏着的慾念，比用武力征服世界難得多。從回到印度以後，我常常感覺到慾念在內心蟄服着。這一種感覺使

我覺得慚愧，但却不足使我自餒。這些經驗和嘗試使我支持下去，也給我以極大的喜樂。但我知道我的面前還有一條艱難的路。我必須把我自己消失至於零度。一個人若不能自動地在同類中甘居末位，就不會得到解脫，因為唯愛是極度的自卑。

在和讀者告別的時候，我要請他與我一同向真理的上帝祈禱，叫他幫助我把唯愛的精神在思想，言語和行爲上，完全實現。

第二十四章 編餘

直到這裏為止，我所用的文件，已足把應說的盡說，並把甘地的生平，用他自己的話語敘述出來。關於近來所發生的事件，讀者可以在甘地的主張（Mahatma Gandhi's Ideas）一書找到，這本書我會稱之為『歷史的背景』。因此，我在這裏便不必把那些事件詳細地重述一遍，或更進一步，敘述那最後一次還沒有完結的偉大的消極抵抗運動。那一個運動，必須等到將來的歷史家加以評判以後，我們才能認識它的真正價值，衡量它的正確分量。

我想我在結束這一本書——這書實在是一件愛的工作——的時候，最好再摘錄兩段話。第一段是在甘地著作中最精警的一篇言論，他在裏面把靈魂得救與生存的主要目的和意義的關係，用簡要的話說出來。這是在一九二四年，他剛從死亡的黑影的幽谷跑出來的時候寫的。他的摯友中有人指出他為闌尾炎而施行手術，而不相信以靈力治病的那個矛盾。有一位朋友，他是一個年老的婆羅門教的禁慾主義者，勸他到某一個巖穴去，實行幽強的生活，使他的精神能恢復支配肉體的力量。

以下是他的答覆：

「我承認我的罪過，但那是等於承認我並不是一個完全的人。不幸地，我離完全還很遠。我只是一个謙恭的完全的企求者。達到完全的途徑，我是知道的，但知道途徑並不就是到達目的地。如果我是完全的，如果我已得到充分控制情慾——即使只在思想上——的能力，那樣，我在身體上便必定是完全的。我可以坦白地承認，我每日要用許多的心力，去控制我的思想。等到我最後成功的時候——如果真可以有那一天——試想我有多少蘊藏着的能力，便因此得到解放而致於用。因為我認為我的病是思想或心理的衰弱的結果，所以我也承認，我的答應施用手術又是另一種的心理衰弱。如果我是絕對不受唯我主義的支配的，我便已安然取聽天由命的態度，但我仍然要在現在的軀殼裏活着。完全的超脫不是一種機械的功夫，是要用堅毅的勞力和祈禱才能達到的。至於我的感恩，我已經不只一次，為麻鐸大佐和他的屬員對我的優渥待遇，公開地向他們表示過。」

我的朋友在他的信內比我於人類的大先知，這是他信中最中心的一點意義，我要把它批評一下。他的心中所以有這一個混亂的思想就是因為他有了一個關於先知的工作的錯誤見解；並且拿先知們和我來比較，是礙於不倫的——在我是這樣看。我覺得我不配和歷來的先知們並稱。我是一個謙卑的真理尋求者，兢兢業業地來自我的實現，並要在此生得到靈性的解脫。我為使靈魂脫離

肉的羈絆，要經過一種訓練，而我為國家服務便是這訓練的一部分。若從這個觀點去看，我的服務可以說是純粹自私的。我殊無意於那終必朽壞的世上的王國。我所追求的是天上的王國，那就是靈性的解脫。為要達此目的，我不必到巖穴裏遁隱。我隨身帶着一個巖穴，只要我自己認識它。一個穴居野處的人可以造成許多空中樓閣，而一個住在宮殿的，如那同時為王與先知的耆那嘉，却不必造什麼樓閣。穴居者用思想的兩翼，神遊天下，心中未必寧靜，而像耆那嘉那樣的人，雖養尊處優，未嘗不能得到那超乎理解的平安。至於我，得救的道路即在為祖國與人類不斷的服役之中。我要與一切有生之物合而為一。用紀達經的話來說，我要與朋友和仇敵安然相處。因此，即使一個回教徒或基督徒或印度教徒要輕視我，恨惡我，我還是要愛他而為他服役，正如我愛我的妻或子，即使他們恨我。所以我的愛國心，為我只是達到永遠自由與平安的福地的旅程之一站。由此可見，離開宗教，便沒有政治，因為政治是宗教的一種工具。失掉了宗教的政治是一個陷阱，因為它要把靈魂毀滅。」

以上，照着甘地自己的話，就是他在生活中所要達到的目的。他的動人的誠懇和謙卑使每一個人的心都被他所戰勝。

還有一段記載，我要貢獻於讀者。那是關於潘那醫院和它的看護、醫生與客人的一段動人的描寫。那時甘地的性命危如累卵，他是被麻鐸大佐神妙的手術救了。那一副圖畫是馬哈德夫狄西忠實

地把它畫出來的。我可以用自己的名義來保證它的正確，因為我終始都在那裏，在那個唯一無二的時候，與他共憂患共喜樂。我們所看見的實在是那患病者內部人格的美麗的一個新的啓示。

『上帝用他無窮的慈悲，馬哈德夫這樣的寫着，『把我們的巴普（註一）救了。這些日子在我們的歷史裏是要永存着的。我們這印度的國家以前曾有過幸運，看見它的領袖工作着，也看見他在工作的時候，把一堆泥土鑄成一些英雄。但它還沒有看見過他的福音從他的病榻宣傳出來，在他的眼前變成具體的事實。在已往的兩個星期中，它居然看見了。從巴普進去以後，醫院便充滿了活躍着的愛的空氣，這空氣，你剛進病室的時候便要感覺到。這病室裏面今天偶然有着一種光——它是超乎時空界限的光。』

『我在這十天功夫深以得與巴普相處爲幸，雖然我不是爲他服役。那一種權利完全被醫院的看護所獨佔着。其中的一個是一位有豐富的經驗的英國婦人。她走近他的時候，他忍不住微笑。有一天，她進來講到她所畜的愛犬，並以引人入勝的詞鋒，和巴普談到各類的犬和它們的用處。第二天，她又講到她在英國和非洲的醫院的經驗，並告訴他，她如何學生遵守着醫生的囑咐，叫她不要故意向

（註一）巴普（Bapu）即父親之意，爲他自己的學院裏面的人對他的敬愛的稱謂。

人討好。第三天，她把房間用最美麗的花裝飾起來，並叫巴普讚賞她的工作。還有一個年紀輕得多的看護，也同樣地喜歡巴普。她從護士學校畢業後，第一個「私家」的病人就是甘地，她以深此爲榮。「看護並非常常是愜意的工作，它有時候是一件苦工。」她會這樣的說，「但給甘地先生當看護是一個純粹的快樂和利益。醫生來對我說：『從前你的報告並沒有用這樣清楚的手筆來寫。』我馬上回答他說：『我從前也沒有過這樣的病人。』」又有一天，她告訴我：「我的朋友們責我太過喜歡甘地；我告訴他們說，如果他們有爲他服役的機會，他們也要像我這樣做。」

「外科醫生對他的愛也像看護們那樣沒有掩飾地表現出來。他接到許多函電，恭賀他爲甘地盡心服務。他對人說：『我怎樣答覆呢？我是否應當登報作答，』說時未免有點赧然。

「我想侍候巴普的人沒有一個些微地感覺着他在侍候一個國家的囚犯。因爲他那時還是有邏兵看守着。一個動人的愛把他的感覺都壓下去了。

「但是爲什麼呢？甚至一個應當把他當作囚犯看待的人，對他的態度，也沒有和其餘的人不同之處。雅拉夫達監獄的典獄官墨雷大佐前幾天來看巴普。他說：『甘地先生，你想我是忘記了你嗎？不是的，我想我不要攪擾你。我隔了幾天沒有看你，便見你好得多了。大佐（按：指醫院院長）也對我保證，說你痊愈得很快。你的朋友們記念着你。』甘尼先生特別請我告訴你，他仍然是四點鐘起來禱告。他

們每一個人都快樂，也想你——我希望他們恆久地這樣。」謝謝你，墨雷大佐，「巴普說，「但我向你保證，我如能重復起來做事，到雅拉夫達去，仍任你的愛護之下生活着，那是再叫我喜歡沒有的。」如果你不認識他，你斷不會想到，那是一個典獄官向他的一個囚犯說話，而你從此便可想見，巴普在雅拉夫達的囚室裏面會造成什麼樣的愛的空氣。

「但我必須講到巴普的健康，不能再絮絮不休地只說他的愛的威力。他看着仍然是消瘦，但這已算不錯了。他在監獄時最高的體重是一百十二磅，現在不能比九十磅多許多，雖然這未必是準確，因為他還是臥着，不能離床。但無疑地他是日漸強壯。從他的床頂上有一條鍊垂下來，讓他可以拿着來把身翻轉或坐起來。這是我的柔軟體操，他有一天對一位朋友說。手指仍是顫震的，但已不若以前之甚。他的營養品大約是兩磅牛奶，兩個橘子，一點葡萄，比平常少一半。最好的就是他得到近幾年所沒有得到的寧貼的睡眠，因為就是在監獄的日子，甯靜之中，還是帶着工作。從我和外科醫生們的談話裏，我知道現在已沒有叫我不能放心的理由，雖然健康的恢復要經過一個長的，甚至無限期的時間。

我還用講到從印度各處流到潘那去的那些愛的泉水嗎？狄忽達（甘地的一個兒子）理應享有終日隨侍他的父親的權利，但他不得不處理那許多不分晝夜地投來問候巴普的函電，而以此為

滿足。但愛的表示還不止於函電。有一天，離那裏很遠的覃組爾的居民寫信來說，他們在某廟爲麻哈瑪治（對甘地敬愛的稱呼）祈禱，回教的弟兄們給他送一種特爲他祝過福的食物，而從希雅禮地魯玻和定迭古來的印度教徒也爭着表示他們對他的愛。一個柏爾西的姊妹寫信來說，如果醫生以爲應當給麻哈瑪治輸灌人血，她願把她的血給他。又有一位英國女士寫信來，把關於巴普的飲食的方法詳爲指示，而高哈理夫人也從孟買寫信來，說因爲麻哈瑪治現在不能紡紗，她自己每天要多紡兩小時。

「常到醫院的一個客人是一位老的領恤金的英國退伍軍人。他隔一天就拿一束花來，逕自到巴普的病室裏去。要阻止他簡直是不可能的。他不耐煩地闖到巴普的面前，拉他的手，說些鼓勵的話，幾分鐘便走了。「你放心罷，」他喊着說，「我看你比昨天好多了。我知道你必定要好的。你有多大年紀了？五十五吧。那不算什麼。你知道我是八十二歲。珍重着，至緊，至緊。」有一天，他站住問巴普：「甘地先生，我有什麼可以替你做的？」沒有，「巴普說，「請你爲我祈禱。」那我自然做，但請你告訴我，我能給你做什麼？告訴我罷，像弟兄一般相信我能罷。」於是巴普微笑着回答說：「請你相信我，在我的朋友中，有好些英國人我認爲比弟兄還要親。」那人深受感動，離開病室，向我們保證，說他每日祈禱三次，願甘地可以活到他的年紀，也告訴我們，許多英國人爲他祈禱，還有許多官員問及他。

「我這一幅圖畫將要不完全，如果我沒有提到那許多到潘那來見他們的領袖的可敬的領袖們。他們直等到現在才來，因為他們知道不好攪擾他。像基雅加那樣的一個人說，「我現在是來了，但我只要在遠處望一望他，因為我不要在他那樣軟弱的時候再勞動他。」潘迭左華樂向狄忽達保證說，他要等到他是最後的一個才來。阿里氏兄弟中的大哥來了，但他摯愛地堅執着不要麻哈瑪治和他說話，因為怕他太倦了。潘迭慕迭樂奈魯非等到第二次和他告別不肯走，而為這事故意誤了火車。拉治巴雷來了，很要和他談話，但幾乎不由自主地站開，避免和他交談。他沒有離開潘那以前，再來看他一次。似乎他有些要說而又不說的話。也許這沒有說的話把淚止住了，也許淚把它止住了。但最後，它成功了，話衝出來了。巴普帶着他那別人學不到的笑容說：「拉治巴，這真是一個再好沒有的一笑，可惜我的創口和縫線還沒有好，不然，我就大笑一頓。」拉治巴本來是要納着悶走的，現在他的心是輕鬆得多了。他也叫我們大家不要憂愁，要因上帝已用他的無限的慈悲把我們在這世界上最愛的人的性命保存了而欣悅。」

我在這裏便可以在平安協和的空氣中把巴普放下不提；他自己也是願意把敘述在這裏結束。說到這平安協和的空氣，這是他用愛的精神，時常無畏地追求真理所得的結果。他對於那個良善的外科醫生，那些溫柔的看護，和那個每天來看他，安慰他的老的英國人，都以誠摯之心相待，不下於他

對那些在他身旁，爲自由而鬥爭的，親愛的朋友和同志們的愛。他所企求的目的不是外表的勝利，無論它是怎樣光榮的，而是那在內心的，至高的愛。在那裏，在心的裏面，真誠，清潔和仁愛要統御一切。在那裏，人格的靈性試驗要繼續至於終了。在那裏——我們可以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等到我所追求的那晶瑩皎潔的精神變成我自己一種完全自然的性格；等到我已不能作惡；等到任何殘暴的或驕傲的意念，甚至頃刻之間，都不會在我思想的世界裏停留着，那時，也只有那時，我的非武力便要把全世界所有的人心震動了。』

甘 地 自 傳

譯 後

我在三年前讀了甘地自傳的原文以後，便決心把它譯成中文。這本書所給我的印像實在是太深刻了，除了新約聖經裏面的登山寶訓以外，我不記得有那一本書會使我那樣受它的感動。現在書是譯成了：這不但償了我的夙願，並且使我得了一種不可以言傳的欣悅，因為我覺得翻譯這本書是一件『愛的工作』，正如編者說他的編輯是『愛的工作』一樣。

中國的青年將要怎樣接受這本書，我不得而知，然而我相信，無論我們是否贊成甘地的主張，我們對於他的人格的高尚，志行的純潔，眼光的遠大，思想的深沉，都不得不驚奇讚歎，景慕欽慕而不能自己。甘地非武力抵抗的方法是否可以適用於中國是另外一個問題，但甘地為真理為國家而奮鬥的精神，和他的犧牲克己，久而不懈的魄力，實在給我們一種精神上的鼓舞，使我們在紛擾變動的時代中，敢做冒險開創的事業。

本書敘述的終結是一九二零年的全印大會，現在把那時以後的事情，在這裏撮要記述，俾讀者

得窺全豹。甘地在印度所舉行的不合作運動是在一九一九年開始的，直至一九二二年孟買暴動以後才宣告停止。自此以後，他便從事於一種建設的事業，一方面推行國布運動，組織全印紡織聯合會，另一方面在提高賤民地位及施行酒禁兩件事上努力。及至一九二八年西門委員會事件發生時，甘地重行提倡非武力運動。所謂蒙得久——金士福（Montague-Chelmsford）的改革案擬定一種印度的憲法，並規定每十年修改一次。當時因為憲法的修改已經到期，所以印人主張以英印人合組的委員會修改之，而英人則不主張把印人加入。這次的運動是取「抗法」的形式的。甘地在開始的時候，從他的宗教學院親至海邊違法製鹽（按鹽是政府的專利品）並叫人取締酒店，破壞森林法。於是甘地被捕了，其他被捕的，有時一次竟達四萬人，裏面還有許多婦女。

後來西門委員會的報告發表了，只予印人以地方自治的權利。這報告書自然是甘地所反對的。經過艾文和甘地的協商（Irvin-Gandhi Pact）以後，全印大會停止抗法運動，而甘地也以全印大會唯一代表的資格於一九三一年出席於倫敦的第二次圓棹會議。會議的結果與西門委員會所建議的大同小異，所以甘地仍然不滿意。他回到印度以後，重行宣佈繼續舉行抗法運動，但在沒有實行以前，甘地向總督表示，仍願磋商解決辦法。總督要求以不舉行抗法運動為談判的條件。甘地沒有答應，於是抗法運動實行了，而甘地也再度入獄。

在監獄的時候，政府允許甘地繼續進行解放賤民的工作。照政府的辦法，賤民在立法會議有特定的座位，與其他代表隔離，選舉也是在特別的投票所舉行的。甘地反對這種辦法，並決定爲此斷食至死。後來雙方商定妥協的辦法：賤民與其他的人民，共同選舉，但仍爲賤民特設議席。結果，從前拒絕賤民的許多廟宇，現在都爲他們開放，並起首有人從事於賤民福利的事業。但甘地仍不以此爲滿意。他決定絕食二十一日，以激動高等階級的天良。政府怕他在獄中餓斃，所以把他釋放了，但他的絕食仍然繼續着，以至於完結。這是一九三三年五月間的事。絕食期滿以後，甘地會宣言再次舉行抗法運動。政府把甘地釋放的時候，下令不許他遊行活動，但他違背了這個命令，於是政府再把它判定監禁一年。他，因爲在獄中沒有機會爲數百萬賤民工作，於是又決定於八月十六日絕食，但政府在那一天的下午，許可他在某種條件下爲賤民繼續努力，甘地遂停止絕食。

在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舉行的全印大會決定把羣衆的抗法運動暫行停止，但仍勸民衆在個人方面實行。甘地是擁護這種新的政策的，並主張如情勢許可，將於一九三四年八月三日恢復抗法運動。

在這一期的鬥爭中，他的從者所犧牲的，實在不少。甘地看見這種情形，心殊不安，於是在七月三十一日把他自己十八年前在沙巴麻地手創的宗教學院解散了，用以表示他個人的犧牲。他爲這一

所學院，費了不少的心血，裏面也有他許多寶貴的經驗。

這一段敘述就可以在這裏告一段落了。至於甘地的運動，將來如何發展，我們就只好等着未來的歷史告訴我們。但是無論這個運動的結果，在表面上是成功是失敗，我們相信它的已經過去的一頁，爲印度和全世界，都已經有了空前的收穫。

吳耀宗，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上海。